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海涛
封面设计 胡朝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6.5印张 324千字 1插页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贵州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50

书号3115·437 定价 1.30 元

编者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10日，1906年十八岁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1年他从流放地逃亡欧洲，后去美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哈林回到俄国，不久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是俄共（布）党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之一，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1938年3月15日被苏联当局处决。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他在青年时代就特别爱好经济理论，在流亡国外六年中，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著作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说，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说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写了一些专门著作。列宁称他为“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写过大量的文章和理论著作，著名的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年）、《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1916年）、《共产主义入门》（又译为《共产主义ABC》）（1919年）、《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1921年）等等。布哈林对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理论、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等，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布哈林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应当指出，布哈林的理论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列宁曾指出，要把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布哈林被处决后，他的著作便无人问津。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开始，各国学者又重新对布哈林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评价。最早写出的著作有悉尼·海特曼的《尼古拉·布哈林已发表著作注释目录》（科罗拉多、柯林斯堡，1958年），彼得·克尼尔施的《布哈林的经济观点》（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1959年），亚历山大·厄里奇的《苏联工业化问题的争论（1924——1928）》（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等；到六十——七十年代国外出版了大量的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各国学者写了大量研究布哈林的著作、文章。1980年6月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学院在罗马还组织了“关于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布哈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为了解国际上对布哈林思想研究的情况，对布哈林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编辑了这本《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我们编辑的原则是：注意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促进开展学术研究；注意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有利于

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的学术资料。为此，我们收集了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力求能反映出布哈林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貌。

本译文集共收入十九篇文章。其中，关于布哈林生平七篇，哲学的五篇，政治的一篇，经济的二篇，书评三篇；把布哈林作为右倾反对派来批判的，反映当时苏联的评论和现今官方评论的一篇。

本译文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组织编辑的。主编韩佳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林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张伟垣（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王福海（河北师范大学）、秦永立（杭州大学）、赵成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参加了编辑工作。参加译文校订的有曾宪森（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田大畏（北京图书馆）、宋益民（北京图书馆）、陈为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同志。

序 言

自从一九三八年布哈林在莫斯科“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审判案中被枪毙以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布哈林定下了铁案：人民公敌，匪帮暴徒，法西斯奴仆和间谍，谋刺列宁和凶杀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杀人犯，反对党、反对列宁、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阴谋家。于是布哈林贻骂名于全球。长久以来，布哈林要么不再被提起，要么在政治需要的时候，被揪出来当作反面教员加以批判。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把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提出来研究呢？这里，有以下一些缘故。

先说布哈林的案件。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苏联政府为莫斯科审判案（包括布哈林案件）中的一些死者（包括一些主要作证人）恢复了身后名誉，有时还给予他们柴典。这些行动本身就证明了这些死者的案情是不真实的。但是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著名的人物未能得到平反。一九六一年苏联四位曾和列宁共事的老布尔什维克写信给苏共政治局要求撤销对布哈林的非法判决，恢复布哈林的党籍。一九六二年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别洛夫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公开宣布，布哈林当然不曾是间谍

和恐怖分子。布哈林的遗孀A.M.拉林娜和他的儿子尤里·拉林（布哈林）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七年两度向苏联最高党政机关要求给布哈林平反，并恢复他的党籍，长期不得音信。他们于一九七八年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请他参与布哈林的平反运动。英国罗素基金会把这封信的复本，散发给世界著名的学者、共产党人，请求支持。有一百人联合签名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审查布哈林案件，给予平反。一九八〇年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学院组织了“关于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国际上发起了一场为布哈林平反的世界性运动。世界舆论认为为布哈林申张正义，不仅是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再说布哈林的思想。自从布哈林被枪毙，二十五年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所有苏联学者都公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除斯大林的路线外，别无其他可供选择的布尔什维克方案。我国也是如此。斯大林逝世后，东方和西方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开始寻求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其他建设社会主义方案。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的改革者试图在斯大林的框子之外，寻找更适当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研究这一类问题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苏联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解释者和理论家布哈林。五十年代，彼得·克尼尔施、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厄里奇（Alexander·Erlich）首先开始研究布哈林，其后，世界各国学者对布哈林的学术上和政治上的

兴趣大为高涨，出版了大量以多种文字印行的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和大量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甚至编写了关于布哈林的剧本和电影脚本。布哈林的思想于是被重新发掘出来进行研究。

这一切情况，由于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在“十年内乱”期间，闭关自守，因而知之甚少。

我们编辑这本《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目的在于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看法，以便于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和批判性的研究。非常有趣的是，在葛兰西学院一九八〇年六月组织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前，有一份意大利的周刊发表文章说，意共想在这次讨论会上把布哈林推崇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先驱。意共葛兰西学院院长罗扎里奥·维拉里在讨论会的开幕词中说：“这种假说纯属误会，我们毫无此意，我们不想为意大利共产党封另一位圣人和保护者。”同样，我们研究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也不想树立什么新的偶像，一如我们反对树立任何偶像；也不想把布哈林思想生搬硬套地用在今天，一如我们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我们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布哈林和布哈林的著作放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加以研究，对布哈林及其思想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借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决不认为布哈林的思想都是正确无误的，即使其正确的部分仍然很大程度上没有超出苏联一国的经验，因而是有局限性的。然而，对布哈林的研究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开

阔眼界，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现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国对布哈林的研究已经开始，国际上对布哈林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布哈林问题的译文集决不会是仅此一本。

苏绍智

1981年7月

目 录

- 序 言..... (1)
- 布哈林自传..... (1)
- 尼·伊·布哈林.....〔苏〕德·彼·马列茨基 (7)
-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29)
-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苏〕尼·伊·布哈林 (70)
- 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访问记
.....〔美〕J. D. 札戈里亚 (73)
-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 (102)
- 1928年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晤..... (147)
- 布哈林社会学中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实践
.....〔美〕拉斯·维加斯 (171)
- 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匈〕乔治·卢卡奇 (216)
- 对一种通俗的社会学的尝试的批评性札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229)
- 历史唯物主义者布哈林.....〔意〕吉诺·皮奥维查纳 (298)
- 平衡论批判简介.....〔日〕岭野修 (303)
- 布哈林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理论
.....〔美〕斯蒂芬·F·科恩 (312)
-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经济发 展论.....〔日〕日向健 (349)

布哈林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	〔美〕斯蒂芬·F·科恩(370)
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一书简介	
.....	〔苏〕德·彼·马列茨基(463)
评布哈林文集《进攻》.....	〔苏〕卡皮托诺夫(471)
布哈林传奇——评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和布	
尔什维克革命》一书.....	〔英〕伊·恩·卡尔(476)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官方评论布哈林和“联共(布)	
党内右倾”资料选编.....	(492)

布哈林自传*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88年9月27日(俄历)生于莫斯科。父母亲当时都是小学教员。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他用通常的知识分子精神教育我，四岁半我就会读能写。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非常热衷于自然史的书籍，凯戈罗多夫、季米里亚捷夫、布雷姆是我喜爱的人物。我狂热地搜集甲虫、蝴蝶的标本，经常养着小鸟，还爱好绘画；同时逐渐对宗教抱嘲讽的态度。我五岁前后父亲任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督察员。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左右。这段时间的生活在“精神”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贫乏的，无书可读，但总的气氛是迷人的外省边区城市生活的气氛。我和弟弟现在“自由”得多了，摆脱了合理化的教育，“走上了街头”；生活在花园、田野之中，熟悉花园里毒蜘蛛的每一个小洞，培育“人面蛾”，捕捉黄鼠，等等。当时生活中的主要梦想就是获得《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其他类似著作。然后我们又回到莫斯科，父亲约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我们陷入了极端的贫困。我时常搜集骨头和瓶子，卖两三戈比的钱；抱着旧报纸到小铺去换半个铜戈

* 根据悉尼·海特曼编的《尼·伊·布哈林著作目录》，《布哈林自传》发表于1924—1925年。——编者注

比。这时候我进入市立小学二年级学习。还需要指出，我父亲生活得毫无条理，却很懂得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中，他最欣赏的是海涅。这个时期我简直什么书都读。海涅的诗我能倒背如流。背熟了科齐马·普鲁特科夫的作品。还在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遍读了古典作家的作品。作为趣事我可以说一下，在这个年纪我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以及科尔什的《古代文学史》。这种无系统的阅读（“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时造成了一些怪事。例如我记得，读了一些很不高明的西班牙骑士小说之后，我在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成了西班牙人的热烈拥护者。在科尔什的影响下热衷于古代生活，不免抱着某种鄙视的态度看待现代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经常同所谓“市井少年”交往，然而我决不为此感到遗憾。玩“羊拐子”、击木棒、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大约就在这时候或稍晚些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同宗教彻底分手了。顺便说说，表面上这是以相当淘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同那些崇敬圣物的孩子们打赌，从教堂含了“圣体”出来，胜利地把它吐在桌子上。这里也有些趣事。这时候我偶然地看到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于是我对自己是不是一个反基督者，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因为我从启示录中知道（顺便说一下，我曾因读启示录被学校的神父处以严重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必定是个荡妇，所以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不是个荡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纯朴贞洁、热爱劳动、喜爱孩子、品德高尚的妇女，这自然使得她非常难堪，因为她怎么

也无法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小学毕业时我是“第一名优生”，有一年时间没能入中学，然后预习了拉丁语，经过考试，上二年级学习。在中学（莫斯科第一中学）期间几乎全拿五分，虽然从来没花什么力气，从来没用过字典，总是匆匆忙忙地“抄”同学们的“活”，在老师上课前五到十分钟才“准备”功课。在中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组织“小组”、出版“杂志”等等，起先完全是天真无邪的。象常有的那样，我们也经历了写作活动的阶段。然后开始阅读非法著作，接着是组织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组“学生组织”，最后终于决定归属马克思主义阵营。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它那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应当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熟人使我产生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这时1905年革命到来了，到处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积极参加了。1906年我正式加入党，开始非法工作。在毕业考试期间我同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发动了罢工。考入大学以后，主要是利用大学作为秘密接头地点，或者是在课堂讨论上对某个可敬的自由派教授进行某种理论“袭击”。

1908年我被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1909年又被选入下一届委员会。这时候我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端的偏

爱，并且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后被释放，接着又被捕，然后我被保释。但是1910年当整个党的莫斯科组织被破坏时，我也被捕（这时我在合法机构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好几个月，被驱逐到奥涅加，为避免被法庭判处苦役（用于我身上的是第一〇二条），于是逃往国外。我在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期间一直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即不曾是“召回派”，也不曾是“调和派”）。在国外，开始了我的生活中的新阶段。最初一段时间，我通常是住在工人家中，而整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如果说我在俄国获得了一般知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相当专门的知识，那么，毫无疑问国外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固定资本。其次，我认识了列宁，他自然给了我巨大的影响。第三，我掌握了数种语言，并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在国外也真正开始了我的著述活动（《真理报》上的通讯，《启蒙》杂志上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我到处都竭力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听了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于战争前夕被捕，被驱逐到瑞士；然后历尽艰辛到达瑞典（中途曾在纽卡斯尔被捕），在这里同亲密的朋友皮达可夫一道紧张地在图书馆研读，直到被捕（所谓霍格伦案件）。接着有一段时间住在挪威（直接参加了“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但不久被迫秘密赴美。在美国任《新世界报》编辑，参加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等等。革命后取道日本回俄，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在车里雅宾斯克被孟什维克逮捕。

抵达莫斯科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编辑。一直站在左翼（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仍任此职。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别的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一点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而我有幸能站在他的身边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目前我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真理报》编辑以及著作家、讲师、党的鼓动员、宣传员等等。

主要理论著作有：1.《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2.《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的批判）；3.《过渡时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瓦解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改组的基本规律作理论分析的尝试）；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理论论文集》进攻》（反对柏姆-巴维克、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弗兰茨·奥本海默等人）；6.《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为批判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而对再生产过程、市场和危机理论所作的分析）。通俗小册子中流传得特别广的有：《共产主义入

*《过渡时期经济学》，又译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编者注

门》(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纲领》等等。另外,还有历史著作《从沙皇制度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后一著作把苏维埃制度条件下经济政策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同城市关系问题联系起来作了理论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具有次要意义的小册子、杂志文章等等。许多著作,主要是通俗小册子,被译成欧洲和亚洲各国文字。

(郑异凡译自《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41卷第1分册附录第52—56页)

尼·伊·布哈林

〔苏〕德·彼·马列茨基*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1888年9月27日（俄历），布哈林生于城市小学教员伊万·加夫里洛维奇·布哈林的家里。

布哈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革命运动。1905年他参加了一个中学生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不久转入社会民主党。1906年下半年布哈林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做宣传员。1907年春毕业考试期间，布哈林第一次发动了斯拉德科夫工厂工人罢工。1907——1908年，他在哈莫夫尼基区多罗戈米洛夫分区做宣传员、组织员和鼓动员。1908年，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增补布哈林为委员，并指派他为

* 德·彼·马列茨基，是十月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苏联年轻的理论家，研究历史和经济史，二十年代属于“布哈林学派”，是布哈林的积极拥护者。三十年代因布哈林案件被关进监狱，并死在监禁中。——编者注

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负责的组织员。不久，布哈林被选入莫斯科委员会。他同“召回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1907年秋，布哈林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学专业学习。但是，他并没有在大学里系统地学习“课程”，而是为党工作，或者在家进行研究，还在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学生中积极地开展活动。1909年春，在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布哈林第一次被捕，很快获释；同年秋，因原案又重新被捕，但在依据法律第一〇二条举行庭审前被保释。1910年，布哈林暂时到合法机构中做党的工作，在那里，他同取消派分子和取消主义进行了斗争。他还参加工会刊物（纺织工会机关报）工作。1910年底，由于莫斯科党组织遭破坏，布哈林又一次被捕，拘押在苏舍夫卡监狱和布蒂尔卡监狱，未经审判被行政流放到奥涅加，不久就从那里逃走。1911年10月，布哈林流亡到德国的汉诺威。

布哈林和列宁的初次见面（在克拉科夫），是在1912年秋，列宁建议布哈林共同编辑《真理报》和《启蒙》杂志。从此布哈林开始进行系统的著述活动，同时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党委派布哈林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克姆尼茨举行的代表大会。1912年冬——1913年，布哈林迁居维也纳，为写作《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作准备，顺便听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布哈林大量的论战性的理论经济学著作（反对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柏姆-巴维克），以及发表在《启蒙》杂志和《真理报》上的一系列论文和通讯，都写于流亡国外阶段的

维也纳时期（1912——1913年和1913——1914年）。布哈林在同列宁保持不断的书信往来和当面接触的情况下，十分密切地参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起草演说、报告，等等），同时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小组里活动，开展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

1914年临近宣战的日子里，布哈林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林茨被警察作为“奸细”逮捕，囚禁于麦尔克军事要塞。只是在与布哈林有私人交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提供证言之后，他才得以获释，在宪兵押送下驱逐到瑞士边境。布哈林在瑞士——主要是在苏黎世和洛桑——逗留到1915年7月。他在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中开展反对护国派分子的斗争，参加了党的伯尔尼代表会议。这一时期布哈林还写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节录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国外杂志《共产党人》上。1915年，布哈林携带化名多尔戈列夫斯基的护照，经过法国和英国（中途在纽卡斯尔曾被英国警察短暂拘留），辗转来到瑞典。

在瑞典，布哈林同集合在采取当时的革命方式的霍格伦周围、后来成为齐美瓦尔德左派的“青年派”发生联系，并与他们的机关报《警钟报》合作。由于瑞典面临参战的危险（1916年夏），青年派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半公开的代表大会，布哈林参加了这次大会。瑞典政府以从事反军国主义宣传的罪名，把布哈林作为蓄谋进行“爆炸桥梁”、“投掷炸弹”等活动的“列宁的代理人”加以逮捕（与霍格伦同时被捕）。在斯德哥尔摩监狱监禁和强制劳动一个半月之后，布哈

林被驱逐到了挪威。他在挪威为“青年派”机关报《阶级斗争》写了多篇文章。他同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国家问题（下面要谈到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分歧，就发生在这斯堪的纳维亚时期。布哈林在其著作《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被拒绝在瑞士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文集《社会民主党人》刊登之后，就将这篇著作的主题在一系列文章中加以发挥，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的机关报上，它们是荷兰的《论坛报》、挪威的《阶级斗争》、不来梅的《工人政治》杂志、《青年国际》杂志以及纽约的《新世界报》。布哈林从挪威转移到丹麦，两个月以后，于1916年10月秘密地前往美国。

在纽约，布哈林编辑《新世界报》。自他接编之后，这个报纸坚持了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布哈林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他在美国各大城市作“巡回”宣传；在组织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齐美瓦尔德左派的过程中，他同托洛茨基当时的立场展开斗争。在美国时期，布哈林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演说家和鼓动家。在国外几乎度过了六年流亡生活的布哈林，一听到二月革命的消息，就取道日本，返回俄国（顺便提一下，返国途中，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在车里雅宾斯克曾被孟什维克逮捕）。布哈林回国之后，就固定在莫斯科工作。他被选入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一直是党的中央委员。布哈林出席了国务会议*和民主

会议**（同时在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支持在国务会议召开之时举行总罢工），是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第一号法令的作者，是莫斯科市杜马的成员。总的说来，布哈林在那个时期，在莫斯科组织中发挥着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他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尖锐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上的动摇倾向，并为克服这种倾向进行了紧张的斗争。布哈林是准备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的成员，负责编辑起义的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在驱散立宪会议之前，布哈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宣言式的讲话。从1917年12月底起，布哈林开始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直至在同帝国主义德国单独缔结和约问题上党内发生尖锐的分歧时为止。作为缔结和约与列宁立场的反对派，布哈林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并且是《共产主义者》报的编辑之一。对于自己政治活动的这个布列斯特阶段，后来布哈林公开承认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错误。1918年左派社会

* 指俄国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召开的国务会议。1917年8月12日（公历25日）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军官和哥萨克的代表。在会议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表示抗议，在莫斯科组织了一天总罢工。——编者注

** 指全俄民主会议。1917年9月14日至22日（公历9月27日至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开的。——编者注

*** 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于1917年6月21—23日（公历7月4—1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二百一十一人，布尔什维克有七十三人。——编者注

革命党人暴动之后，布哈林重新回到《真理报》工作，同时成了党中央的一名十分积极的工作者。

1917——1918年期间和以后，布哈林不止一次地受党和共产国际的委派去国外活动。

1918年，布哈林在德国结识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开始同“斯巴达克”联盟发生联系，在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之间建立了思想上的接触。布哈林是在形成中的德国布尔什维克派别内俄共影响的传播者。在十一月革命爆发前几天，布哈林和俄国使馆人员一起被遣送出境。他在返回苏维埃俄国的途中接到俄党的指示，要他参加准备出席德国苏维埃（德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但是，在霍夫曼将军的命令下，布哈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马尔赫列夫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在途中受阻，并且落入疯狂的德国军官团之手。这些德国军官用机枪包围“布尔什维克车厢”，显然要挑起一场残害事件。代表团成功地鼓动押送他们的德国士兵起来向他们的长官“造反”（众所周知，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终究没有允许代表团进入德国）。1922年，布哈林是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三个国际的会谈的代表。1923年，他前往挪威，在那里与特兰麦尔集团进行了斗争。

在共产国际工作方面，布哈林从这个组织一建立就参与领导活动。他参加了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会议期间的工作，是出席大会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被选入执行委员会，以后历次代表大会他都重新当选此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作了关于议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详述了

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观点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示反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反议会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哈林参加了关于策略问题的辩论，同勒维、哥尔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斗争。布哈林对俄共队伍中站在“胆怯的反对派”立场上的新经济政策反对者给予了回击（关于列宁报告的发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他在报告里分析了提交大会的纲领草案，对第二国际在理论上的破产（在国家理论、崩溃论、危机论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诸方面）作了总结，也向其它国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课题，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问题（《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载于布哈林的文集《进攻》）。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鉴于个别小组中暴露出一些理论上的偏向，布哈林再次就纲领问题作了发言；在讨论1923年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时，批判了德共领导者（布兰德勒、拉狄克、塔尔海默）的右倾，进行了反博尔迪加的斗争。1925年（5月）布哈林写了共产国际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指示提纲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极左派的信。随后还写了关于英国罢工的教训的提纲、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等等。同时，他最积极地参加执委会的日常领导工作。最近两年（1926—1927年），布哈林在执委会中的作用变得特别巨大。

在党内，在中央和政治局，布哈林从事着紧张的工作；同时他又是党的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最为积极的参

加者。在革命胜利后的近十年中，布哈林在党的和工人的会议上作了无数次报告，起草了大量的党的文件，作了若干次学术性专题讲演，出版了许多小册子、通俗读物、杂志论文，还有数种大部头的理论著作。《真理报》刊载了上百篇布哈林撰写的社论和文章。

布哈林世界观的形成和思想的成长经历了如下的过程：还在童年时期就“克服”了宗教迷信，中学时期布哈林经历了皮萨列夫热的阶段，十七岁时，布哈林从崇信皮萨列夫转到马克思主义。

布哈林在他的自传里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是确定他的思想倾向的决定性因素。1905年革命时，参加示威游行和集会，使布哈林成为了一个完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

从“科学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大学时期、囚禁时期以及国外时期，对布哈林来说是收获最为丰硕的时期。经济理论对他最有吸引力。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潜心钻研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青年时期还十分认真地从事过土地问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他写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就是对彼·马斯洛夫的《国民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批判（发表在学生杂志上）。布哈林还广泛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著作和当代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哲学也没有处于布哈林的视野之外；还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个时期他曾热衷于阿芬那留斯。从小就酷爱绘画的布哈林，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怀着无比浓厚的兴趣。俄国前一代的革

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同民粹派斗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市场问题和土地问题上；布哈林和这些前辈们不同，他的理论兴趣转到了从前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即同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的各种貌似科学的、心理学派的和折衷主义的体系作斗争。早在H.沙波什尼柯夫教授主持的课堂讨论上，布哈林就作过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社会分配理论的批判性的学术报告。到了维也纳之后，布哈林把这篇学术报告改写成论文：《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最初刊载于1913—1914年的《新时代》杂志；后来收入《进攻》文集）。布哈林在维也纳的图书馆里埋头阅读奥地利学派的著作，为撰写批判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著作《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作准备。在瑞士，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和洛桑图书馆里大量收藏的旧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以及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的问题。在评价布哈林观点的发展的时候，应该认为瑞士—斯堪的那维亚时期是重要的关键性的阶段，这一时期布哈林发表了关于国家和革命问题的论文。

布哈林探讨的课题，都是经济理论方面比较说来最为抽象的领域，这就迫使他在分析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时，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现阶段发展到极限的、大致上完成了的那些趋势上。布哈林著作的长处就在于他异常清晰地分析了这些趋势，把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放到所谓“纯化学”的状态中进行研究。与此相似，布哈林也极其鲜明和成功地详细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国家政权，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政权是

阶级强制的最广泛的工具，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集中的暴力。这种用“极限”进行思考的独特方式，再加上与布哈林的极左派立场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一定的缺点，但无疑有助于他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家机构作出锐敏的剖析。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的问题上，成功地摸索到了一系列正确的提法。例如，当时是他第一个把在革命过程中必须炸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论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坚持了当时使许多人感到“震惊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可能性的论点。但对这个问题以及与此关联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提供的解决方法，如他自己后来承认的，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由于布哈林是以完全不留余地的图解式的表述方法分析当代的各种发展趋势，他并不总能适当地抓住现象的实际具体性。由此便产生了他当时在对“民族自决权”的解释上同列宁的论战（在民族问题上，布哈林接近皮达可夫-基也夫斯基同志的立场）。由此便产生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实现速度的一定的过高估计。在解决国家问题方面的某种公式化的毛病也是由此而来的。布哈林把他的致命的打击集中于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批判，但相形之下，在揭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性质方面，他谈的就不够充分。当然，责难布哈林不理解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必要性，显然是不公正的。请对照：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保存着国家政权的形式，因为这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

* 参看收入于1925年《法的革命》文集中的，未完整保留下来的布哈林的文章《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在这里，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或，“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自己的临时的国家组织……”^④。谈到自己同弗·伊·列宁在国家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时，布哈林在《法的革命》文集中作了如下说明：^{*}

“弗·伊·发表了一篇短评（载《列宁全集》第8卷）来反对《青年国际》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犯那个硬加在我头上的错误，因为我清醒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关于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个一个时代。”^⑤

^{*} 在这篇以笔名Nota-Bene发表的文章里，布哈林发挥了关于国家的问题。

应该指出，正是布哈林的著作促使列宁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②。

但是必须承认，布哈林后来的政治错误，首先是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立场，正是以上所指出的布哈林见解中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缺点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还在国外时期(1915—1916年)，当他预见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时，他没有顾及到这个革命的全部特点、它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相互交叉、情势的错综复杂、农民的巨大作用、以及列宁“牺牲空间以赢得时间”的战略的辩证的精微之处。这里显示了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列·达·托洛茨基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其特征是：用形式逻辑代替辩证法；比内容“更慷慨激昂”、“更左”的词句；不理解农民的作用。这一切，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的时期中已经克服和消除了。这是列宁对布哈林的影响愈来愈大的时期，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为此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虽然在1921年，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布哈林有过一次“左倾”和托洛茨基主义旧病的复发，但当托洛茨基向党的路线发动新的进攻时，布哈林无情地痛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布哈林在理论和实际政治的领域中，通过正面的和论战的方式，详尽地论证了“农民问题”、结合问题、关于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布哈林最积极的参与下，并依靠他在理论上的论证，终于实现了著名的党的策略转变（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等等）。最近几年是布哈林政治上发展得特别迅速的年代。

布哈林的理论著作多数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这是布哈林作为经济理论家最强的一面。他是马克思著作的卓越行家，又是善于用料想不到的和多方面的论据克敌制胜的杰出论战家。布哈林总是无情地扑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撕下其臭名远扬的“客观性”的面纱，不仅从逻辑上把他们驳倒，而且唤起人们对他们的憎恨，揭露他们是阶级敌人。思维的系统性与丰富的理论想象力相结合，使布哈林没有成为考茨基式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解说者，而成了一个创造性地应用《资本论》作者的遗产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布哈林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旧的表述变得更准确，砥砺得更加锋利，还增添了某些新的表述，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起了推动作用。布哈林透彻了解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有时涉足于经济理论的最抽象的领域，同时又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巧妙地联系起来，揭露出资产阶级学究们的诡辩术的“社会学”的等价物。

布哈林早就有一种打算，想对马克思逝世之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一次系统的批判。但是，布哈林担负的政治工作，吞没了他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从而使他迄今为止未能实现这一计划。不过他毕竟还是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为进行那个重要的批判工作做了准备：例如他已经有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意见、摘录、方法论的设想、以及散见于布哈林的各种（特别是以前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大量评注。

《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批判）》一书，是布哈林二十四岁那年写的。它完全有理由被

认为是一部反对奥地利学派的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布哈林的这本书问世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在方法论方面作过批判主观主义者的尝试（例如希法亭的早期文章）。《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给予心理学派的体系以广泛的“逻辑的”批判。布哈林步步深入地揭露出柏姆-巴维克之流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矛盾——从主观的估价中决然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经济范畴——必然使奥地利学派陷入毫无结果的“诡辩术”的演习，导致一种循环论法的体系。它们实际上代表着食利者——“边际资产者”的经济思想。同时，“边际效用”理论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能够用以抗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彻底和唯一完整的意识形态。布哈林在对柏姆-巴维克的批判中还附有详细的图书评注，其中“（简要地）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其它分支的平行的和系统的批判”^{*}。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于1915——1916年，虽然由于作者不能作主的原因迟至1918年才得以问世）是原先登在布尔什维克国外文集《共产党人》中的一篇文章的改写本。这本书所研究的思想范围，基本上与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中所包含的相同，即对资本主义当代发展阶段的分析。布哈林著作的特点是它首先分析了世界经济的“形成”。对这个范畴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极其必要，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建立了一整套的世界经济理论，其中塞满了一些极端谬误的和辩护性的观念（例如：“接替资本主义”的

* 参见布哈林为《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所写的序言。

将是一个“世界经济”；或：世界正走向“超帝国主义”的牧歌式的乐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看作是资本的国际化和国家化趋势在新的组织形式(垄断、金融资本同工业资本相结合、联合化的过程)中的结合和斗争。帝国主义，按照布哈林的定义，是与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是“资本主义竞争扩大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政策。

《过渡时期经济学》(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第一部分)写于苏维埃俄国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时期。《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从理论上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揭示革命经济的特点，指明社会阶级关系瓦解、生产力暂时降低，以及嗣后在新的基础上和新的结合中重建的必然性，指出城乡关系中的新颖变化，深入考察国家政权的特殊作用和职能的变化，最后，规定了转化过程的各个“阶段”。在列宁研究院保存着一册弗·伊·列宁在书页空白处和书后作了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评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我们不妨援引一下弗·伊·写在书页空白处的若干评注及弗·伊·对全书的基本意见。下面是一些摘录：《经济学》第8页(第2页)*布哈林写道：“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列宁在“全

*《经济学》，即《过渡时期经济学》，前面的页码是作者马列茨基原引俄文本页码，括号内的页码是三联书店1980年中文版《过渡时期经济学》的页码。下同。此书还有另一种译法，见注④——译者注

世界”一词下面划了黑线，在空白处注道：“不是全世界”④。
第10页（第4页）布哈林：“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弗·伊·对“消灭”一词作了记号，并在旁边写道：“没有消灭”⑤。

在第21页（第14页）布哈林给国家下了定义：“国家组织是最广泛的阶级组织，它积聚了全部阶级力量，集中了各种机械的镇压工具和惩罚工具，使统治阶级组织成为阶级，而不是阶级的一小部分或小集团。”列宁注：“非常好！”⑥

在第46页（第36页）布哈林写道：“1918——1920年欧洲经济的具体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个瓦解时期已经到来，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旧的生产关系体系将要复活。”列宁注：

“ein bisschen zu viel（有点过分）”和“quiprou ve tvop……（谁证明得过多……）”⑦

在第58页（第47页）布哈林写道：“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是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列宁在空白处注：“非常对！”⑧

在第71页（第58页）布哈林写道：“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工人组织职能的辩证变化。非常清楚，随着统治关系的重新配量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种生产组织者的力量。”列宁注：“sehr gut（非常好！）”

第150页（第131页）布哈林写道：“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列宁注：“不对：是从‘比较弱的’开始

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⑩

看来，在全书中列宁最喜欢的是第十章*《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在这一章里写满了他的记号：“对！”、“对！”、“非常好！”、“c'est le mot（说得很恰当）”、“正是如此！”而且在这一章的最后，弗·伊·列宁写道：“这一章很出色！”^⑪

列宁为了开玩笑而故意模仿着《经济学》一书的不通俗的术语，对全书作了如下的评语：“这本出色的书的出色的质量，有某些不足之处，因为它们受到了下述情况的限制：第一，作者的假定没有以足够坚实的、即令是简短的实际材料为基础，虽然他掌握的材料是很全的。更多的实际基础会消除该书在‘社会学’容貌上，更确切些说不在哲学容貌上的缺陷。第二，作者对动的经济过程的观察是不够具体的，常常落入名称（‘专门术语’）、‘玩弄概念’的陷阱，没有了解到，许多不好的意义和术语都渊源于哲学，它们在‘深奥’的幌子下走上了哲学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常常是不作考虑，不加批判地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而绝不是唯物主义。我希望，以后重版时能消除这些不大的缺点。重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很必要的，并能为科学院带来更大的荣誉。我们对科学院表示祝贺，祝贺它的院士写了一部辉煌的作品。1920年5月31日”^⑫

以后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暴露了《经济学》一书的

* 原文该为第十一章，据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改。——译者注

主要缺点。作者和我们全党（也许除了弗·伊·列宁以外）一样，在那个时候都没有预见到新经济政策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自己时代的真正产儿，在其身上带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烙印。由于这个缘故，关于各种已瓦解的关系的恢复过程的规律、关于“沿着新经济政策的轨道”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在《经济学》一书里都未能提出正确的和确切的设想。生活本身虽对《经济学》一书做了重要的修正，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能推翻布哈林对社会阶级关系瓦解过程基本转化规律的分析的正确性，以及关于社会生产水平暂时下降的必然性的观点，运用再生产的观点分析范畴的特殊重要性等等，等等。

布哈林关于经济的其它理论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写作此书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认为在纯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资本积累这种卢森堡的民粹主义公式在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开始受到一定的信仰；与此相应地出现了一些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的企图，它们带有滑向宿命论的崩溃论的错误倾向。因此就有了研究马克思的积累理论，排除卢森堡主义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义对它的歪曲的必要。除了上述主要的经济著作之外，布哈林为各种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小册子，内容涉及国际和俄国经济以及许多局部性的问题。

布哈林的社会学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文章之外，最重要的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通俗读本)。这本书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抽象的领域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一般说来，布哈林是通俗化的能手，在各种文体的“琴键”上都能弹奏自如：他既是“深奥”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作者，又是极通俗易懂的《共产主义入门》和《共产主义者纲领》的作者。）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某些新的表述，把对它的多种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简明的札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中，布哈林列举了自己著作中新的表述和问题，并作了论证。布哈林的某些相当重要之点，即作者“离开了对问题的习惯的阐述”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受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他对于“机械的”和“有机的”概念的理解；他从平衡论出发的对辩证方法的表述；他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全部社会运动（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它们的相互影响）的根本决定因素的提法。布哈林的一系列原理竟完全或几乎没有被批评者和所谓的“批评者”们注意到。这里有：（1）对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的表述，即把这种关系表述为人们（被视为“活机器”的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劳动组合；需要提出这样的表述是为了反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亚·波格丹诺夫等一大群人把生产关系“唯灵化”的强烈意图和把这种关系描绘成“心理的相互作用”的尝试；（2）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的精确区分。而通常这两者总是被

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草率地混为一谈；(3) 关于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关系的更准确的提法，它以揭示每一上层建筑内各个成份的极其具体的状况为前提，从而消除了舒里雅齐柯夫式的庸俗化、简单化；(4) 上层建筑的“分类劳动”的定义；(5) 对马克思关于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观念方式”的原理的研究；(6) 社会现象的物质化的理论、即文化不断凝聚为物的形式的“文化积累”的特殊过程的必然性，——他把这一点看作是任何发展中的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7) 对过渡时期的规律性和衰落的规律性的探索，对马克思关于“斗争着的阶级”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关于“文化毁灭”的可能性、关于社会暂时或长期退化等等原理进行的解释和研究。在这本书里还包含着另外许多也许是值得争论的但至少是有趣的和引人思考的“新东西”，这是布哈林在马克思的正统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半社会学的专题文章中，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1921年写的这篇文章中，布哈林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蜕化的问题）；《延其緬主义》；反对巴甫洛夫院士的政论性抨击文《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它》；一系列论“干部”、文化、文学，论领袖，政党和群众等等的文章。

从1924年起，布哈林把大量精力用于研究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在一系列的文章和报告中，他深入探讨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弗·伊·列宁的文章《论合作制》，对“合作化计划”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分析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一系列问题的提法随之发生了辩证的变化；关于“阶级斗

争”和“国内和平”，关于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关于城乡关系，关于价格政策，关于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关于国内市场机制，等等。还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论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及其它）。党内斗争激化的形势，使布哈林主要是和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的论战联系在一起提出这些问题的。在这方面他写了整整一套小册子，有：《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文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论我们革命的性质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可能性》、标题为《关于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的未写完的反对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的论战文章等等。

布哈林的下列著作可以算作单独一类：《俄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和《从帝国主义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的两篇历史抨击文章），《革命假面具下的恺撒主义》（反对乌斯特里亚洛夫），《国际资产阶级及其“门徒”——卡尔·考茨基》。

无论作为政治家，或是作为理论家，布哈林都具有国际声望。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特别是通俗化著作——被翻译成欧洲和亚洲的各种外国文字。布哈林的全集目前还没有出版。

注 释

- ①引自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 ②《法的革命》文集，第1辑，共产主义学院出版，1925年俄文版第5页。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0页。
- ③参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284页。
- ④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页。
- ⑤同上，第3页。
- ⑥同上，第6页。
- ⑦同上，第12—13页。
- ⑧同上，第18页。
- ⑨同上，第20页。
- ⑩同上，第60页。
- ⑪同上，第50—58页。
- ⑫同上，第65页。

（秦永立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1927年第8卷第
271—284页，田大畏校）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1936年初，无论是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似乎还并不预示着什么灾难。无疑，基洛夫的被暗杀和一系列秘密政治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在其中的一次审判中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导致了持续的紧张状态。但是，许多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前成员通过再次忏悔过去的“罪恶”，仍有可能免于镇压。而许多前“右倾”反对派分子，包括布哈林本人在内，甚至连这样的忏悔多半也没被要求进行。

此时，布哈林正埋头于主编《消息报》的工作。显然，《消息报》的意义及其影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比不上《真理报》（在所谓的右倾反对派失败之前，布哈林曾任该

* 本文是根据1978年5—6月份《新左派评论》第109期所发表的海伦·贾米森的英译本转译的。——编者注

** 罗·伊·麦德维杰夫，生于192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苏联国内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1969年因发表“反苏文章”被开除苏共党籍，后又被开除公职。现在仍在莫斯科。著有《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等书，还出版过《政治日记》、《二十世纪》等刊物。——编者注

报的编辑)。但是，一些绝不可能在《真理报》上出现的消息却可以在官方地位稍次的《消息报》上发表，因为《真理报》的文章相当于党的指示。布哈林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把《消息报》办成一份人们喜闻乐见的报纸，且获得了成功。在1935——1936年期间，《消息报》是苏联最受欢迎和读者最为广泛的报纸，布哈林给自己确立的第二项任务是使该报具有更鲜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特点，这一任务也实现了。《消息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很快就喜欢上了布哈林。他为人质朴，平易近人，不拘礼节。他非常熟悉新闻界，而且真正热爱这一行。他学识极其渊博，有非凡的工作能力，《消息报》上常有他的文章。他关心同事，休息日爱和他们一起到乡下远足。每逢这时，他们彼此都争相拿出绝招，玩个痛快。

这时布哈林仍然住在克里姆林宫，也仍留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虽然已不再是正式的而只是一个候补委员了。在编辑工作以及同朋友的交往中，他依然极其忠实。他从不背着斯大林讲坏话，既不诋毁斯大林本人，也不诋毁他的政策；也从未流露过可能被称之为“反对派”的任何暗示。当然，有许多事情他不知道，而对其它许多事情他也完全不愿了解。但是，对农村，特别是农民，当时所遭受的各种严重困难，他却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读者信件常常象潮水似地涌进《消息报》编辑部，而其中的许多信件布哈林是必须要看的。但即便如此，也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这几个月内，甚至连他在反对派中的前不久的同伙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他也没有会过面。

布哈林的巴黎之行

1936年春，有一个购买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档案（主要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的问题。当时，德国正处于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社会民主党象共产党一样已被取缔。该党的地方组织已经解散，许多积极分子遭到逮捕而呻吟在集中营里。但大多数领导人都已移居国外，党的大批档案材料（与马、恩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活动有十分密切联系的档案）也转移到了西方其它国家，特别是那些社会党人还在执政的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极为缺少经费，想把部分档案卖给苏联（其条件是他们可以保留副本）。苏共中央政治局指派布哈林率领前往谈判的代表团。当时中央委员会里是否有比布哈林更适宜于负责谈判的人选，现在看来是令人可疑的。代表团还包括阿多拉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一位著名的工作人员）和阿罗谢夫（1907年以来的党员，是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和政治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虽不怎么知名，但权势却不一定小。

政治局的决定还具体指定了布哈林要与之会见和进行谈判的人。这些被指定的人中就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奥托·鲍威尔。他既是第二国际的一位负责人，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要接触的还有许多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因为在未来的谈判中，这些人也许可以起某种调停作用。这些孟什维克分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鲍里斯·尼

古拉也夫斯基（一位五十来岁的新闻记者，他本人在国外搜集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运动史和布尔什维主义史的档案材料）和孟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唐恩（他于1917年曾领导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尼古拉也夫斯基十月革命一胜利就移居国外。唐恩则直到1922年才离开俄国，当时他是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敌人”而被驱逐出境的。就布哈林个人而言，他曾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打过交道，但从1917年以后就没有碰到过他们。

布哈林欣然接受了政治局关于这次巴黎之行的建议，做了认真的准备，而且很激动。当然，为了购买或搜集西方社会民主党常常提到和使用的、但尚未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手稿，布尔什维克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早已进行过许多接触。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创始人达维德·梁赞诺夫，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三十年代中期与二十年代中期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就我所知，关于成立以布哈林为首的代表团及其任务或其随后的交往活动，虽然西方报刊有许多文章谈到，但苏联的报刊却只字未提。

以布哈林为首的代表团经过挪威、丹麦和其它一些国家，最后以巴黎为基地呆了较长的时间。在这里，布哈林、阿罗谢夫和阿多拉茨基在著名的卢克丽霞饭店租了几个毗邻的房间。布哈林的妻子安·米·拉林娜显然是4月份来巴黎同他会面的。她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岁。布哈林以前已结过两次婚。在那个时候，结婚如同离婚一样，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情。他与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名叫斯维特兰娜。布哈林同拉林娜结婚时，这个孩子已近十一岁。安·米·拉林娜出身于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有名望的家庭，从童年时代起，她就熟悉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而且非常了解布哈林。因为布哈林常常去拜访那些住在克里姆林宫和政府“堤岸住宅区”的同事或同志，喜欢同孩子们一起逗着玩。十九岁时的拉林娜出落得异常美丽。1935年，她嫁给了当时已有四十八岁的布哈林，并搬进了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1932年以前，这所公寓是斯大林居住的，但在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以后，斯大林要求与布哈林交换住宅，原因是他很难在那儿继续住下去。斯大林也认识拉林娜，当听说她结婚时，曾打电话向她表示过祝贺。不久后，斯大林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遇到了布哈林和拉林娜，还曾说：“甚至在这儿您们还想避开我啊！”

当拉林娜到达巴黎时，购买档案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后来，西方出现了许多回忆录，谈及他们与布哈林的会晤、讨论以及晚上漫步街头的情景，甚至还说布哈林常常出人意料地到他们的住处（比如唐恩的住处）去拜访。这些回忆录包含着许多虚构的成份，实际上，布哈林在同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会晤时是极其谨慎的。无论他们当中的谁到旅馆来拜访，布哈林照例都要请他们稍候一会儿，到隔壁房间叫阿多拉茨基和阿罗谢夫一道参加讨论。而且，法国的警察也在秘密地注视着布哈林的一切行踪，唯恐侨居巴黎的许多白俄会暗杀布哈林。有一天，法国警方就得到过这样

一份情报，因而在随后的整整两天里，警察一直包围着布哈林所住的饭店。这次事件后不久，布哈林就搬进苏联使馆，一直到这次使命结束为止。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布哈林的行动无疑也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遣到巴黎来的特务的秘密跟踪，——更不要说被指定负责监视布哈林的阿罗谢夫和阿多拉茨基了。所以，鉴于上述情况，说布哈林在巴黎有什么自由行动或常常漫步街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最近的一些回忆录作者又说什么布哈林不仅批评了斯大林的有害政策，扬言“这个人不久就会消灭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还同他们讨论过留住国外的问题。还说什么这是布哈林的同伴提出来的，但遭到了布哈林的拒绝。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1936年春，甚至在党的高级领导中，还未出现准备摊牌的局面。只是到了1936年底，这种情况才开始出现，而且在1937年才日趋严重。当然，这一期间的前些时候，领导层中的地位 and 心情就已几乎每月都在发生变化了。

返回莫斯科

拉林娜在巴黎并未呆多久，因为她已接近分娩期。她乘飞机于1936年5月1日抵达莫斯科。八天后，她就分娩了，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取名叫尤利。一个多月后，布哈林也回到了莫斯科。他所负责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因为斯大林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要价太高，购买档案的交易终成泡影。布哈林的整个巴黎之行难道真被斯大林后来当作指控他同孟什

维克分子进行勾结以便背叛祖国的根据了吗？这是完全可能的。总之，在审判“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集团”的法庭上，布哈林曾被迫作证“在我1936年最后一次出国期间，我接触过孟什维克尼古拉也夫斯基，此人和孟什维克领导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在审问中，布哈林还说：“从我和尼古拉也夫斯基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知道右派，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协议，并且对于一切正在进行的事，包括柳京纲领在内，他都知情。我们谈话中的具体的和新的成分，就是一旦右派中心或联络中心或整个阴谋的上层组织败露，就通过尼古拉也夫斯基和第二国际领袖达成一项谅解，由他们在报刊上发起一场适当的运动”^①。布哈林还进一步证实说，他在国外期间还曾同前国民议会秘书，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马克·维希尼亚克进行过接触。实际上，从布哈林的证词来看，无论是尼古拉也夫斯基还是维希尼亚克同右派和左派的各个主要“中心”早已相当熟悉了。那么这一切到底出自何人之口呢？结果证明是从李可夫那儿来的。

总之，购买档案材料的谈判没有成功。回到莫斯科后，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里又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就决定到帕米尔度假。他喜欢在山区隐居和休息。这一次他选择了吉尔吉斯。他的健康状况显然不佳，秘书是跟他一起去的。这位秘书并不是私人朋友，而且很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委派去监视布哈林的人。大约于7月底或8月初，他们到了吉尔吉斯。不久，他们就出发去山区了。当地的警卫人员可能

也陪着他们。由于当时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所以布哈林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

就在布哈林到山区度假的同时，莫斯科于8月15日在工会大厦又重新开始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的案件。这一次，不再是仅仅指控他们要对暗杀基洛夫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是指控他们直接策划了这一恐怖活动，甚至指控他们准备谋杀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其它种种罪行。一些被告，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在预审时所作的补充交待中，突然提出他们与前右倾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有“罪恶的”联系；与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和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与1921年的工人反对派首领施略普尼柯夫以及其他一些前反对派成员（这些人于1936年8月没有被捕，仍享有自由）也有“罪恶的”联系。

这期间，布哈林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山区。但是，就在审讯开始后不久，布哈林的秘书病了（要不然就是装病），布哈林随即赶回了伏龙芝。正是在这里，他才第一次获悉莫斯科审讯的消息。报上的报导象是晴天霹雳，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以前，布哈林的心理就已受过创伤，虽然他仍在执行斯大林和政治局的一切指示。他曾认为1935年初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第一次审判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他所喜爱的基洛夫被暗杀了，而且凶手就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据说这次暗杀是由科洛达诺夫所领导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这些人当时因此受到审讯和被处决。布哈林当然没有理

由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他基本上接受了中央委员会在致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信中所谈到的关于谋杀基洛夫的内容，也同意1935年初审讯中对季诺维也夫及其亲密同伙的指控（“道义上的责任”）。布哈林认为，这一次可能又揭露了新的情况。这些情况比十八个月前揭露的显然要更直接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为他很了解亚哥达，正如对许多其他杰出的契卡人员的了解一样；他不可能想象他们会通过严刑拷打来逼取被告人的供状。

另一方面，布哈林也确实感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在蓄意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同那些可怕的罪行牵连到一起，以使他们所有的人都同归于尽。他于这次审讯的最后一天或前一天赶到了伏龙芝。有关这次审讯的消息，不仅莫斯科的报纸（要一两天才能到达伏龙芝），而且当地的报纸都有报导。布哈林给亚哥达和斯大林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求延期宣判（他相信可能会判处死刑）。他想与被告进行面对面的对质，以便能对自己的指控进行答辩。但是显然当他还在伏龙芝的时候就已得知这些人被处决了。

暂时的缓免

还在伏龙芝的时候布哈林就预感到可能会被捕，但结果并没有发生。他把所有的行李都留在吉尔吉斯，搞了一张下一班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当时从伏龙芝到莫斯科，即便乘飞机起码也要二十四小时。第二天，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接到

了电话并被告知她应去接她的丈夫。这些日子，拉林娜也一直惶恐不安；她没有收到任何来信，只是每天阅读报上登载的被告人所提供的、当然包括指控她丈夫在内的证言，不过她并不相信对她丈夫的种种指控。

拉林娜坐上布哈林当时仍然可以自由使用的汽车（司机仍非常爱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赶到了机场（当时位于今天的地下“航站”，就在列宁格勒大道的另一边）。布哈林已经到了，拉林娜和司机稍迟了一些。布哈林正坐在一个房间角落里的包裹堆上，为了不被人认出，把头埋在怀里。拉林娜和司机向他走了过去。“你好，尼古拉，咱们回家吧！”“到哪儿去啊？”“回克里姆林宫的家。”“还能让我们进克里姆林宫吗？”“反正现在我们还住在那儿”。“那么帮我遮蔽一下，我不想让人看见”，说完布哈林就向车子走去。

一到家，布哈林就立即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斯大林当时不在莫斯科。他在审讯和处决了所有被告人之后就到索契“度假”去了。于是，布哈林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开头仍称“亲爱的柯巴”。在随后的几天里，布哈林几乎那儿也没去，既没有人来电话，也没有人来拜访。他只是同妻子讨论有关审讯的问题，并让妻子放心，他是无罪的。她的年轻的妻子甚至也不太相信季诺维也夫的罪行。她问丈夫：“你认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真的能杀害基洛夫吗？”布哈林回答说：“可是他们不正在用这些人的口供来打击我吗？”

除了这些以外，布哈林还被托姆斯基的自杀而弄得心神不宁。他不知道自杀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对斯大林曾拜访

过托姆斯基的家，他们面对面地辩论以及斯大林去时还带了一瓶酒等情况都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在斯大林与托姆斯基刚辩论不久，托姆斯基就发出“滚出去，快滚出去！”的狂叫。紧接着一句难听的骂人话之后，托姆斯基就朝自己放了一枪。这是在斯大林匆匆离开，手里还拿着那瓶酒的时候发生的。李可夫也曾企图自杀过，但被亲属强行制止了。起初，布哈林认为托姆斯基的自杀将会毁灭他们所有的人，因为这显然表明托姆斯基是在承认前右派领导人由于某种原因而犯了罪。但后来，当布哈林在中央全会上碰到李可夫时，却又说：“事实证明托姆斯基是我们当中最精明的一个人。”

就在审讯季诺维也夫以及他那些不幸的同伙的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于1936年8月1日也发出了对参与“反革命集团”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和审讯中提到的其他人着手进行审查的指示。不知道这次审查是如何进行的，既没有审问也没有对质。此时，布哈林一直没有离开过家门，当然也再没有在《消息报》编辑部露过面，虽然该报的每一期的最后一页仍继续印有“主编尼·伊·布哈林”的字样。9月10日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的公报，其内容是“对一些被告人在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核心过程中所提供的有关布哈林、李可夫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进行审查”的总结。公报指出“审查结果不能证实对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的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因此宣布停止对他们的审查”。于是，布哈林

松了一口气，但对“法律依据”这一模棱两可的表述没有立即引起注意，也没有考虑到公报上只提到李可夫和他本人这一事实。由于紧张而搞得精疲力尽的布哈林就带着妻子、儿子（以及保姆）到乡下别墅去了。他自己并没有别墅，但作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仍有权在国家的别墅中度假。

第二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卡·拉狄克匆匆赶到了布哈林度假的别墅。拉狄克是一个丧失激情、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但仍不失其机敏和诙谐。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他与布哈林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二十年代中期，他参加过左倾反对派并与斯大林、布哈林作过斗争。二十年代末他被流放，但不久就向斯大林屈服了。他谴责托洛茨基，并在所有的发言、文章、乃至私下谈话中都吹捧斯大林。然而，拉狄克毕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尖锐的政治评论家。所以，布哈林常常拉他参加《消息报》的工作。正如我前面已谈到的，布哈林不仅想把《消息报》办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报纸，而且力图加强该报反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特色。拉狄克特别适宜于担负这样的任务，他为《消息报》写的许多文章都以辛辣而机智的笔锋申讨了法西斯主义。

但这时的拉狄克已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他向布哈林保证，他与“反革命集团”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核心”的“破坏”活动没有任何联系。他请求布哈林在他一旦被捕之后就立即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斯大林。他恳求说：“请斯大林亲自过问我的案件，而不要让亚哥达管；请提醒斯大林想一想勃柳姆金。”勃柳姆金是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杀

害过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捕后不久，他就作了忏悔，同社会革命党人断绝了关系。因此，不仅得到了宽恕，而且很快成了一名契卡工作人员，并干得很出色”。勃柳姆金还曾担任过托洛茨基专列的列车长，受过托洛斯基的影响。但仍保住了在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并多次在国内外执行过保安局的任务。在一次去土耳其的途中，他曾秘密拜访过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由于还天真地相信他那些前不久的追随者们的忠诚，所以给拉狄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让勃柳姆金转交。勃柳姆金按地址转交了这封信，但拉狄克连信封也未打开就直接交给了亚哥达，后者当然又转给了斯大林。因而勃柳姆金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处决了。拉狄克满以为通过这样的代价就可以显示他最近的忠诚。然而，他并不真正了解斯大林。斯大林并没有忘记拉狄克的许多辛辣的嘲讽，因为其中的许多讽刺的影响无疑比他们两人的寿命要长久得多。所以，就在与布哈林夜间谈话之后的一两天内，拉狄克就被捕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布哈林就履行了他曾许下的诺言，写了一封信把拉狄克告诉他的一切都转告给斯大林，只是在信的末尾附了一句不必要的短语：“虽然他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

从亚哥达到叶若夫

1936年9月的大部分时间斯大林都是在索契的别墅中度

* 根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抱一线希望》一书中所说的情况来看，勃柳姆金在暗杀德国大使时已经是契卡的成员。——原译者注

过的。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向留在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把亚哥达从内务人民委员的岗位上立即撤下来而换上叶若夫。叶若夫以前就发迹得很快，是党组织中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二十五岁时，就已经是中央正式委员，十八个月后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亚哥达的撤职和叶若夫的任命当时还看不出是加强恐怖活动的直接预兆。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所发电报的内容。他们在电报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方面落后了四年”，并敦促立即撤换亚哥达。虽然1936年秋镇压活动相对说来还不怎么严重，但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要讨论和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布哈林当时以宪法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在制定这部宪法的过程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因为叶若夫需要时间整顿从亚哥达手中接管过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级机构。

在接受这一新的任命之前，叶若夫已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旦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委员，叶若夫就立即开除了亚哥达的所有追随者，并任命了一些他非常了解、忠于他本人和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人们不应夸大叶若夫的作用。他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业工作人员，因此，对这一职业的许多特点并不熟悉；也没有在这样一些复杂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中进行工作的足够知识。所以，他不可能

全部更换业已存在的内务部的各级机构。他虽然作了许多变动，但挑来作他亲密顾问的那些人，大多数仍是专业的契卡工作者。他的最密切的顾问和副手，当然也是未来法庭审判的主要组织者，就是曾任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子扎科夫斯基。

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叶若夫总是盲目地、奴隶地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的），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开始准备一系列的新的审讯和新的镇压。这次镇压计划不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总部，而是来自斯大林的头脑。首先，于秋天，逮捕了许多前托洛茨基分子——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其次，在进行逮捕的同时，加紧准备新的法庭审判。前不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的成功的审判，促使斯大林想进行一次新的更为“公开”的审判。不仅邀请经过特别选定的苏联公民代表参加，还将邀请外国记者和一些来自西方的私人代表列席。虽然苏联总检察长于1936年初曾经宣布过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但现在，由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任命了新的委员，所以又重新开始了审查。这对布哈林来说只是严峻时刻的开始。

猫 和 鼠

这一次斯大林又使用了新的花招：把那些在押犯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供词都进行复制，并打上“机密”的字样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布哈林，象李可夫一样，也

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那里收到了这些档案材料的副本。他不知道，也猜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是用什么手段使这些受害者污辱自己和诽谤同志的。布哈林怀着恐惧和疑惑的心情读完了这些可怕的供词。他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名字在这些供词中常常是作为恐怖和破坏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来提的。

布哈林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斯大林。他们曾经是朋友，或至少布哈林是这么认为的；甚至直到这时，布哈林在给斯大林的所有的信中开头仍称“亲爱的柯巴”。过去，他俩常常在一起消磨时光，取乐、唱歌（并不总是非常严肃的歌曲）。有时甚至还在一起摔跤；强健的布哈林总是把柯巴斯大林摔倒在地，而后者又总是哈哈大笑地从草地上爬起来。布哈林还向其他一些以前的朋友如奥尔忠尼启泽、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写了信。不过，奥尔忠尼启泽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兄弟波普利亚和其他一些朋友也被捕了。加里宁没有回信。伏罗希洛夫本来也可以完全不回信的，但却出人意料地送去了一张存心让人痛苦的短条子：“我恳求您，布哈林同志，决不要再给我写信提什么要求了。”他甚至用“您”的正式称呼，似乎是写给一个生人而不是写给一位朋友和政治上的同志。

斯大林也没有回信，但他仍想使布哈林存有一线希望。据布哈林妻子回忆说，193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九周年时，布哈林决定到红场去。但不象过去那样上列宁墓上的观礼台，而是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站在观礼台的一

侧。斯大林从陵墓上看到了布哈林。拉林娜突然看到一个哨兵穿过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和她走来。她原以为哨兵会叫他们立刻离开广场，但哨兵却向布哈林敬了礼，并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并请您上列宁陵墓！”

然而，十月革命节一过，立即就开始了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他们不是在路比扬卡，而是在克里姆林宫让布哈林与在押犯进行了一连串的对质。这些在押犯既有“托洛茨基分子”，也有所谓“布哈林学派”的他本人的追随者”。布哈林与索柯里尼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拉狄克进行了对质。这些人都说他们与布哈林有罪恶的联系；还说存在另一个地下的反革命恐怖中心，其头子，据说就是布哈林。布哈林拒不承认一切，但每一次都是带着沮丧和绝望的心情回家的。最使他受到震动的是与他最喜爱的追随者之一耶菲姆·蔡特林的对质。耶菲姆当着布哈林的面证明说，布哈林曾亲自给过他一把左轮手枪，要他躲在斯大林可能驱车经过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但那一天斯大林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暗杀斯大林的企图才未能得逞。所有这些供词，正如我已说过的，都经过复制并分发给每一个中央委员。

* 被认为是“布哈林学派”的一批年轻的党的知识分子，是在1925年的党内斗争中崭露头角的。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之前的党内论战中，他们曾受到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猛烈攻击。实际上，早在1922年就成立的这一学派与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追随者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之处（其他领导人的追随者是由秘书、助手、行政部属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不过，可能最为潜一色和最为志同道合罢了。——原译者注

与耶菲姆对质后，布哈林一回到家就立即取出他的左轮手枪。枪把的金属薄片上仍刻着这样的字迹：“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尼·伊·布哈林，克·叶·伏罗希洛夫敬赠。”布哈林觉得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他向妻子道别以后就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他久久握着手枪，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随后的几天，他又重复过多次。有时甚至当着妻子的面紧握着手枪，突然朝空中一举，然后又把它藏进办公桌内。这种感情冲动的结果常常是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每当这时，都要很长时间，才能痛苦地恢复常态。

有一天，显然是1936年12月底，大约有十来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带着搜查证闯入了布哈林的家。正当这伙人要开始搜查时，通向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铃响了。布哈林拿起了听筒，负责搜查的内务部人就在他旁边站着。因为在搜查期间，一般是不准打电话的，但这是一条特殊的线路，而且布哈林毕竟还是一个中央委员。无论是布哈林，还是贴在他身旁的契卡人员，都听得出这是斯大林的声音。“您好啊，尼古拉？”斯大林问道，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但接着就局促不安地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刚到这里来进行搜查。斯大林没有进一步询问就大声地喝道：“叫他们统统都滚出去！”于是搜查立即停止了。

不过，在1936年12月于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就已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新的指控首次提出过质问。直到当时为止，无论在什么场所——街头、家里、火车上或别墅

中，都不能随便逮捕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是到了1937年夏，中央委员会才做出一项特别决定，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这样的临时权力。据说只持续一年，但实际上，在斯大林以后的统治时期内，内务部一直在行使这种权力)。要逮捕一个正式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都得由中央委员会本身批准。在这次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要求立即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斯大林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他出人意料地说：“我们不应匆忙决定问题，必须让内务人民委员部进一步审查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罪还是无罪。”

因此，十二月的中央全会没有批准对他们的逮捕。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布哈林仍然可以得到新的法庭审讯记录。对质也在继续进行。前面我曾提到，布哈林实际上已不在《消息报》工作，而由他的副手主持编辑了。然而有一天，布哈林突然接到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电话，要他到编辑部办公室接待一位西方来访的作家。当时，利昂·福伊希特万格正在莫斯科。布哈林奉命在他的办公室内迎接了他。这无疑是在做戏。因为福伊希特万格是知道对布哈林的指控的，布哈林能在一家苏联主要报纸的办公室里出现，当然会向来访者表明苏联司法的“客观性”。

所谓的平行总部

1937年是以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审判开始的。这就是对所谓平行总部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者把前托洛

茨基分子大都列入这个总部的名单。他们都是一些早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到三十年代仍在苏维埃出版界等国家机构中担任要职的人。这些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利甫什茨、索柯里尼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以及另外十二个人。主要被告尤·皮达可夫多年来一直是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泽的第一副手。作为一个管理人员，乃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皮达可夫比起他的上司来无疑更为内行也更富有经验。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对苏联工业化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也要比他的上司大得多。利甫什茨直到前不久还一直是副筑路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和谢烈布里亚科夫也一直是党内的重要人物。

这里将不直接讨论这一次审判。但我们应当指出，这次审判对布哈林的指控具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特点，即他的日子显然已屈指可数了。这次审判的组织者挑选拉狄克来进行揭发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布哈林在《消息报》前不久的同事，而且一、两个月前还到布哈林的郊外别墅请他代为说情。拉狄克一经被捕，就不可能长期忍受监禁，等着审问和折磨。果然，他很快就同审讯人员合作了，帮助他们编造所谓平行总部以及他同“业已暴露”和“尚未暴露”的两个反革命组织联系的各种离奇的神话。很可能多半就是由于拉狄克的帮助，1937年的审判才准备得如此迅速和如此“顺利”。正如大家所知，拉狄克后来没有被行刑队处决，而是改判十年徒刑。

证据表明，拉狄克还为1938年的政治审判捏造了许多情

节。与其他在押犯进行对质时，他曾诱使这些人在审讯人员事先炮制的全部“供词”上签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1937年1月29日的最后陈述中，他还声称：“我还要交待另一件犯罪事实——甚至在我已经认罪和已经揭露了这一反革命组织之后，我仍顽固地拒不揭发布哈林。我是了解布哈林的，他的立场和我一样都是不可救药的，因为我们的罪行，即便不是从法律上，那么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但我们是亲密的朋友，而且精神上的友谊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友谊都要牢固。我以为布哈林会明白自己和我一样已陷入危险的境地，并深信他会向苏维埃当局做出诚实的交待。因此，我不希望导致他被押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至于其它一些骨干分子，我则希望他们能缴械投降。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即当我看到审判即将开始时，我才决定我不能在法庭面前继续隐瞒还存在另一个恐怖组织的原因。”^②

1月中旬，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正式解除了职务。1937年1月17日，作为主编的布哈林的名字在《消息报》上也随之消失了。因此，许多人都以为布哈林被捕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仍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内，自我软禁在家。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他仍继续领取苏联政府特殊配给的食品（当然，再也没有去过克里姆林宫食堂）。他也常常给斯大林写信，象往日一样，开头仍称“亲爱的柯巴”。

1937年2月的中央全会

对拉狄克—皮达可夫的审讯结束后不久，就在莫斯科提前召开了中央全会。象往常一样，全会的成员都接到了预定于2月19日举行的提前开会的通知。议程有两项主要内容：1.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2.关于党的各级组织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做好准备工作的问題。当接到通知书时，布哈林认为这只能意味着他和李可夫将被赶出中央委员会和被开除党籍。此时，由于没有，或者至少看不到还有什么其它斗争方法，他就决定进行绝食，并把这一行动通知了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就在他开始绝食的一、两天内，斯大林打来了电话，说：“您在对谁闹绝食？是冲着党？”布哈林回答说：“您要开除我的党籍，我还能有什么办法！”“谁也没有想开除你的党籍。”斯大林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1937年2月18日，奥尔忠尼启泽自杀了。他的住处就挨着布哈林的家，不过是从另一道门出入罢了。布哈林喜欢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也很信任他。布哈林是从收音机和报纸的报导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并相信了官方的解释，即他的死亡是由于心脏病。但布哈林不能去他家拜访，也不能参加他的葬礼。中央全会由于奥尔忠尼启泽的葬礼向后推迟了一个礼拜。会议的前两三天，中央委员会成员又接到了一份新的议事日程，其内容主要是：1.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2.关于布哈林的绝食问题；3.关于党的各级组织为苏联

最高苏维埃选举做好准备工作的问題。在接到这份经过修改的议事日程时，布哈林茫然不得其解。他先是自己揣摩，然后又同妻子讨论。他认为如果议事日程中包括第2点即关于他的绝食问题，那就表明他和李可夫实际上不会被开除出党。因为中央委员会是不会讨论一个刚刚被开除党籍的前成员的绝食问题的。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布哈林停止了绝食。

中央全会是于1937年2月25日开始的。叶若夫做了关于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其他前反对派分子的“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报告。许多中央委员也发了言。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神话，即一些中央委员在会上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了辩护，并反对正在进行的大清洗。事实并非如此。会上发言的人都一致谴责了他们，并主张把他们送交司法机关。发言中，还列举了前反对派分子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的许多“破坏”活动作为谴责其罪行的例子。只有波斯蒂舍夫多少提出了怀疑。他对逮捕他的一位最亲密的同事提出了质询，因为此人以前从未参与过任何反对派活动。但波斯蒂舍夫本人当时也在受到攻击。(1937年1月他就被解除了苏联共产党基辅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虽然仍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解除他职务的基辅地方委员会的全会是由卡冈诺维奇主持的，他利用一个名叫尼古拉恩柯的诽谤信来攻击该委员会的前领导。指责他们犯有一系列的政治错误、官僚主义，并攻击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莫洛托夫攻击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调子最高。

当布哈林被点名表态时，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他驳

斥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不会说谎！”这时，莫洛托夫从位置上跳了起来，喊道：“如果你不坦白，那么这就证明你是法西斯的走狗，因为敌人正在自己的报刊上说我们的审讯是预谋的。把你抓起来，你就会承认啦！”当布哈林回到家里时，他痛苦地大叫说：“这完全是诱人入狱的圈套！”为了不受中伤者的陷害，他要为自己进行辩护，但他并不是想“帮助”什么法西斯分子。总之，他后来代表李可夫和他本人在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皮达可夫、拉狄克和其他人的供词中一切反对他们的指控都纯属诬陷；布哈林和李可夫还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伪证，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内务部活动的委员会。这时，斯大林冲着他喊道：“好吧，我们就叫你到那儿去，你自己去看看好了！”

随即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委员会，为全会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拟订决议。在委员会工作期间，全会休会了两天。这两天，布哈林是在家度过的。他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他写了一封题为《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并嘱其妻熟记，他对妻子说：“你年轻，还会看到由其他人来领导我们党的那一天。”在这两天中，他反复测试妻子，直到他确信她已一字不错地铭记在心为止。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

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布哈林接着列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罪状。这个组织已成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们没有头脑、腐败无能、报酬优厚，通过卑鄙肮脏的活动去迎合“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虽然他驳斥了所有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他本人的指控，但却没有提到其他那些业已判处的前反对派的问题。为了强调他的忠诚，他在信中写道，“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象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布哈林在又一次核实了妻子的记忆力之后，就把信烧了。

受全会委托负责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委员会，在米高扬（委员会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委员会几乎包括了党的所有高级领导人，其中许多人，在后两年的残酷镇压中，本身也成了牺牲品。处理的决议是采取按姓氏字母顺序指名表态的方法产生的。中央委员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

——安德烈也夫、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蹦出这样几个单词“逮捕、审判、枪毙！”轮到斯大林时，他说“把案子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后面发言的人都重复了斯大林的公式；但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逮捕、审判、枪毙”。（只有作为主席的米高扬没有表示意见，因此没有记录在案。）

被捕和受审

两天后，全会复会。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叫到会上听取委员会的处理决议。布哈林知道，他的命运已不可挽回了。他吻别九个月的孩子并老泪纵横地跪在妻子的面前请求宽恕。他知道她会吃苦，但对他们两人还会忍受什么样的痛苦却一点也想象不出来。布哈林竭力克制住自己，站起来对妻子说：“记住，安娜，我是无罪的。把我们的儿子教育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吧！”全会正在他所住的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他只需穿过院子就可以到达举行会议的房间。衣帽间空无一人。李可夫与他同时到达。正当他们脱外套时，从内壁突然走出八个人，分成两组，每组四人，分别向布哈林和李可夫走来，这就是被捕。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的克里姆林宫带到了路比扬卡。

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搜查了布哈林的住宅。布哈林的妻子此时已经明白她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丈夫。

* 按照俄语字母发言的顺序，英文中的V应紧接B的后面。——原译者注

了。搜查进行了很长时间。布哈林的藏书室几乎没有触及，但他所有的笔记本和他的全部档案材料都被没收拿走了。这些档案有许多宝贵的文件，包括一些列宁手稿。（列宁逝世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列宁研究院，并呼吁全体党员把无论是列宁写的，还是与他的活动有关的全部信件、著作或其他文件统统都交给研究院，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布哈林也把许多列宁的手稿交给了新成立的列宁研究院的图书馆馆长，但却留下了少量私人性质的信件和文稿。）虽然搜查进行了很长时间，但还总算比较客气。布哈林的家庭成员没有被捕。这时，除了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子的保姆外，布哈林的父亲也住在这里。这位曾当过小学教员的老人，现在病得很厉害，正危在旦夕。

在随后的五天内，布哈林的妻子没出家门一步。但至少总得带孩子到外面散散步啊！所以，她才又一次开始推着儿子坐着的童车围着克里姆林宫转圈，没有人理她，也没有人向她提什么问题。不久，她接到一个电话，问她为什么不去领取配给的食物。“什么食品？”“你还有领取配给食品的权利。”这指的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配给供应。安娜·拉林娜以为这一定是弄错了，所以没有去领。但后来保姆被召去把食品带了回来。他们也不再拒绝了，因为布哈林没有留下什么储备；他被捕后，家里很快就既没有钱，又没吃的东西了。

布哈林被捕后的一个月左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给拉林娜捎来了布哈林的一封信，要她送一些书和材料去。信中说，他已开始写一本题为《法西斯主义下的文化堕落》的

书，他要的这些材料都是写这本书所不可缺少的。但拉林娜无法照办，因为布哈林的办公室被封了。不久，审查队的头头打电话给拉林娜，说为了取出有关的书籍，办公室可以启封，并要她把书送到他所在的路比扬卡去。拉林娜除了书以外，还带去了一些食物，但审查人员不肯转交，说：“我们对您的丈夫供养得非常好。他似乎爱吃甜食，对吧，每一杯茶里我们都给了他六块方糖。”审查人员还说：“您丈夫要您给他写一张条子，并给他一张您和您儿子的照片。”安娜·拉林娜正要动手写条子，但审查人员却口授她能写些什么——或更确切地说——应当写些什么。“就写您们现在仍象过去一样还住在克里姆林宫内，还可以继续领取配给的食物。”由于意识到这里面有某种诡计，所以拉林娜回答说：“我不写这些。”她决心“宁愿不写也不写他们想要的东西”。经过一番争执，审查人员就是不肯接受拉林娜写的条子，因为里面没有包含他所口授的内容。这个礼拜，审查人员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想要布哈林相信，如果他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供词，那么他的妻子、儿子以及其他亲属就会得到宽大；然而，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亲属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这显然是在讹诈。但对布哈林来说，要顶住这一压力也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不知道审查人员对布哈林是否动用过酷刑，但李可夫肯定是遭到了毒打。因为，在后来的审讯中，每当布哈林躲躲闪闪，言不及义，李可夫总是及时地“纠正”布哈林的回答。

尽管布哈林已被监禁，而且随之而来的大逮捕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并开始吞噬到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但布哈林的

家庭仍居住在克里姆林宫。不过此时的生活已使人无法忍受，因为没有人希望与这样一个如此显眼的“人民敌人”的家庭有什么联系。因此，拉林娜要求分配一套新的住宅。一两天后，她就在“堤岸住宅区”——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莫斯科河对岸的政府宿舍区——分到了一套五个房间的公寓。当时，公寓仍有人继续打扫，虽然屋里有一半是空的。一个月后，拉林娜接到了一份公寓租金及其服务费的帐单，大约是三百卢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很小的款子。拉林娜把帐单寄给克里姆林宫，并附了这样一张短条“遗憾得很，盖世太保特务布哈林所得的报酬太少，我们弄不到所需要的这笔钱来付房租。”加里宁收到这张条子后，就指示不得向布哈林家庭索取房租。就这样，几乎过了一年，直到1938年3月。当时，住在“堤岸住宅区”的人，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有失踪的，而且，一旦家主被捕，妻子、成年的子女以及其他亲属也会被捕。但布哈林的家庭直到大审判最后开始的时刻也一直未受触及。大审判是1938年3月2日开始的，布哈林是其中最重要的被告。

大 审 判

这是最“重大的”一次审判，似乎把以前的历次审判推到了一个顶点，因为这是在揭露所有“反苏核心”的“最隐蔽的敌人”。在被告席上，布哈林旁边坐着李可夫（他曾多年主持人民委员部会议的工作）和亚哥达（前内务人民委员部

委员，直到前不久，他还一直是契卡的全权负责人，并组织过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被告人还包括其他一些前人民委员和许多乌兹别克、白俄罗斯的党的领导成员。最后，还有两位被指控与高尔基的秘书克柳切柯夫一道阴谋杀害高尔基的医生。这次司法审判是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受理，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宫（而不是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在什么圆柱大厅）里举行的。大厅可以容纳五百人左右。前五排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他们的后面是群众代表，其中夹杂着一些人们所不认识、多半也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人员。我所以没有在群众代表这几个单词上加引号，是因为他们确实代表苏联社会的某些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弄一张为期一天的入场券，为的是看一看“人民的敌人”是如何“忏悔”的。比如，第一天，伊利亚·爱伦堡出席了审判，第二天又由一位著名的莫斯科艺术家参加，如此等等。其中的一些人还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首先，军事法庭的成员——乌尔利赫（庭长）、马特维也维奇和叶夫列夫以及法庭秘书巴特尤出来就坐。接着是国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辩护律师布劳德和科莫多夫走进大厅。再其次是第一批警卫队“登场”^{*}。每一个被告的前面都坐着他的审查人员，其借口是保护被告的安全。这些审查人员都使自己负责的被告人为这次最后的表演作了“准备”。大

^{*} 这里有一个难译的双关词，因为本文所指的“警卫队”这个词在语源上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前辈沙皇的“警卫队”（Охрана）是同一个概念。

——原译者注

厅的旁边有一些特设的供外国通讯社代表使用的专席。出席这次审判的最重要的外宾是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戴维斯不懂俄文，由美国记者夏皮诺充当翻译。尽管如此，但他们两人对这次审判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夏皮诺认为这次审判是司法上的把戏，是虚构的故事；而戴维斯则真的认为斯大林摧毁了苏联的第五纵队。戴维斯在从莫斯科写给他女儿的信中，以及后来在题为《出使莫斯科》的书中都谈到了这一点。最后，被告人被押上了带有简陋板壁隔障的被告席。他们的外表各不相同。科兹哈也夫穿着一套时髦的衣服，似乎是刚剪裁好的；伊克拉莫夫身体好象已经垮了，穿着也很狼狈；亚哥达则象一只巨大的精疲力尽的狼；布哈林在凝神思索，但脸色苍白。

一些程序性的问题结束以后，法庭秘书宣读了一份依据预审证词而写成的很长的起诉书。接着审讯就开始了。第一个被审的是别索诺夫。他的作用，无论是对组织这次审判，还是在实际“剧情发展”中，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从起诉书来看，恰恰是他被说成是在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以及托姆斯基之间起着联系的作用。据说，还是当他在苏联驻柏林贸易使团工作期间，就曾安排过反对派分子同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会面，他传递过指示，还干过一系列其它活动。然而，要谴责别索诺夫在这次审讯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完全恰当，因为他不是乐意、或一开始就承认这些问题的。他遭到了各种严刑拷打，忍受了“车轮战术”的折磨，整整十七天没有睡过

一次觉；而其他许多被告经受折磨的时间一般只在四五天左右*。别索诺夫常常被搞得精疲力尽。但正象许多其他人的情况一样，即经过最初的长期抵抗以后，一旦垮了下来并在伪供上签了字，他就再也没有力气作进一步的对抗了，而只能成为审讯策划者手中的驯服工具。

法庭诉讼过程中的障碍

在盘问每一个被告的时候，一些特殊的问题还要同其他被告进行对质。当别索诺夫谈到他曾竭力在托洛茨基分子、加米涅夫分子和右派分子之间进行斡旋，建立联系时，维辛斯基转向布哈林，问他能否证实别索诺夫的交代。布哈林证实说，甚至在同别索诺夫会面以前，就已同皮达可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过讨论。维辛斯基接着问布哈林：“你们讨论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联合行动吗？”布哈林简单地回答说：

“是的。”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对这次审判来说完全是意外的事件。当维辛斯基问完布哈林又问被告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要他也证实别索诺夫所作的一系列交代时，克列斯廷斯基却把他的交代统统否定了。克列斯廷斯基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人物，直到被捕前一直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他所以不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也没有参与过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只是因为1921—1930年期间他一直是苏联驻德国大

* “车轮战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用以审讯和制服囚犯的一种基本手段。是指由警察轮流进行审讯，连续数日，不让犯人睡觉。——原译者注

使*。在预审期间，他曾痛快地同意审讯人员的说法，并在要他签字的所有供词上都签了名。以后才弄清楚，原来由于他意识到要准备一次新的政治审判，所以他才决定养精蓄锐，以便在法庭上说明真相。此时，他严厉地——甚至是怒气冲冲地——大声地宣布说，他从未与别索诺夫讨论过什么托洛茨基的问题；事实上他也从不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别索诺夫是在向法庭撒谎。当惊慌失措的维辛斯基提醒他注意在预审时所作的交代时，克列斯廷斯基回答说，那些统统都是谎话。维辛斯基追问说：“你为什么在预审中不说真话？”克列斯廷斯基的回答稍一犹豫，维辛斯基就赶忙结束了对他的审问，说：“我没有听到任何回答，也没有更多的问题要问。”

接着，维辛斯基又开始审问别索诺夫，显然是为了让坐在克列斯廷斯基身旁的审查人员能够警告他会承担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过了一会儿，虽然维辛斯基又审问了克列斯廷斯基，但后者又一次全部驳回了别索诺夫所提供的种种证据，并再次申明他在预审中的所有交代都是捏造的。他解释说，当时所以未能讲真话，是因为他确信“要是可能举行审判的话，那么在这之前”是不会允许他拒不承认所有针对他的假指控的。维辛斯基问道：“你为什么把审问和检察长引向歧

* 在这次法庭的另一轮审讯中，克列斯廷斯基其实说过他于1927年11月曾写过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断绝同他的来往。在这之前，他同左倾反对派有过密切的联系，但在柏林任大使期间，并没有直接卷入党内斗争。对克列斯廷斯基审讯的另一种报导（意义完全不同的报导），请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平装修订本，伦敦，1971年）一书的第497—521页。——原译者注

途？”克列斯廷斯基回答说：“我只是认为，如果我在预审中说了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即所有一切指控都与事实不符——那么我的证词是决不会到达党和国家领导人那里的。”维辛斯基在向别索诺夫又提了一两个问题之后，就宣布休庭两个小时。

克列斯廷斯基的新的证词立即就传到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那里。因为，第一，在离被告人不远的台上，有一个事先安好的秘密的麦克风，为的是让斯大林能从他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听到所有的证据。第二，大厅的尽头有一个四周很高的楼厅（只要不是站在上面，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只能容纳一个人。有时人们可以看到楼厅里冒出缭绕的烟雾，这次审判的一些组织者也认为斯大林为了查看他前不久的同事及对手，曾来这里待过一两个小时。休庭期间，法庭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事先为审判组织者准备好的房间里举行了会议，因为这种形式的公开审判实际上是主持人和全体助手都参加的一场大演出。这些事先安排的房间是相当舒适的；就在十月宫的下面，并有一个经过仔细掩蔽、保卫得很周到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只有进出的人才知道。负责法庭全体助手工作的是一个名叫扎科夫斯基的老契卡。他先在捷尔任斯基，后又在明仁斯基手下从事秘密警察工作。在亚哥达手下，他跃升得较快，而且在叶若夫手下也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都需要象他这样的“专家”。这个工作班子是如何评价克列斯廷斯基事件的，人们不得而知。总之，休庭以后，维辛斯基转而审讯的是罗森戈尔茨和德宾科。这两个人

在被捕前曾在外贸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任职。他们向法庭提供了全部“所需要的”证据，包括一些显然指控克列斯廷斯基的证据。然而，克列斯廷斯基又一次拒不承认，并坚持认为他是无辜的。

因此，第一天的审讯，对组织者来说，并不十分成功。第二次开庭时，总检察长没有继续审讯克列斯廷斯基；但在后一阶段的审判中，当重新审问克列斯廷斯基时，他却承认了指控他的全部罪行，并确认“他”在预审时所作的交代不是伪造的。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克列斯廷斯基了。因为出席审判的人都非常熟悉被告，是不可能认错人的。曾有一位出席审判的人向我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第一天的审判中，与布哈林、德宾科、亚哥达以及其他一些我以前就非常熟悉的人并排坐在被告席上的是真正的克列斯廷斯基。但在最后一天，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虽然看起来象克列斯廷斯基，但我不能担保他就是真正的克列斯廷斯基。这是我在审判中怀疑被告人身份的唯一的一次。”克列斯廷斯基很可能是由一个扮得很象的演员来代替的。这种演出（就象在真正的舞台上一样），如果突然需要一个补缺角色，也许早已有一个替角在等着了，要不也会很快找到这种替角的。

被告席上的布哈林

布哈林的口供也不十分正常，或至少是发人深思的。他在法庭上所说的话似乎可以作两层解释。对普通的公民来

说，他的交代显然使自己充当了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角色。但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从布哈林的口供中却可以发现许多比比皆是的暗示，从而使人们对法庭和审查过程中所提出的全部说法不能不表示怀疑。布哈林，一方面承认他曾追随“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集团”的反革命组织；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一反革命组织并不完全知道本身的目的（因为从来也未真正阐述过）。布哈林坚决否认曾直接参与过间谍活动，坚决否认他与暗杀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和明仁斯基以及1918年企图暗杀列宁等事件有任何牵连。为回答维辛斯基，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被告人的交代是没有约束力的；利用被告人的交代是中世纪法律制度的原则。”而且他说这次法庭审判就是完全建立在被告人口供基础之上的！

虽然布哈林在审判过程中，基本上同意起诉人的意见，但他几乎总是附有保留条件，而把总检察长和法庭弄得狼狈不堪。一次开庭期间，军事法庭庭长乌尔利赫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冲着布哈林说：“你是在旁敲侧击，闭口不谈自己的罪行。”在另一轮审讯中，同样被激怒的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也厉声地对布哈林说：“你显然是在固守某种策略而不想讲真话！在夸夸其谈和合法诡辩的背后躲躲闪闪，把枝节性的小事扯到政治、哲学、理论等问题上去！可是你还可以悬崖勒马，因为你被控犯有间谍罪，而且侦察得来的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你是某一个情报机构的间谍，所以还是奉劝你收起这一套吧！”此时的苏联报纸也说布哈林正在固守某种策略；正竭力用伪科学的词藻来搅浑对他的控告，以达到隐匿真情、开脱

罪责的目的。“在总的方面，他声称对一切都负有罪责，但在每一条具体的指控上又推得一干二净”^③。

1938年3月11日上午开庭时，维辛斯基做了最后一次起诉讲话。讲话的三分之一几乎都是专门指控布哈林的。他要求对布哈林和其他大多数被告处以死刑。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整个开庭期间的全部议程都用于辩护律师布劳德、科莫多夫发言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这几次开庭也并非完全没有出人意料的事件。比如，前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先是向法庭承认自己犯有破坏罪，曾侦察、盗窃过国家资金帮助托洛茨基分子开展活动，甚至还想同图哈切夫斯基、乌波列维奇和雅基尔一起用军事手段颠覆苏维埃政权。然而紧接着，他又突然大谈起十月革命期间和国内战争期间自己所作的种种贡献。他在莫斯科培养过第一支起义部队，随后又在国内战争的许多艰险地区执行过党的极其复杂的指示。

维辛斯基要求判处罗森戈尔茨死刑，而后者也说他不要求宽恕，因为他应当得到严厉的惩处。他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与可爱的祖国永别就不痛苦。现在我们已可以看到新的巨大的发展，看到布尔什维克教导出来的新一代。我们在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更增加了我生离死别的痛苦。我的生命第一次充满了热血，闪耀着幸福的光辉。”说完这些话，他就突然开始唱起杜纳耶夫斯基和列别捷夫-库马奇所创作的歌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大部分在场的人——不管是契卡工作人员，还是应邀出席的公众代表——都从位置上跳了起来，不知所措。然而，罗森戈尔茨没有唱完，就坐下来抽泣了。

亚哥达只作了一个简短的最后陈述。虽然，他确实“承认”种种罪行，但仍然否认他是这一“集团”的领导核心，也不承认他组织过暗杀基洛夫的活动。然而，最后他突然走到安装秘密麦克风的地方（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知道这个地方），用颤抖的声音说：“斯大林同志，契卡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宽恕我！”

布哈林，甚至在最后的陈述中，也依然固守他所采取的策略。他说，他是“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集团”的一个领导，但接着又补充说，作为一个领导，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该集团的各个具体行动。他断然驳回了起诉书上所提出的下列指控，即他随时都能下达开展破坏活动的指示，能在爆发战争期间命令向德国开放战场，或能指挥间谍组织。他以一种不太明确的方式说，他并不希望看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崩溃。他断然拒绝承认自己与谋杀基洛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马·彼什科夫有任何牵连。他只承认对“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集团”所犯的各种罪行负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他说，托洛茨基才是这些罪行的“主要推动力”。布哈林没有要求宽恕。

3月12日晚，已经很晚了，为了讨论最后的判决，法庭又暂时休庭。讨论进行了六个小时。3月13日上午凌晨4点，重新开庭。疲惫不堪的听众，警卫和被告人都分别就席。此时，除了工会大厦以外，莫斯科到处是一片死寂。曾有一种荒诞的传说，说什么法庭大厦的外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等着听候判决的消息，但事实上，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庭长用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宣读了判决书。在他宣读时，被告都一直站着。十八名被告，包括布哈林、李可夫、亚哥达、克列斯廷斯基、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德宾科、捷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科兹哈也夫，被判以“极刑”（即由行刑队枪毙），并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医生普莱特涅夫被判二十年徒刑；拉柯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判以二十年和十五年徒刑。3月15日夜，曾被列宁正确地称为“全党的宠儿”的布哈林和他的那些不幸的同志都被处决了。这就是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犯下的最可怕的罪行之一。人们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罪行。

跋

从布哈林被处决的那一天，或更正确地说，从那天夜晚起，四十年已经过去了。要列举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与“布哈林案件”有关的（那怕是间接的）各种事件是不可能的。这次审判一结束，安·米·拉林娜就被捕了。她在监狱、集中

营以及流放中度过了十八年。布哈林的儿子尤利是由住在乌拉尔山区的拉林娜的妹妹养大的。尤利大约有二十多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今天，拉林娜和尤利住在莫斯科，而且多年来一直在争取——迄今为止尚未实现——为布哈林正式恢复名誉。从本质上来说，苏联报刊早已揭露1938年的整个政治大审判。这次审判中的被告人克列斯廷斯基、伊万诺夫、切尔诺夫、德宾科、捷连斯基、伊克拉莫夫、科兹哈也夫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已完全恢复了名誉。1964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在全国历史学家会议的讲坛上，在回答问题时，曾说布哈林和李可夫都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

但与此前编辑理论相后 直到今天为止 苏联国家政策的注

不真正了解曾经是最孚众望的领袖和革命理论家之一的布哈林，因为他们不能阅读他的著作和文章。苏联在新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甚至连布哈林的名字都未提及。所以鉴于这一点，维辛斯基所说的话——迄今为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对的。而今天（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已有二十多年，从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也有十七年了），当全世界都知道斯大林的严重罪行时（对布哈林的处决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党的领导人安葬在什么地方。但我们却知道起诉他的检察官维辛斯基（斯大林时代最凶狠的人之一）的埋葬地。他的躯体就埋在离列宁陵墓不远的克里姆林宫墙旁边。他坟头上的墓碑似乎在提醒人们：在我们国家，并不是所有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都已成为历史上的往事。

注 释

① 《反苏的“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集团”的真相》：《法庭诉讼报导》，1938年，莫斯科。

② 《消息报》，1937年1月30日。

③ 《消息报》，1938年，3月9日。

（王谨译）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苏〕尼·伊·布哈林

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流的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所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

* 这封信是布哈林的夫人拉林娜在布哈林被捕前背诵下来，并经过十七年监禁释放后追记下来的。1961年3月苏共曾准备为布哈林平反，拉林娜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引证了这封信的全文。——编者注

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来未曾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十八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

* M. H. 柳京——1914年入党，1927年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原为莫斯科一个区的区委书记，他在三十年代初所组织的反对派小组属于苏共的中层领导。——编者注

** 沙皇尼古拉二世。——编者注

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又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象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林英译自罗·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纽约1974年俄文版）

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访问记*

〔美〕J.D.札戈里亚

“还有，和李可夫谈话以后，在我1936年最后一次出国期间，我接触过孟什维克尼古拉也夫斯基，此人和孟什维克党领导集团关系十分密切。从和尼古拉也夫斯基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知道右派、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协议，并且对于一切正在进行的事，包括柳京纲领在内，他都知情。”

摘自布哈林1938年3月法庭供词

* 这次以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为一方，以谢维林·比亚勒和我为一方的谈话是1964年1月30日在纽约进行的。——J.D.札戈里亚注

俄国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生于1887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所长，为第二国际保管重要历史资料）1936年春在巴黎会见布哈林，1937年以匿名方式印出一本题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的小册子，透露当时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大量情况，引起了轰动。后来尼古拉也夫斯基声称这些材料主要是从和布哈林的谈话中得来的。1964年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珍妮特·札戈里亚夫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谢维林·比亚勒为此事走访了当时在纽约的尼古拉也夫斯基。这篇访问记首次发表在札戈里亚夫人编辑的尼古拉也夫斯基论文集《权力与苏联上层人物》（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内。

——中译者注

访问者（以下简称“问”）：你说过《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主要是根据1936年你和布哈林的谈话写成的。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你可以先向我们谈一谈当时你是怎样和他见面的吗？

尼古拉也夫斯基（以下简称“尼”）：说起来话很长，也很有意思。我尽量简短地说一下。我和布哈林见面与一批德国档案的事有关系。那是我1933年离开柏林的时候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一起从德国带出来的。带出这批材料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托·韦尔斯的请求，因为这是他们的财产。德国档案和俄国档案一起运到了巴黎，我在那里担任它们的保管员。

布尔什维克为了充实他们在莫斯科的收藏，非常迫切地想得到这批德国档案。他们那里除了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档案，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1935年，他们派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一位代表来找我，问我是否同意就向俄国人出售档案问题进行谈判。我说我只能把他们的建议转达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我照这样做了，于是就开始了谈判。

谈判在一个代表团来到巴黎之后进入了主要阶段。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当时的中央委员布哈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维·阿多拉茨基，还有苏联名作家、全苏对外文协主席阿罗谢夫。布哈林的身份是马克思专家，显然是因他本人要求才派他来的。

谈判从1936年2月一直进行到4月底。布尔什维克出价一千万法郎，这样一大笔钱被拒绝了，因为德国人不愿意出

让马克思的材料。

布哈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到达巴黎的当天来找我，就是为了上面说的这件事。

问：那么，谈话纯粹是正式的吗？

尼：不，我和布哈林的谈话也有非正式的一面。布哈林和我以前没有见过面。但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有许多和我相同的经历。我第一次被捕是1904年1月，他是在1908年。但他的流放地和我一样，也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奥涅加。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相识者，所以有一些追怀他们的话要说。

再者，布哈林试图让我们的交涉多带一些私人的性质。他头一天晚上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弗拉基米尔（我的弟弟）问你好。”后来布哈林和我有机会单独谈话的时候，他说：“阿列克赛（李可夫*）问你好。”我的弟弟是李可夫的妹夫；和李可夫住在一起，而布哈林则是他们家的常客。有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场，布哈林只替我弟弟带好。我弟弟是个孟什维克，虽然政治上并不积极。只有我们单独在一起他才转达李可夫的致意。布哈林就是这样为我们后来的交谈定下了调子。

问：你认为布哈林为什么有意要使你们的谈话带上非正式的气味呢？

* 李可夫继列宁之后成为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他参加了反斯大林的右翼集团，在十六大上被迫低声下气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布哈林访问尼古拉也夫斯基的时候，李可夫还是一名中央委员，但是极受斯大林的冷遇。——原编者注

尼：我有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他想让他觉得可以信赖的外界的什么人知道他在某些事件上的立场。例如，关于1922年的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他问我：“你知道我在这次审判里面的真实作用吗？”我回答说，我知道他曾在背后反对过处决被告。审判期间，在要不要处决被告的问题上，曾有一场很尖锐的斗争。布哈林表态反对处决，但中央委员会不认可他的表态，在党的纪律约束下，布哈林在正式场合发表了几次最激烈的反对社会革命党的讲话。

我的印象是，布哈林想把事情说清楚，让苏联以外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观点。但是他又想说，又怕说得太多，两种思想明显在打架。我记得有一次谈话，那个曾在外国呆过多年的阿罗谢夫在场。他在旁边打岔，用一句冲着我说的话实际上堵住了布哈林的嘴：“行啦，我们一走，你就能写出几篇蛮有趣的回忆录！”我看出他在担心。因而我回答说：“让我们达成一条协议：我们这几个人当中，谁最后一个活在世上，由他把我们的会见写出来。”事情凑巧，我正是最后一个。

问：你们谈话的那些日子，布哈林看起来怎么样？他的情绪如何？

尼：布哈林很象是希望从莫斯科生活的紧张气氛里脱身出来得到一次休息。他疲倦了。他想休息几个月，也许是想去海边游泳，不想事，不争论。从以下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一天他对我说：“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我们为什么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讨价还价上？让我们到地中海边的什么地方去一趟。然后你写信告诉你们方面，说我不同意，我也写信回

去说你不同意。这样我们就能休息上一两个月。”话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里头有认真的含意。这时候他年轻的夫人来了。她是一个大学生，正在等待着生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布哈林向我介绍了她。她也非常需要一次休假，听她丈夫说要去海边旅行，露出了赞成的笑容。

可是与此同时，要永远离开俄国，看来布哈林是不会同意的。他和一个女共产党员范妮·叶泽尔斯卡娅谈话时这样表示过。叶泽尔斯卡娅到巴黎来看他，后来把他们谈话的内容转告了我。她曾经是罗莎·卢森堡的秘书，和布哈林的关系很好，以前在共产国际的时候在他手下工作过。她试图说服他留在国外。她说有必要在国外办一份能得到俄国现状的真实消息并且能在那边发生巨大影响的反对派报纸。她坚信布哈林是能完成这个使命的唯一的人。可是，她告诉我，布哈林回答说：“我不认为我能够在俄国以外生活下去。对那边的事物和紧张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

他是会这样说的。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布哈林想起托洛茨基住在离那里相对地说并不太远的地方——奥斯陆。他眨了眨眼说：“我们拎上这个（装着马克思手稿的）木箱，花一天时间去看看托洛茨基吧！”他接着说：“不用说，他和我有过几场恶斗，可是这不妨碍我对他怀着很大敬意。”

这样一类的话，比如关于国内的生活怎么不好过，关于他对托洛茨基的称赞，他是能说的，但也能到此为止。

党内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话题。不过我们仍然有过多
次关于党内形势的谈话。布哈林显然想说这些。我也懂他的心
情。

另外有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是个重要人物，虽然赶不上布哈林——到国外以后，一次对我说：“我们在那边已经忘了怎么才能坦率。只有到了国外，和你这样的人，也就是和一个从我们的机密档案里已经了解清楚并且认为信得过的人谈话，才能够坦率。”据我看，这也是布哈林的感觉，尽管他竭力克制。

布哈林和我通常是从回忆往事和讲我们很多共同相识者的故事变为谈论一般政治问题的。从过去很容易就转入现在。所以我们的谈话具有随便漫谈的性质。他没有直接谈苏联的形势；他往往自己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把那些难谈的问题挡回去。直到今天我也说不准这是为什么。也许对一个并非共产主义同道者的人，他不愿意完全信任？或者他害怕甚至在自己思想里做出某种结论？然而从他的言谈，从他的沉默或提问里头，我还是能摸到他对各种事物的态度，纵然他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问：我知道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提到过你们的谈话。这方面对他的指控是什么？

尼：在法庭上，布哈林关于我们的谈话作过以下陈述：
我们谈话中的具体的和新的被分，就是一旦右派中心或联络中心或整个阴谋的上层组织败露，就通过尼古拉也夫斯基和第二国际领袖达成一项谅解，由

他们在报刊上发起一场适当的运动……

我忘记说，我和这个尼古拉也夫斯基需要因公会晤的事实，为我和尼古拉也夫斯基的接头提供了方便和伪装。我因此有了一件完全合法的外衣，在它的掩盖下，我可以进行反革命谈判并且达成这种或那种协议①。

换句话说，布哈林被控告和我达成了一项协议：一旦他被捕，我应提请社会党第二国际出来为他辩护。

我必须在这里插一句，对布哈林的起诉书里的这些断言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布哈林和我之间当然没有缔结过什么协议。象这样的协议我们连商谈都没有商谈过。不过我记得，1938年审判期间，我从布哈林的供词中觉察出他有在西方社会党舆论面前剖白心迹的愿望，也就是想表明他和他的朋友们现在变成了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和好的赞成者。但我相信，这个想法只是在我们巴黎会见以后才产生的。

问：在我们谈《信》的实质问题以前还有一个问题，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方式，能不能向我们谈一谈？

尼：我写《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的时候，手头没有任何和布哈林谈话的记录。我做过一点记录，可是1936年8月契卡人员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进行了一次袭击，我是这个分所的所长，在这以后我认为还是把记录毁掉的好。这次袭击中偷走了三、四十包文件，包括托洛茨基的儿子刚刚交给分所保管的托洛茨基档案里的材料。毫

无疑，契卡人员正在为预定的几次公审搜罗材料。他们认为对布哈林、李可夫的审判是最重要的，正在调查布哈林在国外的接触。因为从托洛茨基档案被盗的前后情况来看，他们一定有内线的情报——现在清楚了，¹原来托洛茨基儿子的心腹秘书兹巴罗夫斯基是斯大林的特务——我决定销毁我手头有关布哈林政治谈话的全部记录。但这些谈话的内容我还记得，其中的若干部分就写进了那封《信》里。

我应当说明，《信》原来的写法，不是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思考，而是作为我和布哈林谈话的记述。F. I. 唐恩，当时的《社会主义通报》编辑，要我把写好的东西改写一遍，因为他觉得简单地写成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自我叙述比较好。这样，这个文件就以不加任何注释的形式出现了，好象是一份逐字记录的报告。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布哈林叙述的事情只到1936年初为止，我们会见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当年后来发生的事实，我是从其它来源得知的，首先是沙尔·拉波波特，一个法俄血统的著名共产党员，这个人因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公审，开始放弃共产主义，很乐意和我分享他的广泛的消息。

现在重读这封信，我看到我略掉了布哈林对我说过的许多东西。特别是跟他个人有关的。我这样做有不同原因，主要是避免授人以有关我的情报提供者身份的线索。然而布哈林对我讲的话，都带着很浓厚的个人色彩。布哈林是一个全身都沉浸在政治里的人，这种人谈政治，不能脱离他本人生活的细节。反过来说，布哈林是透过他个人经历的棱镜描绘

着当时苏联领导层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我前面说过，我当时感觉到，他是在把每件事都告诉我，以便日后有人能正确地解释他行为后面的动机。现在，三十年以后，根据发生过的全部事态，我确信我当时的猜测是对的。许多事情布哈林根本没有谈到，许多事情他没有充分地讲明，但凡是他对我的，都是心里想着他死后的讣告而讲出来的。

实际上，写作这封《信》主要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一方面只能摘用他的言谈中有关政治事件的实质部分，另一方面还必须保留他表达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的一般心情，他们发现自己陷进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式的环境，正在这个环境里灭亡。

问：现在转入你和布哈林谈话的内容，你说他提到1922年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关于他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他没再说什么吗？

尼：布哈林是1922年3—4月间和社会党国际进行建立统一战线谈判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你可能记得那时在柏林举行过三个“国际”的会谈：第二国际、所谓的维也纳联盟和共产党的第三国际。布哈林告诉我，他、拉狄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他成员和社会民主党人谈判的过程中，后者宣布，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起码的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建立统一战线才有可能。他们要求，第一步，在当时莫斯科正准备举行审判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案中不得施用死刑。

这些社会革命党人是因为争取重开被布尔什维克解散的

立宪会议而被逮捕的。他们将在1922年夏天被当作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受审。外国社会党人希望确切地知道这些社会革命党人不会被处决。布哈林向我讲明，他和代表团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一点并且作出了个人的保证。就在这时候，俄国国内在托洛茨基倡议下发动了一场无情地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为了配合这个运动，苏共中央拒绝承认布哈林等人在柏林所作的保证，所有主要的社会革命党人被告后来都被判处了死刑。

和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布哈林两次用下面的话解释他的立场：“是的，必须承认，在二十年代初期，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有能力把整个欧洲发动起来，使得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判决不可能执行。”

问：我明白《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里包含着有关所谓“柳京纲领”的最早的报道。你是从布哈林那里知道的吗？

尼：柳京的纲领我原来就知道。1918年在伊尔库茨克我和他本人见过面，当时他还是个孟什维克。我知道1928年他是后来被斯大林搞垮的莫斯科市委右翼反对派的台柱之一，从《红星报》总编的职位上被撤下来以后，写了一篇很长的纲领，主要内容是对斯大林在党内生活中的作用的分析。

但布哈林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了解到柳京攻击斯大林的一些具体情节。他说，柳京声称苏联领袖是“一个附在俄国革命身上的恶魔。在个人权力欲和报复欲的驱使下，把革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他论证说：“不铲除斯大林，党和国家都不可

能恢复健康。”斯大林说这个纲领是对他进行暗杀的号召书。不过实际上它并没有包含这样直接的号召，尽管它的确认为必须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问：你和布哈林谈论过什么人吗？比如列宁、斯大林或别人？

尼：谈过。特别叫人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列宁的那些评语，因为布哈林对他那么挚爱。即使谈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上的分歧，他的语调也是充满温暖和友情的*。

下面是他对我说的有关列宁生病的最后时期的情况。根据布哈林讲的各种具体情节，我推断他指的是1922年初秋。**“列宁常常叫我去看他”**，布哈林说，“大夫们禁止他谈话、免得

*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他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事件是列宁传记中最不光彩的篇章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沙皇警察的特务，并且出卖了党的成百名工作人员。但是从派别斗争的角度，他的活动对列宁是有利的，因为沙皇警察局为了保护它的特务马林诺夫斯基，从而支持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内和工人运动内部制造分裂的政策。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事，好些人警告过列宁，包括许多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就有布哈林。他1911年在莫斯科曾和马林诺夫斯基打过一次交道，当时就认准了马林诺夫斯基是个警察局的特务。从一开始他就用他知道的事实警告列宁，但是列宁非但不听从他的警告，甚而威胁布哈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说如果他不停止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诽谤”，就要把他开除出党。

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最上层在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上进行的斗争，我从A. A. 特罗扬诺夫斯基那里听到过，他在1913——1914年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但是布哈林充实了一些细节，包括他和列宁的论争。列宁的立场他当时是不能理解的。在1936年，布哈林把列宁在这件事上之所以未能采取行动归因于他的“顽固的念头”。——鲍·尼

他心绪不宁。但是我一到，他马上挽着我的手，领我到花园去。他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们不让我想这些事。他们说这会叫我心烦。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懂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如果我不能谈这些，我会比认真地谈它还要心烦。只有和象你这样的一些人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平静下来。”

我问布哈林这些谈话的内容。他说和列宁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当时称为“领袖学”的问题，就是继承的问题，列宁一旦去世谁适合做党的领袖的问题。布哈林说：“这件事最使列宁焦虑不安。”

关于这方面他还告诉我，列宁的最后几篇论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关于合作社的等等，只是列宁计划要写的一部分。他还打算写和这几篇字数差不多的一系列论文，以便对将来应当实行的政策作出完整的描绘。这是他想完成的主要目标。

列宁的遗嘱由两部分组成，比较短的一部分谈论领袖们，比较长的一部分是谈论政策的。我问布哈林，列宁的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他对我说：“关于这个政策我写过两篇东西，《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和《列宁的政治遗嘱》。头一篇是本小册子，1925年出版的。第二篇发表在1929年。”布哈林问我：“你还记得这些小册子吗？”我回答：“我承认目前记不得《到社会主义之路》了。”

“那一篇恰恰是比较有意思的，”他说，“我写的时候，把我和列宁关于他的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的谈话都包括进去了。我试图在那本小册子里只限于写列宁的想法，只限于

写他对我讲的东西。当然那并不是引用原话；在我写出来的东西里反映着我对他的意思的理解。但那是我按照列宁对我详细阐述过的内容，对他的思想作出的概括。他的遗嘱的中心思想，就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一个有关如何对待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问题。列宁以及——一般地说——全体布尔什维克都认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对农民使用暴力是可以的，然而这决不能成为永久的对待方法。这也是《到社会主义之路》的中心思想。”

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布哈林说，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围绕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大的争论，我所写的只能是列宁已经发表过的观点。这和前一篇东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第一本小册子向前迈得更远些，思想更具体化一些，不停留在列宁已经写出来的想法上。”

我把这些小册子重读了一遍，我看到布哈林以这种方式很准确地表达了列宁的思想。这正是列宁的思路。列宁认为布哈林是最能传达他的思想的人。他和他谈话，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还没有发表出来的意见，让布哈林写出来。

我在这里还应当加一句。当布哈林向我转述列宁的话的时候，我插话说：“你知道，列宁对你讲的这些，实质上是回到司徒卢威。”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司徒卢威写过一篇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后暴力的使用问题的长文。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决不能建立在成为永久因素的暴力的基础上。布哈林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说一定要找来看看。

问：还有斯大林呢？他评论过斯大林吗？

尼：如果你指的是他们之间的个人接触，那只是一带而过。有一天他在我家里看见一本卢斯塔维里写的格鲁吉亚民族史诗《豹皮骑士》*，由格鲁吉亚政府印刷的带插图的精美的纪念版本。布哈林见到它以后说：“我最后一次去看斯大林，在他家里见过这本书。他拿给我看过。”这就是全部了。

不过，范妮·叶泽尔斯卡娅告诉我，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跟斯大林的关系怎么样？”布哈林的回答是：“三减……最低分。”**

大部分情况下，布哈林难得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关于他们的个人关系几乎什么也不说。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他深知人们革命前就在谈论的斯大林的“高加索式的复仇心理”，为此，他已经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是非常克制的。

问：他还谈过别人吗？

尼：是的，他还对我说过一个关于他和俄国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第一次见面的有趣的故事。布哈林被选进了科学院。提名选举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在1926至1927年，也许还要早些——布哈林说，巴甫洛夫发言反对他的提名，说他是一个“直到膝盖都浸泡在血泊里的人”。当时布哈林不在场。布哈林听到巴甫洛夫的言论，决定当面和他谈个明白。“我非常崇敬他”，他对我说，“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和他有

* 应为《虎皮骑士》，——中译者注

** 在俄国学校里这是表示不及格的符号。——原编者注

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崇敬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是一个好人。我登门去看望他，我说：“我想和你谈一谈”。巴甫洛夫见到我的时候，其态度决非一般的冷淡可比。可是他既然把我领进了他的住所，就不得不交谈。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午饭时间到了，巴甫洛夫已经稍感过意不去，说道：“好吧，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吧。我请你跟我一起吃饭”。我们往饭厅里去，一进门，我注意到墙上挂着装蝴蝶的玻璃匣。巴甫洛夫爱好收集蝴蝶，与本人是同道*。我在桌旁坐下，这时候才看见正对面的房门上方挂着一个匣子，里面装着一只极为罕见的蝴蝶标本。我冲着巴甫洛夫惊叫起来：

“怎么？你有这个？”巴甫洛夫回答说：“哦……他连这个也知道。”我询问这只蝴蝶是在哪里捉到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渐渐相信了我是真地精于此道。这样就开始了我们的友谊。”

问：布哈林是怎样影响巴甫洛夫的？以什么使他产生了印象？

尼：这就和布哈林的人道主义思想有关系了。布哈林和巴甫洛夫讨论了他的一种信念，即知识分子必须帮助布尔什

* 布哈林酷爱蝴蝶。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非要去自然历史博物馆不可。那里有荷兰各殖民地人种志和自然史的陈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也许在全世界堪称首屈一指——就是它的丰富的蝴蝶标本的收藏。布哈林如饥似渴地盯住这些收藏不放，拉也拉不开。我留他一个人在那里忙不迭地用放大镜细看每一件标本，自己走开去看别的东西了。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我童年时期的爱好”。——鲍·尼

维克改变俄国的总的气氛，象高尔基后来做的那样。布哈林向我解释说：“他们都是乐意做出任何牺牲的好人。如果说他们当前的表现不好，那不是因为他们人不好，而是因为处境不好。必须让他们相信，国家并不和他们作对，只是需要改变政策。”

有一次他要我拿最近几期的托洛茨基的公报给他看。我给他拿来的不仅有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公报》，还有社会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通报》。他对《通报》带着很强的批判态度，但是有一篇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他到达巴黎前——1936年2月——出版的那一期上，有一篇谈论高尔基计划把知识分子联合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参加选举的文章。布哈林就这件事说：“某种第二党是必要的。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没有竞选，这就和纳粹主义一样了。为了在俄国人和西方人的眼里使我们和他们有区别，我们应该建立有两个候选人名单的选举制度，作为一党制的对立面。”

他的想法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二党将不是一支在原则上与政府对立的力量，而是一支可以提出改革及补救建议的力量。

问：巴甫洛夫同意他这个想法吗？

尼：是的，巴甫洛夫，还有另外几位杰出的学者，都是同意的。这是布哈林和巴甫洛夫友谊的基础。巴甫洛夫是在我和布哈林谈话前不久去世的，布哈林有一天谈到这件事，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巴甫洛夫答应在这方面支持他。

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想，因为国家刚刚经历了集体化，马上又要开始大清洗。但是布哈林和那些人显然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问：布哈林相信可以用人道主义对抗纳粹，具体情况怎样？

尼：布哈林赴巴黎的途中经过德国，在柏林停留了一天。他跑遍各书店，买了一大堆讲法西斯理论的小册子。这些东西就摆在他旅馆房间的桌子上，他经常研究。

他感觉到希特勒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前在德国发生的事，是不是社会结构急剧变质的结果？布哈林的结论是，不仅需要防止在苏联出现这样的变质，而且还必须提出一个使得从事反纳粹主义斗争的国际运动能够在它下面团结起来的口号。

他对我说：“不树立一种和他们针锋相对的我们自己的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他们。他们的思想就是暴力。你记得他们常用的那句伪哲学的格言吗？‘杀人证实人的力量。’说到底，这就是暴力的思想，就是把强制变成对社会、个人、人的个性行使权力的永久方法的思想。必须击败这种思想。他们的思想包含了对其他民族和人民的镇压。”

布哈林接下去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许多罪恶的行为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名义犯下的。我们必须坚决否认我们与这种滥用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人道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是崭新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在这个新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反对反人道的纳粹主义

的斗争。”

我记得布哈林提出这种人道主义的时候使用的措词十分简单，但怀着极大的热忱。他一再坚持采取这种态度的重要性。我很快就看清了，对于他来说，反对“永久强制”的人道主义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外部敌人纳粹主义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内部敌人，即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修正共产主义理论、使其非人道化的企图的斗争。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由于我想进一步弄清布哈林的结论，我就对他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现在所讲的，完全是回到‘十诫’。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他回答：“你认为摩西十诫过时了吗？”我说：“我并不是说它过时了。我是说它已经存在了五千年。我们是不是到达了必须把摩西十诫当作新的真理重新发现的时节了？”布哈林没有回答。

另外有一次，他在巴黎要去做一篇论述共产主义目标的演说。在这篇从来没有用俄文发表过的演说稿里，他甚至更有力地强调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当他的演说稿快写完的时候，我碰巧去看他。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刚才写好的东西念给你听。它和我们的谈话有直接联系。”我说当然想听听，他就给我念了几段。念完了，我对他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正是我们谈过的东西——人道主义，回到人道主义。”他回答说在早期他们实行过对人道主义的反叛。的确，如果我们拿1917至1920年的文学来看，真的是对人道主义的反叛。而且不仅仅是布哈林，不仅仅是高尔基，连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如此。布哈林进一步说，每

件事都要经过一些困难的阶段。以前破坏是必要的，反对人道主义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说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不同的时期，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建设。它要求对我们整个观点做一次调整。布哈林继续说，不仅我们的共产主义，就连你们的社会主义也必须把根子扎在这个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

我对这些思想没有表示异议。在这以前，当希特勒向德国民主制度进攻的时候，我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前夕，一位友人与我合写了一本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书，中心思想就是说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布哈林读过我那本小书，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与我有同感。这就是他能够和巴甫洛夫接近的原因。

问：你谈到布哈林与之斗争的内部敌人。能不能把这问题说得详细点？

尼：布哈林的人道主义大部分是由于集体化运动的残酷性和与此有关的党内斗争而引起的。有一次我向布哈林提了一句，我说国外知道集体化运动中发生的许多可怕的事情。他朝我生起气来，用尖锐的口气回答说：国外写的所有那些东西，只给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幅最模糊的画面。他脑子里确实装满了从集体化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们那里得来的印象，那些人简直被他们的所见所闻吓呆了。一些共产党员自杀了，有的发了疯，很多人承认失败，索性甩手不干了。

“在集体化以前我就见过许多事情，”布哈林告诉我，“1919年我建议限制契卡的处决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

过了一项决定，任命我为拥有否决权的政治局代表，参加契卡委员会。列宁说：“让他亲自到那儿去。让他试着把恐怖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如果他能成功，我们都会很高兴的。”我实际上见到的事情，连我的敌人我都不希望他见到。然而1919年的情况和1930至1932年发生的事情简直不能相比。1919年我们正为我们的生存在斗争。我们处决别人，但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可是在后来那个时期，我们在大批消灭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

然而，布哈林认为，最坏的演变还不在于集体化当中那些可怕的事。最坏的演变在于那些参加了这个运动没有发疯而变成了职业官僚的共产党员们心理面貌的变化。从此以后，在他们眼里恐怖手段成了正常的行政方法，对上的唯命是从变成了最大的优点。“他们不再是人”，布哈林谈到他们说，“他们真地成了一部可怕的机器上的齿轮。”他又说，现在正发生着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们的真正的非人道主义化，一个把苏维埃政权变为“铁蹄”^{*}帝国的过程。这个过程比什么都更使布哈林感到恐惧，在他心里唤起了恢复某种人类基本真理的愿望。在他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里面，头一个词只是一个形容词。这个措词的实质在于“人道主义”，在于对人、对他是否能仍是一个人的担忧。

问：斯大林不知道布哈林的思想吗？如果知道，为什么

* 杰克·伦敦小说标题。他十分熟悉杰克·伦敦的作品。——鲍·尼

没有采取对付他的措施？

尼：布哈林这时候人身还没有受到侵扰。可以说，他只是在报刊和各种集会上挨整。共产主义学院甚至被硬逼着举行了一次揭露他的错误倾向的专题讨论，而政治局却禁止他本人参加。在这次会上布哈林的真实观点遭到诽谤性的曲解。例如，他竟被指控为赞成战争。但是还没有对他提出起诉。

至于他的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情况就不同了。这些人是布哈林在十年当中煞费苦心挑选出来的，其中许多人是很有才干的，斯大林对他们抡起了大棒。几乎这一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也就是后来斯大林称之为“布哈林小宗派”的人，艾亨瓦尔德、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斯列普科夫等等，全都被调到地方上，然后被捕，最后被消灭。布哈林对于这些打击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他的年轻学生们的毁灭，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这些人的前途负有个人的责任。

问：你前面提到你和布哈林到过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这是为了去看马克思的一些材料吗？

尼：是的。一部分德国材料——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手稿——单独地通过丹麦使馆运出了德国，存放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代表团成员们一定要看一看，所以我们同意去一趟。

一到哥本哈根，我们就去该党的档案馆。他们给我们搬来一只装着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木箱。布哈林把一堆笔记本浏览了一遍，那里面记录着马克思对建立在私有经济关系

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的复杂而变化着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再接再厉的尝试的成果。然后他开始逐页翻阅手稿，试图辨认他注意到的个别句子。这是一件毫无收获的工作，于是他朝我转过头来说：“你一定能找出马克思写到阶级的那个地方。”

我对这些段落很熟悉，很快就替他找到了。布哈林小心翼翼地从我手里接过马克思写的那几页纸，双手抱着头，开始阅读马克思第一次企图用以表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的那几行著名的文字。这一段字迹十分潦草，因书写匆促而显得很整齐，好象马克思的笔跟不上他的迅速展开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完成，它们突然中断了，很象是有什么人走进来打断了马克思的工作。

布哈林把这一段从头读到尾，然后一页一页地翻着，看看正面再看看反面。他明显地是在查找草稿里是不是包含着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线索，可以用来对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作出新的说明。他再一次从头读起，但是当他确信再也发现不了什么新东西的时候，停了下来，叹着气说：“啊，卡尔鲁沙，卡尔鲁沙*，你为什么没有写完？这对你虽然困难，可是你却会帮我们多大忙啊！”

我记得这时我和同来的阿多拉茨基互相交换了眼色。他也是一个马克思专家，但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布哈林青年时代就热爱马克思的伟大思想，他觉得马克思继续活在这些思想里。布哈林可以和这些思想交谈，甚至争论。阿多拉茨

* 卡尔（马克思）的俄国式爱称。——原编者注

基则相反，他是一个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卡扎尔神学院的产物，布哈林的罗曼蒂克精神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影子。对于阿多拉茨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零散地抄在本子里的、做了系统分类的、一排排地摆在书架子上的东西。他知道所有必要的和不必要的语录，知道它们的意思，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但是对于如何把它们应用到变化着的时代中来一点也不感兴趣。而布哈林生活的目的正是为了把马克思的思想具体运用于今天的现实，为了这个缘故，他试图弄清马克思未阐明的思想，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阿多拉茨基另外花了两个小时看手稿，做目录，阅读许多未发表的段落。布哈林转而去看丹麦的档案，了解这些档案和丹麦工人运动的情况了。然后，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拖着我们去参观各个博物馆，买了满满一皮包十三至十七世纪名画的照片，还领着我们到殖民地博物馆里去转了几小时，研究它的独一无二的蝴蝶收藏*。他什么都要亲眼看一看。在这一天当中他好几次回到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言论。

布哈林是一批最杰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一个。1893年普列汉诺夫肯定地认为俄国必须先经过一段资本主义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布哈林摈弃了这个思想，他断言有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一次足够深刻的革命便可以跳进社会主义。布哈林不仅需要对付普列汉诺夫的旧的论据，而

* 在本文注释中说此事是在阿姆斯特丹，可能叙述有误。——译者注

且还要和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就预见到会出现经济管理人员新阶级专政的波格丹诺夫的论据打交道。波格丹诺夫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在1905年革命时期是占第二位的最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对布哈林所受的教育起过重要的作用。波格丹诺夫关于新阶级的思想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布哈林不同意波格丹诺夫的结论，但是他懂得，布尔什维克从事的“快速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危险正在于它可能造成一个专政者的新阶级。

关于这个问题，布哈林和我比较深入地谈过。后来我把他的许多文章拿来翻了一下。从这些文章里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他十二分地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蜕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问：传说1936年的宪法主要是由布哈林负责搞出来的。这方面他没说什么吗？

尼：布哈林在起草宪法当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从各种迹象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的。他是宪法草案制定委员会的秘书。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过一个实行普选权的草案，并且曾经力争取消共产党的一切特权。这两点都在这个宪法里得到反映。此外，当布哈林和我谈到高尔基、巴甫洛夫以及另一些人的时候，他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好象宪法的思想是来源于他们的。

后来有一天我们正讨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布哈林从他的的衣兜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给我看，他说：“仔细看看吧。整个苏联宪法就是用它写出来的，从第一个字到最后—

个字。我单独承担了这件工作；只有卡尔鲁沙（拉狄克）*帮了一点忙。我现在能来巴黎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已经决定下来了。现在正在印全文。在这个宪法里人民将有较多的地位，他们不能再被推到一边去了！”

布哈林颇为这个宪法自豪，它不仅仅采用了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还确立了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总的说来它是为了把国家从一党专政制度和过渡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而周密设计出来的格局。布哈林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甚至提出过应由若干候选人进行竞选的问题。

但是布哈林低估了他的对手，没有预见到斯大林将会多么狡诈地利用这些原则，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歪曲为在斯大林绝对独裁面前党员和非党员的平等。斯大林不仅悍然把宪法的起草人杀了头，而且对党内所有赞成布哈林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也都做了毫不留情的处置。

问：你认为布哈林对他后来的命运有所预感吗？会想到他将因为反对斯大林的统治而受审判吗？

尼：1938年审判的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巴黎会面的时候，布哈林内心深处是怀着忧虑的。

例如，他对我讲了一个他去苏联中亚地区旅行的很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在斯大林对布哈林周围的那一批人进行了清洗之后。这次旅行成了布哈林生命史中的重要里程碑。我

* 拉狄克也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原编者注

从他的谈话里就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我有机会对他的传记材料做了一番研究的时候，我更是确信无疑了。在我们的谈话里，他好几次回到这次旅行上，这时候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变化和深藏的寓意，他说到他们乘的那架飞机掉进了一个气阱，好容易才钻出来……还说遇到了土匪*，侥幸逃脱，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布哈林还没有决心从帷幕后面站出来，这一类的具体情节仅仅把这张帷幕揭开了一角。

在这次去中亚的旅行中，布哈林登上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帕米尔山区。他谈到他在苏联、中国、印度、阿富汗边界会合处的“世界屋脊”上的逗留。人们曾竭力劝阻，不要他到那里去——道路冲坏了，形势不安定，到处有土匪，而且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帕米尔地区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布哈林说：“他们愈是这样说，我愈要去。我向来喜欢地图上没有画出来的山路，正如在科学里我偏爱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样。”他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事的。

他们给了他一名向导——一名熟悉当地地形的边防战士，一个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人。布哈林说：“你一定看过他们拍的关于他的军犬‘狼’的影片。不久前在巴黎演过的。”我看过这部表现一位边防战士、他的机敏的军犬、特别是山区景色的影片。“我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翻山越岭穿过最难走的地带，‘狼’始终走在最前面，它的神态显得极为尊严，我从来没见过一只狗象这样子。我们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的向导

*这里指的是“巴斯马赤”，集体化时期活动在中亚地区的反革命匪帮。
——鲍·尼

牵着他的马走在稍前面一点，他指着一条山路说：“这条路比较近，可是现在选这条路等于自杀。它有好几段被雨水冲掉了，而且这里还发生过山崩。连山羊都过不去。”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布哈林继续说：“可是我却把马牵到那条被冲坏的路上，沿着它走去了。到了两条路重新会合的地方，我的卫士已经在那里等着。他的样子比他的‘狼’还要愤怒。‘你算是运气，’他严峻地训了我一顿；‘可别再跟我开这种玩笑了。我会忘记你是个中央委员的。’”

“可是我想看看那条道路是什么样子，”布哈林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不要站在这里瞎扯了，”向导顶回他的话，“当然我是对的。那条路根本不能走。马只能干给马规定干的活儿！”

布哈林谈了有关这个卫士的许多事，他显然是个富有色彩的人物。这个人当然是个共产党员，可是具有独立的生活哲学，有很强的敏感、个人尊严以及社会责任感。布哈林谈到他，很明显不是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熟悉人迹罕到的山路的头脑清楚的人，而且还把他看做是在苏维埃统治下正被拖到底层的新人的代表。

布哈林间接地向我透露，他在中亚的时候曾被深重的悲观情绪压倒，丧失了生活的愿望。不过他不想自杀，这将会是承认失败。他希望不以自己夺去自己生命的方式去死，所以才作出选择被冲坏的道路的冒险。死亡没有来临，但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去尝试。

两条路的事件稍稍地提起了布哈林的精神。他产生了对

人的信心，不是对一般的人，而是对适应了苏维埃专政但仍没有失去人性、没有成为这个怪物般的机器中单纯的齿轮的人的信心。布哈林联系着这个插曲，发展了一整套理论，我将把它称作“人流”论。

他对我说：“我们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比方说你，恐怕就过不惯。即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我们这样几十年经验的人，有时候也觉得活不下去。但是有一个信念救了我们，那就是一切总是朝前发展的，它象一条奔腾入海的水流。如果你把身子偏离到水流的外面，你就会被彻底甩掉。”这时候布哈林用两根手指头做了一个剪刀的手势。“水流经过一些最困难的地带。但是它仍会朝着它应去的方向前去。而人们在其中成长，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建设着一个新的社会。”

因此我要说，布哈林对他个人的未来是怀着疑虑的。他一定知道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对他凶多吉少。然而他觉得他必须留在俄国，他不肯相信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较好的未来。

关于这个悲剧的时期有这样一脚注：在P. 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②的回忆录里面，这位有名的俄国文学史专家谈到他在监狱里见到布哈林的帕米尔向导的情况。后者被关押起来，无疑是为了他和布哈林的关系。但是审讯的时候对他的指控却是为外国情报机关服务。他把侦查员和跑来给侦查员帮忙的契卡人员弄得精疲力尽。他们经过了一场真正的打斗才给他安上了一点什么罪名。为了对他的态度进行报复，他们把事情做了这样的安排，使得他再也见不到他心爱的群山了。

注 释

① 《反苏右派与托洛茨基派同盟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审记录，莫斯科，1938年3月2日至13日（莫斯科，苏联人民委员会议，1938年），第426页。

② P. B.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监狱和流放》（纽约，1953年）。

（田大畏译）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

国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的审判**象晴天霹雳似地降临到我们头上。近几年来和当前发生的事情简直不是用笔墨能够形容的。当然，这封信里所说的并不适用于一般苏联“公众”的心情。一般老百姓对政治厌烦到了极点，只求不打扰他们，让他们能安安静静地活着就行了。我在这里说的，只反映那些不久前还认为自己唯一有权过问政治的、也许可以称为共产党“军官团”的人们的思想状态。

去年春夏，这些政治上层人物当中曾出现他们长久未有过的平静和信心感。今天回顾起来，有一些应引起关注的征兆当时是明摆着的。但这已经是事后的聪明。实际上大家都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开始了经济上和政治上改进的时期。改进虽然缓慢，然而切切实实的。对新宪法的作用并

*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指的就是尼·伊·布哈林，这是由于害怕布哈林受到迫害而未指真实姓名。这封“信”于1937年匿名发表，曾轰动一时。后来，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声称，信中所述内容是布哈林1936年在巴黎同他会见时讲的，他把它用文字转述出来并用这个标题发表了。详细情况见本译文集《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访问记》一文。——编者注

** 指1936年8月审理的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除季诺维也夫外，还有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人。——中译者注

没有作过高的估计，谁都知道，提出搞宪法主要是出于和担心爆发战争有关的政治上的考虑。但普遍感到这种考虑本身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阻碍极端恐怖措施的复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势的稳定。这一切造成了对最近的将来有了信心的感觉，我们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出去度假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看重夏季休假。国内的人说，十月革命带来的权利中，斯大林唯一不敢剥夺的，就是政府和党的权贵们的夏季狩猎权）。8月初，听说几个政治局委员已经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也就要去休假，开始了“休眠季节”。照例这个时候是不会做出什么重要决定，也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

但出人意料，来临的不是政治上的平静，而是一次审判，一次前所未见的审判。我们一下子被震昏了，渐渐地才清醒过来。我们开始估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慢慢地明白了，当前出现的不是单纯的偶然事件：一般地说我国发生的事件偶然性甚少，不象国外的人可能认为的那样。

列宁留下的遗训，有一条我们“党的领袖们”抓得最牢，那就是关于不要重复雅各宾党人的错误，即关于千万不可走上互相残杀的道路的谆谆教导。向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一切手段皆可，就是不能施用死刑，这被认为是一条公理。固然偶尔也背离常规：枪决了勃柳姆金和另外几个托洛茨基派，那是因他们在自己组织的指使下钻进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核心机密部门，把某人出卖和即将抓人的情报转告给他们的同伙。这种处决一般被看作是例外的措施，杀他们不是因

为他们参加了党内斗争，而是因为泄露了公职机密。在苏联对这种性质的轻微犯罪，一贯惩办得很严厉。1924—1925年，一个孟什维克闯入中央监委秘书处盗走一些文件，企图寄给《社会主义通报》*，因此被判处枪决。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在“孟什维克审判”**（1931年）期间，适用死刑的问题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

处理柳京事件的时候，才第一次讨论了对从事党内政治反对派活动的人适用死刑的问题。那是1932年末，当时国内形势很象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的1921年。固然1932年没有发生真的暴动，但很多人认为如果政府碰上真的暴动，情况反倒可能变好。半个国家在闹饥荒，工人口粮减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并且没有办法提高，因为问题不是工人们不想好好干，而是因为空着肚子干不出活来。党内普遍的看法是斯大林的政策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搞得农民和我们的党对立。要挽救局势，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许多有影响的中央委员都这么看。据说政治局里也在形成一个反斯大林的多数派。党的负责干部们不管在哪儿碰在一起，讨论的主题总是应该拿出一个什么纲领来取代斯大林的“总路线”。这时候显然已经有几种纲领和宣言在私下传阅，柳京的纲领尤其引人注目。它具有明确的亲农民性质，要求取消集体农庄，给农民以自决权。但这还不是它和别的纲领不同的地方。当时不仅斯列普科夫等人提出的右翼布尔什维克的纲

* 孟什维克在国外的期刊。——中译者注

** 指1931年对所谓“孟什维克联盟局”的审判。——中译者注

领带着强烈的亲农民观点，连原左翼托洛茨基分子现在提出的纲领也是这样的，尽管这些人事实上应对斯大林的“总路线”负政治责任。因为这本来是他们的思想。柳京纲领不寻常的地方，主要是它对斯大林的严厉批判。这篇长达二百页的纲领，整整五十页描述斯大林的个性，评论他在党内的作用，论证柳京的基本观点——不取消斯大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就不可能好转。他的观点表达得气势磅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被他描写成附在俄国革命身上的恶魔，在复仇心理和权力欲的驱使下，把革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主要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分，这个纲领才受到热烈欢迎。其作者后来大吃苦头，也是为了它。纲领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而它的一份抄件很快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也就不足为奇了。接着来的自然是逮捕和抄家。结果不但所有传阅过柳京纲领的人都被抓起来，连散发过其他宣言的人也是一道遭殃。柳京正在流放地，也许是在“隔离所”*，纲领就是在那里写的，他这时候被押回莫斯科。审讯时他承认自己是作者。作为一个对党有重大贡献的老一代的党的领导干部，他具有按列宁遗训不得处死刑的那一类人的身份。因此，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然是奉斯大林的旨意）要处决他的时候，这个问题由政治局进行了考虑。

*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度对许多法律名词进行了改革，监狱改称“隔离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称为“政治隔离所”；死刑或极刑改称为“最高措施”即本文中所述的“最高刑罚”。——中译者注

政治局讨论得很激烈。斯大林主张同意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要求。他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联系到目前青年人当中，尤其是在共青团内，恐怖主义情绪正在增长的事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里引用了青年工人和大学生的大量恐怖主义言论。此外对苏维埃和党的基层负责干部的恐怖行动已经发生了多起。对这类恐怖分子，即使是共青团员，党一概毫不犹豫地处以“最高刑罚”。斯大林据此坚持说，对恐怖行动的实施者这样严惩，而对那些通过政治宣传唆使别人从事这类行动的人却加以宽容，这在政治上是讲不通的，不公正的。他建议不要过分去注意那些小鱼小虾，政治局应当一把抓住问题的根子和原因。斯大林说柳京纲领就是为谋杀他而制造的直接的理由和口实。

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意见分歧，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只知道基洛夫的发言特别有力地反对了诉诸死刑。不但如此，他在争取政治局的人们同意这个意见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斯大林相当谨慎，不愿意把事情弄到公开冲突的地步。这样，总算饶了柳京一条命，判他在一座实行严格管理的隔离所里服长期徒刑。不过这时大家心里都明白，将来还会逼着政治局去处理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这类问题。这类问题果然很快就露了头。但是它们出现时的客观环境和1932—1933年冬季大不一样。1933年的夏天无论就内政和外交来说都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农业获得没有意料到的好收成。在经济普遍混乱的状况下，对于完成田间作业和粮食进仓的工作几乎谁也没敢抱希望。这个成就

毫无问题应当归功于斯大林，他此时表现出的非凡毅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强迫每个人干到精疲力尽。他无疑认识到那个夏天将决定他的命运；除非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否则对他的反叛情绪势必以某种方式爆发。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夏季的收成不错，党内人士的态度随之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化。广大党员第一次相信了“总路线”真能成功，对这一点有了信心，对其名字和这路线紧紧连在一起的斯大林的态度也改变了。“斯大林胜利了”，连昨天还想方设法弄来一份柳京纲领看看的人现在也这样说。经济形势的好转在政治上将得到怎样的反映的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极端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也急待解决，这就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希特勒掌权的头几个月，我们俄国人觉得第三帝国仅仅是德国历史上转瞬即逝的阶段，希特勒在台上顶多能呆几个月，紧接着就会发生土崩瓦解和革命。一般认为，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允许他们的“宿敌”德国实现重新武装的计划；对于希特勒关于对俄作战的夸夸其谈也没有人当真。然而，这时我们逐渐地认识到形势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不能指望西方列强对希特勒会采取什么预防性措施；而对俄作战的准备工作却在全力进行着。对德国人在乌克兰搞的宣传活动，尤其是对所谓同性恋阴谋进行的调查和揭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33年底侦破的这项阴谋的具体情节如下：一名德国使馆武官助理、声名狼藉的勒姆上尉的朋友和门徒打进了莫斯科同性恋者的圈子，在同性恋“组织”（当时同性恋在俄国还是合法的）的掩护下建立了一个国社会主义的宣传

网。它的线一直连到各省以及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等地。文学艺术界的一部分人也卷了进去：一个有同性恋爱好的大名鼎鼎的演员的私人秘书，列宁研究院的一名重要的科学工作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德国人不仅利用这些联系获得军事情报，而且在政府和党的人士中散布不同政见。阴谋的幕后指挥者抱着这样深远的目标，以至苏联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做出反应。这样，对外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很快导致苏联加入国联，在法国建立“人民阵线”。但是克服那条根深蒂固的旧方针，即联合德国，那怕是反动的德国，以便在各战胜国内部引起爆炸的方针，并不容易。这个转变之所以阻力重重，还因为谁也明白对西欧民主党采取新方针必然会导致苏联国内政策的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洛夫的影响开始蒸蒸日上。

基洛夫在政治局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总路线的百分之百的支持者，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他以干劲十足和坚定不移出名。所以斯大林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可是基洛夫的态度总有那么一股让斯大林讨厌的独立劲儿。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斯大林曾经好几个月不让基洛夫到莫斯科来参加政治局会议，借口列宁格勒离不开他。不过斯大林从来下不了决心对基洛夫采取强硬手段。把基洛夫这样举足轻重的党的领导人推进数量已很可观的持不同意见的一伙中去，未免太愚蠢，特别是他在列宁格勒已经集合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助手在自己周围。现在和列宁格勒的党发生新的冲突，可能要比季诺维也夫时代冒更大的风险。基洛夫在1933—1934年之交的

冬季，阵地已经这样巩固，以至能够推行他自己的路线了。他的目的不仅是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西方方针”，而且在国内政策方面也要从这个新方针里做出理应得出的结论。

据此，为了准备应付看来已避免不了的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任务不仅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在政治方面还要在国内战线上造成应有的心理状态。这里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铁面无情的行政手段和更加强硬的恐怖措施继续推行原来的粉碎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另一种是试图“与人民和解”、争取他们在国家的政治战备中自愿地合作。第二种办法的最坚信不移和最有地位的鼓吹者就是基洛夫和高尔基。本来可以在这里细谈一下高尔基在党的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去世，可以比较公开地谈这些事了。但这是另一个话题，谈起来会扯得太远。高尔基对斯大林发生过很大、很好的影响。但尽管有影响，他毕竟不是政治局的成员，对决定政策起不了直接作用。所以基洛夫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

基洛夫主张在社会上和党内一概废除恐怖。我们不想夸大他的建议的意义。不应当忘记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实行的时候是党的首脑之一，是鼓吹和推行恶名远扬的残酷无情的反农民措施及消灭富农运动的人物之一。遍布囚犯营等设施的克姆及摩尔曼斯克沿海地区在他的管辖之下，而且波罗的海白海运河*的修筑也是他亲自抓的。这就足以表明，

* 这条运河完全是用犯人劳力修筑的。——中译者注

无论如何不能责怪基洛夫在对待人们生命的问题上有心慈手软的缺点。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反倒增强了他在领导圈子里捍卫自己观点的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有那么大的一份责任，所以他现在更可以出来带头主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节制恐怖的政策。基洛夫思想的脉络是这样的：为铲除农村小有产者成分而必须经历的破坏阶段现在已经结束；集体农庄的经济地位业已巩固，它的前途已经有了保证。这就为发展到下一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经济形势的继续好转，广大居民群众将愈来愈听政府的话；“内部敌人”的数量将会减少。当前党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将会支持它的力量团结起来，从而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因此基洛夫强烈主张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走到了反对派一边，但在“破坏”时期已经过去的现阶段可以吸引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合作的党内人士进行和解。

据说基洛夫在一次讲话里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当前“已经不存在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旧的集团和党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战斗岁月已经烟消云散，目前已经不再成为有影响的因素。至于新的敌人，只要我们实行和解政策、除了少数例外，都可以和我们达成谅解。

基洛夫的观点（高尔基提得还要强烈些）在党的首脑人物当中产生很大影响。为五年计划而斗争的时期对这些人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伴随着贯彻农村中的改革而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实在很难以笔墨形容，关于这些情景，你们国外的

人只有一点很模糊的概念。党内的负责同志们对这些事都是一清二楚的，其中很多人对这种情况感到无法忍受。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1932年底，列宁格勒的一批年轻同志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文艺晚会。加里宁应邀出席。这次活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多少周年（大概是它的前身契卡成立十五周年）有关。会上朗诵了为契卡歌功颂德的诗篇，不外乎是：“让契卡更加无情地继续消灭我们的敌人！”之类。尖酸刻薄的人硬说加里宁那天晚上准是喝多了。即便是如此吧，那也只能说明是酒力冲破了他平时的克制，让他说出了心里话。据那天在场的人说，加里宁的讲话象是受伤的心灵在哭号。当一首血腥味特足的诗念完以后，加里宁站了起来，他说：“我们时常被迫地诉诸恐怖手段，但是永远也不要歌颂它。我们不得不采用恐怖措施，这是我们的悲剧。但是我们大家最渴望的事情，莫过于废除恐怖。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歌颂契卡的冷酷无情，而是希望我们不需要这只‘惩罚之手’的那一天早些到来。”

据说这个讲话引起很大震动，不单在列宁格勒，连在莫斯科也在议论。传闻加里宁挨了批评。加里宁讲话等等事件表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负责人现在倾向于接受一种新政策，即一旦条件允许就应对恐怖加以节制的政策。基洛夫因此大受欢迎。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并不正面反对他的路线，而是仅仅试图限制它带来的实际后果。斯大林的这种态度据说和这时期达到顶点的高尔基的影响有特殊的关系。

由于这个原因，1933年夏天，当丰收已成定局的时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另一些前反对派成员再一次被接纳入党。甚至许可他们自己选择工作领域，其中一些人当真接到了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邀请（1934年2月）。

基洛夫出现在代表大会上象一位凯旋归来的英雄。大会前，列宁格勒唯独为他一人的当选举行了庆祝。他在一天之内巡回全市，在各区的集会上受到如醉如狂的欢呼。与会者高喊：“我们的米罗内奇”万岁！”这是一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盛大示威，表明列宁格勒全体无产阶级誓做基洛夫的后盾。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基洛夫也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人们向他欢呼；在他做报告的时候整个会场站了起来。大会休息的时候人们议论谁受到的欢迎最狂热，是基洛夫还是斯大林？这种比较本身就说明基洛夫的影响已经变得多么强大。

基洛夫不但再次被选入政治局，而且还被选为中央书记。这样他就必须在最近期间搬来莫斯科，接管原由波斯蒂舍夫和卡冈诺维奇负责的摊子，以便确保贯彻他提出的新路线。然而他搬来莫斯科的事被推迟了。正式宣布的理由是列宁格勒的工作还脱不开身；大家以为大概是正在列宁格勒物色接替他的人，在合适的人选决定以前，他只好暂缓调往莫斯科。尽管如此，政治局的工作他还是照常参加的，他在里

* 米罗内奇是基洛夫父名的昵称。在正式场合这样称呼他表示特殊的亲切和敬意。按苏共党内的习惯，只有对列宁才以这种方式称呼（称“伊里奇”）。——中译者注

面的影响也在继续增强。

1934年初，有一个可以看做是柳京事件的继续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的会议上。破获了几个讨论恐怖主义问题的小组，成员全是共青团员（青年和大学生）。这些小组并没有实施过什么恐怖行动，否则他们的命运恐怕也用不着讨论了。因为自从内战时期以来，对实施恐怖行动的组织一概加以肉体消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这些小组的成员除了关于恐怖主义必要性的单纯讨论之外没有做过别的事。他们总的论点是：鉴于党内完全没有民主，而苏联宪法又遭政府的漠视，反对派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诉诸恐怖。

这类案件一向适用“最高刑罚”，但由于新方针的实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提起诉讼以前需要得到专门的指示。一份有关这些小组的综合报告送到了上面。现在回头看来，把这种问题重新提到政治局是另有原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试图借此检验新方针的有效程度，看看政治局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能走多远。政治局下达了一道伸缩性很大的指示。没有作明确的总括的决定。只简单地建议根据每一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判决。不过主要精神还是最好只在极端情况下，即在这些暴乱组织的某一成员确系怙恶不悛的情况下才适用“最高刑罚”。结果这些小组的成员们得到了相对来说较轻的判决。他们被送进隔离所、囚犯营或被流放，其中有些人流放到不大远的地方。列宁格勒“恐怖分子”事件即以这样非常温和的方式告终。贯彻新方针的好消息在全党迅速传开。在它的影响下，一批反对派的主要成员放弃了势不两立的态

度，其中包括拉柯夫斯基、索斯诺夫斯基这样的人*。这同样被看做是和解政策的重大胜利。凡是表示了“悔过”的人马上获准住在莫斯科，还可以担任负责工作。拉柯夫斯基甚至受到卡冈诺维奇的亲自欢迎。索斯诺夫斯基又能从事他的新闻工作。即使不能在《真理报》上，至少可以在《消息报》上写文章。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基洛夫的成功在1934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达到了顶点。这次全会讨论贯彻新方针的具体措施。基洛夫作主要报告，成为一时的中心人物。又讨论了他调来莫斯科的问题，确定要在最短期间内解决。

党的书记处下面所有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部门都要归他领导。他暂时回到列宁格勒只是为了向继任者移交工作。所以，当电话传来他被暗杀的消息，使人加倍地吃惊。

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情况还可以多谈一些，它无疑可以形成一篇很有意义的材料，因为这不幸的一枪宣告了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但这样的报道将使我远离本题，而我的信本来已经过于冗长了。因此我仅涉及有助于理解在党内形势后来的发展中特别重要的那些因素。

*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1873——1941），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保加利亚等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第八至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派，被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8年再次被开除。同年被逮捕和判处徒刑，1941年在监狱中身亡。

索斯诺夫斯基，列丹·谢苗诺维奇（1886——1937），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7年作为托派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1937年被捕身亡。——中译者注

在给莫斯科打来的关于基洛夫遇刺的第一个电话报告里，就已讲清楚这是一次政治暗杀。从凶手尼古拉也夫身上搜出了一份说明犯罪动机的宣言。但是鉴于发生暗杀前几个月内党内政策的明显的和解气氛，把1934年12月1日的行刺解释为党内冲突促成的恐怖行动，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心理上是通不过的。很难相信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和解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会死于反对派分子的子弹，尤其是当这个政策眼看已成定局的时候。再者，这件恐怖行动对党内政治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这种后果本身使我们更难以做出上述的解释，由此产生了12月最初几天的那种心情。当时大家七嘴八舌地把这次暗杀传说是某一外国（并没想到需要指明是哪一国）阴谋策划的结果，推测尼古拉也夫一定是充当了该国的盲目工具。由此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这次暗杀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基洛夫不久前向中央全会的报告里提出的路线仍将是党的政策的既定指导原则，不会改变。那些过去某个时候和反对派有过某些瓜葛，因而并非无缘无故地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人们，这时特别热心于做这种宣传。于是拉狄克负起了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责任。他哪里想得到这种“盖世太保之手”的说法以后将会用来对付所有的前反对派成员和他本人呢！

但是不光前反对派成员倾向于对尼古拉也夫的行刺做这种解释。这是普遍接受的观点，显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最初也倾向于这种认识。如果回想一下他们对尼古拉也夫行

刺立即做出的反应——第一份处决名单，你就会发现其中包括的主要是被怀疑（不论是对是错）和某个外国间谍机关有联系的人。在俄国普遍认为德国人是乌克兰分立主义宣传的后台。这批枪决命令是在列宁格勒的电话报告最初冲击下由莫斯科下达的。

然而，暗杀基洛夫事件有外国人插手的说法不是政府的官方说法。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下什么指示。他让别人去探索事件的原因，自己却把注意力集中于狠抓审讯工作。他立即和伏罗希洛夫及奥尔忠尼启泽一起赶赴列宁格勒。这两个人都是他在政治局里最重要的支持者。斯大林当场规定了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规模和方向。某些比较重要的讯问他亲临现场，特别是对尼古拉也夫本人的审讯。他还亲自抓列宁格勒内务局大改组的措施。调查的实际工作由斯大林本人近几年来特别信任的阿格拉诺夫*具体负责。斯大林很清楚，雅沙（斯大林这样称呼阿格拉诺夫，有时候在正式场合也这么称呼）永远会十分卖力地和绝对听话地执行他的命令，决不会受别人影响。对于该部的其他负责人，斯大林可没有这样的把握。

调查一开始就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尼古拉也夫的日记提供了某些与他这个行为的动机有关的重要资料。下面我还要提到的那份报告里摘引了他的日记，虽然只是简短

*阿格拉诺夫，雅柯夫·伊乌洛维奇（1893——1938），1938年和前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一起被捕并枪决。——中译者注

的片断。关于这本日记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可是对于尼古拉也夫总的特征，说法大体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承认，由于他这一枪给全党和全国带来了如此致命的后果，这个人的看法很难完全客观。然而还是应当把尼古拉也夫看做是年轻一代人里一种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是在国内战争的推动下入党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曾历尽艰辛，在每一个急转弯的关头都必须适应环境，最后一个个搞得神经脆弱，体弱多病，内心冷漠。

尼古拉也夫的经历是：在尤登尼奇将军暴动时期，他十六岁志愿上了前线，直到内战结束。他在前线加入了共青团。他历史上有一件弄不清的事，那就是和契卡的关系。他在这个机构里从没有起过重要作用，但他曾属于这个机构是不成问题的。尽管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这件事在只供党内传阅的有关调查情况的文件里也秘而不宣。尼古拉也夫在党内从来不是积极分子，虽然他从1920年担任维堡区共青团支部委员时就是党员了。他没有参加1925年的反对派，只是在当时的某些会议上投过票。当时列宁格勒党组织百分之九十的成员都是支持季诺维也夫路线的。至少十四大以后对季诺维也夫派党组织进行总“清洗”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没有被调到其他城市去（这是对被认为和反对派有瓜葛的“列宁格勒分子”采取的最温和的惩罚方式）。1929—1933年他在几个城市工作过，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曼斯克。党派他到那里去在一支强迫劳动队里担任看守的小职务。从那里回来以后，他再次参加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显然是

当了斯莫尔尼大楼*的警卫人员(目前对这一点尤其保密)。以上就是尼古拉也夫的正式简历。可是,从他那本自摩尔曼斯克回来以后开始写的最后两年的日记里,可以看清他外在生活背后的思想内容。那里面的话都好象是在告诉人们,装满他脑子的主要是他个人和日益官僚化的党的机器的矛盾冲突。日记里到处提到这类事情,抱怨说革命初期的那种使党内生活非常愉快的友谊的关系现在不见了。他一再缅怀那些日子,觉得它们那么单纯,那么美好,那是“骨肉情谊”的时代。眼前的一派官场风气使他深感压抑和愤怒,为此他卷进了几场冲突事件,结果在1934年初被开除了党籍。但不久以后就撤销了这项决定,其理由是他在摩尔曼斯克的工作过于劳累,患了神经衰弱症,身体也有病,对这样的人不能要求过高。

尼古拉也夫的批判态度的出发点,是他对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的怨恨。但是他并没有往前走一步。他的行动的严重性和他看问题的肤浅性(他对现实没有任何更深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相称。尼古拉也夫对党外的一切完全视而不见;即使党的生活,他对一般政治问题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唯独是党内人与人的关系。他对这方面状况的反应愈来愈激烈,逐渐把当前形势看成是对过去好传统的十足的背叛,是对革命本身的背叛。

与此同时,在他内心产生了充当殉道者的强烈愿望。他

* 斯莫尔尼大楼是列宁格勒市委办公楼。——中译者注

的日记里愈来愈多地出现这类的话：为了引起全党注意这种致命的趋向，必须有什么人出来做自我牺牲。要实现这个目的，他相信只能对掌握党和国家大权的“篡夺者”集团中的某个头面人物实行恐怖行动。阅读早期俄国革命者的著作对他影响很深。看他的日记就知道，他熟读过这类文献。恐怖分子的回忆录，无论是民意党人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凡能拿到手的他都读过。他把自己的行动看成历史上俄国革命党人恐怖活动的继续。听说当斯大林问他为什么要搞暗杀并且说他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这有什么？现在很多人倒下。可是将来的某一天，我的名字要和热里亚鲍夫、巴尔马晓夫*并列。”此案的另一一些情节也能说明尼古拉也夫有这种和前代俄国革命党人的恐怖行动一脉相承的企望。

搞清了尼古拉也夫的犯罪动机以后，调查委员会把注意力转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找出“同谋犯”和“指使人”，二是查明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领导对未能防止暗杀应负多大责任。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本来很简单。尼古拉也夫在供述中强调他完全是单干，没有任何同谋者。这一点可以由日记的内容证实。其中找不出一句话能够证明关于存在一个尼古拉也夫可能是其成员或者以其名义行动的秘密组织的假设。至少

* 热里亚鲍夫，安德列·伊万诺维奇（1850——1881），民粹派分子，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处死。巴尔马晓夫，斯切潘·瓦列里安诺维奇（1882——1902），大学生，加入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1902年枪杀内务大臣皮亚金，被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在上面提到的尼古拉也夫案情报告里没有一字谈及此事。毫无疑问，如果日记里即使有这方面的片言只语，负责调查的干部在报告里也决不会漏掉。根据日记总的特点，如果真存在这个组织，不能设想尼古拉也夫对自己所属的秘密组织的事情会始终一字不提。因为凡是有助于加强他的观点的谈话，他在日记里都做了记载，而且措词是颇不谨慎的。

然而，只把某件恐怖行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实际参与者看做“同谋犯”或“指使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今天，凡是支持或鼓舞可能促使任何人实施这类行动的思想情绪的人，都可以被宣告为“同谋犯”或“指使者”。要在暗杀基洛夫一案里找出同谋犯和指使者并不困难。从尼古拉也夫的日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格勒党组织内部和外围都有很多不满分子，他们并不隐讳自己对党和国家当权者的批判态度。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近几年受处分的以及刚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的前反对派分子。这些都是曾经担任过较高职务的人，习惯于从事政治活动并在政治上有一定发言权，对于自己今日相形见绌的境况自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对新秩序动辄挑剔，爱做“今不如昔”的对比。他们没有秘密组织，但彼此保持着相当经常的交往。在他们的聚会上互相传递有关党内情况和狱中及流放地的同志们的消息。他们捐款接济这些难友，对他们最讨厌的对立面尽情地谩骂。不过他们的政治活动也就是到此为止。他们并不企图进行公众活动。偶尔地会有什么人在某个聚会上念一篇“历史事件回顾”之类的文章，如此而已。

这类“思想上未缴械的反对派分子”群体的存在并非秘密。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明明知道并且加以容忍的。这正象从前沙皇政府可以容忍那些被视为“异类”而不与周围社会来往的前流放犯公社的聚居地一样。现在阿格拉诺夫接到了调查这一群人的任务。他开始收集有关它的成员的“危害能力”、姓名、职业等方面的材料。

阿格拉诺夫的第二项工作就比较微妙。他对列宁格勒的内务局做了调查之后，发现这个局的负责干部对尼古拉也夫的思想状况，甚至对他的恐怖主义倾向，都是一清二楚的。尼古拉也夫是个神经质的纪律性不强的家伙，时常公开地谈论这个危险的题目，甚至当着素不相识的人。再说我们今天的侦察系统已经完善到这种地步，那怕是只当着两三个人的面讲出来的反对派言论，要不了多久就能传进“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们的耳朵里。如果再考虑到对我们的“领袖们”的保卫工作做得多么细致，那么简直就不能理解怎么能允许尼古拉也夫这样靠近基洛夫的人身。因此产生了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尼古拉也夫的书面陈述已经说清楚了他行动的动机。现在应当查明那些有责任防止暗杀行动的专职人员是否有玩忽职守的过失！什么人对在基洛夫调去莫斯科以前把他除掉感兴趣？这些感兴趣的人和列宁格勒内务局某个负责人之间是不是连着线？顺着这个路子调查下去说不定能揭出许多有意义的材料。关于这方面我没有听到什么谈论。近来大家说话都是小心谨慎的，尤其对这种危险的题目。不过影影绰绰也能听出一点口风。1934年的12月，人们

对暗杀斯托雷平*的史实突然大感兴趣，那件事和基洛夫被刺事件有很多相似之点。

然而调查工作对于这些问题都毫不在意。它集中于另一方向。对“同谋犯”的调查迅速转为对列宁格勒反对派人的调查。而对列宁格勒内务局领导干部的作用和责任的调查却变成了关于他们对反对派分子丧失警惕的原因的调查。具体说就是为什么允许反对派分子住在列宁格勒，为什么允许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讲话等等。被控告的领导干部们为了说明自己无罪，纷纷引证基洛夫的口头的或书面的命令。基洛夫从他总的政治观点出发，曾力主改善前反对派的处境，命令内务局不要在细小的事情上找他们的麻烦。

这些头头们的辩护理由是符合事实的。近年来基洛夫为恢复季诺维也夫时代的老传统、把列宁格勒变成一个在文艺和科学方面能与莫斯科争高低的独立中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为此大力促进列宁格勒的出版事业，在财务和审查制度上为出版期刊创造有利条件，支持科学协会的活动，等等。在这些领域里基洛夫积极支持暂时借用前反对派分子的力量，这正象沙俄时代思想开明的省长聘请政治流放者参加西伯利亚科学研究和考察工作一样。前面说到的和“异类”的类比，在这里也完全适用。基洛夫的“自由主义”走得这样远，以至他在1934年秋天竟批准马恩研究院前任院长梁赞诺

*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1862——1911），沙俄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被社会革命党人、保安局密探博格罗夫在基辅刺死。——中译者注

夫*这样横下了一条心的罪人在列宁格勒落户。

列宁格勒内务局的负责人就是这样按照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个在列宁格勒完全可以自行其是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的命令办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办法？

12月中旬，调查工作进展到可以向政治局写报告的阶段。关于从这次尼古拉也夫行刺事件中应得出什么政治结论的问题，和这份报告一起进行了考虑。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在这次调查中所持的态度。

1933年秋天以后党的领导层里展开的斗争和过去的这类冲突大不相同。以前各家反对派都反对斯大林，都要求解除他的领导职务。而现在解除职务的问题根本提不出来了，各个集团不再以赞成或反对斯大林为分野。每个人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对斯大林的忠诚。所以倒不如说现在是为了对斯大林施加影响而进行的战斗，或者说是一场争取他的心灵的战斗。在决定性时刻他究竟会表态支持哪个集团，目前还在未定之际，但是眼前的大政方针都是要依赖斯大林的决定，所以每个集团都在拚命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基洛夫被暗杀以前，斯大林态度很不明朗，有时候他支持新路线的提倡者，有时候又阻止他们。他既不显示自己和新路线的代表人物站在一起，同时也避免做出反对他们的表示。现在，他吩咐把日常呈阅的公文减到最少数量，经常一个人锁在书房

* 粟赞诺夫（戈尔登达赫），达维德·波里索维奇（1870——1938），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老活动家，1931年前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1年因与“孟什维克联盟局”一案有牵连而被捕。——中译者注

里，一连几小时走来走去，嘴里叼着他的烟斗。他身边的秘书人员都说，每逢这种时候就是斯大林在思考问题了，就是他在制定新的路线了。而当斯大林在想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

高尔基对斯大林有过很大影响。前面已经说过，高尔基的影响在这几个月达到了顶点。他热烈支持促使党外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府和解的主张，完全赞成基洛夫关于首先在党内实行和解政策的想法。他相信这种和解必将增强和紧密党的队伍，从而将能更有效地向苏联广大知识分子施加道义上的影响。高尔基很了解斯大林的基本特征，了解他对周围人的纯东方式的猜疑，所以千方百计地让他看到现在人们对他的态度和当年与反对派斗争时期的一般态度全然不同了。他试图说服斯大林，现在所有的人终于认识到他的总路线是英明的，没有一个人还想反对他的领袖地位。高尔基论证说，在这种情势下对他昨日的反对者采取宽大态度绝对无损于他的地位，反而会进一步增强他在道义上的威望。

我对斯大林的了解程度，还不足以判断他当时做出的反应究竟是属于一种姿态，还是他真地在接受或拒绝高尔基的论点之间，处于犹豫不定的状态。无论如何，对高尔基的一个论点，斯大林是完全听得进去的：要考虑他未来的传记作者对他这些或那些措施将做何种评论。

最近以来，斯大林不仅关心给自己立传的问题，而且希望将来写出的传记给后人留下好感。他愿意被描写成不仅是一个在与不共戴天的仇敌搏斗中强硬而无情的人，而且当冷

酷的时代允许他表现出他自认为隐藏在他灵魂深处的真正的自我时，还是一个纯朴而宽厚的人。他竭力扮演哈鲁姆-阿里-拉希德的形象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后者不也是东方人吗？不也是同样质朴吗？至少高尔基是很知道该怎么样去拨动他这根弦的，他试图利用它实现善良的目的——减少斯大林的猜疑，缓和他的复仇心理。不过斯大林也许是在别的想法指导下行动的。过去的十年紧张把每个人都弄得筋疲力尽，如果硬和大家的情绪以及高尔基的劝谏对着干，只会引起新的冲突。就算是这么回事吧，但斯大林在1934年突然变得比较温和，比较和蔼，比较肯让步，则是毫无疑问的；他喜欢和作家、演员、画家们聚会，听他们的谈话，并且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这种情绪在斯大林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态度上很快也得到了反映。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重新起用布哈林。他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以后，又被任命为《消息报》的主编。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新态度更有代表性。如果我没有记错，加米涅夫被开除过三次，也忏悔过三次。他最后一次栽跟头是在1932—1933年，那时有人揭发他“阅读而不报告”斯大林最痛恨的一个文件——柳京纲领。那一次眼看加米涅夫要倒一个轻易过不了关的大霉了。但是对加米涅夫十分敬重的高尔基说软了斯大林的心肠。他安排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见面，据说加米涅夫在会见时做了爱戴斯大林的某种表示。

谁也不知道这次严格保密的会见的详情，但它的结果得到了党内人士的赞许。斯大林差不多公开宣布了他“开始相

信加米涅夫”。据说接见的时候加米涅夫坦率地谈了他的全部反对派活动，说明了他为什么以前反对斯大林，为什么现在停止了反对派活动。听说加米涅夫向斯大林“以名誉担保”不再进行任何反对派活动。对方作为交换条件给了他管理科学院出版社的广泛权力并且答应最近的将来还要委派他负责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

诺言马上兑现，他得到了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许可。他在大会上出面的效果异常成功。加米涅夫在讲话里，为专政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根据。这里说的并非党的或者阶级的专政，而是个人的专政。照加米涅夫的说法，阶级内部和党内的民主只有在具备进行讨论和说服的充裕时间的和平发展时期才是可行的，在危机的时期情况则不同。在这样的时期国家需要一个领袖，需要一个能独自承担起决策大任的人。一个党、一个国家在这种时刻，拥有一名能带领它渡过最困难局面的洞察一切的领袖，确是极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掌握者是一个不适合做领袖的人，他们就要遭殃，因为那时难免一场灭顶之灾。

加米涅夫的讲话无论措词和口气都表明发言者是把斯大林看做第一流的领袖，这在听众的脑子里并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大会向加米涅夫热烈鼓掌，接着转为向斯大林热烈鼓掌。很久以后才有人注意到这篇讲话倒不如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仔细读读，便会产生和表面上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印

* 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他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中译者注

象。维辛斯基在审判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法庭上说加米涅夫是马基雅维里的伪善的门徒，指的就是这个。

如果可以设想斯大林曾一度赞同过彻底改变党的方针以及实行党内和解政策的话，那么他身边的人，他的工作班子则自始至终抱着根本反对的态度。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班子的人从原则上反对基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的改变党的总政策的方案，相反，这倒是因为这个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总政策的问题和他们无关痛痒。以后的事件表明，他们甚至可以接受比基洛夫的方案更惊人的改变。他们死命反对的是对党内政策做任何改变。有一点他们看得透亮，尽管今天有许多人因为看到斯大林的一些正面的好处而宁愿忽略他的性格中的反面因素，但是一旦党内体制发生改变，他身边的助手们（这些人对于如何利用他性格中的反面因素是吃得很透的）就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慈悲。因为，我再重复一遍，现在进行的斗争不再是为了赞成或反对斯大林，而是为了在对她施加影响方面占上风。用组织局的语言来说，这是一场围绕着用谋求对待人民的新态度和新方法的干部取代现有中央工作人员的问题展开的斗争。所以老班子自然要使尽全身解数来抵制任何改变了。抵制的总指挥是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

卡冈诺维奇无疑是有才干的人。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有迅速地领会和吸取别人思想的本领，有出色的工作能力、非凡的记忆力和组织才能，这都是他高出于旁人的地方。主持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当需要把讨论引入适当的轨道，强迫与会者拥护某种论点，留心让发言者扣紧主题的时候，没有

人比他更有办法。你只能遗憾为什么老天爷把这么多的聪明才智赋予了这么一个道德品质为众人所不齿的人。在党内这个人是以言而无信著称的。他的诺言从来靠不住：自食其言、睁眼赖帐和许愿保证来得同样容易。这也许应当由他上台的时代环境来负责。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这种口是心非风气的盛行，他的贡献比谁都大。

叶若夫是卡冈诺维奇的右膀左臂。如果谈到卡冈诺维奇，还可以问为什么他就一定不能靠诚实的手段向上爬，而关于叶若夫则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遇见过比叶若夫更叫人讨厌的个性。我看见他，禁不住想起拉斯捷拉也夫大街上的小无赖。他们最爱干的营生就是把一张蘸了石蜡的纸系在猫尾巴上，把它点燃，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这只吓坏了的小动物一溜烟窜到大街上，绝望而徒劳地躲避愈烧愈近的火苗。我确信叶若夫小的时候一定爱用这种方式取乐，他现在不过是用另外的形式继续干同样的事而已。你只要观察他一遇机会就怎样欣喜若狂地整治任何一个老反对派分子就明白了。曾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在党内的官运似乎并不那么亨通。他遭人厌恶，遭人藐视。他对那些原先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有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而他自己不会演说）、有出名作品的著作家（而他自己除了打小报告，别的不会写）、有光荣历史的老革命家（而他自己在地下时期还没有参加工作）——蓄积了一肚子的怨恨。到了打出使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化”的正式旗号，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的时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了。大

自然绰绰有余地赏赐给他的唯一才能，就是在幕后施展阴谋诡计。凡有发挥这种才能的机会他从不错过。在组织局和中央监委机关将近十年的工作，使他对党的机器中的主要干部的个人特点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天生嫌恶有丝毫独立见解或坚持自己看法的人，一个一个地撤掉这些人的职务，换上那些唯上司之命是从的人。他能推行这样的政策，当然是因为上面有人支持，但是在实施的方式上叶若夫打上了自己性格的印记。他经营十年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由他的可靠仆从组成的网。他们人数众多，在党的各个部门，在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苏维埃机关，在军队里，都有他的人。他现在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对它的领导班子来了一个彻底的“年轻化”，上面这些人果然对他有了大用场。顺便提一句，雅沙·阿格拉诺夫是原来领导班子里被叶若夫留下的唯一的成员。他们两人是牢不可破的老朋友！

卡岗诺维奇和叶若夫这一对从一开始就反对党内和解的政策。基洛夫在世，他们不敢公开跳出来。他们只限于挑动斯大林反对这个政策，加剧斯大林对假想敌的天生的猜疑心理，利用送上门来的机会阻挠基洛夫往莫斯科的调动。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他调来，他们煞费苦心地装配起来的党的机器又会面临一个人员大换班的问题。你们会记得他们阻挠调动的企图，在十一月全会上破产了；然而基洛夫再也未能来到莫斯科。基洛夫之死正中此辈的下怀，在此以后他们就公开站出来干了。

阿格拉诺夫关于基洛夫遇刺事件的报告是禀承他们的意

思起草的。报告里把列宁格勒前反对派分子中那些并不敢为非作歹的持异见者，描写成一贯策划恐怖行动的阴谋分子。一个以鲁缅采夫、科托利诺夫、沙茨基等人为首的季诺维也夫当政时期在维堡区活动的前共青团员小组被定性为这次密谋的总部。不过他们这些人从1934年秋天以后的确是经常碰头的。真相是这样，党史研究所打算出一本列宁格勒共青团运动史，为此在全市各区组织了一系列回忆前共青团工作者活动的座谈会。这些季诺维也夫时期的前团干部，包括完全放弃了政治活动的沙茨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被硬拉到这些座谈会上来的。在维堡区这类集合搞得尤其活跃。鲁缅采夫的回忆特别引人注目。1926年初几个中央委员在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求省委赞同严厉谴责季诺维也夫的十四大决议，就是这个鲁缅采夫把这项建议顶了回去。鲁缅采夫的这个行动，当时遭到斯克沃尔佐夫主编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猛烈攻击。鲁缅采夫的回忆还接触到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情况，他的语言可以相信是和官方的路线不协调的。这些回忆引起了纷纷议论。阿格拉诺夫就把这件事拿来作下结论的根据，因为据查尼古拉也夫确曾参加过这类已被阿格拉诺夫定性为反对派集会的座谈会云云。

凡是对阿格拉诺夫的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想象得出，他利用这些材料能炮制出一部怎样的海外奇谈。而他这次的成就又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不以局限于列宁格勒一地为满足，把这条线拉到了远在莫斯科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头，而那两位仁兄处事确也欠谨慎，每逢他的前支持者来

莫斯科，他们总要和他们见面。正当上层人物们在那里讨论党内和解问题的时候，一个由老反对派头子们组成的葛藤蔓延的密谋的假象就这样制造成功了。

为了给斯大林造成印象，报告特意把某些证言突出出来，表明斯大林已表示了信任的加米涅夫并没有恪守誓言，明知某些人的反对派情绪，非但未报告中央，反而在和朋友的谈话中恣意发泄虽然巧加掩饰，但是实属“不忠”的言论。

政治局讨论这个报告时的气氛极为紧张。要决定两个问题：第一，对据称业已侦破的暗杀基洛夫一案的“参加者”和“指使者”应如何处理；第二，从破获反对派密谋一事应做出怎样的政治结论。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对于中央全会上提出的预定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和颁布新宪法的政策，大多数人不同意做任何改变。在这一点上政治局内的大多数看来是胜利了。斯大林斩钉截铁地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必须贯彻，他本人也是坚决赞成的，基洛夫提出的方案只有一点要改变，鉴于反对派拒绝“放下武器”，党作为一项自卫措施，将对前反对派分子进行一次新的强有力的“审查”，要以“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为重点。这一建议得到通过，虽然是带着一些犹豫。至于第一个问题，决定作为一件普通的恐怖行动案交付苏联法院审理，由检察机关对各有关人犯提起公诉。这就等于把前反对派首领们交付审判并送上断头台。

决定一通过，党的机器便开动起来。在同时召开的莫斯

科和列宁格勒市委全体会议上打响了运动的头一炮。两个全会的形式极为庄重，都有政治局委员到场讲话等项目。每个市委委员收到厚厚的一叠尼古拉也夫案情报告（即前面提到的报告），其中包括尼古拉也夫日记摘抄、口供节录和其他文件。这个文件只印了限定的份数，由市委委员亲笔签收。阅后必须按原签收号退回各自的市委秘书处，放在该处的机要保险柜里保存。但即使在这份机密报告里也没有逮捕尼古拉也夫时搜出的宣言全文，显然连这样小的范围里也不许知道。在会上对问题进行讨论自然更是谈不上的。事先准备好的决议一致通过，第二天就把猎狗们撒出去了。一场反对一切反对派分子，尤其是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疯狂运动在报刊和集会上发动了起来。要求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社会舆论”也就这样制造了出来。被控告的人们的命运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人敢为他们辩护。没有人获准出席旁听，连亲属也不例外。顺便说，恐怕也很难找到什么亲属，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因为所有和被告有点什么个人关系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党派，统统当作“同谋”嫌疑犯被抓起来了。只有以官方身份需要在场的才能参加庭审。关于这次审判外面很少议论，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至少有一个情况是确定无疑的：它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几乎全体被告都拒绝承认所控告的罪行；对于据称与他们有关的证据，他们也一概加以否定，并且说出了侦查期间向他们施加的压力。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存在什么“阴谋分子的总部”。他们的抗议自然起不了任何效用。对列宁格勒内务局负

责人的审判更是严加保密。但是进行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起诉书措词缓和。被告们表示认罪，但把责任推到基洛夫下的命令上。判决更是轻得惊人，尤其是如果你想想我们的“领袖们”的人身保卫工作中小小的疏忽大意，一般会受到多么严峻的惩罚的话。斯莫尔尼大楼警卫工作负责人巴尔泽维奇仅被指控犯有执行公务时的“疏忽罪”，判处十年集中营监禁。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副局长各判徒刑二至三年不等。同时，他们进了集中营以后被分派了营内的重要管理职务，所以惩办只等于降级而已。

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第一次审判，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一开始就象“拉出来示众的样子”，搞得“大张旗鼓”。其目的是在全体市民面前彻底“剥开”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假面具”。已经有好几年不住在列宁格勒的被告们，从莫斯科等地押到了本市。从全体被告的组成情况看来，这次审判实际上成了对季诺维也夫时期联共列宁格勒市委的审判，当然除了少数一贯忠心耿耿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他们对被告们说，目前的恐怖主义倾向是他们以往在派别斗争中走极端造成的后果；在这场反对恐怖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党要求他们为党出力”，还说他们负有在政治上牺牲自己以帮助党的事业的义务。向他们这些人打了招呼，只有以反对派首领的身份出庭，承担造成当前恐怖主义情绪的责任，并且当众谴责这种情绪，才可能阻止和预防他们的支持者继续从事恐怖活动。许多被告觉得这样的建议简直是骇人听闻和可恶已极的。但是加米涅夫在被告当中，却是劝说别人接受这条建议

的急先锋。

加米涅夫被捕前不久，被叫去见过斯大林。这显然是紧接在上面说的那次决定性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的事。斯大林看来要通过当面谈话查明加米涅夫是不是真地违背了一度向他做过的保证；加米涅夫是不是不顾许下的诺言实际上继续保持着和反对派分子的关系。

莫斯科的反对派分子的确经常利用“社交茶会”的方式保持接触，这种茶会和列宁格勒的一样，也是窃窃私议的场所。加米涅夫本人虽然没有参加这类聚会，但他知道此中情形和那些议论。同这种聚会的个别参加者密谈时，他诉说自己仍未改变初衷。加米涅夫的表白为茶会的参加者所共知，其中有人传给了列宁格勒的政治上的朋友，那些人随即报告了阿格拉诺夫。和斯大林见面的时候，加米涅夫力说他被人误解了，但最后还是承认了有罪，表示忏悔，甚至当场哭了鼻子。然而斯大林宣布对他不再信任，他将让这件事按照“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去发展。

应当承认，从政治道德角度说，大多数反对派的行为实在不足为训。不过党内的一般状况真地是叫人受不了的。要做个忠诚的人吧，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要当情报员，偶然听来几句反对派的言论，碰巧发现一份反对派文件，你就赶紧跑到中央监委去报告吧。一个要求它的党员做这种事情的党，绝不能要求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相同观点的人们的自由联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撒谎，否则混不过

去，然而撒谎也不应超过一定限度。不幸的是，反对派分子，特别是他们的首领，经常走到了这个限度之外。

以往我们这些“政治犯”，在和统治者的关系方面习惯于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请求宽恕被认为是罪恶。谁干了这种事，他在政治上就算完了。我们蹲监狱或者被流放的时候，决不轻易向当局保证不逃跑。这条规则我们是坚守不渝的，即使答应这个条件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待遇。看守我们是他们的事，逃跑是我们的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保证，我们就要严格遵守。利用以“名誉担保”换来的较好待遇实行越狱，被视为卑劣。旧时代的流放者对于以这种违规行为糟塌政治犯声誉的人，毫不客气地记下他们的姓名。

今天的心理完全不同了，恳求宽恕变成了普遍现象。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执政党是“我的党”，沙皇时代的规则自然不管用了。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论据。而同时却把一贯地欺骗“我的党”视为完全正当，因为这个党不是用说理方法而是使用暴力和它的思想上的对立面进行斗争。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道德观，它允许一个人事先抱着根本不打算遵守的想法去接受任何条件，签署任何保证。这种道德观特别盛行于党内老同志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才开始迎着很大的困难和它决裂。

在反对派分子的队伍中，这种新的道德观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两者的界限完全模糊了。很多人堕落到明目张胆的背信弃义和不老实的地

步。这种新的道德观，同时也给那些反对与前反对派重归于好的人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们说，这种人的话不可信，因为他们在原则上认为说谎是可以允许的。谁能断定他们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待他们的唯一适当的态度，就是任何时候对他们任何人一概不相信，不管他们是在说话还是在赌咒发誓。这正是叶若夫所持的观点；现在他正要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了。

加米涅夫被捕后精神彻底崩溃。他象垂死挣扎似地企图赢得对他新的悔过声明的信任，但是他未能动员“列宁格勒市党委案”（把这次审判说成这种性质比较符合实际）的全体被告服罪。原来举行“公审”的计划因而告吹了。在这种时机搞出一个一半被告对另一半被告的供述进行反驳的审判是根本不行的。所以审判只好关着门进行，其结果弄得谁也不满意。叶若夫要求判死刑，报刊和集会也一哄而上。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接受不了这个想法，个别影响很大的党员向斯大林呈递了反对适用于死刑的请愿书。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为一份致政治局的请愿书公开征集签名，它提请政治局注意列宁的一条主要的遗训：“你们之间不要流血。”看来采用“最高刑罚”的土壤还没有充分准备好，于是斯大林在政治局里提出在这个案子里不适于诉诸这种手段。他暂时已感到满意，因为现在已经把问题摊到桌面上来了。不过党内的“清洗”工作仍以更大的劲头进行着。在目前形势下，叶若夫青云直上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他不仅当了政治局委员，还登上了中央第五书记的宝座，这原来是给基洛夫准备的位子，他迁来莫

斯科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本来应交基洛夫管辖的那些部门，现在都由叶若夫负责了。政治局内部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基洛夫和古比雪夫（两人都是和解政策的拥护者）死后空缺的两个位子，都由这个政策的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填补了。

叶若夫一朝大权在握，马上开始对各个机构实行大刀阔斧的清理。前政治流放者协会（在沙皇时期被判过苦役的政治犯）被勒令解散。尼古拉也夫就是从该协会的出版物（回忆录等）里产生了对恐怖活动的好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也被封了门。这是一群“不识时务”的、“专爱挑毛病”的老家伙们的窝子。下一步，“理论家们”的据点共产主义学院也宣布停办。斯捷茨基*亲自负责对两个首都和各省市报刊编辑人员的大清洗。

1935年春举行了与阴谋杀害斯大林事件有关的“第二次加米涅夫审判”。受审的有一些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人员。这个案子里显然有一点真东西：它包得很严，这种小心翼翼的做法一般是在对手们根本不屈服的情况下才采用的。加米涅夫自然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牵扯进去。他和案情根本不沾边，但是他的名字必须在此案中出现，这是进一步搞臭反对派的需要。斯大林本人对加米涅夫的态度使公诉人员感到是要他们加大火力。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内里是有一点真东西的。被卷入的人至少讨论过走尼古拉也夫在列宁格勒

* 斯捷茨基，A.N.（1896——1938），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8年被捕枪决。——中译者注

选择的那条路的必要性。可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工作到底比斯莫尔尼大楼有效得多。

这次审判最重要的结果，一件是叶努启泽*的垮台，另一件是对高尔基的第一次警告。

叶努启泽是斯大林最亲密最老的朋友。斯大林对他的情谊是毫无疑问的，并且直到最后仍和他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叶努启泽是斯大林偶尔去看望的少数人之一，也是每逢斯大林出席什么社交场合必定要请去的一个人。叶努启泽是斯大林亡妻的好友，从她童年起就认识，而斯大林总以和他的天性不大协调的温情珍视着与他亡妻有关的任何纪念。再说，斯大林确信叶努启泽从来没有害他之心。然而他终于垮了，因为他胆敢对列宁格勒审判中查明有罪的人犯及其家属给予接济。

应当说明，叶努启泽对政治犯和流放者一向是尽力帮助的。这件事在党内以及流放者和犯人们中间都知道。斯大林本人也知道，不仅是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里，也直接从叶努启泽自己的嘴里。一般人都知道后者是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的，否则他做不了这种事。

但是时代变了。叶若夫声称叶努启泽的仁慈削弱了镇压的机器，为了使机器的威力得到加强，必须把叶努启泽扒拉下来。斯大林对叶努启泽保护过一阵，但大概是不够有力

* 叶努启泽，阿韦尔·萨弗罗诺维奇（1877—1937），1898年入党，1923—1935年3月任苏联中执委秘书长，十七大（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1935年被捕，后被枪决。——中译者注

吧，因为叶努启泽最后还是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斯大林给他的唯一赏赐就是保他免受进一步的惩办，让他得到一个世外桃源里的工作。他当了北高加索疗养所和休养地的主任。叶若夫的随从们竭力把斯大林此举形容为高尚的范例，强调指出事关党和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的时候，斯大林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去私人的感情。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仅就斯大林明知并准许过叶努启泽的活动这一点来说，这是明摆着的背信弃义。

高尔基的事情更要复杂。基洛夫被暗杀，高尔基陷入狂怒，他要求对恐怖分子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然而他一旦看清了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利用尼古拉也夫行刺事件，达到改变1934年开始实行的他本人大力支持的路线的政治目的，马上不顾一切地设法阻止斯大林选择复仇主义的道路。在加米涅夫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的第二次“加米涅夫审判”期间，高尔基的不满达到特别尖锐的地步。

然而高尔基的全部努力都归于失败，斯大林不再上门看望他，也不接他打来的电话。事情竟走得这样远，以至《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扎斯拉夫斯基攻击高尔基的文章，这在以前怎么可能！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篇文章是在叶若夫和斯捷茨基直接授意下写的。扎斯拉夫斯基经常被雇用来干这种勾当，此人文笔不错，但是不知道道德原则为何事。高尔基大发雷霆，闹得不可开交，直到要求发给他一张出国护照。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但是没有对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因为他到底是高尔基，对这样的人采取撤职或叫他靠边站的简

单办法都不起作用。

第一次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审判以后，陆续采取的这些党内的恐怖措施，局外人是不知道的，就连党内也是很晚才知道，这些都是幕后进行的。在国外的人们眼里，1935年初是真正的“莫斯科之春”。一个改革接着一个改革，方向都是一个：与党外知识分子和解，吸收一切在苏联建设的各行各业中以实际工作证明有真才实学和忠于苏维埃国家的人员，借以扩大政权所依靠的基础。

凡是原来支持基洛夫方案的人，现在都欢迎斯大林的措施，因为它们和基洛夫的方案十分相似。对高尔基来说，苏联政府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和解无论如何是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他从索伦托回莫斯科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梦想作为他和自己的行动妥协的理由的。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继续采取的恐怖措施初看起来好象只是令人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是尼古拉也夫行刺事件的被拖长了的和被扩大了的后果，而不是党的整个政策即将发生急剧变化的征兆。大家深信，与知识分子和解政策的逻辑，必将引导党的领导者最终走上党内和解的道路。必须想办法（大家这样相信）让斯大林的猜疑症的这场大发作快点过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坚持认为必须尽可能地、经常尽可能突出地强调全党对现任领导的无限忠诚，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一切场合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吹捧他个人。据说正因为斯大林有爱奉承的毛病，所以只有用多多益善的大剂量的恭维赞美才能缓解他的复仇顽症；除此而外别无它法。此

外，人们还说，我们必须学会原谅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斯大林引导全党从五年计划的最危急的年代里走了过来，是为党办了大好事的。同时我们应当更加响亮、更加着重地大谈今天的巨大变化，大谈我们正在进入的“幸福的日子”，大谈以在群众中培养人的尊严感、尊重人的个性和发扬“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党的新政策。唉，我们这些希望何其天真啊！回首往事，我们简直很难理解当时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表明事态正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征候呢？不是朝着党内的和解，而是朝着党内恐怖的加强。党内恐怖的加强正走向它的逻辑的结论，正走向从肉体上消灭党内一切由于其历史经历可能成为斯大林的反对者和他的权力的觊觎者的人们的阶段。今天我一点也不怀疑，斯大林正是在基洛夫被暗杀和第二次加米涅夫审判之间的那个时期内做出了他的决定并且制定了他的“改革”计划，其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即将到来的“十六人审判”和其他的审判。如果在基洛夫被暗杀以前，斯大林在选择哪条道路上还有些犹豫，那么现在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斯大林下此决心的决定性原因，是他根据送来的报告和情报了解到党的老干部的大多数，对他确实怀着怨恨和敌视的情绪。

从基洛夫事件以后进行的几次审判和调查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全党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并没有服气；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别听他们信誓旦旦，骨子里都是否定斯大林的，这种敌视态度不但不是在减弱，反而是在增强，那些当面阿

谄奉承，矢表忠心的人，政治气候一变，马上就会实行背叛。

这就是斯大林在尼古拉也夫行动调查过程中编写的各种文件里所看到的基本事实。必须承认，斯大林自己也能拿出合理的根据来支持这种归纳，他从其中可以大胆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斯大林领会到，老布尔什维克的敌视他的原因，根子就在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们这些在反抗旧制度的革命斗争里成长的人，都养成了反对派的心理，不肯调和的“不信奉国教者”的心理。我们的头脑总是不由自主地朝着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向去思考；我们总是到处寻找缺点。简言之，我们是批判者，破坏者，不是建设者。这一切在过去都是好的，而现在当我们必须从事建设的时候，这一切都完全要不得了。使用由这类怀疑派、批判者构成的人的材料，什么牢固的东西也是建设不起来的，而当前最要紧的是把苏联建设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因为苏俄面临着如果爆发战争就必然会引起的大混乱。这就是斯大林的推理。

他从这一切中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够大胆的：如果老布尔什维克，即今天构成国家统治阶层的人们，不适合执行这种职能，那就必须把他们从现有的位子上拉下来，建立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基洛夫方案的前提是与党外知识分子和解，吸收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实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项任务，作为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促进它与居民的民主成分合作的途径。在斯大林的计划之下，原来这些建议的意义完全不同了；它们的任务变成了为实现统治阶层的大改组提供方

便。这场大改组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感染了批判习气的人统统赶出去，用心里只想着正面建设的新的统治阶层取代他们。

详细叙述为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各项准备措施，要占太多的篇幅。重点自然是党的机关的更新，它的许多单位从上到下都换了人。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斯大林决心在新宪法生效以前完成这些准备。我们曾经抱过这么一条希望：如果有什么社会集团能从这个宪法里得到一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那准是老布尔什维克。谁知道宪法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帮助斯大林彻底消除我们这帮人对国家命运的任何影响。使斯大林得以顺利实现他的目标的其他因素，多少有点鬼使神差、应运而生的成分。

第二次加米涅夫审判以后，高尔基的影响大大下降，但他的命运之星还没有彻底陨落：他和斯大林达成了表面的和解，他是唯一的一个一直到死斯大林都不能不加考虑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如果高尔基活着，8月审判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结局。假如真是这样，那末，高尔基的死肯定是放开了斯大林身边那些要求赶紧实现杀头计划的人们的手脚。

7月末，一小批被控密谋杀害斯大林的共青团员大学生在莫斯科受审，审判自然是关门进行的。被告几乎全是小青年，他们没有干过任何公开行动。他们的密谋未超出过单纯的讨论，不过讨论得很认真，表明他们显然有意把计划付诸实施。近来这类案件在俄国时有发生：国内聚积了太多的爆炸因素。此案的大部分被告并不否认他们的计划，唯一关心

的是保全他们纯属偶然地落到被告席上来的私人朋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如果判决不应存在任何疑问。尼古拉也夫行动发生以后，对聚首议论恐怖行动者只有一种惩罚——死刑。因此当检察机关要求把这个案子暂时搁置以待补充调查的时候，无怪审判员们要感到惊讶了。

后来才知道，提出这个要求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动议，而最高当局又是遵照中央书记处的直接指示行事的。因为后者决定利用这件小案子，达到另外的政治目的。补充调查的任务交给了阿格拉诺夫。于是调子马上定好。线索从被控告的学生们身上拉到了教政治科学和党史的教授们身上。随便在哪本俄国革命史讲义里都很容易找出几页今天能够助长对政府的批判态度的地方，而头脑发热的青年们总是习惯于引用那些课堂上学来的正式材料支持他们对现实的结论。阿格拉诺夫只需要把他认为应列为同谋犯的教授挑出来就行了。十六人审判的第一批被告就是用这个办法拼凑的。

把这条线进一步挂到前反对派首领中的老布尔什维克身上就更容易了。部分材料已经攥在手里：尼古拉也夫一案以来的各次涉及反对派分子的案件，都是由阿格拉诺夫负责的，他炮制了大量的随时可用的必要“文件”。现在就看党的上层领导想把案子搞成多大规模了。准备工作极端保密。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去休假了，不知道正有什么惊人消息等着他们。尼古拉也夫案件以后，如案情涉及恐怖活动，向革命法庭对党员高于提起公诉已经不需要事先征得政治局同意。维辛斯基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案子的工作。指挥者是叶若夫。

不仅党的一般干部，就是中央委员和几个政治局委员都觉得这次审判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斯大林对每件事都点了头以后，审判开足马力地搞了起来，他自己却跑到北高加索休息去了：他走开是有意让政治局开不成会，没法讨论被告们的命运。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政府官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那里对于判处死刑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关于是不是还要搞附带的审判，关于某几个还准备判罪的人，有过一些对立的意见。在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发表了一个为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名誉的公告。对被控告的人连询问都没有询问过，就能发表这样的公告，由此可见一般。叶若夫现在对这个让步颇为后悔，发誓说将来要纠正这个“错误”。斯大林休假的时候，对这方面的问题总是有意避而不答，但现在出来说话了，表示一定要把清洗工作进行到底。有人提出应当考虑西欧的社会舆论，他无动于衷。凡有人这样说，他一概轻藐地答之曰：“没有关系，他们会咽下去的。”他认为那些对审判愤愤不平的人，对他们国家的政策起不了什么决定性影响，报上发表几篇“小文章”他认为无足轻重。

附带的审判是否接着搞，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阿格拉诺夫已经接到了把清洗工作搞深搞透的威力无比的指示。亚哥达罢了官，因为他对举行这场审判表现了温和的反对态度。这件事的全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他才知道，他坚决要求把这个案子上报政治局讨论。阿格拉诺夫借此告了他一状，说他包庇党内的老领袖们，他现在实际上遭到软禁。叶若夫

接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以后，撤换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所有的高级干部，只留下一个阿格拉诺夫。这个委员部各机构的新班子，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从各级党委书记里抽调。这些人都是和叶若夫共过事的，是他信得过的人。听到消息说，被捕的人很多死在监狱里；审讯方式极端残忍，被审讯的只有一种选择——承认阿格拉诺夫要你承认的一切或者死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新的处决，如果把处决被控与盖世太保、波兰特务机关之类保持联系的外国人除开不算的话。但是列入这类外国人名单的也有俄国本国人。听说索斯诺夫斯基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处置掉的。至于那些已归化为苏联公民的外国血统的人受到的非法待遇，就不用提了吧！

我们这些历史上有过一点名气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现在都躲在自己的窝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人家不是在理论上已经证明现阶段我们成了不良分子吗？什么人只要和陷进某个案子的人沾上一点边，他的命运就决定了。谁也不敢为我们辩护。而与此同时，各种“福利”和“改善”倾盆大雨似地降临在一般居民的头上，这是特意安排的：好让关于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记忆，在人民的头脑里和他们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种种“好处”紧紧地连在一起。

（田大畏译自鲍·尼古拉也夫斯基著《权力与苏联上层人物》一书，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版）

1928年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晤

这里题名为《1928年7月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晤》的文件是由乔治·桑德斯翻译的。虽然所有研究这个时期的西方历史学者都引用这个文件，但这还是第一次把它全译成英文，也许还是第一次全译成别国文字。

俄文原文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资料里，是一份加米涅夫简明摘记的打字稿，单行空隔格式，共五页。译者设法在译文中让人看出加米涅夫原文中那种上下文不连贯的、省略的笔法，以保留文件中所反映的那个历史关头的戏剧性。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看懂，也作了某些微小的变动。一些省略的地方，经过认真琢磨，都已写得清楚完整。在空白的括号里填入了某些说明。（所有的圆括号都是原文中就有的。）根据加米涅夫原来的小标题，分成五个主要部分，加上了新的标题。原文中第三部分前面加有“加着重点的是逐字逐句记录的”和“转抄”的字样，这些注解和着重点（或打成斜体字的）都略去了。最后，在分段和引号的使用上处理得稍许恰当一些，但对文件中的疏

漏和重复之处并没有花功夫去修改。

前面的介绍文章《斯大林主义的先兆》和后面的注释（即文中的脚注——编者）是由斯蒂芬·F·科恩写的。

乔治·桑德斯和斯蒂芬·F·科恩*

斯蒂芬·F·科恩：《斯大林主义的先兆》

1928年初开始在苏联发生的事件，至1929年末达到了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狂乱地步。对于这些事件有过各种各样的委婉说法。有些是学者派头的描绘，另一些则具有坦率的政治意味。而它们都把1928—1929年作为现代史中一个转折点的真实意义掩盖起来了，使人们弄不清楚这个意义的费解之处。

例如，西方历史学家有时把1928—1929年说成是“极权主义全盛”的开端，这种说法就是要使人们对它连续不断产生的必然结果易于理解。然而，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则表明有另一些看法。苏联和西方的作家们都同样讲到经济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心目中指的是这个计划具有高度的周密性。但那时苏联即使在工业上也没有真正的计划，不过是乱加指标，强迫提倡，危机频仍，临时安排以及造成很大浪

* 斯·F·科恩，生于1938年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俄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是西方研究布哈林及其思想的学者之一。——编者注

费的不均衡状态，是这样胡乱搞起来的重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如果真有那样充分的合理性，也就不至于引起苏联农村1929—1933年的不必要的悲剧——实际上是一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内战，结果是无数人死亡和农业破产。历史文献无可争辩地证明，其后几十年里，官员们滥用职权，特权盛行；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依然把1928—1929年说成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开端”。

1928—1929年的真实意义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到来，是在其后二十五年成为斯大林主义制度标志的那些特殊政策、政治措施和意识形态的初步表露。它开始把巨大的成就和惊人的犯罪混杂在一起，从而创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苏联，变更了世界政治的实质。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国内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及其一直遗留下来的东西，使它列入了二十世纪主要的政治现象，而转折的起点就是1928—1929年。如果说历史学家迟迟未能认识到这一事实，未把它当作能说明历史的重要问题来对待，那么，普通的苏联人却是一直就认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与1928—1929年所造成的功过息息相关。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最后一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派别斗争，产生了导致这一转折点的政治决策*。1928—1929年的争执虽然涉及面极广，从党和政府同苏联社会各部

*关于这次斗争的全面记述及文件记载，见作者所著《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部政治传记（1888—1938）》（纽约1973年及1975年诺普夫版）。

门的关系，到共产国际的方向和外交政策，这全部公众事务都在争执之列，但论争的中心则是经济政策。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经济仍然是革命的决定因素。

以前几次的党内斗争（1923—1924年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以及1926—1927年他们三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均先后失败，从而结束了这几次斗争），都没有在全体居民中造成重大影响。1928—1929年斯大林在工农业方面日益增强的极端主义政策，尽管在表面上与左派的政策有些相似，但深究起来，实则是新的一套。他的政策很快从中央一直推广到最小的乡村。这些政策受到三个高级政治局委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当时还一直是斯大林的同盟者，这三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家、共产国际首领、自1925年以来与斯大林同为党的领导人的布哈林，继列宁任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李可夫和苏维埃工会首领托姆斯基。

这个布哈林主义集团即后来所谓的右翼反对派，坚决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经济上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在几个主要方面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布哈林主义者的基本宗旨也是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不过他们所渴望实行的建议是以下列几点为基础的，即继续推行“耐普”（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继续保持国营工业与农民经济间建立市场买卖联系的公私双重经济；以及继续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和平、温和、渐进及均衡发展的原则。在所有这几方面，布哈林主义同早期的斯大林主义都是

针锋相对的。

1928年初斗争开始时，在斯大林以强制（“非常”）手段征集粮食问题的争端上，布哈林集团曾占了很大优势。它的首领们控制了重要的权力机关，个人水平也比斯大林主义派的人要高。斯大林除本人是党的总书记以外，他所依靠的是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这样的二流人物，他们是后来才获得权势而且弄得声名狼藉的。布哈林主义的政策博得了党的中下层及政府机构人员的广泛同情，而且看来还得到社会上大部分人士的广泛同情。除此以外，由于左派的失败，这些政策一再被公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政策。1927年11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会立即把左派开除出党了，布哈林的政策法定为工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准则。

1929年4月，斯大林同样以压倒优势击败了布哈林主义反对派，使他的新政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合法化。斯大林获胜有好几个因素，包括他握有总书记的组织大权，以及党的许多高级官员还没有看出他极端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样一些因素。他们根据他过去所起的作用，仍然把他看成是一个谨慎的中间派人物。

然而，布哈林及其同盟者的失败，还因为他们不肯把这场斗争挪到斯大林权力最大的高级会议之外，挪到他们自己把持的舞台上去进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也曾帮忙指责左派的这类行为是“分裂主义”，是“搞分裂”，最后并把左派开除了。他们挖了一个上层秘密政治的陷井，结果自己也陷下去，而斯大林却获胜了。就连那些失意的斯大林主

义者后来也抱怨说，他们“并非失败于辩论，而是失败于党证”，他们是“被别人背着党扼死的”。

布哈林主义反对派的失败具有深远的影响。布哈林、李可夫很快被驱出政治局，他的追随者也到处被逐出机关。（后来他们三人都毁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托姆斯基于1936年自杀，李可夫和布哈林于1938年莫斯科审判后被处决。）列宁的继承人就只剩下斯大林自己。这时他已是唯我独尊的领袖，不久之后就成为专制的独裁者。与此密切相关的是，1929年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恐怖，把凡属布哈林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做法都当作“腐败的自由主义”来反对。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纲领性的思想在苏联仍然受到排斥。最后，布哈林的失败乃是那个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序幕，它揭开了斯大林主义的篇章。1929年12月，由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反对派的牵制，斯大林的“非常手段”的行动，就必然导致产生其它的严重后果——一亿二千五百万农民被强制实行集体化，对任何反抗者都进行残酷的斗争。

下面刊登的这个重要文件，提供了唯一的这场斗争的内幕情况，它是对1928年7月11日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秘密会晤的记述。加米涅夫急忙把布哈林的谈话内容写成这份报告交给了季诺维也夫。文件还包括索柯里尼柯夫的按语，他是个反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曾参与过这次谈话的一部分。

布哈林通过索柯里尼柯夫安排了这次秘密会晤，要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都是刚刚重新入党）支持他反对斯大林。他从正在继续举行的中央全会直接来到会晤地点。

那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当时，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决策人仍然是布哈林主义者。布哈林在秘密会议上就已发现斯大林用“非常手段”收集粮食的全部纲领的实质，发现自己过去依靠的那些领导人的背叛行为，以及持中立态度的中央委员们不愿起来反对总书记。他还要担忧预定于7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早已暗地里开始进行活动，反对布哈林的控制和他的统一战线政策，走向极端反对社会民主的道路。从1929年起，这种种做法严重地削弱了欧洲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

这个文件并没有逐字逐句地把会晤情况记录在案。据说只有一部分是布哈林的原话，即使这一部分也显然有省略。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后来辩解说，这个会晤记录是片面的，这点看来也显然是如此。此外，可以看出，加米涅夫对布哈林的评语有许多出言不逊之处，这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当时刚结束的那场斗争中曾蒙受屈辱并被驱逐出权力机构。

然而，这个文件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这已由几个来源加以证实，其中包括布哈林本人^{*}。事实上，这个文件在布

* 关于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及其历史背景，见A.塔斯卡在意大利姜贾科莫·费尔特林内里研究所的报告，载A.奥塔沃主编《年鉴》（米兰，1966年），第889、893—894、897—898等页；《斯大林全集》第九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32—340页，《斯大林在1929年1月30日至2月9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莫斯科1954年版）第556—567页的决议；《托洛茨基文集〔1929〕》（纽约，帕斯芬德尔出版社，1975年）第67—73页，《右倾温和主义集团内幕》。

哈林和斯大林的斗争中逐渐起了作用。7月下旬，加米涅夫给季诺维也夫的这个报告，有一份被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拿到了，还有一份在那年初秋传到了流放在哈萨克斯坦的托洛茨基手里。1929年1月20日，显然出于托洛茨基的主意，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把这个文件作为地下小册子出版，引起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的极大愤懑。

这个报告流传很广，而且很快就落到了斯大林手中，他抓住这个把柄趁机向布哈林主义分子摊牌。在1月30日至2月9日继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派展开交锋，互相激烈攻击。斯大林的攻击，大部分就是根据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晤，认为这是布哈林违犯党纪、企图与信誉扫地的反对派分子结成同盟的明显罪证。由于这种虽属派别偏见却有事实根据的解释，这个从此受到压制的文件，就成了斯大林玩弄政治权术的可憎神话。1938年在布哈林审判案中，这个文件被列举为“右倾反对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集团”阴谋罪行的早期罪证。

从以上背景来看，这个文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是我们研究1928—1929年的重要原始资料。其中证实了布哈林集团及其支持者对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这些支持者甚至来自最上层机构——从乌格拉诺夫领导的莫斯科党组织、秘密警察（GPU，后称作OGPU，它的两个副首领亚哥达和特利塞尔都同情布哈林主义者），到斯大林看成是他的势力范围的政治局。文件从这方面反驳了那种认为斯大林的胜利不费吹灰之力、他那自上而下的革命实际上早已预定的说法。

首先，这个文件阐明了布哈林本人在苏联历史的重要关头所起的作用。作为反对派的领袖来说，他的弱点是很明显的——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和动摇不定，忽而失望，忽而盲目乐观，自拆台脚的策略，对形式上的反派别主义过于拘泥。然而，还很难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换上另一个政治人物就会改变这种结局。所有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都同样被斯大林击败了，而他们都是在这个或那个紧要关头表现了几乎相同的弱点。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或许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布哈林在与初期的斯大林主义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却表现了良好的思想认识水平。他比其他几个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都强，实际上，在他们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懂得1928—1929年真正意味着什么：“革命在危险中。”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仅仅把斯大林的残酷政策说成是官僚手腕，并且期待同他结成反对右派的同盟。布哈林立刻看到斯大林的新路线超过了以前争论的范围，认为“总的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另外，布哈林指明了斯大林在农村的政策是“对农民阶级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他在同加米涅夫谈话时以非凡的预见警告说：“斯大林的政策正在导致内战。他必将把反对者淹没在血泊中。”

布哈林正确地把斯大林（提出来为内战辩护的）凶杀理论，即“社会主义愈接近成功，阶级斗争愈趋激烈”的论调，看作是一种永久性的恐怖意识形态，“其结果必然是警察

国家”。

最后，布哈林已经认识到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曾经是列宁的继承者，现在成了套着枷锁的流浪汉。多年来他们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彼此分成了派别，大家都不愿寻求确实可能的妥协。其结果是斯大林掌握了权力，靠着这个权力，他可以变成成吉思汗来“把我们消灭”，实行一条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情愿的路线。布哈林对加米涅夫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他说：“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比我们以前同你们的分歧要大许多倍。”但是，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都仍然无动于衷。

布哈林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他对将来的预见也是正确的。然而为时太晚了。

1928年7月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晤

一、索柯里尼柯夫给加米涅夫的信

莫斯科，1928年7月9日

亲爱的列·波〔加米涅夫〕：

我们回莫斯科已好几天了——正好赶上开全会*。原以为会在这里遇到你。可你似乎还在卡卢加安然地袖手旁观。你是否早日来这里一趟？什么时间都行。我有事需与你商谈，请你见教。最近几天内能否来此片刻？事情至关重要。全会

* 1928年7月4—12日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看来明天就要结束，今天仍在继续讨论米高扬的报告。“战斗”正在爆发。如有可能，请用电话回答（3—49—24）。

祝你好。

格·索柯里尼柯夫

二、加米涅夫关于他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记述

星期三，7月11日上午9时

摘要：（一）情况已极端恶化；布哈林已同斯大林最后决裂。具体提出了撤销〔斯大林〕的问题。“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出卖了我们”。他们鉴于斯大林也作了让步，正在采取对我们更为宽让的态度*。（二）布哈林说过两次：“你们难道不了解我现在要放弃斯大林，争取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吗？”布哈林的境遇很惨，他最怕的是你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会说斯大林的路线正确。（三）他发誓说政治局里没有“四人”或“五人”小组**。（四）斯大林在全会上的演说：有两种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一种是地地道道的——主张“调整价格”***，还有一种是布哈林托洛茨基主义。为了发展工业“必需由农民交纳贡款”。米高扬也照样说：“剪刀差长期对

* 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均为九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苏维埃联盟的挂名主席加里宁的右派观点是尽人皆知的。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长时期的密友，而布哈林显然是以为农民军队中的动乱不安会使他倾向他们一边。

** 指早先布哈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派别斗争期间由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非正式的核心小组。

*** 在二十年代初期，“调整价格”意指国营工业产品的价格足够弥补生产成本并能为国营工业收回利润。在1928年7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指斥布哈林主义者提倡农业产品的“调整价格”——即以较高的粮食价格诱使农民的剩余物资返回交易市场。

我们是有利的；剪刀差不能缩小”。（据他们说托洛茨基也想要缩小剪刀差*。）索柯里尼柯夫在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莫洛托夫说：“中农已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他们跟我们不和的原因”。（五）布哈林的回答：贡款理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规律”**没有任何不同之处。托姆斯基的回答：“如果莫洛托夫是对的，我们的前景又是什么呢？你们要的是没有耐普曼（“耐普曼”，音译。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编者注）、没有富农或享有租让权者的耐普；可那是办不到的。”李可夫把卡冈诺维奇驳得体无完肤。结论是：斯大林的路线将会失败。布哈林处境很惨。不要赞扬斯大林。可以和你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共同拟定一个积极的纲领。布哈林要想亲自来谈一谈。一个排除了斯大林的集团。

加米涅夫：为什么他们还是一事无成呢？

索柯里尼柯夫：对他〔布哈林〕来说，你们还是X和Y，是未知数。斯大林在散布谣言，说他可以任意支配你们。

三、加米涅夫关于他同布哈林谈话的记述

（7月11日上午10时）我到达后一小时，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没叫门就进屋来了，索柯里尼柯夫是快谈完话前走

* 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与较低的农产品价格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图解法把这种差异描绘成一把剪子的两片张开的刀身。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派的第一流经济学家。他在1924年宣布了这条“规律”。他解释说，苏维埃国营工业的迅速发展，只有靠剥夺农民私有经济成分，也就是从那里获取剩余价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倡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而在两种经济成分间实行“不等价交换”。

开的。他〔布哈林〕的样子很苦闷，非常激动地谈了一个小时，我没有打断过他的话。他说（这里记录得尽可能准确）：

“在讨论到主要问题之前，我先要澄清两个谣言：（1）并没有给〔你们〕分配四到五个表决权，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2）季诺维也夫的文章要点是斯大林不顾我的反对亲自口授的，算是同莫洛托夫谋求妥协，莫洛托夫极力反对发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现在来讲主要问题。

“1.在中央委员会内和党内，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免不了要把你们（也许还有托洛茨基分子）拉进来扮演决定结局的重要角色。

“2.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发生我还不知道。也许还不会很快，因为双方都在用机警的目光瞧着你们。不过无论如何，出不了两个月时间。

“3.所以我希望你们认清这个形势。我知道（假定）斯大林主义分子也会来找你们。当然，你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也会利用这个形势来‘下赌注’。不过我并不怕。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路线，而我是希望你们了解这次斗争是怎么回事。”

4.我〔加米涅夫〕：“真的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吗？”

布哈林：“这正是我要同你谈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

*这两点是指政治局讨论恢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某种职位的问题。一部分代价是要由季诺维也夫写一篇悔过的文章登在《真理报》上。布哈林是该报的主编。

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比过去同你们的分歧要大好多倍。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一致明确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现在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请到政治局里来，代替斯大林，情况就会好得多。’我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很公开地讨论了这一点。我已经好几个星期不跟斯大林讲话了。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样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刻要搞掉的是什么人。在政治局‘七人’小组里*，我们同他争论时竟说出‘你撒谎！’‘你胡说！’这样的话来。他现在对我们是作了让步，为的是以后再杀我们。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他要这个手腕不过是为了把我们弄成分裂者的样子。这次会议决议所以能得到一致通过的原因是，斯大林不承认他赞同莫洛托夫的讲话，而对我的声明，表示十分之九都接受。我是把那个声明紧捏在自己手里，当着‘七人’小组宣读的。（那怕是最小的文件也不能交给他们。）他现在的目的是要把《莫斯科真理报》和《列宁格勒真理报》从我们手中夺走，用卡冈诺维奇代替乌格拉诺夫。乌格拉诺夫完全是我们一边的。至于说到斯大林的路线（按他自己在全会上所说的），有如下几点：（1）资本主义过去是靠掠夺殖民地、借外债或剥削工人发展起来的。我们没有殖民地，人家也不会借债给我们，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以农民的贡款为基础。（你知道这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是一模一样的。）

* 指政治局高级成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几个人在当时进行会辩、表决。其他两名政治局正式委员古比雪夫和卢祖塔克没有参加。

(2) 社会主义愈是向前迈进，反抗愈是强烈（见决议中的提法）。这简直是愚蠢无知。(3) 既然交纳贡款是必要的，而反抗又注定要增强，这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自我批评不该触动领导人物，只可以碰一碰那些执行政策的人。而事实上自我批评已经指向了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是警察国家。人们岂不要问：“究竟是谁在说自家人的坏话？”事实上，革命已在危险中。依着他的理论，一切事情都会弄糟。然而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却在遵循一条右倾路线：他把共产国际挪出克里姆林宫；是他主张沙赫特事件不处决任何人（我们表决时反对）*；而且在所有的谈判中，他都倾向让步。托姆斯基说得很明白：我（托姆斯基）在国际问题上比你（布哈林）右三十公里，可是我（托姆斯基）比斯大林还左一百公里。他的路线是灾难性的，可是他又不给任何人讨论的机会。他设置种种圈套，指控人们搞背叛。他在演说中断言“只有大地主才会这样想”，他是字字针对乌格拉诺夫演说中的一段话讲的。他要掐死我们。”

5. 我：“你们的实力是什么？”

* 1928年3月，保安警察宣布在顿巴斯工业组合沙赫特矿区破获一起涉及技术专家和外国政府的反革命阴谋案件。有五十五人被指控犯有阴谋破坏和叛国罪，其中许多人已经供认。而沙赫特事件全部真相及其审讯情况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斯大林却利用这个事件来否定布哈林的阶级调和政策，诋毁李可夫的国家机关管理工作和托姆斯基的职工会领导工作的信誉。这个事件在1929—1930年斯大林对非党知识分子进行袭击中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原始罪行指控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但他们为了限制事件的扩大化，在政治局内作过艰巨的斗争。

布哈林：“李可夫加托姆斯基加乌格拉诺夫（百分之百的）加我自己。彼得格勒一般是拥护我们的，不过，一看到可能要撤换斯大林，又吓住了，因为科马罗夫已表示并不赞同斯捷茨基的演说；可是当晚乌加罗夫又特意为科马罗夫来向我道歉*。安德烈也夫是赞成我们的，北高加索正要把他撤换掉**。斯大林已经把卡冈诺维奇从乌克兰调出来换取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但是（1）一般中央委员还不了解分歧的严重性，而且（2）这样的中央委员特别害怕分裂****。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非常手段这个问题上依从了斯大林的缘故，这使得我们更加难于向他展开进攻。我们不想要当分裂分子，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掐死我们。不过托姆斯基在他最后一次全会上的演说中，公开地指出斯大林是分裂分子。亚哥达和特利塞尔是我们的人。已经有一百五十起农民暴乱。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最后关头出卖了我们。我认为斯大林对他们控制得非常紧。我们的任务是逐步说明斯大林的危害作用，说服一般中央委员，使他们认识到撤换他的必要性。政治局是我们的。”

* 列宁格勒（原名彼得格勒）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团包括科马罗夫、布哈林主义分子斯捷茨基和托姆斯基在职工会的同僚乌加罗夫。

** 安德烈也夫，北高加索区的党的领导人，实际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并未被撤换。

*** 卡冈诺维奇或许是斯大林手下最能干而又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在任乌克兰党的总书记期间，他的三年暴政触犯了乌克兰本地首领。

**** “一般中央委员”这个用词，在这里可有几种含义，可以指每一个中层的或持中立态度的委员。

6.我：“可是到目前他还在想搞掉你们。”

布哈林：“我们有什么办法？关于撤换他的事此刻在政治局还不会通得过。我有时候自己半夜在想，我们有权利保持缄默吗？这岂不是缺乏勇气吗？然而经过深思，我知道要谨慎从事。李可夫要在星期五作报告，在那个报告里我们将会讲得很详细。我打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批文章。想让全党了解斯大林究竟在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这也许还需要再一次战斗。”

7.作为补充，〔布哈林〕透露了许多关于“七人”小组的情况。语气中表露出他对斯大林充满敌意，已经同他完全决裂。然而，究竟是公开传出去呢还是不公开传出去呢，又是犹豫不定。“如果我们这样做，他就会拿出禁止分裂活动的条例来掐死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用小花招把我们弄死。除此之外，如果十月份弄不到粮食，他还会把过错推到我们身上。”

我：“可是他们打算靠什么弄到粮食呢？”

布哈林：“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再出现困难，他就恢复非常手段。然而那是战时共产主义**，必然是死亡。”

我：“你的办法呢？”

布哈林：“也许需要设法采取一种更为长远的策略，以便

* 1921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根据这个禁令，早先的反对派分子曾受到严厉的处分甚至被开除出党。

** 指1918——1921年俄国内战时期征用粮食的手段。

同中农讲和。你想要撵走多少富农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不和中农谋求和平。然而在斯大林和那个笨蛋莫洛托夫（他竟想给我上马克思主义课；我们管他叫‘草包’）的指挥下，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8. 我：“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

布哈林：“斯大林吹牛说他能随意支配你们。你们的人（朱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到处都在串连起来支持斯大林。这就很糟糕。你们当然可以决定自己的路线，不过我请你们不要用赞扬他的话来帮助他消灭我们。斯大林很可能要设法同你们接触，我希望你们能了解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9. “没有必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这次会晤。不要在电话里跟我讲话，因为我的电话有人窃听。格柏乌在我后面盯梢，也正在监视你们。希望我们经常互通消息，但不要通过秘书或中间人。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我跟你谈过话。你也不要告诉别人。不过请你叫你们的人不要攻击我们。”

10. 我：“斯大林给你看过季诺维也夫的备忘录吗？”

布哈林：“没有。我这才第一次听说。”

我：“他们要利用我们做什么呢？”

布哈林：“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不跟我们讨论这些事。斯大林也可能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你们’，也可能委派你们那样那样的职位，以便先把你们调来再说。再见。最近几天我要忙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能来看你。总的来说，我们必须严守秘密。”

我事先安排过索柯里尼柯夫在我离开以前再过这里来看

看。

我把你的（私人）信交给了〔布哈林〕。他读了你的信说，他怕白纸上写黑字。他怕写成文的东西会惹起麻烦。最好是亲自来谈谈关于纲领的问题。

布哈林：“斯大林在好些地方把我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弄糟了。”“他自己想要在全会上作关于这个纲领的报告。(!!!)我无法摆脱他。他极力想要人家承认他是个理论家，他以为这就是他唯一缺少的东西。”

除此之外，就是许许多多的琐事和细节。他〔布哈林〕心神极度不安。他的嘴唇不时地神经质地抽搐着。有时给人一种恶运就要降临的印象。我的想法是，现在不论如何，要看那边阵营发出的信号。我们必须冷静地等待。这是肯定的。因此你现在就不必到这里来了。我们要看他们怎样说。明天上午八点钟来电话给我答复。

7月11日下午6时

旁注：这全是乞怜。我找不到其他的话来形容；当然是从政治上来讲的。

四、加米涅夫对布哈林的谈话所作的补充记述

7月11—12日晚

1.总的印象，几乎全都是一种命运感。他自己的讲法：这一切是否自找烦恼？我有时对耶菲姆说：“*事情岂不是绝望了吗？（一）如果国家毁灭，我们也就毁灭。（二）如果国家

* 布哈林当时正在着手草拟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 文件原注：耶菲姆·蔡等林是布哈林的秘书。

脱了险，斯大林立刻会掉转身来对付我们，我们还是要毁灭。怎么办？遇到这样一个对手有什么办法？一个成吉思汗式的人物；中央委员会的文化水平又低。

2.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论退出武汉政府*。

3. 斯大林告诉共青团员们说：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途径，取决于布哈林是否停止他的错误政策**。

4. 假如我们着手讨论，他们就会消灭我们。中央委员会就是怕讨论。

5. 假如我们——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联名提出辞职又会怎样呢？

6. 假如我暂时——两个月内——不被撤职，我也不应该缠身在例行公事里。要是出现了紧急情况，我就毫无顾虑地说出来，彻底公开地说出来。

7. 我们不能发起讨论，因为那样做就会立刻演变成武装冲突。我们负什么责任？我们会说，有人使我们国家陷入了毁灭和饥饿。而他也会说，他们在保护富农和耐普曼。

8. 党和国家已经完全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全部不幸。

9. 斯大林除了抓权，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向我们让步，就把握住了领导权这把钥匙，他把住了这把钥匙，以后就好

*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曾于1927年4月突然对他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其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武汉（汉口）成立了主张独立的左派国民党政权。共产国际对中国内战的政策，曾经是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同左派反对派在1927年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 斯大林解释说，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工业政策和职工会政策使青年人丧失了就业的机会。其目的是寻求共青团的支持。

把我们消灭。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在中央委员会内，撤销斯大林职务的主观条件虽然正在成熟，但还未完全成熟。

10. 索柯里尼柯夫：采取一个比较主动的政策，要求至少把莫洛托夫撤掉。

11. 斯大林只懂得一种方法——报复，他用暗害的手段来报复你。我们要记住“惬意的报复”这种理论*。

12. 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并不是身披胄甲的武士**。他以前经常来看我，痛骂斯大林，可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却出卖了我们。

13. 通过全会决议的经过和〔政治局内〕的斗争。（一）我要求对全部政策进行全面讨论。斯大林表示反对，说有一个工业财政计划是必要的，等等。（二）我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全面讨论，斯大林来见我说：“我的朋友布哈林，你真能使牛劲蛮干。”可他总还是不同意讨论。（三）我给他写了第二封信——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开始就说：“你和我喜马拉雅山，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四）我们去“七人”小组，一个难堪的场面。他向着我喊叫起来。我引用了他关于喜马拉雅山的说法。他气得大喊大叫：“你说谎！你捏造事实让政治局反对我。”我们分道扬镳。（五）我宣读了二十页的声明，不让讲稿离手。莫洛托夫扬言说这是一个反列宁主义、反党的

* 1922年，斯大林同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在酒后闲谈时曾这样描述他生平最爱好的事：“最大的乐趣是留心你的敌人，作好一切准备，彻底报复一下，然后就去睡大觉。”见罗伯特·C·塔克尔著《革命的斯大林》（纽约：W·W诺尔敦1973年版）第211页。

** 奥尔忠尼启泽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管理委员会主任。

文件。斯大林说：十分之九我都可以接受。莫洛托夫走开了。就以这个作为依据，我出去写决议。他们也去写决议。意料不到的是，他们拿进来的一份决议是从我的声明中剽窃下来的。我作了三处更正；托姆斯基作了一处更正。这个决议全部一致接受了。斯大林的想法是这样：我用非常手段弄到了粮食；在关键时刻我又打开了新局面，并且由我自己写出了这个决议。如果再需要采取非常手段的话，我还可以单独去干。可是事实上，他是要把我们带到毁灭的地步。

14. 报告将由瓦尔加来作*。因为斯大林不要李可夫做。这个报告怎么作法我还不知道。瓦尔加会辩解说饥荒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15. 在共产国际，塞末耳德是赞成斯大林的，还有台尔曼是赞成斯大林的。埃弗特并不是个右翼共产党人，可是他们正在把他逼成右翼**。

16. 斯大林违反政治局（“七人”小组？）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要把弗鲁姆金的来信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并起草一封回信的***。还没等到那样做，斯大林就自己写了回信发出去了。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申斥他违反决定的行为。斯大林说：“这封信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只不过不够全面。我不能让事情拖延下去。”

* 瓦尔加，著名经济学家和共产国际官员。

** 塞末耳德，法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和埃弗特，德国共产党领袖。

*** 1928年6月15日，财政副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给政治局寄去一封信，信中以凄凉的笔调评价了斯大林的农村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并请求布哈林提出补救办法。

17.在这个时刻,或在另一个时刻,〔布哈林〕对斯大林说:“不要以为政治局仅仅是总书记下面的一个议事机构。”

18.斯大林的政策正在导致内战。他会把反叛者淹没在血泊里。

索柯里尼柯夫(接上布哈林的话说):在一次酒会上,托姆斯基完全喝醉了,倚着身子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工人很快就要枪毙你。”

五、索柯里尼柯夫的讲话如下: (加米涅夫记述)

7月12日上午11时

从关于集体农庄的辩论中,只看出以下一段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作了一次粗野的骂人的演说反对托姆斯基:“我非常惊讶地听了托姆斯基的演说,托姆斯基认为我们除了向农民让步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这是投降主义,是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的信心。假如中农要求向外国垄断贸易让步,或者要求农民联邦那又怎么办呢?也让步吗?那是投降主义。我们需要依靠的是国营农场,依靠的是我们在贫农中进行工作。”他的皮肤黑黑的,脾气古怪,爱报复,怒容满面,一副冷峻逼人的神态。现在大家都了解,不仅布哈林在进攻,斯大林也在进攻。他的演讲粗暴得令人惊诧。

索柯里尼柯夫对全会的情况表达如下:李可夫发动了进攻;斯大林回击。彼得格勒人动摇不定,不赞同斯捷茨基的发言。布哈林自己掘了一道战壕,但一枪未发。莫洛托夫发了火,对着《真理报》炮弹齐发(特别是对准阿斯特罗夫,总的是对准《真理报》的‘片面性’,给克律茨曼的文章加上脚

注等)*。然后是托姆斯基攻击莫洛托夫，只不过方式上温和些。斯大林最后公开粗暴地攻击托姆斯基。

(乐舍夫译自美《异议杂志》1980年第26卷第1期)

*阿斯特罗夫是布哈林的一个年轻拥护者，是他手下的《真理报》副主编。阿斯特罗夫给经济学家克律茨曼写的一篇文章加上了批评性的编辑部按语，那篇文章是称赞斯大林在农村所采取的强迫手段的。

布哈林社会学中的 哲学思想和科学实践*

〔美〕拉斯·维加斯**

鉴于“新经济政策”实施、列宁逝世、托洛茨基下台和斯大林获胜这一发展过程，斯蒂芬·科恩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史上最关紧要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①。这一时期动乱不宁，充满了政治与经济的矛盾，真可与苏联最近的发展动向相比，正如摩西·莱文所说：“有关六十年代及其后的经济辩论文献资料，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模式成绩的估价，以及对改革的评论和建议等等，在论题、用词和表达方式上都与二十年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与二十年代一模一样。”^②

在二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或许就是尼古拉·伊·布哈林。众所周知，当时他经常在许多问题上同列宁

* 本文载于英国《苏联思潮研究》第21卷第2期(1980年5月)第141—174页。——编者注

** 作者是内华达大学的哲学教授。——编者注

(1920—1921年为工会问题辩论)^③、同托洛茨基(1923—1927年)、同斯大林(1928—1929年)发生冲突，他们三位先后都是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但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却肯定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④。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是公认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发言人^⑤，他同时还担任党中央委员、《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等重要职务，并参与列宁著作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不仅如此，谁都不能忽视他在二十年代之前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曾影响到列宁的思想，或者说早已提到列宁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他于1914年^⑥写成并于1919年^⑦初次发表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以所谓边际效用概念为基础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进行了批判，这本书在俄国被公认为“对奥地利学派作了明确阐述，可用作教育院校的基本教材”；据说，在这些院校，“谁若不重讲一遍布哈林同志的论点，这问题就无法解决”^⑧。他于1915年^⑨写成并于1918年^⑩初次发表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先于列宁并影响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专著；列宁也曾公开表示了谢意”^⑪。即或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与布哈林写于1916年、初次发表于1925年的题为《论帝国主义国家》的专著确有上述的关系^⑫。1919年，布哈林参与主编《共产主义入门》一书；这本党纲普及教材是“最著名的，早在斯大林阐述布尔什维主义之前已广为流传”^⑬。1920年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引起广泛的争论；列宁虽有一些保留看法，但“对书中关于‘战

时共产主义’的部分予以高度赞扬”^⑨，对全书也“基本赞同”^⑩；而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列宁的评价被歪曲了^⑪。

最后，即使在政治上被斯大林击败，并于1929年基本上丧失了权力和地位，布哈林仍然表现出惊人的活力：他是科学院的成员，一度担任研究院协会主席和《消息报》主编，并且是1936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就是斯大林“大清洗”高潮时，他的悲剧性结局也是很有意义和引人注目的。他虽受到审判并被处决，但这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刻，因此，阿瑟·凯斯特勒写成了纪念他的小说《正午的暮色》，麦尔略·旁特也为他写了《人道主义和恐怖》，他们都描述了这一情节。罗伯特·塔克甚至说，布哈林的言行相当于反审判行为，即对斯大林背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次成功的起诉^⑫。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部社会学体系》是布哈林最著名的著作*。这本书初版于1921年，1922年译成德文，1925年译成英文，1927年译成法文^⑬。还在1923年，乔治·卢卡奇已写了著名的书评^⑭；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⑮中有更全面的评述。近些时候，由于研究布哈林的兴趣增长，此书再版，已收在《安阿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中^⑯。有一个激进派刊物^⑰还对它再次进行了批判。后起的布哈林传记作者科恩，选出这本书作为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哈林政策之间关系的最有意义的说明^⑱。

* 布哈林这部著作的原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编者注

大部分社会学家对此书持赞同态度，西摩·马丁·利普赛特曾经强调指出，“这本书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注意。它显示出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正在兴起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相妥协的有意识的尝试”^④。阿尔弗雷德·G·麦耶认为它是“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所作的最初尝试同现代苏维埃共产主义理论手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之间的重要里程碑。在三者之中，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正统‘共产主义最文雅和精确的论述’……它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个有条理的、深刻的、甚至是现代的社会学体系，确实，布哈林取得了杰出的成就”^⑤。

自然，这些评价没有同时附有社会学方面的解释，但作为社会学家的直觉判断，则不能被忽视。

二

任何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再评价，都必须注意过高或过低地估价所引起的两个难题：前者偏重于研究哲学上机械论同德波林学派的争论，后者偏重于研究政治上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再者，即使二中择一，研究上也必须注意区分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⑥。

关于机械论的争论涉及到二十年代为俄国所广泛注意的哲学的内在有效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性问题，这场争论包含有实证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等因素。机械论为阿勃拉姆·德波林的继承者所批判，他们反对那种包括辩证

法、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学说。政治上的争论则涉及这类问题：工业化步伐，管理农民方式，世界革命事业。布哈林主张一般有节制的、有组织的、不断发展的渐进途径，被认为是党内“右翼”的领袖。托洛茨基主张一种激进的、革命的、自发的途径，被看作左翼的领袖。斯大林原先同布哈林结盟击败了托洛茨基，然后又用托洛茨基的观点反对布哈林，直到一九二九年，斯大林一直在设法战胜布哈林。

疑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哲学章节来看，他可能被划成机械论者，而书中相当于社会学理论的部分，则可能被看作为“右倾反对派”提供了1921—1929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再者，政治的和哲学的辩论恰巧都结束于1924年4月；哲学界的辩论，是在第二届全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大会上^②，以正式否定机械论而结束的。恰巧说布哈林著作中有机械论和右派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即在1929年，党内右倾反对派和机械论者皆被击败。因此，大卫·乔拉夫斯基和科恩称这种巧合为“传奇”^③。这正是那种认为哲学上的机械论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有密切历史联系的观点。乔拉夫斯基已经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历史联系的谬误^④，他的观点被科恩继承，并用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虽然布哈林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纲领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但更应强调的是这种联系“模糊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真正要旨所在”^⑤。科恩认为布哈林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布哈林——同苏联二

十年代其他‘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指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反对当代西方思想成就并与之竞争的思想体系。”^⑧

确实，在科恩著作的这一章之前，他引用的就是布哈林的名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静止不变，那才是咄咄怪事。”^⑨

虽然科恩的解释是深刻的可以接受的，但他却没有对那种认为布哈林的政治纲领衍生于他的机械论的观点作恰当的评判。他主要是指出：（一）来源于1929年后批判布哈林的斯大林主义者^⑩，（二）“简单地把他的社会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公式化了”^⑪，（三）部分地还基于早已为乔拉夫斯基所驳斥了的那种“传奇”^⑫。但是，非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如卢卡奇（在1923年）和葛兰西（在狱中）*都持这种观点，可见这种观点并不简单，它有着特殊的根据。

这种观点并非简单化的，它可以系统地表述为这样一种观点：布哈林的机械论和实际政策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也不限于逻辑推演，而是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方法论方面的联系。他的社会学理论是其机械论和政策之间的分界；这样，我们就看到两种联系：或多或少的从社会学到政策的逻辑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科恩在内也无人否认^⑬（虽然科恩的重点不在于此）；再就是更会引起争议的从机械论到社会学方法论上的联系。关于后一联系，即是说，布哈林的社会学理论在

*这里指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编者注

方法论上来源于他的机械论，这种联系归因于他信奉机械论的方法论，从布哈林书中的两个部分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另外，也可从卢卡奇的权威性著作中找到根据，他的著名的书评对它有系统的明确的阐述，葛兰西对布哈林的评论也暗示过这一点。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这种方法论联系的可能性。考察葛兰西的评论和卢卡奇的书评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他们本身的论点也是错误的话（我就要揭露这一点），那么直接考察布哈林著作的两个部分就尤其必要了。

三

我将从分析葛兰西的批评开始，因为它的中心问题将直接导致对卢卡奇观点的鉴定，葛兰西的评论见于《狱中札记》第十一卷第二部分^①。必须记住，这些笔记是在狱中难于进行学术研究和探索的条件下完成的。然而，相对说来，对布哈林的评论是书中组织得最好和最精彩的部分。《札记》本身也值得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在其他地方做过这一工作^②。这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此我将考察纯批判性的葛兰西的评论。

如上所述，葛兰西只是暗示布哈林的机械论同其他社会学方法论有联系。葛兰西的批判包括对教学法问题^③、哲学形而上学^④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修辞学^⑤等方面的异议，但他的批评主要还在于方法论意义上。他争辩说由于使用了机

械论这个站不住脚的、实证主义^④的科学概念，布哈林的著作是非科学的。这样，如果这种批评是中肯的，葛兰西就必须假定布哈林的科学概念的错误使其具体的社会学理论失去意义，并且由于失其意义，这些理论必然是错误概念的结果。换句话说，葛兰西的批评是假定错误的机械论“科学”概念先天存在于布哈林的社会学推理之中^⑤。无论如何，葛兰西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书中的哲学章节，但偶尔论及布哈林社会学理论的具体观点时^⑥，他或者是以现实和实际的理由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来怀疑布哈林是否恰当，而不是在方法论上有所依据。这就是说，葛兰西的主要批判，是同布哈林著作中的哲学部分直接联系着的“哲学”，而如果要在其他方面纠正他对布哈林科学理论的批评方法，那决不是在他的科学实践方面，而是在他的社会学推理方面。概括说来，葛兰西推测布哈林的机械论同他的社会学之间有方法论上的联系，但未能加以说明。

葛兰西的这种批判，我认为是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一致的。他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⑦，使得他对布哈林的所有批判化为一体，其主要概念之一就是整体和实践的统一性。这种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对葛兰西来说，从整体世界观上看是文明和文化的基础^⑧，因此，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应当适用于“批判”，——它也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具体领域；或者，至少是葛兰西式的批评家，应将它应用到自己的批判实践中去。然而，怎样进行这项工作呢？

首先，在这里，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在概念上就不能

理解为理论和实践是等同一致的，因为这样的理解一定无从区别二者，而无区别也就无所谓统一了。应该确信，区别不应是抽象的分离，而统一更不是概念的混同。同样，所谓区别也不是在经验主义意义上而言，例如将饮食、做工、政治斗争和其它一些活动归为实践一类，而将思想、哲学推理等活动归于理论一类。人们会说，概念区别必须表达为“辩证”的区别，而“辩证”一词也就这样被滥用了；这一表述很容易驳倒，不过是赞成者随使用词，而反对者又使问题更加混乱和模糊不清。我相信，在逻辑上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区别，同结论和前提之间的区别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正如一个命题除非同一定的前提相关就不能是结论一样，反过来，理论和实践也是互相限定同时存在的；又如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可以是另一争议的前提——在一处是前提而另一处是结论一样，对一项活动来说是理论的东西，对另一项活动来说可能是实践。比方思考社会现象，这对社会活动来说显然是理论问题，但与一项哲学推理相对而言，它又有实践意义。

将这种观点用于批判的实践，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评判一种特定工作时，应将理论和这项工作中的实践区分开来；要检验它们的综合程度，避免无批判地假设它们是一致的；要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评判所涉及的理论、实践和综合的函义；还要谨慎地避免将我们的理论批判置于来自实践的证
据之上，又将对实践的评判置于来自理论的证据之上。

现在可以看出，葛兰西对布哈林著作的教学法方面的批判，部分地来源于他在哲学上认为实践是关系到普及哲学的

“理论”成就的，因此，对布哈林著作中这两方面的综合作了批判。他还批判布哈林的社会学实践又关系到写作初级科学教材的“理论”目的；这里，错误就在于对一个引起争论的学说作此明朗的解释是不适当的，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上的错误。

葛兰西在哲学上有什么批判呢？据说布哈林某些方面的活动是教条主义，过于简单化的唯物主义，因此，他的活动就受到了葛兰西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影响。然而，在理论上，布哈林却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因为他认为形而上学无异于思辨的唯心主义。这里就出现了矛盾。

其实，布哈林根本不理睬葛兰西那种柯罗齐*学派的历史哲学理论（把历史和哲学“等同”起来）。这里并不存在布哈林的“哲学理论”是否和实践相一致的问题。可是，葛兰西在批评时仍追问道，布哈林的“哲学”实践是否在事实上同柯罗齐的理论一致，也就是质问布哈林著作中同历史哲学观念有关的实践方面是否同这种观念相一致。我们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否则就会冒险将实践的批判置于来自理论的证据之上，甚至于断定布哈林实际上未能完成有着正规特征的某种（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因为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观念。我认为，这是不能否认的，如果说布哈林企图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那也就是在柯罗齐学派的意义上企图把哲学和历史综合起来。如果是这样，那末布哈

* 柯罗齐的中译名也有译为克罗齐的。——编者注

林的实践就成了柯罗齐的了！

人们不应当误解这个结论。指出布哈林书中的研究实践从整体来看有某种哲学的正规形式，并不等于说他力图使之具体化的哲学就是葛兰西想要具体化的那种哲学；比葛兰西再过分一点，那必然是柯罗齐的纯理论唯心主义。但正如葛兰西承认柯罗齐成果的正规特征一样，也没有充分理由能正式否认布哈林在这方面的成就。或以为承认某种成果，似乎就是承认其特性，这也是错误的。事实上，我认为，正是葛兰西自己毫无批判地造成了这个“等式”，因为他以为成功地批判了布哈林的社会学理论，似乎布哈林的哲学形而上学和抽象的方法论观点也就可以否定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评述葛兰西的方法论批判时还要详细讲到，现在让我们先转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修辞学问题的批判上来，这比较容易解决。

葛兰西关于马克思主义修辞学的批判认为，布哈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意识，同他实际接受的过去的保守传统因素——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同样也没有一致性。再者，他实际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性，这使他既不能达到理论目的，也不能认真接受马克思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至理名言。

现在来讨论葛兰西最重要的方法论批判。这里，情况变得复杂化了，因为葛兰西看来是按照一些方法论原则，发现布哈林的某些错误，借以批判布哈林的科学实践。例如说布哈林大概不加鉴别地模仿自然科学来创造他的方法，错误地推理和使用概念，否认先前成就，树立假敌，对它采取不公

正态度等等^④。据说，同布哈林认为科学进步取决于科学工具的观点相对照，这些也算是“功绩”；原来是葛兰西自己企图否定上述观点，他这种批评既不中肯，也不公正^⑤。

试看一下葛兰西所指责的布哈林原著这段文字，我们发现，布哈林在方法论上引起反对之处，一般都不在布哈林的社会学分析上（这本是他的科学实践）。例如，所谓推理谬误，是指布哈林对斯塔姆勒尔的目的论作了批判（第一章）^⑥；所谓曲解概念，是指以为内容和形式等同一致的唯心主义观念——康德的目的论概念和“物质”的一般概念^⑦；所谓对假敌强辩和不公正，则主要指布哈林对前辈哲学家的一般态度^⑧。对这种方法论批判，可以归纳起来说了。葛兰西并没有真正论及布哈林的科学实践，而主要是指布哈林的科学理论。这样，按上述既定的批评方法原则来看，人们就不能断言布哈林的科学实践同他的哲学一样是不适当的。它或许有不当之处，却也不该用理论不当来证实，除非我们假定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这正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何况从布哈林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学，“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看，确有证据说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似乎也不存在。这意味着对布哈林科学实践（他的社会学理论）的批判仍待完成。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我们将考察一下卢卡奇对布哈林著作的评论，因为正是他提出了这个具体的方法论批判上的难题，虽然我们也将看到，他并未解决问题。

四

卢卡奇对这本《读本》*的评论**最早见于此书出版后几年的一份德文刊物，1966年译成英文，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①。它基本上是一篇书评（长八页），篇幅有限，不可能涉及书中多少细节^②。我将把重点放在他对“书中方法论错误根源的论证”上^③，为求得全面了解，对其他部分也作一点简介。

卢卡奇认为“作为一部教材，这本书可喜地达到了它的目的”^④，“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归纳到一种完整的、系统的解说中去，这方面是成功的，这部解说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⑤。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卢卡奇怎样强调本书“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

本书是一份普及读物，卢卡奇指责它不该写得那么容易引人误解，而且有些提法过于简单化了；布哈林还没有“达到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已达到的水平”^⑥，他们的著作证明，通俗的说明同基本的科学方法可以取得一致^⑦。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卢卡奇发现这本书或许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既有唯物论，又有决定论。前者“令人感到很接近于马克思贴切地称之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那种东西”^⑧，因而此书“往往模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特征，即认为

* 《读本》指布哈林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编者注

** 卢卡奇的评论，见本《译文集》。——编者注

一切经济现象或‘社会学’现象都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⑧。卢卡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批判决定论的语录来驳斥布哈林的决定论，还说明不是为了驳斥来引用这些权威性观点，而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指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传统”^⑨。

卢卡奇集中批判了布哈林关于技术发展决定着社会发展这一基本观点和他的社会学方法论^⑩。对于后者，卢卡奇讲的并不十分明确（我不久将使之明确），但显然说它是适合于布哈林技术决定论的方法。由于卢卡奇认为这种技术决定论是完全错误的（这也许是他书评中最有兴趣的争论），他断言布哈林的方法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一般说来，卢卡奇在方法论上的批判，既有趣而又有根据，我已经在别处探讨过这种争论方式，指出它对于历史学^⑪和哲学^⑫都有重要意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1）方法步骤同实际结果应有所区别；（2）论证一个根本观点上的严重错误应有切题的论据；（3）如何鉴别和表述批判中实际所运用的方法；（4）如何评定这种在根本观点上犯错误的方法；（5）结论：这种方法为什么是错误的。

但很不幸，卢卡奇的论证归于失败；他主要是在上述方法论的第四步失败了，其第三步也有问题。在第四步上，他不仅缺乏根据，而且还与自己在别处的方法论的论述有矛盾。

在目前这场争论中，卢卡奇对技术决定论的驳斥（上述第二步）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他争辩说，技术决定论颠倒了

因果关系，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决定着技术发展的。但他也小心指出，他并不否认技术的重要性，并不否认它同社会经济结构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只是否认技术在历史和方法论上的第一性作用。卢卡奇一开始就指出，布哈林对库诺的自然主义的批判正好适用于对待他自己的技术主义^⑤。库诺认为，技术装备受自然条件约束，具有一定的原料对于具备一定的技术装备具有决定性意义；布哈林反驳说，库诺把原料同劳动主体混淆起来了，却忘记必须有相当的技术装备，自然界的影响从物质前提的意义上说，本身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其次，卢卡奇指出，同中世纪社会相比较，古代社会技术发达而劳动组织落后，因而不能用技术决定论来解释由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因为：

“古希腊罗马社会崩溃的同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原因之一，当然就是它无法维持它的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对无穷无尽的奴隶资源的使用过于浪费。”^⑥

而且，因为“中世纪的社会组织产生于完全不同环境（缺乏劳动力，等等）”^⑦。卢卡奇的第三个论点是：技术决定论甚至不能解释由封建主义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因为正如马克思强调的，由行会生产到手工工场生产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而并不伴有技术的发展，但它却是大规模市场形成和机器发明的首要的先决条件。

在卢卡奇看来，布哈林基本观点的错误源于他方法论的错误。但正是这个前提还不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方法论？卢卡奇把它形容得很复杂，说是拜物教，令人难解的诡辩，

错误的客观性^⑳和自然主义^㉑，“把辩证法变成一门科学的企图”^㉒，探求一种普遍的社会学，象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专心于自然科学^㉓，偏心于自然科学^㉔。从卢卡奇对布哈林错误之处所作的方法论解释中或许能得到一点根据，但我将在下面指出，卢卡奇并无根据；重要的是他竟然断言：“对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探讨，突出了难解的怪论和虚假的‘客观性’的其余方面”^㉕；又说：“布哈林摇摆于不同结论之间……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关于技术的优先地位的基本上不正确的理论，只是布哈林企图创造一门一般的社会学的实际结果。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疏忽，而是肤浅的前提的必然结果。”^㉖

对于卢卡奇这第四步论点无须再作详细论述，不过我应指出，这里毫无理由说布哈林因为上述方法论而犯了错误。相反，我们发现一种理由，可指出上引方法论论述有一方面是根本错误的，而一系列对布哈林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的评述都不妥当^㉗。试看一下，就在上引方法论这段论述的同一页上，竟然出现前后矛盾的见解；卢卡奇说：“布哈林对自然科学的倾向同他往往很敏锐的辩证本能在这里不可避免发生矛盾……他对他的理论的应用往往比理论本身要好得多……他幸而经常在他的具体分析中忘记他的理论前提……结果是，他的结论往往违背他的出发点，非常有趣。”^㉘

照此看来，布哈林的论证结果还是很有价值的，虽说他有些理论上假设；至于说他由于他的方法论造成错误的技术论，却没有理由来说明；这样，比较恰当的结论是卢卡奇在方法论上的争辩可以一笔勾销了。

如前所述，对那种认为布哈林方法论并无可取之处的论调，我们也有独立的“理论”反驳理由。然而，这需要在本质问题（技术论）上作出可靠的批判。换言之，尽管有所暗示，卢卡奇毕竟没有具体的方法论批判，没有在方法论原则上给布哈林的科学实践作出评判，当然他对科学实践也作了科学批判，对布哈林的科学理论作了理论（抽象的）批判。现在，问题澄清了，只是我们还不能确信对他的研究已有全面的评判，可否拒绝他的社会学理论。即使赞同卢卡奇的重要论证，我们也只能在某一点上反驳布哈林的社会学。

卢卡奇对布哈林的方法论的抽象批判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即讲到布哈林认为“在社会科学中预见是可能的，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⑩，虽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这一或那一现象将在何时何刻发生……这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够精通具有统计性质的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不能讲出社会进程的速度，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进程的方向”^⑪。

卢卡奇反对说，预见本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事物本身的客观的质的差别”^⑫。他这种说法即便是对的，也只表明上面引文中布哈林的科学理论有一点错误，而不能说布哈林所有的论题都错了。因此下面就有必要来具体考察一下布哈林的社会学。

五

谁要是读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证实事物

“机械论”的社会学体系》*，他就会知道，第一章中反对把哲学上的“目的论”和“因果论”当作唯一的科学解释；布哈林指出：“所谓目的、原因等观念，都是绝对论，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社会现象的自然规律决不是什么‘目的论’的自然规律”（原著第22页）^⑧；他警告说：“目的论直接引入神学”（第25页）。他还写道：

“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社会发展，都有客观存在的（即不以我们愿望和要求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它才是原因所在……这种解释方式是真正科学的。”（第30—31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二章，我们见到，所谓“自由意志”被否定了，“宿命论”也受到批判。布哈林所想的是：“归根结蒂，人民群众的活动证明，他们对自由意志论是完全抵触的”（第35页）；“严格说来，……绝没有偶然的或无缘无故的现象”（第44页）；“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在所有领域都可能作出预见的”（第48页）。

第三章否定唯心主义而宣扬了唯物主义。首先，从本体论上说，“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物质却是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物质先于精神存在，精神乃是某种特殊有机物的特殊性能”（第55页）。其次，从认识论上说，“唯物主义能解释社会‘精神生活’现象，这在唯心主义就做不到”（第62页）。

在这一章里，我们还见到布哈林企图“把黑格尔辩证法那种‘神秘的’语言（马克思指出过）改写成现代学术语言”

* 布哈林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编者注

(第75页)。他认为，一般“辩证的解释方法，首先要承认一切现象有着它们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是要看到它们是在运动状态中”(第67页)。他指出，“黑格尔说过：‘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第73页)，同时注释说，“这一法则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同上)。但他用“平衡”这个概念作了解释：所谓运动，就是失去平衡，矛盾，即平衡失调(同上)；社会发展，即“波动中的平衡”(第74页)；辩证发展即下述形式的发展过程——“原先有平衡的条件，后来平衡失调，最后在新的基础上又恢复平衡”(同上)。这大概也是对黑格尔所谓从“正题”到“反题”然后到“合题”的运动观念的一种非神秘化的解释(第74—75页)。同样地，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被重新解释为“突变论”(第79页)，如在物理学上“由量到质的转变乃是物质运动的基本法则之一；这在自然界和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上都是确实可查的”(第80页)。

其实，“社会的革命，也如同自然界的激烈变化，具有同样的特征。它们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由先前的整个发展过程决定了的，比如水的沸腾是加热过程的结果，蒸汽锅炉的爆炸是由于水蒸汽对锅炉内壁的压力越来越大”(第82页)。

由此可知，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述哲学的几章中，无疑包含着“反目的论”、决定论、唯物论和机械式的辩证法等因素。为了说明他在社会学理论上继承了这些观点，我们再来检验一下他主要的社会学著作。

第四章的中心论题就是所谓社会学。它着重谈到社会高

于一切个人之上，社会现象是不能简化为精神现象的。布哈林说：

“社会绝不仅仅是人们的集合体，它比人们的总和大得多，因为人们结合在一起，在劳动过程中有明确的配置（马克思称为‘分类’），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比人们的‘总和’或‘集合体’还要强大的力量”（第94—95页）。例如：

“物价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人们交往的结果，但它却不是猜测出来的平均数，而且往往不会接近于人们的猜测。因为个人猜测毕竟是主观的，实际的物价对所有的人都发生影响；它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考虑的客观事实，虽说是无形的但也是客观现实……换言之，物价就是一种新的、对社会生活起作用的因素，它往往不受个人控制，虽然它是人们自己造成的”（第95页）。

确实，“不能想象个人会生存于社会之外或没有社会。但是，我们也不能想象社会在由各种各类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它就生存于‘自然状态’中；就连结合成一个社会的人们也不可能这样生活的”（同上）；由此可知：

“个人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从一般社会要求中提出自己的打算，社会环境所赖以求得发展的各种条件也就限制着个人活动；个人作用取决于社会条件”（第101页）。至于说有些人物不在此例，比如说有王公将帅或有特别影响的伟人等等，那末，也可以说明，“恰恰是他们的活动证实社会对他们有着一定的影响，假如没有社会影响，没有社会（阶级、集团、一般群众的）要求，任何‘发展’都不能有其成就”（第

99页)。

在一本介绍社会学纲要的著作中表达这些思想，或许不足为奇。但从原文上看，并无任何证据说明布哈林试图从他的“哲学机械论”来表达这些思想，本来也没有这样推论的逻辑方法。实际上，这些思想的一般内容和要点是与“机械论”思想家的见解相差很远的。假如称布哈林为决定论者，那就没有理由象他那样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会反过来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作用，那也会得出决定论的公式。任何事物，在本体论唯物主义看来，都不是个别事物对社会，而是社会对个别事物起主导作用。因此，他也就按照唯物主义观点，指出物价是“一个无形的客观现实”（第95页），是一种有影响的因素，而且它还有自己的活力。最后，在这一章，看不出布哈林的反目的论和机械论辩证法同社会学观点有什么联系。

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论述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平衡关系的章节。这里，如卢卡奇所指出的，布哈林提倡一种可以称之为技术论的观点。论据如下：

第一，“我们知道，在任何一种制度中，引起它内部改变的原因只能在它和它的环境间的关系上去寻找；同时，发展的基本方向（进展、停滞或制度的破坏）恰恰也取决于现存制度及其环境的关系如何”（第107页）。

这两个论点显然是从布哈林对辩证方法的一般解释中引伸出来的。如前所述，辩证法包含两个因素，即一切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动态观点。这里，他在制度外部去寻找原因，正

因为他肯定了“相互联系”；他注意到制度的“改变”是可以解释的现象，因为他有动态观。由此我们就能联系到他的“哲学机械论”。但应承认，我们还没有进入实际的社会学理论领域。这要看布哈林下一步的论据，其要点是：

“一方面有自然界，外在的自然界，我们称它为‘环境’，它和另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即人类社会。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并形成整体的则是人类劳动过程”（第108页）。

布哈林说：“在这里首先发现了社会进化的‘最初原因’”（第110页）。

特别是，“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劳动的收获量（产量）或生产能力（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维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平衡状态’的主要手段；它是环境和制度相互作用的手段，社会制度在其自然环境中的地位也因此确定了，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也能说明整个社会内部生活必定有所变革”（第113页）。

其次，还要着重指出：

“人们付出劳动，这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归结为生产工具的改进，另一部分是‘养活’劳动，即直接用于维持劳动能力……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说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第115页）。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得深些，即生产工具决定着劳动者的性质，……从而可以断定社会劳动工具体系，即一定社会的技术是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实际标志”（第115—116页）。

从客观原因谈到劳动、生产率、物质生产力、劳动技术

或工具，这个论据基本上或是被接受，或是被拒绝。但我还想改用另一种方法来说明它是有道理的，没有明显错误的。很清楚，决定性的一步在于指出两种生产力——工具和劳动者的存在，强调工具技术的主要作用。这里，布哈林并不是根据他“哲学上的机械论”，上述论据也不可能得到“机械论”的承认。例如，从决定论观点来看，显然无法确定究竟是工具还是劳动者起主要作用，因为避不开因果原则；有人甚至说，要解决主次问题，只好采用方法论上非决定论者的立场，那等于说不必费心去解释主要现象。同样，从唯物论观点来看，虽然工具和劳动者都是物质实体，但无论是工具最终决定劳动者还是相反，这关系却是无形的。另一方面，布哈林的反目的论和他对辩证进化（矛盾和量—质）规律的解释，看来无助于说明上述论据。总之，虽然布哈林的技术论可能引起机械论者的“共鸣”，——因它认为机器对社会进化的作用比人的作用更加重要，但机械论者决不会从构成他“哲学上机械论”的那一套学说中引申出确切的见解。

往下是最长而又复杂的一章，即论述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平衡问题。正是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平衡”适当的著名理论。我们将说明存在于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宗教、哲学和艺术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心问题在于：

“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适应’是毫无疑义的，换言之，社会内部在它的各种要素之间、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同种类的社会现象之间存在某种平衡是毫无疑义的”（第

132页)。

他一开始是讨论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他所说的技术是指生产工具体系。而这里提到的经济，他认为是人们当中的生产关系体系（第143、146、148页）。这些关系分为两类：劳动关系和阶级关系（第136、143页）。他们都受到使用的工具的制约。简言之，“劳动工具的结合（社会技术），在人们的结合和关系中，即在社会经济中是决定因素”（第14页）。那就是说，它决定着“劳动者的类别、他的技巧程度，还决定着劳动关系，生产条件……以及劳动分工”（第137页）；再者，“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同时存在的阶级关系一类的生产关系”（第147页）。

这里没有必要评述布哈林的一些解释，只须说明一点：那主要是在古代和近代社会之间作了比较或对照。至于我们的分析，重要之点，在于认识经济结构以上述技术体系为基础，但布哈林并不因此把它看成上层建筑，它仍然是基础的一个因素。事实表明，布哈林在分析上层建筑各方面时（第150—208页），一般都是从“生产力”或同样是从技术和经济来解释的。此外，他在结束讨论时明确指出技术与经济相联系，强调“生产关系的整体性，它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或说是生产方式。这是人类劳动的社会机构，它的‘现实基础’”（第148页）。这段话很重要，是他的平衡论中精心的发挥，而决不是从他“哲学上的机械论”学说中引申出来的。

同样，他对上层建筑理论的另一个细心考虑与机械论并无联系。例如，“社会政治上层建筑是由互相联系的各种要素

组成的复合体，总的说来，它是由社会的阶级构造决定的，——而社会的阶级构造又以生产力，即社会的技术装备为转移。”（第155页）

进而言之，“它的一些要素以技术装备（‘军事技术装备’）为转移，而另一些要素则既以社会的阶级性质（它的经济）又以上层建筑本身的‘技术装备’为转移（军队的编制）”（同上）。无论这种分析是否正确，是否合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机械论根本无助于得出此结论。再看看布哈林对科学的见解，他首先告诫我们：

“科学的状况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联系是很复杂的。它决不是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简单。为了充分显示这种联系，需要从不同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知道，科学有（或往往有）自己的技术装备，自己的科学工作组织，自己的内容，自己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当然相互影响，并影响一个时期一门科学的整个状况。”（第164页）

其次，布哈林作了简要的结论，至少有五个问题（参见第169页）。层次很清楚：不仅是上层建筑包含各种因素的复合性，它们与基础的两个不同因素都有相互作用；而且上层建筑的每个重要因素也包含着同类互有作用的次要因素的复合性。看来这令人感到兴趣或‘惊异’，或说有理，或说不适于写进一本“通俗读本”，但其中并无“机械论”的痕迹，“机械论”对任何事物都看得很简单。布哈林对艺术的见解，或许是表达得最清楚有力的；他分析了艺术现象的六个不同方面（第189—193页），探讨过艺术领域内八类不同的因果关系

(第190—195页),还补充说“这一主题尚未详尽论述”(第195页)。

另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则是上层建筑主要因素互有作用而引起的。例如,“归根结蒂”——宗教可以从生产力之低下来说明,“但其实质却是一定社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反映”(第179页);由此可见,它可能属于第二级上层建筑,是另一个上层建筑因素的上层因素。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也有类似关系;布哈林认为哲学好比是科学的科学(第180—181页),因而写道:

“哲学可以说是处在人类精神的‘最高峰’;揭示它的凡俗的、人世的根源比其他领域要困难些。……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种非常复杂的依赖关系。这就是说,哲学不是直接地、没有中介地依赖于技术,这二者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环节。”

最后,布哈林谈到法律和道德,其见解更与“机械论”无关;它显然与“机械论”相反,而且有别于“反目的论”和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他说:

“一般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是指有助于保全其社会、阶级或集团的言行,或要求个人服从于集体利益。因此,所谓准则,也就是人类社会制度内部矛盾所需求的平衡条件。”(第157—158页)

布哈林原著中有一段论及“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其内容更为复杂,却也没有“机械论”。他强调说:“生产力决定着经济条件,从经济条件中生长出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

经济条件也发生影响，即对它的发展起着有利的或妨碍的作用。换句话说：在社会现象各个领域之间，有一种永恒的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果相互转化。”（第228页）

简言之，布哈林实际上所重视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综合”概念，即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观点（第229页）。我不准备在这里来评价这种观点固有的正确性，但它相当精辟，不能视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而加以否定。我研究了它同书中论述哲学的章节（机械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最好是说它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有独立性，最差也得承认它与目的论并不一致。

下一章题为《社会平衡的破坏和恢复》，在这一章里，布哈林阐述了他关于革命、变革和进步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变革通常是由一种稳定平衡状态向另一种平衡状态过渡。这里有两种途径：“社会整体内各种因素的逐渐变化适应（即进化）和剧烈的大动荡（即革命）”（第243页）。一般说来，革命乃是经济基础两种因素之间，即技术或生产力与经济或生产关系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第244页）。但是，例如小生产不经过革命也会消失，所以不能绝对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任何矛盾都会引起革命”（第245页）。问题在于，要分析“革命实际上怎样发生的”，由此才能确定冲突（矛盾）的相应性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第245页）。作了这样的分析，也就看到“革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这时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中间孕育着剧烈的冲突，生产力已无法容纳在生产关系外壳的范围内，而这一外壳又构成这些生产关系、即‘财产关系’、生产

资料的所有权关系的基本轮廓。这时，这一外壳就要‘爆破’。”（第248页）

“假如生产力能够在不改变财产关系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进化；假如它不能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又不能改变，社会就停滞不前或者衰退。”（第249页）

这里讲的是革命原因。接着，布哈林还论述了革命的阶段性。首先，“革命的前提是新阶级意识的革命化、作为旧社会的掘墓人的阶级中的意识形态革命”（第255页）。其次，“革命第二阶段是政治革命，也就是说，新的阶级夺取政权。这时，新的阶级的革命心理化为行动”（第257页）。然后是“革命的第三阶段是经济革命。这就是说，执政的新阶级利用政权作为实行经济变革的杠杆，彻底破坏旧的生产关系，促进在旧制度内部在与旧制度相矛盾中成熟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第259页）。

“最后，革命的第四阶段（结束阶段）是技术革命。在达到新的社会平衡之后，也就是说，在形成可以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形式的新的稳定的生产关系外壳之后，生产力从某一点开始加速发展……采用新工具，打下新的技术基础……这时就进入了新的社会形式的发展的‘正常’、‘有组织’的时期。”（第261—262页）

这真是精辟的论述，就象一篇《共产党宣言》。然后布哈林进一步强调说，他写的只是革命过程“经历一系列阶段，从意识形态开始，到技术革命告一段落，这是一个反方向的次序，本应如此”（第262页）。他多次重述这一点。就在下

页，他曾指明“我们是按颠倒过来的次序分析问题，不是从经济到政治，而是从政治到经济”（第263页）。再下一页，由于讲到革命的始末，他又指出“在始末之间有一个上层建筑起作用的反向次序”（第264页）。布哈林还强调说：“这是过渡时期的特征”（同上）。他说对了，因为他的平衡论还来不及指明这一特征。引用上述原文，我们毫无疑义；但终究他的唯物主义还有一个矛盾。自然，问题在于第三章关于“精神变物质”的理论还没有纳入有关革命阶段结构（第六章）的讨论中来。这就是说，布哈林的哲学理论和他的科学实践还有矛盾。

另外，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来布哈林的进化理论也有同样的矛盾。他分别讲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展；对于物质文明的进展，他说：“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就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这是社会技术体系的一部分；有了不断增多的生产工具的帮助，比从前用少得多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出多得无比的各种有用的产品”（第269页）。然后，布哈林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作了有趣的类比：过去，“对于艺术家说来，绘画就是生产资料”（第271）；“一部凝结意识形态的书也是精神生产的工具”（同上）；同样，实验室、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或动物园，也都是精神文明的工具。他得到结论：“精神文明的积累决不只是人们头脑中思想意识因素的积累，而且还是事物知识的积累”（第272页）。

由此可见，布哈林阐明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同时也显示出他的“机械论”。在这里，所谓唯物主义，

是辨明社会现象的发展水平而不涉及其发生原因。他实际上是说明，精神或文化的进步，原由还在于精神生产已有了（物质）工具的积累，换言之，精神文明的进步可以由此“判断”或改正。无论如何，只要看到这种积累现象，显然首先在“精神”方面来解释：实验室、图书馆是（正规地）为着“思想”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诚然，在布哈林看来，“分析到底”，这些思想上的要求乃是技术、经济基础的产物。但要进一步解释，既不能忽视前者，也不能忽视后者，前者（精神文明的积累）离不开后者。否则推论下去，这种积累现象决定于“精神”，“唯心主义”是对的，“唯物主义”反而错了。布哈林在这一章节中似乎已看到这一点，所以命题为《社会现象的“物化”》（第269页），因为“物化过程”是指思想、精神或其他非物质因素造成了“物质”作用。简而言之，布哈林在这里竟象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原书最后一章谈到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毫不奇怪，因为我们看其重点决非机械论。但有三个论题即人道、社会和精神境界似乎与决定论或唯物论不相容。

布哈林一开始就指出，“我们已经知道阶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如何重大的作用”（第276页）。这一点，还见于他讨论导致革命的根本矛盾时写道：“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并未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在这种矛盾由于呆板的机器打击到人们的时候也未能发现，这象是怪诞的不可思议的设想。但是，显然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处于互相直接对立的地位，因而引起矛盾……这种矛盾只会在人与人的关系

中、在各阶级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第308页）。

这一章结尾处论及各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布哈林又重述上面引证的观点；他指出“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的实践而不是在人们的实践之外发生变革的；生产关系是人类斗争和人类活动的产物，正如亚麻布或纱线一样”（第308页）。

在布哈林分析阶级差别、职业差别、种姓等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时，其重点都放在社会方面而不在物质生产方面。例如他首先指出了金属加工业的差别，其成员在行业关系中是有差别的，一些人从事金属加工，另一些人则去采选矿石。所以，他又说明，“这种工作并不能指出其属性，因为行业分工乃是同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但无论这些关系（事物）有多大差别，它们对于呈现在基本方面的差别来说还是次要的，在基本方面是支配工作的人同服从于工作的人之间的差别”（第281—282页）。

考虑到国家的本质，布哈林否定了无政府主义者那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国家的谬论，他们争辩说，共产主义社会也带有集中制管理的特征。布哈林反驳道：“国家的‘本质’并不在其体制中，而在其社会关系中；不在于集中制管理特征，而在于集中制管理的阶级结构……集中制本来就不是国家组织的必要特点。”（第303页）

最后，布哈林在讲到意识时着重引述了马克思关于“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大有区别的观点（第292—293页）。他考虑说：“最原始的一般阶级利益的表现，就是各阶级都力求增加自己在产品总量中的分配份额”（第285页）。阶级

斗争表明，“当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时就产生出所谓的阶级利益，当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发生冲突时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第297页）。结论是：“阶级斗争，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只是在阶级社会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上才发展起来”（第297页），在这个阶段上，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利益已有了觉悟意识。无论如何，在布哈林看来，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经常在进行阶级斗争。国家组织的存在就证明统治阶级已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这说明它对自己的基本阶级利益已有了充分的意识”（第301—302页）。其次，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即或没有明确表现出来，它也在发展着，因为“我们不会忘记辩证法，它证明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进化过程中”（第301页）。

简单说来，在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本书里，可能发现一系列有着机械论特点的哲学论题。它们见于前三章，那是反目的论的，或被说成是决定论、形而上学决定论，或被说成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影响下宣传辩证法。这种哲学上的机械论是朴素的，有点难以置信，它被葛兰西和卢卡奇“有效地”批判过了。但在另一方面，布哈林社会学体系中的基本因素，却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自然和社会相互影响的技术论、关于社会结构的平衡论、关于革命的能动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主观判断。这些社会学理论，往往是复杂的但也有些道理，它们与他哲学上的机械论互不相容，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只有一些机械论的痕迹包含

在他对辩证法的解释中，这显然受到机械论自然科学的影响，但它们毕竟是他的哲学理论中极少的机械论因素；实际上，所谓机械论只不过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尽管在哲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间有上述不协调之处，布哈林的社会学并不是从他的机械论引申出来的，也没有受到机械论的不良影响。当代社会学家对布哈林社会学理论所作的直观的好评都是可信的。

六

新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布哈林的哲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不相一致，那末，在他的研究实践中有没有一种虽然未被意识到而实际上起了作用的哲学呢？按上面的分析，原来也可以否认的，但结果还是要提出一种有根据的解释。再者，先前我们讨论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问题，现在也要求作出结论。我已经指出，这种结合，在葛兰西看来很简单，据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则反驳说，他错误地把这个观点用在他自己的批判研究上去了。正因为他批评不当，我们才有以上一番分析说明。我还指出，这种结合谈何容易，即使接受葛兰西的看法，它也未必在具体讨论的问题上显示出来。特别是现在，一方面自然地把“理论”当作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简明见解，而另一方面却把“实践”解释为研究社会现象。其实，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须排除所谓理论和实践的简单绝对的（机械论的？）概念，而要应用有逻辑

内容的相对论（辩证法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认清问题所在。理论和实践并非一回事，并非科恩所说理论就能注明社会学，或社会学研究就能指明社会政治行动那样简单。不过，我们的看法是接近一致的；首先，所谓“理论”，指科学实践内在的哲学，它是普遍存在的，但其特点却很难意识到。现在，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假设没有哲学、没有造成布哈林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如果我们能验明或辨别这种学说体系的特点，也就会发现他有一种结合实践的“理论”。

然而在这项工作之前，我们不妨加上一个复杂问题，其后果反而会使我们的工作容易解决。现在，既然是要寻找实践中的理论，也就不能以布哈林的社会学理论为限。他的哲学理论，现在可视为他的全部理论研究（在原著中）的一个部分。换言之，我们认为这部著作是对社会现象提出一系列的讨论意见，假如其中有一种模式（即我们正在寻找的“理论”），它就可能见于讨论哲学以及社会学的章节。要是这样，它是容易识别的，我相信有这样一种模式。论据如下：

每一章（甚至于导言1）都应看作是讨论一对矛盾或区分两个事物，它们对于理解一种社会学体系的建立是必要的。布哈林的论述总采取一种力求审慎（不偏不倚1）地把两极方面综合起来的形式。

导言应看作是讨论与理论相对的历史（尤其是第13—15页）；其他各章的对立面，依次是原因和目的，必然和自由意志，物质和精神，静态和动态，个人和社会，社会和自然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化和革命，被压迫阶级和统治

阶级。

这些论题都是相当清楚的，稍加思考就能明了；每一对矛盾事物的对立性也很清楚，虽然对立性并不总是同样的。事实上，在社会学体系中，确切的对立性必须有所规定。只有一点还不很清楚，那就是布哈林如何审慎地解析这种对立性。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几对矛盾。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化和革命的论述是最审慎而卓有见识的。如前所述，在布哈林看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际上是互有作用的体系；每一方都按因果关系影响到对方。我们还见到，他认为社会的变革同时包括进化和革命，有时是进化，有时是革命。他的技术决定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和自然界的系统呢？在他看来，技术是劳动的首要因素，劳动则是自然界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很清楚，他的技术论把两方面都考虑在内，并说明原由，确实是慎密的探讨。

谈到阶级，一开始似乎是布哈林偏袒一方（被压迫阶级）而排斥另一方（统治阶级）。但是，这种偏袒或偏执并不失当，因为要看到现在和未来，应以这种方式来说明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将变成统治阶级。这是可信的，即在政治革命之后，从前被压迫的阶级必须转变为压迫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但布哈林的理想、希望和预言却是压迫将逐渐停止，因为随着经济和技术革命的发展，统治阶级将作为一个阶级实际上消亡。一般而言，这些推论是尽可能想把对立双方协调起来。

我还没有提到引言中关于与理论相对的历史概述部分。那里谈的是社会现象的历史研究与一般系统研究两者的合理性。他把社会学看作理论史，目的在于研究“一般性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什么因素决定它的发展和衰退？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法律、科学等）之间有何关系？怎样解释它们的进化……？”（第14页）

历史和社会学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时，社会学为历史提供解答原则，“例如社会学指出经济形式决定政治形式的一般原理，历史学家必须努力找到在特定的时代确实有这种关系，必须说明这种关系的具体或特殊的表现”（同上）。

另一方面，历史学为社会学提供论据：“历史为社会学得到结论和确定社会学的各种概念，它充实材料，因为社会学的结论不能凭空虚构，而要从历史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同上）。顺便可以指出，布哈林的概念都有历史证据，因而他的社会学理论化了，而且符合于这种（明确的）认识论观点。

布哈林的其他论述，初看似乎是涉及单方面：有时强调社会而不顾个人，有时偏重因果关系而排斥技术论上的解释，或是说明必然性而排斥自由意志，或是说明物质而排斥精神，再则是专讲动态而不提静态。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有了观察问题的新境界，可以重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究竟是说单方面，还是象书中哲学章节部分那样有理地说明了机械论。我确信先前发现的“机械论”和社会学结论都是正确的，尽管某些细节还要澄清。

为了简化问题，把一定范围内可以采用的两种讨论方法区分开来是有益的，或是方法论的启发式的研究，或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布哈林当然强调说明社会现象而不偏及个人作用方面，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学理论；反之，如从本体论上来看，他也承认社会就是个人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是“真实的聚集体”或成为体系（第85页），因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经常持久地互相影响的，但我并不认为他把社会和社会现象加以人格化了。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白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比它的各部分总量大得多，何况它并不能分解为几个部分”（第93页）；好比一台时钟，“它真是各种装置的复合体系，其中有活机体，也有死机体”（同上）。我可以作出结论了，不管布哈林的方法论社会学还是他的形而上学个体论，都是明确无疑的^④。这是现实两个极端的折衷表现。

我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观念在其他论题上也有类似的表现。在方法论上，他是反目的论者，因为他相信唯有因果关系的解释是科学的；但在形而上学方面，他也承认有全人类的目标（当然他根本否认所谓神的旨意）。他引用过《资本论》一段话：马克思解释说“一位拙劣的建筑师之所以有别于最灵巧的工蜂，原因还在于建筑师是先有结构设计而后施工建筑的”（第27页）。布哈林注释道：“马克思在人类和自然界生物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人类有其目标这个论题”（同上）。但是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中由‘目的论方法’拥护者引用这一事实去捏造论

据”(同上)。

在必然性和自由意志问题上，布哈林的决定论表现为绝对否认任何事情（包括人类活动）无原因可寻。但他据理争辩说，这是介乎非决定论和宿命论的中间领域，面对两者他都作了批判。一方面，“假如人类意志可以完全独立于任何事物之外，那将一事无成”(第35页)。另一方面，“所谓社会决定论……绝不能与宿命论混为一谈……因为后者否认人类意志是进化因素之一，决定论则不是这样”(第51页)。决定论承认社会现象“是通过人的意志来实现的；离开人类或社会而言社会现象，那无异于说有一种圆形的正方体或液状的冰块……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意志，只是给它以解释”(同上)。

谈到精神和物质，我认为布哈林显然是哲学唯物论者。因为他断定“精神现象乃是有一定有机构成的物质的属性”(第55页)。但在方法论上，他又是二元论者，对精神和物质同样重视，在他的学说体系中既有精神的一定地位，同时又肯定唯物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精神现象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关于社会学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这种观点……并不否认‘思想意识’有其作用。马克思在论述科学理论即意识最高阶段时甚而明确指出：‘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但是，唯物主义者不能满足于仅指出‘人们这样认为’，他们还要问清这一事实：为什么人们在一定地方、一定时间这样‘想’，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又那样‘想’？”(第61—62页)

最后，布哈林谈到与动态相对的静态，他的辩证法的解

释，基本上是在分析革命和进化时创造性地发展了的“波动中的平衡论”的概述。无论人们怎样评价他的辩证法解释，有一点是无疑的，他对运动和静止状态同时都力求说明其重要性。还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第三章各节所述的哲学“理论”，与论及革命的章节所述的社会学研究实践，前后是相应一致的。事实上，如前所说，他“哲学上的机械论”就有这种因素，它一般也适合于他的社会学研究实践的各个方面。

由此可见，布哈林全书的明显特征就在于它论述了对立面的统一。这里所谓统一，即审慎的分析判断。关于这一点，许多思想家（我相信列宁在内）已有明确的评论，他们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乃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正是彻底的辩证法著作。至于列宁评论说“他从来还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②，我们应该解释说，这是指布哈林的辩证法理论而不是指他的实践方面。科恩评论布哈林的著作“有一种独行其事、好争论的特性，其内容往往使人中意又不中意”^③；我的分析或许就是科恩这种评论的重述、深化和发挥。

或许再作一些比喻，结论不甚明确。我在别处曾经指出，就如伽利略关于自然科学史的古典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④，也具有对立面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的特征。在这里，相应的对立面是思考和观察，量的分析和质的鉴别，因果关系和现象的表述，反权威主义和传统主义，语义主义和逻辑分析；又如各种学科：物理学和

天文学，物理和数学，天文学和哲学。布哈林的社会学之所以是“科学的”，理由就在于它内在的“方法”竟然与“近代科学之父”的成熟著作所总结的同样高明。

我想在总结时着重谈谈批判方法，这里指的是批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批判领域，一般认为，否定式的破坏性的批判容易做到，肯定式的建设性的批判则难。我认为，这在心理学上是自明之理，但从逻辑和方法论观点来看却是错误的。否定式的批判比较容易表达，但如果我们回到公正水平上来，情况就完全相反。正当的否定式批判往往比正当的肯定式批判还难。这是因为否定式批判的论据，比肯定式批判的标准要求更为严格。理由是简单的：肯定式批判一般是承认被评论的作品有某种价值；这种价值或真有之，或者缺少，但若有一点可取，它就有内在品质。这种（肯定式）评论家往往把过多的见解硬加进主题之中，发挥己见比讨论主题还多；他的“阐述”即或有所贡献，主题仍不过是一种刺激物，即或有不当之处，那也无损于原著的思想内容；最后，似乎在主题上有所改进，但这种改进仍有待考虑。

至于否定式的批判，情况则相反。这类评论家总是挑剔说主题上缺少某种（或任何）价值。他的批评或有失当之处，就说这种改进意见没有价值；但若主题真的缺乏价值，又说不值一顾或不必认真讨论。总之，否定式批评必须小心谨慎，要有充分论据，否则会比肯定式评论还冒险，这类否定式批判也不起任何作用。简言之，否定式批判若没有确切的阐述，就是无的放矢，肯定式评论即或不当，它也有所贡献。

另一方面，应看到否定式批判有更大的启发教育作用，因为它若是批评得当，就能把应当否定的主题和批判的论据作一对比，只要论据可靠，它就成功了。这一事实也许能说明否定式的批判为何经常出现。这种批判或许就是“批判的批判”的评价方法富有成果的基础。

由此可知，我们先前指责葛兰西和卢卡奇错误地评论布哈林的“机械论”与他的社会学之间的方法论联系，这指责是完全合理的。对待葛兰西，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定了他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误解；既然他（和其他许多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当前的研究也就是给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论作出一点贡献，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推广运用到科学批判领域；正如布哈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若一成不变，真是咄咄怪事”^⑤。

概括而言，我们指明了科学家对科学方法的解释与对一般知识的了解之间的区别，按照这种观点考察了布哈林的社会学体系，他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是卓有贡献的。这一重新考察很有必要，一方面是因为近来已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对布哈林的著作做了直观的论断，另一方面也因为最近还有一些研究思想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学者就苏联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布哈林的著作经住了葛兰西和卢卡奇哲学批判的考验。我们在这次研究的中心部分，对布哈林哲学上的机械论和他的社会学研究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可以说两者之间没有一致性，他的社会学理论并没有受到他的机械论的不良影响。最后，对他的实践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也作了分

析，可以说其中是关于个人和社会、社会和自然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化和革命等对立面统一关系的明确见解。

注 释

①斯蒂芬·科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政策：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见《政治科学季刊》第85期（1970年）第40页。

②摩西·莱文：《苏联经济争论中的政治潜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③同上，第9页。

④引自大卫·霍夫曼：《布哈林的平衡论》，见《目的》杂志第14期（1972年）第128页；原著所引列宁《遗嘱》，见《新领导人》，纽约1962年版第567页。

⑤摩西·莱文：《苏联经济争论中的潜流》，第13页。

⑥斯蒂芬·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页。

⑦同上，第393页；参见注⑥。

⑧同上，第20页。

⑨同上，第25页。

⑩同上，第393页；参见注⑥。

⑪同注②，第5页。

⑫见斯蒂芬·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8、42、396页；莱文前引书，第5—6页；霍夫曼：《布哈林的平衡论》，第126页。

⑬斯蒂芬·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83页。

⑭同上，第97页。

⑮同上，第96页。

⑯参见前段引文。

⑰罗伯特·C·塔克与斯蒂芬·科恩合编：《大清洗案》，纽约1965年版，第22—28页。

⑱参见阿尔多·扎纳尔多：《德国共产党人和葛兰西回忆布哈林》，载于《社会》杂志第14期（1958年）第231页；英译本见纽约“国际书局”版（1958年）和伦敦“艾伦-安文书局”版（1959年）。

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档案》第二卷（1923年），第216—224页，原卷译本题为《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见《新左翼评论》，1966年第39期第27—34页。

⑪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四日记》，第1396—1450页，杰拉塔纳编（都灵1975年版）；另见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都灵1948年版），第119—168页；《狱中札记选编》，豪尔与诺威尔·史密斯译本（纽约“国际书局”1971年），第419—472页。

⑫安阿伯，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⑬同注④所引霍夫曼的文章：《布哈林的平衡论》。

⑭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四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⑮罗伯特·米歇尔：《政治党派》序言（纽约“自由出版社”1962年版）第27页。

⑯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序言，安阿伯1969年版，第7页。

⑰引自大卫·乔拉夫斯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1917—1932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47—61、93—106页；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07—122页，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⑱大卫·乔拉夫斯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第51页。

⑲同上书，第48页；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09页。

⑳大卫·乔拉夫斯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第47—50页。

㉑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10页。

㉒同上，第122页。

㉓同上，第107页。

㉔同上，第108页。

㉕同上，第110页。

㉖同上，第109页。

㉗同上，第121页。

㉘《狱中四日记》，第1396—1450页；《狱中札记选编》，第419—472页。

㉙《葛兰西对布哈林的批判中的理论和实践》，见《哲学和社会批判》第6期（1979年）第25—56页。

㉚《狱中四日记》，第1396—1401、1411—1416、1418—1420、1424—1426页。

- ⑩同上，第1401—1403、1424—1426、1445—1447页。
- ⑪同上，第1406—1411、1434—1438、1487—1491页。
- ⑫同上，第1396—1430页，引文见其中第1403—1406页。
- ⑬同上，第1420—1422页。
- ⑭同上，第1422、1439—1442页。
- ⑮同上，第1448—1449页。
- ⑯同上，第1434页。
- ⑰同上，第1404—1405页。
- ⑱同上，第1420—1422页。
- ⑲同上，第1406页；参见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27—30页。
- ⑳《狱中四日记》，第1417—1418、1450、1442—1445页。
- ㉑同上，第141—147页。
- ㉒参见注⑮。
- ㉓卢卡奇：《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第34页。
- ㉔参见前段引文。
- ㉕同上书，第27页。
- ㉖参见前段引文。
- ㉗同上书，第28页。
- ㉘参见前段引文。
- ㉙参见前段引文。
- ㉚同上书，第29页（原文斜体字）。
- ㉛同上书，第33页。
- ㉜同上书，第29—32页。
- ㉝拉斯·维加斯：《科学史概论》，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23—228页。
- ㉞拉斯·维加斯：《伽利略和自然哲学》，见弗·萨普与阿斯奎斯合编：《自然哲学协会1976年会议汇编》，第一卷，东兰辛，密执安，自然哲学协会1976年版，第130—139页。
- ㉟卢卡奇前引书，第29—30页；参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20—121页。
- ㊱卢卡奇前引书，第30页。
- ㊲同上书，第31页。
- ㊳同上书，第29页。

⑳同上书，第30页。

㉑同上书，第32页。

㉒参见前段引文。

㉓同上，第33页。

㉔同上，第29页。

㉕同上，第32页。

㉖同上，第32页。

㉗参见前段引文。

㉘卢卡奇引文，见前引书第32—33页。

㉙同上，第33页。

㉚同上（原文斜体字）。

㉛以下所引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原著页码，均注明在本文括号内。

㉜鉴于卡尔·波普所用的名词术语往往使不熟悉他的读者混乱不清，这里应对熟悉其术语的读者说明：这段描述之适用于布哈林，正如波普用以解释马克思的原意一样；换言之，布哈林虽可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人论者”，他却反对“心理至上论”的。波普所谓的“反心理至上论”，与我在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社会论”是一致的；而他所谓的“方法论上的个人论”，也同我所说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个人论相近似。参见卡尔·波普：《开放的社会及其大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87—99页。

㉝参见注①；霍夫曼《布哈林的平衡论》所引列宁的“透啊”。

㉞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09页。

㉟拉斯·维加斯：《伽利略和自然哲学》，参见注②，见原书第一编（1977年版），第95—118页；第二编（1977年版），第371—383页；另见拉斯·维加斯：《伽利略和推理艺术》（即将在荷兰—多德雷赫特出版）。

㊱科恩在他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引用布哈林这句话作为第五章前言。

（许虹译 耳常校）

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

[匈] 乔治·卢卡奇*

布哈林的新著是符合长期以来对一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说的需要的。自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不曾有过这种尝试（普列汉诺夫的薄薄一卷除外）。这种理论解说一直听任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去写，他们一般对马克思主义只有很肤浅的理解。因此，布哈林的尝试是值得欢迎的，尽管方法和结论都应予以批评。应当说，布哈林在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归纳到一种完整的、系统的解说中去，这方面是成功的，这部解说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阐述一般清晰易懂，所以，作为一部教材，这本书可喜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既然布哈林的目的只是编写一部通俗教材，评论者对于特别是某些比较艰深的方面的特别说法应当谅解。这种情况以及在俄国获得有关文献的困难，也就说明了下列事实，即

* 乔治·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和文学史家。1918年加入共产党。著有《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这一著作从唯心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他自己也认识了错误。本文是卢卡奇在1923年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一书写的书评。——编者注

布哈林在论述艺术、文学和哲学问题时几乎完全利用第二手的资料，而且忽视最新的研究作品。但是，这就增加了布哈林在编写通俗教材的努力中把问题本身简单化的危险。他的说明是出色的和清楚的，但同时又把许多关系弄模糊了而不是弄明白了。我们决不当接受把问题和答案本身都简单化了的简单说明，而宁肯接受问题和答案的历史罗列，特别因为布哈林的简单化倾向，不仅限于意识形态的边缘方面，而且涉及一些核心问题。举例来说，布哈林认为，一方面经济生产结构中的权力等级制度和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等级制度完全相称。他随之下结论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国家机关的结构反映了经济的结构，也就是说，相同的阶级在这两方面只有相同的地位。”作为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两个等级制度之间长期的严重的矛盾经常导致革命变动，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具体的历史并不与布哈林的过分公式化、简单化的说法相吻合。因为完全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两个阶级在竞争中经济力量的平衡，可能产生实际上不为任何一方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如果它势必获得双方的许多妥协的话），所以，经济结构并不是简单地在国家中反映出来的。例如，在近代史开始时，绝对君主制度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阶级甚至可能取得经济权力，却无法使国家机器完全适应它自己的利益或给它打上自己的阶级烙印。梅林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德国资产阶级如此担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中，甚至在它最迅速发展经济期间为资产阶级改革而进行的积极斗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居然听任容克国家机器原封不动，安然

承认它的封建的绝对权力机构继续存在。自然，一部教材是不可能希望深入讨论这种问题的。但是，甚至根本不提公式的这种例外的重要性，未免使布哈林的说明多少难于置信。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已经在比较专门的著作中屡次证明，通俗的说明与基本的科学的方法如何可以取得一致。布哈林已经承担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的合乎时宜的重大任务；但在许多方面他并没有达到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已达到的水平。

但是，我们不应当局限于一些枝节问题。比这种疏忽更重要的是，布哈林在并非不重要的几个问题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传统，从而并没有证明自己的论点或在前人已达到的最高水平上改进自己的论点；的确，他甚至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不言而喻，尽管有种种错误，我们认为他在分享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方面的成就是非凡的；通俗读本作者很少讨论这种问题）。这个意见特别适用于介绍哲学的一章，在这一章中布哈林令人感到很接近马克思贴切地称之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那种东西。布哈林显然并不知道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对这种理论的批评，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更不用提了。由于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特殊地位，这种理论理解历史过程的效力是大大受到限制的。当每一个“唯心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到库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现实中心进行歪曲的时候，势必有一种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归根结底，也是正常的。但是布哈林在他的哲学论述中，摒弃了马克思的方法中导源于古典德国哲学的一切

因素，而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所引起的自相矛盾。当然，黑格尔是时常被提到的，但是他没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作必要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唯一提到费尔巴哈的地方，只是指出，由于费尔巴哈的缘故，“物质才提到首要地位”；“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有助于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他完全忽视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其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它清楚地揭示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根本错误。布哈林的理论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接近，在于他把“科学”（指法国意义的科学）当作模式来应用。因此，在具体应用于社会和历史时，它往往模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特征，即认为一切经济现象或“社会学”现象都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强调虚假的“客观性”，就会导致拜物教。

技术装备的作用

对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探讨，突出了难解的怪论和虚假的“客观性”的其余方面。布哈林赋予技术装备以太过分的决定作用，就完全失去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无可否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一些引文，可以这样来解释）。布哈林说：“每一种特定的社会技术装备体系，也就决定①”

* 原文如此。——编者注

了人们的劳动关系。”他认为，自然经济在古代的优势地位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很低。他坚持认为：“如果技术装备改变，社会分工也就改变。”他断言，“归根结底”，社会取决于技术的发展。技术装备被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决定因素”，等等。显然，这种终于把技术装备同生产力等同起来的作法，既不可靠，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装备是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一种因素（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它既不能简单地和社会生产力等同，也不（象布哈林较早的一些论点似乎暗示的那样）是社会生产力改变的最后或绝对因素。要在生产过程（从而也在分配、消费等等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正确理解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外的原则中寻找社会及其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将导致拜物教，布哈林自己在别的地方也承认这一点。举例来说，他批评库诺的下列观点：技术装备受自然条件约束，具备一定的原料对于具备一定的技术装备具有决定性意义。理由是：库诺把原料同劳动主体混淆起来了，却忘记“必须有相当的技术装备，对于这种技术装备，木材、矿石、纤维等等才能起原料作用……自然界的影晌从物质前提的意义上说，本身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但是，难道我们不应把这一确凿有据的批评应用到技术装备本身吗？难道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技术装备这一结论不正如库诺的理论一样，是一种谬误的“自然主义”、十八和十九世纪“环境论”的一种稍微经过修饰的说法吗？当然，布哈林避免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明显错误；用固定的原则解释变化的作法。因为，的确，技术是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改变着。所以，从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他对变化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用可变因素说明变化。但是，技术装备作为发展的独立自主的基础只是那种粗陋的自然主义的大力改进而已。因为如果技术装备不设想为现有生产体系的一种因素，如果它的发展不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而且这一点正是需要澄清的），它就会和“自然界”、气候、环境、原料等等一样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先验原则。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决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技术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布哈林针对整个意识形态强调了这一点（恩格斯稍晚的理论见解和这里有关）；但是，如果把技术同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分开，认为它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独立自主，那就完全不正确和违反马克思主义了。

罗马帝国的覆亡

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即使只是把技术看作对于社会是间接地确定的，它的发展过程中的显著变化也完全无法解释。我们试举古代技术和中世纪技术的差别为例。不管中世纪技术在性质上多么原始，它对于古希腊罗马有名的技术成就怎样是一种退步，中世纪的技术原则是在较高水平上发展的，也就是说，和古希腊、罗马社会相对而言，劳动组织的合理化。劳动的操作还没有合理化，而且劳动组织的合理化与其说是通过技术合理性的提高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社会暴力之门”^②实现的，但是，这就为近代技术的

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哥特从水磨、矿井、火器等方面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技术发展方面的那种决定性的改变，是以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改变，即劳动潜力与劳动条件的改变为基础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崩溃的同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原因之一，当然就是它无法维持它的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对无穷尽的奴隶资源的使用过于浪费。中世纪为新的必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奠定了一般的基础。麦克斯·维贝尔*令人信服地证明，古代奴隶和自由民的并存妨碍基尔特的的发展，从而也妨碍现代国家的发展——这是古东方或古希腊罗马同现代社会的又一悬殊差别。中世纪的社会组织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环境（缺乏劳动力，等等），后者又决定了技术发展的基本进程。所以，当布哈林断言“新的技术装备使奴隶劳动成为不可能；既然奴隶破坏复杂的机器，奴隶劳动就不再合算了的时候”，他就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奴隶制度不是低下的技术水平造成的；相反，奴隶制度作为一种支配劳动的形式，使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成为不可能，从而使合理的技术装备成为不可能。把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的奴隶制度当作一个孤岛来研究还很不够，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变革由何而起**。

如果我们再来看从中世纪生产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这种被颠倒的关系甚至更加明显。马克思明确地强调说，从行

* 《经济和社会》德文版。

** 然而可以参看马克思对于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的说明（《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4个说明），这里纯技术方面只被看作是全面的社会经济过程的一个因素。

会手工业向手工工场的过渡不牵涉技术装备的变化：“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③为产生质变的大规模市场（自然经济的解体）提供社会前提的，是资本主义分工和它的权力关系。可见，首先产生现代机械化技术的社会前提，是一百年来社会革命的产物。技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成果，而不是它的始因。只有在它的社会前提确立以后，它才出现；这时，手工工场的原始形式的辩证矛盾已经得到解决，“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④。不言而喻，技术的发展这样一来就特别加速。但是那种相互作用并不能超越经济对于技术的现实的历史的和方法论的优势。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正如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一样。”^⑤

社会学观点和历史

我们所以稍微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它的方法论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产生于它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产生于布哈林的解决方式是用以说明他的虚假的方法论这个事实。我们已经提到他要把辩证法变

成一门“科学”的企图。这种倾向在科学理论中的表现就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般的社会学”这一概念。他对自然科学的倾向同他往往很敏锐的辩证本能在这里不可避免发生矛盾。恩格斯曾经把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⑥。布哈林关于社会学是一种“历史方法”的理论是符合这种观点的。但是，由于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社会学不可能局限于一种“纯粹的方法”，而发展成为具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目的的一门独立的科学。辩证法可以做到没有这种独立的实在的成就；它的领域就是整个历史过程，其中个别的、具体的、不可重复的因素正是从它们之间的质的差异和它们的客观结构的不断变化中显示它的辩证实质。总体就是辩证法的领域。另一方面，一门“科学的”一般的社会学如果不超越本身成为单纯的认识论，就必须有它自己的只承认一种类型的规律的独立的实在的成就。布哈林摇摆于不同结论之间。一方面，他意识到，显然不存在“一般的社会”这种东西，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由此必然产生的结论，因为他的理论（他对他的理论的应用往往比理论本身要好得多）只是把历史变化看成一种“确定的历史躯壳”，一种“外貌”。另一方面，他区分“理论”和“方法”的作法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问题的提法混乱。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关于技术的优先地位的基本上不正确的理论，只是布哈林企图创立一门一般的社会学的实际结果。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疏忽，而是肤浅的前提的必然结果。

这种混乱在布哈林关于科学规律的概念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幸而经常在他的具体分析中忘记他的理论前提。举例来说，他得出一定体系中的平衡和平衡的破坏的一般规律，不管这一体系属于无机界或有机界，还是属于社会。随之，马克思和黑格尔被以相当勉强的方式联系起来。但是，尽管有这种理论观点，布哈林承认，这种关系“充其量只能作为类比应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复杂体系”。所以，他幸而在具体分析中忘记了他的理论，结果是，他的结论往往违背他的出发点，非常有趣。他对各种社会“有机”理论等等的攻击，经常导致出色的批判鉴别。

预言和实践

但是，当他探讨社会学的理论目的时，他对自然科学的偏好却是赤裸裸的。“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情况表明，在社会科学中预见是可能的，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目前我们不能预见这一或那一现象将在何时何地发生……这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够精通具有统计性质的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不能讲出社会进程的速度，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进程的方向。”布哈林对自然科学的偏爱使他忘记，我们关于方向或趋势的知识，不是统计的预测，不是关于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和需要知道的东西的差别的结论，而是关于事物本身的客观的、质的差别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这一点十分清楚。我顺便只提一下，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关

于不可能通过统计研究当前事件的那些睿智而富有思想的方法论见解”。当然，马克思在他的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平均利润率理论中在确定的统计事实同整个过程的社会趋势之间，作了明确的方法论的区分。“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末，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瞬间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⑦。列宁本人反复强调关于发展趋势的这一概念，认为发展的趋势性不是我们无知的结果，而是以社会事件的那种客观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社会事件的构成也奠定了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和“革命实践”的现实性。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列宁强调了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一论点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他论证说，虽然这种战争也许是极不可能的，但对发展趋势的分析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尤其不容置疑的是，在方法论上不可能知道任何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国际斗争时，甚至更加强调这种方法论上的不可能：

“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形是没有的。……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谓的学究行径，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种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592页。

** 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849页及以后诸页。

明’。”⑧

我们在这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只是作为权威来加以引证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指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顺便说一句，布哈林根本简直不提罗莎·卢森堡的基本经济观点，这种态度是令人遗憾的，但从方法论说是一致的）。如果要真正彻底探讨这种理论宗旨，势必超出一篇评论的篇幅。这样的话，就要证明：布哈林的基本哲学怎样与直观的唯物主义完全符合；他不是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也就是说，说明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批判地、非历史地和非辩证地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社会的研究。但是，虽然普列汉诺夫论述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以及黑格尔的著作为这种评价打下了一些基础，这种评价却还没有人试图完成，所以我们只可能指出布哈林的概念中那些使他的具体的社会学结论模糊起来、陷于绝境的种种推论。

这篇短评不可能考虑到书中的许多细节。它只限于证明种种错误的方法论根源。应当着重指出，虽然布哈林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结论以通俗形式加以系统化这种可嘉的目的，这些错误却始终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期望，以后再版时，很多这样的错误将会得到纠正，从而全书可以达到它的许多出色的章节的水平。

注 释

①哥特：《经济和技术。社会经济结构》德文版 I 第236—239页。

②同上。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页。

④同上第407页。

⑤同上，第25卷第9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10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325页。

(孟北译自《新左翼评论》，1966年9—10月第39期英文版)

对一种通俗的社会学的 尝试的批评性札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通俗读本》这样一部著作***，本质上是面向非专业知识分子广大读者的，因此，它应当把它的起点放在批判分析常识哲学上。常识哲学是非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换句话说，通过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加批判地吸取的世界观，而普通人在精神上的个体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常识并不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同一的单独、唯一的观念。它是哲学的“民间传说”，它同“民间传说”一样有不胜枚举的

* 本文系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一九七一年伦敦英文版第五篇第二章第二部分（昆廷·霍尔和杰弗里·诺埃尔·史密斯编辑和翻译）。——编者注

**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意大利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6年墨索里尼下令逮捕了葛兰西，并流放在乌斯提卡岛上。由于法西斯折磨而患病，1937年死于罗马。葛兰西在狱中写了许多学术理论著作，后汇集成《狱中札记》。——编者注

*** 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参看《狱中札记》第三篇第二章介绍）。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原故，葛兰西在文章中提到布哈林时都简称“作者”，并把他的著作称为《通俗读本》或简称《读本》。除本《译文集》的编者注外，本文没有注明“编者注”的*注和注释，都是《狱中札记》的编辑和翻译者注。——编者注

不同形式。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它是这样一种观念，甚至在个人头脑中也是支离破碎、不联贯的，这是与拥有这种哲学的群众的社会、文化状况相适应的。在历史上，当出现统一的社会集团的时候，与常识相对，也会出现一种统一的（换言之即连贯而有系统的）哲学*。

《通俗读本》的第一个错误是，它从下列假设出发（至少是含蓄地从下列假设出发）：人民群众原始的哲学的创立，是与传统哲学的巨大体系以及教士领袖的宗教，即知识分子和高度文化的世界观相对立的。事实上，这些体系是群众所不知道的，对群众的思想 and 行为方式没有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影响，但这是另外一种影响。这些体系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政治力量，作为使统治阶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因素，因此也就是外在的领导权所支配的一种因素来影响人民群众的。这就从消极方面限制了人民群众本来的思想，但对群众关于世界、人生的初步而浑沌的想法内在演变的必要酝酿却没有积极影响。常识的主要因素是宗教提供的，结果，常识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比起常识与知识分子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来说，要密切得多。但即使在宗教内部，也应当有所鉴别。每一种宗教，甚至天主教（诚然，正是由于力图保持一种“表面的”统一并避免分裂为不同的民族教会和社会层次，天主教更长于任何宗教）实际上包

* 关于葛兰西自己对常识的看法，随之关于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的正确起点的看法的比较系统的说明，参见《几点初步商榷》头几页，载《狱中札记》第323以下诸页。

括好几个不同的而且经常是彼此矛盾的宗教：有农民的天主教，有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的天主教，有妇女的天主教，还有知识分子的天主教。而这种天主教本身又是多种多样而且互不相联的。但常识不仅受到今天存在的最朴素和极少修饰形式的这几种天主教的影响，常识也受到以前的宗教的影响，以前的宗教直到今天仍然是常识的组成部分。现在的天主教的早先形式——种种民间异教运动、同过去的迷信有联系的在科学上的迷信等等——也是一样的。常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的”和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天然的感觉的直接产物。它与宗教因素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但是在这里这些因素是“迷信的”，是非批判的。所以，这是《通俗读本》的一个危险，因为它不去科学地进行批判，反而常常强调这些非批判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常识仍然停留在托勒密时代、拟人说和人类中心说的时代。

关于《通俗读本》不从批判常识出发而去批判系统哲学这一做法的上述论述，应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的观点，而且有一定限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对知识分子的系统哲学的批判。群众中如果有人能成功地批判并超越常识，他通过这个事实本身就在接受新的哲学。因此，解释实践哲学就需要与传统哲学进行论战。的确，由于实践哲学按其本性倾向成为一种群众性的哲学，就只能从论战的方式中，从不断斗争的方式中来理解它。而起点始终仍然应当是常识：常识是群众的自发的哲学，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使它联贯一致。

法兰西的哲理文学比任何其他民族文学都更多地涉及

“常识”，这是由于法国文化具有更加严格的“民间——民族的”性质；换言之，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由于某种特殊的传统条件，比在其他地方更倾向于接近人民，以便从意识形态上引导人民，使人民同领导集团保持联系。我们可以在法国文学中发现大量论述常识的资料，可供利用和研究。法国哲学文化对于常识的态度确实能成为统治的思想建设的典范。美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也可以提供一些启示，但不如法国文学那么自然和完整。“常识”被以不同方式来对待。它有时甚至被当作哲学本身的基础。它在另一种场合下又被另一种哲学的观点批判。实际上，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结果都是超越常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并创造更接近领导集团的世界观的另一种形式。昂利·古伊埃在发表于1931年10月17日《新文学工作者》上的评论列昂·布伦瑞克的一篇文章中，就布伦瑞克的哲学问题写道：“不论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或伦理学中，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超脱运动，这就是精神为了摆脱常识和自发的形而上学所作的努力。自发的形而上学注视的是现实的感性事物世界以及处

* “民间——民族的”（或更常见的“民族——民间的”）这一观点是葛兰西思想中最有趣的观点之一，也是最广泛受到批评的观点之一。据说，从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的起源来看，也许最好把它看成是形容介于民族愿望和民间愿望之间的一种“历史集团”，葛兰西的广义的知识分子在这种集团的形成中起了一种重大的中介作用。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它是涉及群众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的一种文化概念，同任何形式的人民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有根本的区别。

于这一世界中央的人”^{*}。

柯罗齐对“常识”的态度似乎不明朗。在他那里，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一命题对他对常识的判断有极大的影响。似乎柯罗齐常常容易感到某些哲学命题为常识所共有。但具体地说，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常识只是乱七八糟的概念的大杂烩，一个人可以从中找到他所喜爱的任何东西。进一步说，柯罗齐对常识的态度并没有导致从民族——民间的观点来说有益的文化概念，即比较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哲学观——但在任何情况下仅仅对于实践哲学才可能发生。

至于金蒂雷，我们必须看一看他的《人道主义世界观》一文（载1931年6月1日《新文选》）。金蒂雷写道：“可以把哲学下定义为：反思为了求得常识和朴素意识的真理在批判上的确实性所作的一种巨大努力；关于这种真理，可以说每个人会自然地感觉到，它构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智力的牢固的结构。”这看来是金蒂雷思想的紊乱状态的又一个例子。金蒂雷的说法看来“朴素地”导源于柯罗齐关于通俗的思想方式是对某些哲学命题的真理的确认的说法。金蒂雷接着写道：“健康的人是相信上帝和他的精神自由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金蒂雷的这两个命题中发现：1.有一个超历史的“人类本性”，而我们还不能完全弄清楚它是什么；2.有一个健

^{*} 列昂·布伦瑞克（1869——1944），法国哲学家，除了他论述巴斯噶的著作外，由于将新康德主义的提法应用于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而享盛名。布伦瑞克的著作有：《数学哲学的阶段》、《人类经验和自然因果关系》、《西方哲学中道德心的进步》、《自我认识》。

康的人的人类本性；3.有一个健康的人的常识，因而也就有一个不健康的人的常识。但健康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体格的健康？还是没有精神病*？还是一个人用健康的方式，即诚实的方式、市侩的方式等等去进行思考？而且“常识的真理”又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金蒂雷的哲学完全违反常识，不管人们把常识理解为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朴素的人民哲学，还是把它理解为良知，理解为对某种形式的科学和哲学解释的深奥、新奇和模糊的蔑视。金蒂雷向常识调情是十分可笑的。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常识中没有真理。它倒是意味着常识是一种模糊的、矛盾的和捉摸不定的概念，求助于常识，把它当作真理的证实，是毫无意义的。为了指出某一真理已经传播到知识界的范围以外，说它已经成为常识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只是从事历史观察或对历史的合理性的肯定。在这种意义上，并且在有限的使用的条件下，论点有一定的可靠性。这正是因为常识天然地害怕新事物而且是保守的，因而能强行列入一条新的真理是一种证明，证明所述真理有特殊的根据和传播能力。

不妨回忆一下朱斯蒂的短诗：

“曾经处处君临的良知，

今天在我们学派里，被束之高阁。

*这段话的意思涉及意大利“Sano”一词的歧义，它既表示体格的“健康”，也表示精神的“健康”。

科学是它过去的宠儿，
现在却为了剖析良知而将其扼杀。”*

这段引文可以表明，良知和常识这两个词汇怎样被含混地使用：作为“哲学”，作为具有一定内容的信仰和见解的特殊思想方式，以及作为一种和藹的宽容态度，尽管同时也是对任何深奥新奇的事物的轻视。因此，为了创造一种“新的”良知，科学必须消灭某种传统的良知。

马克思经常提到常识和对常识的信念的可靠性问题。但马克思指的不是这种信念内容的可靠性，而是它们形式上的可靠性以及这种信念产生行为规范时随之而来的强制性。此外，这些提法暗中包含一种主张，即需要有新的通俗的信念，这就是说，新的常识和随之而来的新文化和新哲学，这种信念将象传统信念一样，以同样的可靠性和强制性扎根于通俗的意识之中。

注一：从金蒂雷关于常识的命题来看，应当补充说，由于不光彩的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他的语言蓄意含混不清，当他举例说明那种由反思来探讨其在批判上的确实性的常识的真理之一时写道：“健康的人是相信上帝和他的精神自

* 朱泽培·朱斯蒂（1808——1850）是意大利激进诗人和讽刺作家，他把对反动和复辟的深刻仇恨与老式的启蒙理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这首短诗是他1849年所作，其确切行文与这里的引文略有不同，葛兰西可能是根据记忆。确切行文应是：

“良知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
现在在我们的学派里已不复存在。
科学本是产生于良知，
现在却为了剖析良知，而将其扼杀。”

由的”，这时他要人们相信，他的哲学征服了天主教真理在批判上的确实性。但天主教徒并不上当，仍然认为金蒂雷的唯心主义是最纯粹的异教信仰等等。但金蒂雷仍坚持并始终运用一种含糊性。这种含糊性对于创造一种半世俗文化的氛围不是没有影响的。在这种气氛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宗教和无神论相互拥抱，内在论和先验论调情，安东尼奥·布鲁埃斯特别快活，因为头绪越乱，思想越模糊，他就越会感到他那种乱七八糟的“信仰调和主义”得到了论证。如果金蒂雷的话确实代表他们所说的，行为唯心主义*就确实会变成“神学的男仆”。

注二：在哲学教育中，由于教育目的不是向学生提供关于过去哲学发展的历史知识，而是向学生提供文化知识，帮助他剖析他自己的思想以便他能投入某一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团体，那就必须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哲学经验作为我们的起点（首先要确切地向他说明，他具备这种经验，他不知不觉成了“哲学家”）。同时，既然我们已经假设学生有一种普通的文化知识水平，而这些学生迄今很可能只获得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而且没有方法论和批判方面的素养，就不能不首先从常识着手，然后，再从宗教着手，直到第三阶段才进而论述传统的知识界探讨的哲学体系。

* “行为唯心主义”，指金蒂雷、斯皮里托等人的哲学，得名于它认为精神具体地存在于“行为”中，而不是存在于反映自身的意识中。（参看G.金蒂雷《关于精神即纯粹行为的理论》1916年意大利文版。）至于葛兰西形容成“一个著名的糊涂的空谈者”的安东尼奥·布鲁埃斯，参看《民族文学和生活》1950年意大利文版第190页。

一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

一个初步的看法是：本书标题与内容不符*。“实践哲学的理论”应该意味着一种对统称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概念合乎逻辑的和连贯而系统的阐述（其中很多概念是谬误的，出自其他来源，因而需要加以批判和清除）。开头几章就应该探讨下列一些问题：什么是哲学？一种世界观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为哲学？迄今为止是怎样设想哲学的？实践哲学是否更新了这一概念？“思辨”哲学是什么意思？实践哲学会有思辨的形式吗？意识形态、世界观和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或应当如何？传统哲学怎样设想这种关系？等等。这些和另一些问题的答案就构成了实践哲学的“理论”**。

《通俗读本》中，甚至没有系统地论证阐述中所包含的而在旁的地方才完全偶然地明确提到的下列前提：真正的哲学是哲学唯物主义，而实践哲学则纯粹是“社会学”。这一断

* 标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葛兰西下面接着论证只有副标题总算是布哈林著作内容的确切表达，即使如此，还附有要“对‘社会学’一词赋予一种严格限制的意义”这一条件。必须指出，葛兰西自己在什么是社会学的观点上也有些踌躇。他的主要靶子看来也许是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这些学说的“唯物主义”形式在布哈林的《读本》中的反映。

**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葛兰西本人试图在他自己的哲学著作中答复的一些问题。特别参看《狱中札记》第343—377页。

言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假如它是正确的话，那末实践哲学的理论就将是哲学唯物主义。但在这一情况下，把实践哲学说成是社会学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门社会学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政治和历史科学吗？或者是对政治艺术的纯经验的观察和对历史研究的表面规则的按特殊顺序分类的系统性的整理吗？书里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但只有这些答案才能成为一种理论。这样，总标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得到论证。如果人们对“社会学”一词赋予一种严格限制的意义，副标题也许是一个比较确切的标题。事实上，问题产生于什么是“社会学”。难道社会学不是试图产生关于社会事实、即政治和历史的一种所谓精密的（即实证主义的）科学，换句话说即一种处于胚胎状态的哲学吗？难道社会学没有试图做一些与实践哲学类似的事情吗*？然而人们必须明白这样一点：实践哲学以格言和实践标准的形式诞生，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它的创始人凑巧把他的精力摆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他对经济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但这些实践标准和格言中包含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一种哲学。

社会学一直试图通过以一种预先创立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体系为依据的一种形式，来创造历史和政治科学的方法。社会学对进化论的实证主义是有反作用的，但只是

* 葛兰西在这里所考虑的，很明显，与其说是他最通常的靶子——经验主义，不如说是麦克斯·维贝尔以及帕雷托和米歇尔要在“社会学”这一总的题目（奥格斯特·孔德首创）下创立关于人和社会的一般的和综合的理論的企图。

局部的反作用。因而社会学变成一种独特的趋势，变成非哲学家的哲学，并试图根据按自然科学模式建立的标准对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提供公式化的说明和分类。因而它就试图用“预言”橡树将从橡子长成的方式“实验地”引申出人类社会进化规律。庸俗进化论是社会学的根子，社会学无法理解辩证原则及其从量到质的转化。但这种转化打乱了庸俗进化论所理解的任何进化形式以及任何一致性规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社会学都以一门哲学、一种世界观为前提，而社会只不过是后者的附属部分而已。使不同形式的社会学具有机械的一致性的特殊内在“逻辑”，也不能与一般理论即哲学混为一谈。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一致“规律”是无用而又乏味的探索，也不是说关于对政治艺术的直接观察的一篇论文没有它的目的。但人们只能把黑桃叫做黑桃，对于这种论文，只能按它们的实际情况来看待。

所有这些都是“理论”问题，而《读本》的作者视为理论问题的那些问题却不然。他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是直接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哲学和日常实践之间的中间状态）；它们是对不相联系的偶然的个别历史和政治事实的设想。当作者一开始提到既否认有可能创立一种实践哲学的社会学、同时又肯定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著作来表达这种哲学的一种趋势时，他就面临一个理论问题。作者除了空谈一套以外，并没有解决这一极为重要的反对论点。当然，实践哲学是通过对过去历史的具体研究以及创造新历史的目前活动而被认识的。但尽管事实在历史运动的潮流中始终是

独特的和变化的，概念也可以理论化，可以得到历史和政治的理论。否则人们就会无法说明什么是运动或者什么是辩证法，而倒退到一种新形式的唯名论去*。

把实践哲学归结为一种形式的社会学，乃是恩格斯批判过的退化趋势（见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的致两位学者的两封信）的具体化**，这就是把世界观归结为使人们感到恍惚掌握整个历史的一种机械公式。这就给那些举笔能写新闻即兴作品的“有小聪明的人们”提供了最强烈的鼓励。实践哲学所依据的经验是不能公式化的，它是变化多端、无穷无尽的历史。历史研究可以产生作为辨别特殊事实的学术方法的“文献学”***，也可能产生理解为历史的一般的方法论的哲学。这也许就是这样一些作者的意图，正如《读本》

* 因为他没有以任何严格方式提出什么是“理论”的问题，作者就无法进一步提出什么是宗教的问题，并对过去的哲学作现实的历史判断。他把过去的哲学都说成是十足的梦呓和蠢话。

** 恩格斯在188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和1894年1月25日致海因茨·施塔根堡（应为符·博尔吉乌斯——译者注）的信（分别发表于1895年10月1日、15日出版的《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这两封信事实上都是为了纠正一种简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作法，葛兰西也就是要抨击这种错误作法。

*** 文献学：葛兰西此处既指它的传统意义，即语言文献和历史文献（编史工作和文字历史的原始资料）的研究，也指柯罗齐从维科著作中重新启用的意义。维科把知识分为哲学即“真理”的文献学即“真实”的追求并参看《狱中札记》第35页注11。

第一章中以比较概括的形式提到的，他们否认能把实践哲学变成一门社会学，而又认为这一哲学只存在于专门的历史论文中（以如此赤裸裸的粗糙的形式表现的这种论断，当然是错误的，看来象唯名论和哲学怀疑主义的一种新奇形式）。

否认能够创立理解为一门社会科学、即不与实践哲学本身毗邻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的社会学，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扩大传统地理解的文献学的范围的种种实际观察进行经验的积累。如果说文献学是按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特征辨认和明确特殊事实的重要性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形式，人们并不能排除突出在政治方面与统计规律或巨大的数字规律相当的某些比较一般的“趋势规律”的实际效用。统计规律和巨大数字规律有助于促进某些自然科学*。但以下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强调，即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始终基本上抱漠视态度（或者至少是被认为抱漠视态度），统计规律才能应用于政治科学和艺术。不仅如此，把统计学推广到政治科学和艺术，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

* 巨大数字规律是一条统计学定理，大意是：抽取的样本数量越多，它们就越容易平均为它们所由抽取的“总体”的平均值。在经济学上这意味着，个别事例的随意选择的组合，将“通过平均数”倾向于表现潜在的规律。

关于葛兰西对趋势规律的分析，认为它具有“一种现实的‘历史的’性质而不只是一种方法论的性质”，参看他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说明，载《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1948年意大利文版第211—215页。葛兰西在这里也批评柯罗齐赋予规律以一种“绝对的”价值，而不是一种辩证的价值的价值。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批评类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5章中对李嘉图的批评。

关于“趋势规律”等等，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3—15章。

果它被采纳来制定未来的远景规划和行动纲领的话。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统计学的最坏后果是造成疏忽和不当。但这种疏忽和不当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轻而易举地纠正过来,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只不过使应用这一方法的个别科学家看起来有一点可笑而已。但在政治科学和艺术中,它可能有真正灾难性的后果,造成无可补救的祸害。的确,在政治上把统计规律假定为必然起作用的基本规律,这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错误,而且在行动上,变成一种实际的错误。更有甚者,它会助长精神上的懒惰并使政治纲领流于肤浅。应当指出,政治行动正是为了把群众从消极状态中唤醒。换句话说,要破坏巨大数字规律。那末这种规律怎么能被认为是社会学的规律呢?我们想想,甚至计划经济即有指导的经济的要求都势必破坏机械地理解的统计规律、即无数任意的个别行为的偶然拼凑产生的统计数字。这种计划必须以统计为基础,但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人类的自觉性取代了自然主义的“自发性”。在政治艺术中,导致抛弃旧有的自然主义先验图式的进一步因素,是政治组织(政党)取代了单独的个人和独特的(或者象米歇尔所说,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领袖。由于群众性政党扩大,而与群众自身的直接生活(经济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群众感情趋于一致的过程就不再是机械的或偶然的(那是受环境

*“领袖人物的感人的超凡魅力”,是领袖人物虽然缺乏合法的权威或惯例的权威,却受人拥护的一种品质。这种观点事实上不是来自米歇尔,而是来自麦克斯·韦贝尔。后者又是从法学家和教会历史学家鲁道夫·索恩那里接受这种观点的。

因素等等的制约所造成的),而变成自觉的和必然的。领导人对这种感情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就不再是辨认统计规律造成的预感的产物了。当时领导人把这种预感变成思想和语言的力量(这是合理和理智的方法而又经常是靠不住的)。现在它要由集体组织通过“积极的和自觉的共同参加”,通过“同情心理”,通过对直接事物的体验,通过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生动的文献学”的一种制度而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广大群众、党和领导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整个联合这样构成,就能作为“集体的人”一致行动。

如果说亨利·德·曼的著作有任何价值的话,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他让我们比较详细地“了解”集体和个人的真实感情而不是那些根据社会学规律设想出来的东西。但德·曼并没有独创的发现,也没有找到超越实践哲学或者科学地证明实践哲学无益或错误的任何独特的原理。他已把政治艺术的一种经验的标准提到一种科学原则的地位。这种经验的标准是人们所熟知并已加以应用的,虽然它也许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和阐发。但是,德·曼甚至还未能对他的标准定出确切的界限,因为他只创造了一种新的统计规律,并无意识地在类似的名义下制定了一种关于社会数学和表面分类的新方法,一种新的抽象的社会学,而就此结束。

注一:被假设为因果律的所谓社会学规律(某事的发生由于某一规律,等等)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它们几乎经常是同义反复和不合逻辑的推论。通常它们不过是被观察的事实本身的复制品,一事实或一系列事实,都根据抽象的

概括的机械过程加以叙述，从中推论出相似的关系，加上规律的头衔，这样规律就被设想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了。但这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呢？唯一新鲜的是给一系列微不足道的事实加上集体的名称，但名称并不是创新。（从米歇尔*的论文里可以找到一整套类似的词义反复的概括，最新和最著名的是“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领袖”。）没有理解，这样人们就会陷入一种奇异形式的柏拉图唯心主义，因为这些抽象的规律与柏拉图的纯粹理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柏拉图把纯粹理念看成是现实的世俗事实的实质。

实践哲学的组成部分

要系统地探讨实践哲学，就不能忽视它的奠基人（马克思）的学说的任何组成部分。但这一点应如何理解呢？要先研究整个一般哲学部分，然后有条不紊地阐发那研究历史和政治、还有艺术、经济 and 伦理的方法论的一般概念，并找出自然科学理论在总的结构中的地位。一个广为通行的观念是：实践哲学是纯粹的哲学、辩证法的科学，它的其他部分则是经济和政治；因此通常认为学说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

* 特别参看《政治党派》（《党派社会学》1911年意大利文版的1915年英译本）。罗伯特·米歇尔（1876——1936）是（原来）带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先移居瑞士，后移居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取得意大利国籍。米歇尔以他的《寡头政治和铁的法律》十分出名。他和莫斯卡、帕雷托同为政治“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创始人。尽管葛兰西显然蔑视米歇尔的方法并厌恶他的政治学，有人认为，米歇尔和杰出人物统治论对他自己在非革命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理论有一种间接的影响。（参看G. 加利《葛兰西和优秀人物统治论》，载《葛兰西和现代文化》意大利文版第2卷第201—217页。）

这三个组成部分同时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科学，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政治活动和科学，在1848年左右达到的最高水平的顶点和超越。这一观念，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定论，与这一学说的其他比较接近现实的定义相对立，因为它所反映的，与其说是根据学说本身的中心内容进行的分类，不如说是对历史来源的一般探索。人们会问，难道实践哲学不正是而且特别是一种历史理论。答案应当是：的确如此，但人们不能把政治、经济与历史分开；甚至不能把政治科学和艺术、经济科学和政策的具体方面与历史分开。这就是说，完成了一般哲学部分的主要任务，即探讨实践哲学本身——辩证法的科学或认识论（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一般概念在其中交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后，不妨在一部通俗读本中提供每个因素或组成部分的基本轮廓，甚至把它们当作独立和特殊的科学对待。经过仔细考察，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方面在《通俗读本》中至少都已提到，但只是偶然地和不连贯地以一种十分紊乱和不明确的方式提到的，因为它对实践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清楚和确切的概念。

基础与历史运动

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讨论：历史运动是怎样在结构基础之上形成的？然而，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①中接触到这个问题，不妨加以阐发。此外，这也是围绕实践哲学产生的所有问题的焦点，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

《读本》为之辟有专章的有关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的相应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两个命题，也许有必要分析这两个命题的全部重要性和意义。这两个命题的大意是：1.人类只对自己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当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或至少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可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取代它们的地位以前，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消灭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清除一切机械论和迷信式的“奇迹”的种种痕迹。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关现有政治集团形成的问题，归根到底，提出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问题。

知 识 分 子

也许值得把本书中广泛援引或辩驳其观点的那些学者编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目录，并在每个名字下面加注，说明他们的影响以及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对实践哲学的拥护者们，也要这样做，当然，引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他们的独创性和影响着眼的。）事实上，书中只是极其随便地提到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这里，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只提论敌一方的主要知识分子，抛开第二流的人物即那些只会重复他们的见

* 本句与下面《技术装备》一节中的引文原意各有不同。——译者注

解的人们，岂不是更好一点呢？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作者只是要和他的论敌中最软弱的，以及他们的观点中最薄弱的（或这些最软弱的论敌维护得最不得当的观点）展开论战，以取得轻易的表面的胜利——因为不能说真正的胜利。这里就产生一种假象：在意识形态战线和政治军事战线之间存在着某种超出形式和比喻之外的相似之处。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先从抵抗最小的据点突破，以便有可能集中最大兵力（正是因为消灭了较弱的援军才能调动最大兵力）攻击最强大的据点，这也许是正确的战术。在一定范围内，政治的军事的胜利具有一种永久的和普遍的价值，断然可以达到战略目的，对于每个人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击败援军和较弱的帮手则只会具有微乎其微的意义。这里所需要的是与自己论敌中的佼佼者展开战斗，否则，我们就会要把报纸和书籍混为一谈，把日常小争论和科学论述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把那些次要的角色摆到关于报纸争论的无穷无尽的案例汇编中去。

当一种新的科学表明它有能力对抗敌对趋势的强大倡导者，能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趋势所提出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或能断然表明这些问题纯属虚构的时候，它才显示了自己的功效和生命力。

的确，一个历史时代和某个特定社会倒是通过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即比较普通的情况来说明的。但是，必须把广泛传播的群众性的意识形态同科学著作和伟大的哲学综合区别开来，后者是前者的真正的奠基石。我们所要对付的正是

后者，就是说，用否定的方法表明它们没有任何基础，或用肯定的方法以重要性和意义更加重大的哲学综合与它们相对照。读了《读本》以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好象一个人在月光下睡不着，就一个劲地扑杀萤火虫，以为这样做就能使月光减弱或消失。

科学与体系

有没有可能写一本关于一种还处在讨论、争论和探讨阶段的学说的基础读物、或手册、或《通俗读本》呢？一部通俗读本只能设想为对一种特殊题材的一种在形式上自信的、在文风上沉着的、在科学上稳妥的阐述。它只能是科学研究的入门，而不能成为对独特的科学研究的论述，因为它是专门为青年人或者普通大众写的——从科学素养来讲，普通大众还处于青年人的状态，因此，他们直接需要“确实的东西”和至少在形式上似乎确实可靠和无可非议的见解。而如果所论述的学说还没有达到其发展过程的“古典”阶段，任何使之“通俗化”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逻辑顺序将会是纯粹表面的和虚幻的；这样我们将只会得到一些较不相同的因素的机械罗列——《通俗读本》就是如此，尽管文字说明进行全面的粉饰，它们仍然无可救药地不相联系，彼此脱节。那么，为什么不用准确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语言来提出问题呢？为什么不满足于对这个学说的每个本质问题分别进行专题论述的一部著作呢？这样做倒是严肃得多，“科学”

得多。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庸俗的论点，即科学必然绝对意味着“体系”，结果各种各样的体系都建起来了，而这些体系却只有一种体系的机械的外貌，而没有它的必要的内在联系。

辩 证 法

《读本》没有对辩证法作任何论述。书中只是以非常肤浅的方式把辩证法作为前提，但却没有进行解释。从一部读本来说，这是荒谬的。一部读本应包含所论述的学说的种种基本因素；援引文献的目的应当是促进研究，扩大和加深对主题的理解，而不是代替读本本身。这里，没有对辩证法进行任何论述，也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设想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理解为社会学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即一种能按自然科学方法（最原始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实验方法）创立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哲学本身，即哲学唯物主义或者说形而上学或机械（庸俗）唯物主义。

甚至在反对机械论的大论战之后，《读本》的作者看来也没有多么改变他关于哲学问题的提法。就他在伦敦科学史会议^②上宣读的论文来看，他似乎还继续坚持实践哲学始终分为两部分——历史政治学说和哲学，尽管他现在把后者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如果这样提出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再能理解辩证法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从自己作为认识论、史学和政治科学的精髓的地位被贬抑到形式逻辑和初

步的经院哲学之类的水平。只有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个开辟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新阶段的独创而完整的哲学，我们才能把握辩证法真实的、根本的功能和意义。既然如此，它就超出了传统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两者都是以往社会的表现形式），但却保留了它们的有生命力的因素。如果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从属于另外一种哲学，那么就不可能把握辩证法，而正是通过这种新的辩证法，超越旧的哲学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第二个原因似乎是心理上的。就辩证思维与庸俗的常识相对立这点来说，人们觉得辩证法是某种艰巨的和困难的事情。庸俗的常识是武断的，它渴求绝对确实的东西并以形式逻辑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在中、小学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讲授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如果把关于“自然规律”的传统观念与统计规律和巨大数字规律的观念放在一起教，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孩子们会什么也弄不懂，学校教育同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冲突将会使学校变成嘲弄和讽刺的对象。

在我看来，这个理由对《读本》的作者起了心理上的阻碍作用。由于他没有用确切的理论的语言提出问题，从而实际上已解除武装，变得软弱无力，他的确是向常识和庸人之见举手投降了。无知的原始的环境支配了教育者，庸俗的常识把自己置于了科学之上，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如果环境就是教育者，那它也应当受教育^⑤。但是，《读本》不懂得这种革命的辩证法。《读本》及其作者的所有错误的根源正是在于主

张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学”和系统的哲学。（作者的观点即使在大辩论之后似乎也没有改变，虽然这次大辩论表面上导致他放弃本书，或者说从他在伦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看来是如此。）与历史的和政治的理论分离的哲学就只可能是形而上学。而实践哲学所表现的现代思想史的伟大成就，则正是在于哲学的具体的历史化和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化。

关于形而上学

我们从《通俗读本》中能不能找到对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呢？应当说：作者正如他没能把握历史运动的概念、生成的概念，从而也未能把握辩证法本身的概念一样，也没能把握形而上学的概念本身。认为一种哲学主张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即作为特定的历史行动、特定的实践的必然和不可分割的表现形式），但在相继的时期又被淘汰成为“无用之物”，而又不陷入怀疑主义以及精神和思想方面的相对论。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哲学具有历史性，这完全是一件艰巨和困难的智力活动。然而，作者一头栽入了教条主义，栽入了一种——尽管是朴素的——形而上学。这点可从本书一开始提出问题的方式，从要创立实践哲学的系统的“社会学”的愿望中，看得清清楚楚。在这里，社会学正是意味着朴素的形而上学。在导言最后一节，作者无法对那些坚持实践哲学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著作中的批判者们作出答复。他未能成功地探讨实践哲学就是“历史方法论”，而“历

史方法论”就是“哲学”，就是唯一具体的哲学。这就是说，他未能成功地从现实的辩证法的观点提出和解决柯罗齐曾经从思辨观点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他没有提出一种历史方法论、一种哲学，而提出了关于种种特殊问题的一部案例汇编。以一种武断的方式，有时纯粹是从表面上注视和解决这些问题；他那些不合逻辑的推论既是天真的，也是狂妄的。如果这部案例汇编是按其本来面目拿出来的，没有超出提供经验性质的大致公式的意图，它也许是有用的和有趣的，即对直接实践也许是有用的。但是，既然在《通俗读本》中，实践哲学不是独立的特异的哲学，而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述情况必然发生了。就本书来讲，形而上学仅仅是指一种特殊的哲学的表述，即思辨唯心主义的表述，而不是指作为一种超历史真理，一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抽象的一般概念而提出来的任何系统的阐述。

我们不妨把《通俗读本》所包含的哲学叫做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一种使形式逻辑适应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东西。历史辩证法被因果律以及对规律性、规则性和一致性的探寻所代替。可是，我们怎么能从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中引申出实践的否定和实践的“失败”呢*？从机械的观点来说，结果永远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的体系，所以，除开平淡庸俗的进化论的发展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发展。

* 意大利原文是，il “rovesciamento” della prassi，意即实践的“失败”。

假如说，“思辨唯心主义”是关于精神的范畴和先验的综合的科学，即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抽象形式，《通俗读本》所包含的哲学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唯心主义，因为在这里思辨的范畴被同样抽象的和反历史的经验的概念和分类所取代。

《通俗读本》中旧式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痕迹之一，就是企图把任何事物都归结到一个终极的或最终的原因。我们不妨回顾一个终极原因问题的历史，就能证明这是“寻求上帝”的一种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教条主义，我们又想起恩格斯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的两封信。

“科学”的概念

把这个问题视为对规律，对永恒的、规则的和一致的方式的研究，是与用断然的方法解决历史事件是否可以预见实际问题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这种需要是通过有些幼稚和离奇的方式想象出来的。既然通过事物关系的一种奇怪的倒置——“似乎”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预见自然过程演进的能力——那末，只有历史方法论允许我们“抽象地”预见社会的未来，它才是“科学地”设想的历史方法论。这就导致了对根本原因、甚至“第一原因”、“原因之原因”的寻求。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早已批判过这种简单化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只能“科学地”预见到斗争，但不能预见到斗争的具体情况，因为具体情况不能不是那些处在不断运动中的

力量矛盾的结果，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力量归结为一定的量，因为在它们之中，量不断转化为质。“预见”实际上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也就是经过某种自觉的努力、从而对实现“预见的结果”作出具体贡献后所达到的那种程度。因此，预见不是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行为，而是作为所作的努力——实现集体意志的具体办法——的抽象表现显示出来的。

预见怎么能成为一种认识行为呢？我们知道已经发生的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然无从知道。因此，预见仅仅是一种实践行为。即使我们不惜白白浪费时间，除上述的解释之外，我们再也不能对它作任何其他解释。为了能彻底批判机械论的因果论观念，剥夺它在科学方面的任何声誉，把它归结为也许过去在某些次要的社会集团的落后发展阶段有用的纯粹虚构，我们必须用正确的观点提出历史事件是否可以预见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彻底批判的是《通俗读本》中出现的“科学”概念本身。它完全来自自然科学，好象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或实证主义所规定的典型的科学。可是，在《通俗读本》中，“科学”一词有几种含义，有的是明确的，有的只是含蓄地或直接地涉及。明确的含义就是物理研究中“科学”所具有那种含义。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似乎指方法。然而，是否存在一般的方法呢？如果它的确是存在的，那末它只可能指哲学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也许正是指

形式逻辑；可是，我们能把形式逻辑称为一种方法和一门科学吗？必须肯定：每项研究都有自己特定的方法，构成自己特定的科学；方法是随着这种特定的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和探讨而得到发展和探讨的，并和它们构成一个统一整体。认为我们能通过使用一种标准的方法推动科学研究工作进步，而其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它在它天然适用的另一科学领域已产生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与科学毫不相干的奇特的幻想。然而，某种一般的标准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不妨认为这些标准构成每个科学工作者的批判意识，不论他的“专业”是什么。这些标准在他工作中应当永远自然地保持警觉。因此，我们可以说某某人不是科学家，如果他对他的特殊标准缺乏把握，如果他不完全理解他所使用的概念，如果他对他所探讨的问题以前的状态缺乏知识和了解，如果他在进行论断时不够谨慎，如果他不是以一种必要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武断的和零乱的方式进行工作，如果他对已获得的知识之间的分歧不加考虑，反而敷衍过去，并只满足于表面的解决和联系，而不表示他眼下是一些有待重新考虑和阐发的一些暂时的见解，等等。

可以对《读本》在论战中的许多引文指出的一点看法是，它一直不顾被引证的个别作者有犯错误的可能，随之，把最不相同的观点和最相矛盾的意图归之于同一社会集体——学者们永远被认为是社会集团的代表人物。这恰好就与一个比较一般的方法标准有联系。这就是：如果选择自己最愚蠢最平庸的论敌，或者甚至他们最不重要的和最偶然的观

点，来加以辩驳，然后，由于驳倒该论敌的某个次要的和偶然的观点，就认为已经“摧垮”“所有”论敌；或者，由于证明第三流或第四流的拥护者在理论上的失当，就认为已经摧垮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学说，这种做法是不太“科学的”，或更直接地说，是不太“严肃的”。另外，“我们对我们的论敌要公正”，就是说我们必须力求弄懂他们真正的意思，而不能蓄意停留在他们说法的表面的直接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要达到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拥护者的思想境界和他们的理性水平，而不是不择手段在自己周围创造一个无人之境的话，那就应该采取这样的观点：必须让自己的拥护者讨论和支持自己在与有才能的和聪明的论敌的争论中，而不是和笨拙的没有锻炼的、为“权威”或“感情”所慑服的人们的争论中的观点。要肯定和说明犯错误的可能性，但要忠实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因为重要的不是张三、李四和王五的意见，而是已成为一种集体意见的意见总和、一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力量。必须针对那些最富有代表性、并且的确由于高度的思想素质和“不计较”眼前得失而值得重视的理论代表人物，批判这些意见。在这样做时也不应当认为，这样一来，已经摧毁相应的社会要素和社会力量（这将是纯粹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而只应认为在下述两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自己方面保持和加强了鉴别和区分的精神；第二，为自己方面形成和产生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适应的自己特有的学说打好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通俗读本》中的许多缺点是与其“雄辩

术”相联系的。作者在序言中似乎以自豪的口吻谈到他的著作的“口语”根源。但是，正如麦考莱很早以前就希腊口头辩论所说的，正是雄辩家们的“口头说明”和心理容易与逻辑和论证方面最难以置信的肤浅作风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这并不能减轻在讲演稿付印前不作任何修改的作者们的责任。这种讲演经常是口头即席所作，其中经常机械地随便地将很多想法联系起来，而缺乏论证的支持。最糟的是，由于这种雄辩术的作法，不花力气的想法增多，而批判上的节制已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通俗读本》中“偷换论题”、“变换字音”和“反驳论证”^{*}兼而有之，这很可能是出于雄辩的“热情”。在我看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斯坦姆勒教授的一节，简直异常肤浅和具有诡辩性。

所谓“外部世界的现实”

同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的整个论战以及“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的“吓人”问题，提得不好，论述得更糟，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和多余的。（我在这里也指1931年6—7月间在伦敦举行的科学史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作为一部通俗读本，整个论述与其说是对任何逻辑必要性的反应，倒不如说是对一种学究式的理智渴望的反应。人民大众并不会认为外部世界是否客观上存在这种问题，甚至只要用这些词句提出

^{*} 经院逻辑中的几种推理错误。

问题，就可能引起人们禁不住哄堂大笑。群众“相信”外部世界在客观上是实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信仰”的根据是什么？它“客观上”有什么批判价值？事实上，这个“信仰”的根据是宗教性质的，尽管抱有这种信仰的人对宗教并不感兴趣。既然所有的宗教已经告诉而且现在还在告诉人们：世界、自然界和宇宙都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所创造的，所以人们发现世界是现成的，是一切就绪的，这个信仰已成为“常识”的铁证，即使宗教感情泯灭或模糊，这个信仰还将同样可靠地存在下去。由此可见，以这种常识的经验为根据，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摧毁主观主义概念，这具有相当“反动的”意义——是暗中回到宗教感情去。的确，天主教的作者和雄辩家都曾借助同样的办法以产生同样的嘲笑效果*。

在伦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通俗读本》的作者对上述说法作了含蓄的答复（这个说法尽管有其重要性，但属于外在的性质）。他谈到我们认为最早阐明主观主义概念的贝克莱是个主教**（似乎人们可以从这里推出该理论的宗教根源）。他接着说，只有当“亚当”第一次发现他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才会认为，仅仅因为他认为世界存在，世界才存在。（这

* 教会（通过耶稣会，特别是通过新经院哲学家：卢万大学和米兰圣心大学）曾试图吸收实证主义，甚至利用实证主义的推理在群众面前取笑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或那个塔的存在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存在的；如果他们不去想它，它就不再存在了”。

** 乔治·贝克莱后来成了爱尔兰克罗因的主教，但他在青年时代发表他的主观主义哲学时，他还只是个小教士。

里，理论的宗教根源又一次得到暗示，虽然没有很大甚至任何说服力。)

在我看来，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怎样来解释此种即使对于实践哲学也显然不是毫无用处的概念，今天一经向群众提起便只会引起嘲笑。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和生活之间——一方面无论如何的高度文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某些知识分子集团，与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距离已经增大的最典型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哲学语言会变成与丑角语言具有相同效果的行话的原因。但是，尽管常识认为可笑，实践哲学家还是要解释它的真正含义，解释它为什么产生并在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以及为什么常识会觉得它可笑。毫无疑问，主观主义概念为最完备和先进形式的现代哲学所特有，它引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并为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的上层建筑学说用现实的历史主义的语言提出了传统哲学以思辨形式所表述的东西。这一问题的论证——在本书中很少谈到——可能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因为它将结束一系列无益和无关的讨论，使实践哲学获得有机地发展，甚至成为高度文化的主要成分。令人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唯心主义断言世界的实在是人的精神的创造，对于实践哲学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并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对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论断之间的联系方面，还没有适当的证实和阐发。

根据明显的理由，这个问题是和所谓精密科学或物理科

学的价值以及它们在实践中将占有的地位问题紧密相联的。它们处于一种近乎拜物教的地位，甚至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唯一正确的哲学或知识。

但是，我们将把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理解为什么呢？我们能接受一系列甚至陷入唯我论的哲学家们和教授们所想象的无数主观主义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吗？这里，很清楚，我们只能把实践哲学与代表这种概念的最出色和完备的形式的黑格尔主义相比较，而对后来一些理论只需要考虑某些局部方面和有用的价值。我们还需研究一下，这个概念无论在它的才能或大或小的拥护者或批判者中所具有的比较奇怪的形式。因此，值得回忆一下托尔斯泰在他的《幼年、少年、青年》中所写的东西。他在其中写道，他对于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如此着迷，以致他经常用突然转身的办法使他自己晕眩。他深信这样他就能抓住他会看不见什么的一瞬间，因为他的精神还没有时间来“创造”现实。（大意如此。托尔斯泰的这个段落很有特色，很有文学价值）*。

* 列·托尔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第十九章，“但是在一切哲学流派中，我不曾对于任何一种象对于怀疑主义那么迷惑过，它有一个时候使我近乎疯狂状态。我以为，在我以外，在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东西，物体并非物体，而是意象在我注意到他们时才显现的，在我一不想到它们时，这些意象就立刻消失了。总之，我和谢林的信念相合，就是：存在的不是物体，而是我和它们的关系，有些时候，在这种固定观念的影响下，我达到了那样的疯狂程度，我有时迅速地回看相反的一边，希望突然在我不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虚（le h'eunt）。（《幼年、少年、青年》，1953年中译本第245页）

除托尔斯泰的这个例子外，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一个记者对“职业或传统的”哲学家（如何罗齐在《哲学家》一章中所述）所作的滑稽的描述。这个哲学家在他的桌子前呆坐好几年，眼睛盯着墨水池，自己问自己，“这个墨水池是在我里面呢？还是在外边？”

所以，贝尔纳迪诺·瓦利斯克在他的《批判的哲学大纲》*中也写道：我打开报纸看新闻报导，你怎么能说我打开报纸自己创造新闻呢？托尔斯泰应当赋予主观主义的概念以这种直接和机械的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瓦利斯克也这样写，这难道不是不可思议的吗？因为，尽管瓦利斯克目前倾向宗教和先验论的二元论，可他总还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应该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吧。瓦利斯克是个凭常识的批评者。值得注意，这样的批评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漠视的，然而在阻碍一种思想方式和文化的传播方面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马利奥·密西洛利发表在《意大利文学》上的一篇文章。他在其中写道：如果他必须在普通公众面前同一个新经院哲学家辩论以捍卫比如说主观主义观点，他会感到非常尴尬。他还谈到天主教如何希望在与唯心主义哲学的竞争中将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据为己有。密西洛利在另一处曾经写道：他预料思辨哲学将有一个衰落时期，实验科学和“现实”科学则将日益得到传播。（但在《开拓者》(IL saggiatore)上刊登的另外的这篇文章中，他也预料到反教权主义的浪潮。换句话说，他似乎不再相信天主教能把科学据为己有了。）我们还值得回忆一下罗伯托·阿第哥的一卷著作(《著作选》，G. 马彻西尼编辑整理，1922年

* 贝·瓦利斯克：《批判的哲学大纲》，1925年意大利文版。贝·瓦利斯克(1850——1933)曾受培养当科学家，却成为一个有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但逐渐转向唯心主义，后来又转向一种宗教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上帝是证实世界的实在的“绝对主体”。

莱莫尼埃意大利文版)中的《南瓜争论》*。在一地方的宗教小报上,有位作者(主教派教区的一个神甫)为了在公众眼里贬低阿第哥,说他好比是“这样一种哲学家,他们坚持只有他们想(曼图亚或任何地方的)教堂存在,它才存在,一旦他们不再想它,教堂就消逝了”,等等。阿第哥对此指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阿第哥原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在设想外部现实的方式上与天主教徒是一致的。

必须说明,尽管“主观主义”概念作为对先验哲学以及常识和哲学唯物主义的朴素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它的用处,它只能在上层建筑概念中找到它的真理和它的历史主义解释。至于它的思辨形式,这只不过是一种哲学虚构而已**。

对《通俗读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它只是按常识批评的观点说明主观主义概念,从极平常的和非批判的意义上接受了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的概念,丝毫不担心会遇到以神秘主义为理由的反对意见。的确,这种反对意见是存在的***。

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观点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

* 所谓的Polemica della zucca。

** 在G.De.鲁吉罗(G.De.Ruggiero)对几年前发表在《批判》(Critica)上的本杰明·孔士坦特(B.Constant)几篇生前之作(可能是书信)所作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主观主义所作的稍微比较现实的解释的介绍。这里指本杰明·孔士坦特(1767——1830)的《日记和致家信》。1929年1月的《批判》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

*** 在伦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通俗读本》的作者提到一种对神秘主义的谴责,把它归之于桑巴特,并轻蔑地不加考虑。桑巴特当然是从柯罗齐那里接受这种观点的。威纳尔·桑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后来在魏玛时期成为保守党右翼理论家。

论证按这样一种机械方式理解的外部客观性的观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看来也许，可能存在一种超历史超人类的客观性。可是，谁是这种客观的判断者呢？谁能把自己置于这种“自在的宇宙观”中呢？这种“自在宇宙观”是什么意思呢？的确可以认为：我们在这里碰到上帝观念的残余——恰恰是一种神秘形式的人所不知的上帝的观念。恩格斯的提法*——“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包含着正确概念的萌芽，因为它求助于历史和人来证明客观现实。“客观”始终意味着“对人来说是客观的”。“对人来说客观的”，可以认为正好与“历史上主观的”相辅相成。换句话说，“客观的”可以用来表示“普遍主观的”**。就知识来说，只有它对在历史上统一为一个单一的文化体系的整个人类来说是真实的，人们才可以客观地认识。但是，这个历史统一过程是通过消除内在矛盾来实现的，因为这种内在矛盾分裂人类社会，而它本身又是形成各种集团和产生各种意识形态的条件。这些意识形态具体地说不是普遍的，而且它们的实体的

*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 原文是 *universala suggesttivo*，稍有歧义，因为它也可译成“主观的普遍”。然而，它的基本意思相同，即：只有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认识主体和一种不可区分的人类，而人人认识相同时，主观主义者所要求的认识和存在的统一才能避免武断的相对论的圈套。

实际根源直接促使它们具有暂时性。所以这里存在着一种争取客观性（把自己从片面的、荒谬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争取从文化上统一人类的斗争是一致的。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并不是起点，而是终点，是向具体的和客观上普遍的统一迈进的上层建筑的总和。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先决条件。

到目前为止，实验科学已为这种文化上的统一扩展到最大范围打下了基础。知识因素为统一“精神”并使之更加普遍作出了最大贡献。它是最客观化的和具体地普遍化的主观。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中的“客观”观念，似乎表示甚至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可是当一个人断言即使人不存在，现实也是存在的时候，他要么是作比喻的说法，要么就是陷入一种神秘主义。我们只是从与人的关系上认识现实，既然人是一种历史的生成，认识和现实也是一种生成。客观性等等也是一样。

我们应该对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一说法进行分析，使之更加确切。这里，科学指的是科学家的理论活动呢？还是他们的实际的实验活动呢？还是两者都包括在内呢？我们可以说，从科学家的实验活动里可以找到现实的典型的统一过程，因为科学家的实验活动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第一个模式，是人类藉以用技术使自己与自然界联系起来、了解它、控制它的基本历史因素。无疑，这种实验方法的兴

起划分了两个历史世界——两个时代。它带来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解体的过程和现代思想发展的过程。现代思想在实践哲学中臻于完善。科学试验是新的生产方法和人与自然界积极结合的新方式的第一个细胞。实验科学家同时也是工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实践永远相互制约，直至形成理论和实践的完善的统一。

新经院哲学家伽索第写道：“自然主义者和生物学家们的研究，以已经存在生命和真正的有机体为前提”^④——这一说法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有关联。

天主教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关于现实的客观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

为了弄清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妨举“东”和“西”这两个概念为例。尽管分析表明它们只不过是因袭的，也就是“历史文化的”结构，但它们仍然是“客观上实在的”。（“人为的”、“因袭的”等词往往用来表示这种“历史”事实，它们是文明发展的产物，而不只是唯理论的专断或个别设计的结构）。还可以回忆一下伯特兰·罗素写的一本薄薄的书里的例子*。罗素大致是这样说的：“地球上要没有人，我们就无法想象伦敦或爱丁堡的存在；可是我们可以想象空间中两点的存在，一点在北，另一点在南，这就是现在伦敦和爱丁堡的位置。”可能有人要反驳说，没有人的存在，

* 伯特兰·罗素：《哲学问题》，1912年英文版。“即使地球上没有人 类来懂得南和北，即使在宇宙中根本没有思维存在，爱丁堡在地面所占的位置还是伦敦所占位置的北面。”（1967年英文版第56页）

就无法想象“思维”，就根本无法想象只有人们存在才存在的任何事实或关系。要是没有人，南北和东西能有什么意义呢？它们是现实的关系，但如果没有人的存在，没有文明的发展，这些关系就不会存在。显然，东和西是任意的和因袭的结构，也就是说，是历史的结构，因为在现实的历史之外，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同时是东也是西。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些词不是从一个假设患忧郁症的普通人的观点中，而是从欧洲有教养的阶级的观点中形成的。欧洲有教养的阶级，由于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使得这些词在世界各地都被接受。不仅对欧洲人，而且也许对加里福尼亚的美国人，甚至对日本人本身，日本都是远东。由于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日本人还可能把埃及称为近东。因此，由于地理概念增添了历史内容，“东”和“西”的说法只是表示不同文化综合体之间的特定关系而已。所以，当谈到摩洛哥时，意大利人往往称它是一个“东方国家”，就是指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明。然而这些提法是现实的；它们符合现实的事实。它们让人们从陆地或海上旅行，能到达他们所要到达的地方；让人们“预见”未来，使现实客观化，使人们理解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合理的和现实的是一回事了。

不弄清这个关系，看来就无法弄清实践哲学，弄清实践哲学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地方，以及上层建筑学说的重要性和意义。正如柯罗齐所认为的，说在实践哲学中，黑格尔的“观念”已为基础“概念”所代替，是不确切

的。其实，黑格尔的“观念”已溶解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之中；对哲学的整个看法已经“历史化”，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探讨哲学的方式已经开始存在，它比以前的方式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历史观点。

注：我们必须研究卢卡奇教授对实践哲学所持的态度。

卢卡奇似乎主张人们只能对人类史谈辩证法，对自然界则不然。他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他的论断以自然界和人之间的二元论为前提，那他就错了，因为他陷入了为宗教、希腊基督教哲学和唯心主义所特有的自然观。这种观念事实上没能把人和自然界结合，把二者彼此联系起来，除非在表面上。但是，如果人类史也应当理解为自然史（也应当通过科学史来理解），怎么能把辩证法与自然界分开呢？也许，卢卡奇在对《通俗读本》的奇异理论的反应中，已陷入相反的错误，陷入一种唯心主义吧*。

对过去哲学的评价

《通俗读本》中对主观主义的肤浅批评，是一个比较一

* 葛兰西根据什么证据提出这个公认非常不明确的批判，不是很清楚的。在卢卡奇自己评论布哈林的《读本》的论文中（见《狱中札记》第3篇第2章介绍，）卢卡奇说：“……〔辩证法的领域〕就是整个历史过程的领域。这一过程的个别的、具体的和不可重复的因素，正是通过它们之间的质变和它们的客观结构的不断转化来表现其辩证实质的。”即使在据说是最“唯心主义”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也好像没有坚持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的二元论。《葛兰西选集》（1959年法文版第153页注）中谈到《我通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1933年德文版），也没有证明葛兰西的论点。他的论点也许是根据德波林和当时其他人对卢卡奇的批评的说法。

般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哲学和哲学家们的态度问题。把全部过去的哲学估价为梦呓和胡话，这不仅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它提出了颠倒时代的要求，企图使过去的人也象我们今天这样思想），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残余，认为某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都是有用的，并用这种眼光来评论过去。方法上的反历史主义就是十足的形而上学。某些哲学体系被淘汰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这些体系在历史上曾经是有用的，而且起了必要的作用。所以，应当从整个历史发展和现实的辩证法来探讨它们为什么靠边站。它们理应靠边站，并不是从客观观点出发所作的道义上的断判，也不是有益于精神的判断，而是辩证的历史的判断。我们不妨对照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的说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过去是同样有效的。

在《读本》中，过去被评价为“不合理的”和“荒谬的”，哲学史因为从形而上学出发而成了关于畸形学的历史论文。（对比之下，《共产党宣言》包含对垂死的世界的最高度的赞扬。）如果这种评价过去的方法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是对实践哲学的背离，它能有什么教育意义吗？还能促进积极的活动吗？看来不会，因为问题已经等于是按某个人生于现代而不是生于过去某一世纪这一简单事实来推断他是个大人

^{*} 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译者注。）黑格尔的这个名言引自他的《法哲学》。参看《狱中札记》第366页注57。

物。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过去和现在，“当代”这个头衔严格地说属于笑话世界的人物*。

内在性与实践哲学

《读本》中有这样一个论点：实践哲学确实使用了“内在性”和“内在的”二词，但是，“显然”这种用法纯属比喻。好吧！可是《读本》解释了“内在性”和“内在的”在比喻上指什么吗？为什么这些词还在继续使用而没有被取代呢？难道这仅仅是对创造新词感到厌恶吗？通常，当一个新的概念取代一个旧概念时，旧的语言还会继续被沿用，但，确切地说，是从比喻上使用的。整个语言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运用比喻的过程，语义学的历史是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既是活生生的东西，同时又是陈列生命和文明的化石的博物馆。当我们使用“灾难”(disaster)这个字眼时，没有一个人可能指责我们信奉星占学；当我们说“天啊！”(By Jove!)时，没有一个人可能认为我们是异教神灵的崇拜者。可是，这些字眼确实能够证明现代文明是异教和星占学的发展。在实践哲学中，“内在性”一词是有十分确切的含义的，而这个含义却被比喻掩盖了。因此，我们不得不给它下个定义，使它明确起来。这样的定义事实上也许名符其实就是“理论”。

*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法国小市民。他把“当代”一词印在他的名片上。他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有一天，他终究发现自己是个大人物，因为他是一个当代人。

实践哲学继承了内在论哲学，但清除了它所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并把它摆到具体的历史基础上。比喻的用法仅仅指旧有的内在性已被淘汰。虽然它已被淘汰，但仍然被视为思维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新的用法就是从这个思维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此外，内在性的新概念是否完全是新的呢？让我们举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例吧！在他身上似乎就有这种新概念的许多痕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对布鲁诺是很熟悉的；他们了解他的著作，他们在他的著作上所作的旁注仍然存在；不仅如此，布鲁诺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等等不是没有影响的。这里是哲学史中值得深究的一些问题。

语言和比喻的关系远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加之，语言总是比喻的。也许不能完全说所有关于事物、物质和感性对象（或抽象概念）的陈述都是比喻的，因为这样做会过分夸大比喻的作用，但可以说，就所用词汇在以往文明阶段所包含的意思和思想内容来说，现代语言却是比喻的。一篇语义学的论文（例如米歇尔·布莱埃尔^①的论文）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某些特定词组的词义变化的从历史和批判角度重新编排的一览表。如果忽略这个事实，就是说对语言现象缺乏批判的和历史的概念，就会在科学和实践领域导致许多错误：

1. 美学性错误。今天，这种错误正被逐渐纠正过来，但

* 自柯罗齐以来唯心主义评论家们反复指出这样一个看法，布鲁诺以及十六世纪其它非正统的哲学家如泰莱修斯（Telesius）和康帕内拉的思想中包含一种“现代的”反先验论的思想形态的萌芽。这种观点甚至得到马克思主义者有保留的支持。

在过去，它曾是一种流行观点。美学性错误指这种概念：某些说法与其他说法相比本身是“美的”，因为它们是定形的比喻。修辞学家们和语法学家们死抱住某些小巧的短句不放，认为其中有天知道的什么抽象的艺术价值和要素。对词源学和语义学某些研究成果入迷的语言学家的这种十足书生气的“陶醉”，与艺术享受本身混淆起来了。在这方面，一个最近的病态的例子就是朱利奥·伯陶尼的《语言与诗歌》。

2. 实践性错误。关于固定的和普遍的语言的空想，它有很多拥护者。

3. 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帕雷托和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语言是错误的根源”这一问题^⑥。帕雷托和实用主义者们宣称他们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至少更新了一门专门科学，因此，他们赋予了语词以新的意义，或至少是新的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或者说创造了新的概念。这样，他们就发现他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的语词——特别是通常使用的，但也包括有教养的阶级、甚至同一科学的专家们所使用的——仍然保留它们原有的含义，尽管内容有所改变。他们便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工作。帕雷托创造他自己的“词典”来表明他创造自己的“纯洁的”或“精确的”语言的倾向。实用主义者们抽象地讲关于语言是错误的根源的理论（见布莱佐利尼那本薄薄的书）。但是，可能从语言中排除比喻的和引申的意义吗？不可能。语言是随着整个文明的变化，通过新的阶级创造文化和通过一种民族语言对其它民族语言占支配地位等等而变化的。语言所起的作用正是通过比

喻的形式从以往文明和文化中吸收语词。今天，没有人会想到，“灾难”（dis-aster）一词和星占学（astrologg）有联系，没有人可能认为对使用这个词的人的意思发生误会。同样，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可以讲“丢脸”（disgrace）* 而不被认为是宿命论等等的信徒。新的“比喻”用法随着新文化的传播而传播，此外，新文化也创造崭新的语词，或从其它语言中吸收崭新的语词作为借用语，并赋予它们以确切的意义，从而使它们失去在原有语言中所具有的广泛含义。因此，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按实践哲学赋予“内在性”这个词的新的“比喻”含义来学习、理解和使用它的。

命名问题和内容问题

作为一个凝固了的社会集团（即那个把自己看作在历史

* 照字面理解，“dis-grace”的意思是丧失天恩。因此，在逻辑上，它具有宿命论的含义。同样，“dis-aster”是指不吉利的星象。然而，在现代语言中，这两个词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思。另一方面，正如葛兰西在另一注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1948年意大利文版注159）中指出的，系统地使用新词作为避免用词方面任何可能的混乱的一种方法，有一段悠久的有意义的历史。在这一注释中，葛兰西谈到彼特罗·卓尔丹尼（Pietro Giordani）几年之后回忆他1805年与拿破仑的一次谈话。据说，拿破仑这样说过：“……我认为在科学上每当发现某种真正新的事物的时候，就得赋予它一个完全新的名词，这样意义才能保持确切分明。如果你给旧词一个新的意思，无论你怎么强调这个词原有的意思与新增添的意思毫无共同之处，人们却不由得总是不总是设想与原有的意思有某种相似之处和联系。”

上不断延续从而处于集团斗争*之外，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每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借以培养它自己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辩证过程的表现的集团)的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正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通过共同的概念命名把自己同以前一类知识分子联系起来。每个新的社会机体(社会形态)都创造一种新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的专门的代表人物和旗手(知识分子)只能被看成他们本身是产生于新的状况而并非以前的知识界的延续的“新”知识分子。如果这种“新”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以前“知识界”的直接继续，他们就根本不是新的知识分子了(就是说，同自然代表着新的历史状况的新的社会集团没有联系了)，而是在历史上已被淘汰的社会集团的顽固不化的残余。(这是新的历史状况还未达到有能力创造新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阶段，而继续存在于旧历史的陈旧的躯壳中的另一种说法。)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任何新的历史状况，无论它带来多么彻底的变革，都不能完全改变语言，至少是在它的外形方面。但是语言的内容必然被改变，即使很难直接对这种改变有一种明确的意识。此外，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是错综复杂的，因为在新的社会集团的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种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些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仍然沉浸于以往历史状况、有时包括最近已被取代的历史状况的文化中。一个阶

* 阶级斗争的一种委婉说法(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原故)。下面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培养它自己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观点，参看《知识分子的培养》一文，载《狱中札记》第5—14页。

级尽管它的某些阶层仍然具有托勒密的世界观，它仍然可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历史状况的代表人物。这些阶层即使在意识形态上落后（或至少是在他们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落后，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零散的和朴素的），但在实际方面，就是说从经济和政治职能来看，他们都是很先进的。如果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决定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即使文化适应实践领域，那么显然，这些“凝固的”知识分子是保守的、反动的。因为：新的社会集团至少认为自己是从前身分裂出来的，并与它的前身是有区别的，而这些知识分子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并认为他们可以把自己与过去重新联系起来。

然而，这并不是说要抛弃历史的全部遗产。对于那些“有用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吸收过来，以便继续加工和提炼。但是，我们怎样来区分有用的价值和应该立即抛弃的短暂的哲学价值呢？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我们接受了属于过去一种特殊倾向的一种短暂的哲学价值而拒绝了属于另一种倾向的一种有用价值，因为它与前者相矛盾，即使这种有用的价值对于表现新的历史文化内容可能有所裨益。

这样我们就看到“唯物主义”一词连同它过去的內容被接受下来，而“内在性”一词却因为过去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內容而遭到摈弃。难于使字面表达与概念內容相适应以及把术语问题和实质问题混为一谈，这足以说明哲学上的功夫浅薄，说明对于把握文化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缺乏历史感，换

言之，说明存在一种囿于形式逻辑的抽象公式的违反辩证法的教条主义观念。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唯物主义”一词不仅应按其受局限的专门的哲学意义来理解，而且应按它在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和胜利发展而在欧洲出现的种种争论中通过论战获得的比较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可用于将先验的东西排斥于思想领域之外的任何哲学学说。因此，它不仅可用于泛神论和内在论，而且可用于由政治现实主义引起的任何求实态度，也就是说，任何反对某些最腐朽的政治浪漫主义思潮的态度，例如马志尼*学说的通俗读物，尽管它们一直在传播着“使命”、“理想”诸如此类模糊暧昧和感伤的抽象事物。直到今天，在天主教的辩论中“唯物主义”一词还经常被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是严格意义的唯灵论，即宗教唯灵论的反面。因此唯物主义这个标题可以包括整个黑格尔主义，一般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感觉论和法国启蒙哲学。同样，根据常识的术语，唯物主义包括倾向于把生活的目的寄托在世上，而不寄托在天堂的一切。超出中世纪生产

* 不光通俗解说，而且马志尼原有的学说本身事实上都是极端含糊的和缺乏内容的。尽管他积极参与了1849年的罗马共和国，马志尼从未得以——特别是在1860至1870这些关键性的年代——制定关于教会和教皇地位的明确政策。他关于“上帝与人民”（Dio e popolo）的口号为各种自由的和新天主教的感伤主义提供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借口。在意识形态方面（1850年以后，马志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不直接表现在政治方面），马志尼主义代表着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的兴起同时的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浪漫爱国激情的衰退。

范围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都是“唯物主义”，因为它似乎是“目的本身”，为经济而经济，为活动而活动，正如今天对于普通欧洲人来说，美国是“唯物主义者”，因为机器的使用以及公司和实业的规模都已超出普通欧洲人所认为的“正常”限度——在这个“正常”限度以内，“精神的”需求才不受抑制。可见，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现在已经借用原来封建文化对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驳斥，一方面反对比欧洲更加发达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反对那些次要的社会集团的实践活动。（对于这些集团，在开始时和直到它们能建立它们自己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活动不能不主要是经济的，或无论如何从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表现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概念在语言中留下了痕迹。德语“geistlich”（精神的）也意味着“教士的”、“教士特有的”；俄语“духовный”一词也是如此。从论述实践哲学的许多作者那里，可以看到这种概念是多么普遍。对于他们来说，衡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着眼点正是宗教和有神论等。

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只能在下述事实中寻找：需要一种完备的和完善的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是哲学的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和论战的状态。但是，完备的和完善的体系永远是单个哲学家们的著作，而且在这些体系中，与历史上有关的部分、即与当代生活条件相适应的部分并存的总是一个抽象的部分。这个抽象部分由于与以往哲学有联系，与体系结构的外在的学究式的需要相适应，或出于

个人特有的风格，所以它又是“非历史的”。因此，一个时期的哲学不可能是任何体系的倾向或个人的体系，而是所有单独的哲学和哲学倾向，以及各种科学见解、宗教常识的总和。这种类型的体系能不能人为地创造呢？如果能够的话，是通过个人或集团吗？这里唯一的可能是通过批判活动，尤其是通过批判地提出和解决那些作为历史发展的表现而出现的问题。而这里必须提出和弄懂的第一个问题是：新的哲学不能与以往任何体系相吻合，无论它称为什么。用词方面的一致不代表概念方面的一致。

联系到这个问题，朗格的《唯物主义史》^⑦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虽然，这部著作也许或多或少已被以后个别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所取代，但是，以我之见，它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拥护者曾经从中获得关于他们的先驱者的知识和唯物主义的根本概念。大致说来，情况如下。有人首先武断地假设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传统的唯物主义，只是稍微经过订正和纠正（为“辩证法”所纠正，辩证法因此被吸收作为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作为它自己的逻辑——认识论）；然后，他从朗格的著作中找到什么是传统的唯物主义，并把这种唯物主义的概念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此，不妨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标题下面的概念总和较大部分的创始人和来源恰恰就是朗格。根据这一理由，研究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的文化和批判意义，何况朗格是一个既谨慎又敏锐的历史学家，具有十分精确、鲜明和有限度的唯物主义概念，他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费

尔巴哈哲学*看作是唯物主义的。这就使某些人（如普列汉诺夫）大吃一惊，甚至气愤。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术语如何是因袭的，但并非不重要。每当我们忘记需要回顾文化渊源来辨别概念的确切价值时，就不免发生错误和偏差，其原因是，同样的帽子可以戴在不同的头上。此外，我们都知道：实践哲学的奠基人（马克思）从来没把自己的观念称为“唯物主义的”，当他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对它进行批判，并断言批判应该更加彻底**。所以他从不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说法，而称它是“合理的”，以别于“神秘的”，这就赋予“合理的”一词一个十分明确的意义***。

科学与科学工具

《通俗读本》中断言科学进步，象结果和原因一样依赖科学工具的发展。这是《读本》关于“生产和劳动工具”的

*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明和批评的那样，不是严格的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建立在客观现实与人的主观的独立领域之间的一种基本的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 这里所指的可能是《神圣家族》中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章节 [VI, 3 (d)]。不过，这里，马克思对法国古典唯物主义远没有葛兰西所设想的那样严厉。

*** 关于这个问题，须重新研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论文。见马克思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所写的跋。他在其中论证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把它好好地倒过来，必须从神秘外壳中取出合理内核。可见合理的辩证法特别是针对黑格尔阐述辩证法的方法而言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应当由“唯心主义的”变成“唯物主义的”。由“唯心主义的”变成“唯物主义”是费尔巴哈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历史作用确立的总原则的必然结论。这个总原则导源于洛里亚^③。生产和劳动工具被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关系。但在地质学这门科学中除锤子之外，没有使用什么工具，而在锤子方面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却比不上地质学的进步。如果象《读本》主张的那样，可以把科学史归结为特殊的科学工具的历史，怎能产生地质学的历史呢？即便我们说地质学也建立在其他许多科学的进步上，所以这些科学工具史有助于说明地质学的历史，这也不怎么好，因为即使有这条出路，最后还是要进行空洞的概括，要求助于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更广泛的活动。因此，把地质学的座右铭说成“mente et malleo”（大脑和锤子）是很恰当的。

总而言之可以说，科学的进步不能以物质为标志。对不断改善工具——取得进步的一种手段的记述和对机器即科学本身的应用的记述最多也只能使我们对科学史的记忆深刻，而且还不一定。科学进步的主要“工具”是智力（甚至是政治）性质的和方法论性质的。恩格斯曾经写道*：“智力工具”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人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上获得、发展，并还在发展的。从科学领域里驱除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权威，这是对科学进步所做的一个多么伟大的贡献啊！难道这种驱除不正是有赖于现代社会的普遍进步吗？请

*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译者注）

回忆一下关于泉水之源的理論的例子吧！对泉水形成方式的第一个正确阐述可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等中找到。可以证明，在此以前，普通人对这个问题已有正确的见解，可是在当时的科学界却出现了一系列极其武断和稀奇古怪的理論。它们的目的是要把《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同良知的实验观察调和起来。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假设《读本》的断言是真实的，那么科学史和技术史又有什么区别呢？随着科学的“物质”工具的发展——这个发展是随着实验方法的到来在历史上开始的——一门特殊的科学即工具学也随之发展了起来。这门科学与生产和技术的总和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⑩。

我们可以从数学科学这个例子中看出《读本》的这个断言是多么肤浅。数学科学不需要任何物质工具（我认为算盘的发展不足以构成一个有力的反证）。数学科学本身就是一切自然科学的一种“工具”。

“技术装备”

《通俗读本》中关于“技术装备”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从柯罗齐发表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评述阿基尔·洛里亚*的文章来看，洛里亚似乎是第一个武断地（或出于从事独特发现的幼稚愿望）用“技术装备”取代“物质生产力”或“社会关系总和”的人。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译文见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回忆〈共产党宣言〉》）**

* 柯罗齐论述洛里亚的文章写于1896年，当时柯罗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属于非正统的。该文后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全集》1900年版第2卷第23—56页）中重新发表。它基本上是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攻击洛里亚把马克思庸俗化和剽窃马克思的观点的扩大说法。阿基尔·洛里亚（1857—1943）是一位学究式经济学家，却自认为是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颇受欢迎，不只是在意大利。洛里亚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历史经济主义”，这种理论是庸俗经济学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大杂烩，没有本质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兰西眼里，它代表“一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也是民族文化的某些颓废和古怪的方面”的典型……。（《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1943年意大利文版第169页）葛兰西把这个理论叫做“洛里亚主义”。

** 转引自柯罗齐《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41—4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下述从洛里亚著作中的引文和其它一些说法，也引自同一著作。因为葛兰西在狱中很难得到马克思的著作，这且从意大利文转译的这段从马克思著作中的引文对他说来异常重要。

下面是洛里亚对这个段落的改写（摘自《世界与社会制度》，1892年维罗纳德鲁克出版社意大利文版第19页；柯罗齐认为，在洛里亚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言论）：

“一定的生产体系、从而也是经济关系体系同生产设备的一定阶段适应，并以它作为依据，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存在的方式。但生产方法的不断演进迟早会引起技术装备产生彻底的变化，使前一阶段的技术建立其上的生产和经济体系变得不可容忍。这时过时的经济形式通过社会革命遭到破坏，而成为一种与生产设备的新阶段相适应的更高级的经济形式所取代。”

柯罗齐补充说：《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3节和第14章）和其他等处都强调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援引了技术史，但没有把“技术装备”说成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而又最高的原因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这段文章有“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经济条件”之类的说法，当然肯定经济发展决定于物质条件，但并没有把这物质条件归结为单纯“技术装备的变化”。柯罗齐又补充说，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从来没有把他的研究工作纠缠在经济生活的最终原因上。“他的哲学并不是那么廉价的。他并没有无缘无故‘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然后去寻找终极原因。”⑩

值得注意的是，《通俗读本》并没有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一段话，甚至提都没提。既然它是恢复实践哲学本来面目的最重要的权威性的资料，这就显得相当奇怪了”。不仅如此，《读本》中的思想方式在这一方面与洛里亚并

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甚至更加肤浅和更加需要批判。很难讲清《读本》中所说的基础、上层建筑或技术装备意味着什么。它所有的一般概念都是暧昧的、模糊的，而且它按如此泛泛而言的方式来设想技术装备，以致技术装备可以指任何形式的设备或工具，甚至包括科学家的实验仪器乃至……乐器。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徒然会使事情莫明其妙地复杂化。

如果一个人以这种奇异的想法作起点，就会引出一系列奇异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基础呢还是上层建筑？或者是科学家的专门的实验室又是什么？如果可以认为一种艺术或一门科学通过其技术装备的发展而发展的话，为什么不能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或者论证某些装备形式同时既是基础，又是上层建筑呢？这样就可以说，某些上层建筑有它们自己的特殊的基础，却不失其为上层建筑。印刷术也许是一系列意识形态、甚至一切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印刷工业的存在也许足以为全部历史提供唯物主义的论证。这就会遗留下纯数学和代数学的问题，它们既然没有自己的装备也许就无法发展吧！显然，《读本》关于技术装备的全部理论纯属一派胡言，可以与柯罗齐虚构的记忆理论相媲美。柯罗齐的这一理论是

* 参看《方法问题》，载《狱中札记》，第382—386页。葛兰西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他的最后岁月中致力于具体的经济研究，没有留下什么哲学性质的著作，结果马克思的哲学中的空白要由恩格斯来填补。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加之葛兰西或者不可能，或者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它们的重要性后来已经显示出来），他对序言的独特的重要性的强调，无论从葛兰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来看，或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思想来看，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要说明，为什么艺术家们不满足于纯粹在观念上设想他们的创作而要把它们写出来或雕刻出来等等（泰戈尔提出一种非凡的反对意见说，在建筑问题上，如果一位工程师要建造一座建筑物，来保持对他的观念的记忆，那未免太不象话了）。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只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幼稚的偏向，它起因于这样一种奇怪的信念，即一个人越退向“物质”对象，一个人就必然越正统。

反对经验主义

要研究一系列事实，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先要有一种“概念”，借以把这一系列事实与可能有的另一系列事实加以区分。如果一个人没有事先存在的选择标准，他怎么能选择事实以便提出证明自己的假设是真理呢？但如果这种选择标准不是一种超越于被研究的每一个单独的事实之上的事物，那又将是什么呢？一种直觉，一种观念，必须被认为具有复杂的历史，一种过程应当与整个文化发展过程联系起来看（等等）。这种观察也许使人联想到另一种对“社会学规律”的观察。一个人在后一种观察中只不过是把同一事实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把它作为事实，第二次却是把它作为规律。但这只是关于双重的事实的一种诡辩，根本不是什么规律。

“正统”的概念

从以上阐述的一些观点来看，正统的概念需要更新并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正统不是从实践哲学的这一或那一拥护者身上去找的，不是从与原有学说以外的思潮相联系的这一或

那一倾向中去找的，而是从下列基本概念中去找的：实践哲学是一种“自我满足之物”。它包含着形成一种普遍的和完整的世界观，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普遍的哲学和理论的全部基本因素。不仅为此，它还包含着促使一个完整的实际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也就是说，成为普遍的完整的文明所需要的一切。

这样更新了的正统概念，有助于对如此随便应用于不同的世界观、理论和哲学的定语“革命的”下一个较好的定义。基督教对于异教而言是革命的，因为它是新、旧世界的拥护者彻底分裂的一种因素。一种理论之所以是“革命的”，正是因为它是自觉分离并区分两个阵营的一种因素，而且是敌对阵营所无法攀登的顶峰。如果认为实践哲学不是与一切传统哲学和宗教敌对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思想结构，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人没有同旧世界决裂，即使他的确没有投降的话。实践哲学不需要外来的支持。实践哲学十分强大而又富有新的真理，旧世界可以从它这里获得比较新式而适用的武库。这就是说，实践哲学正开始支配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仍然是强大的，而且首先是较为优美、精巧的，它正力图象希腊那样在失败中采取对策，希望终于战胜它的不文明的罗马侵略者。

可以说，柯罗齐的哲学的大部分具有这种重新吸收实践哲学、并收容它作为传统文化的婢仆的企图。但正如《谈本》所表明的那样，甚至某些自命为实践哲学的“正统”的拥护者也落入了圈套，他们自己就认为他们的哲学从属于一

种一般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哲学，而其他人的哲学则从属于唯心主义。（这并不是说，实践哲学与旧有的哲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说与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相比要少。）我们在奥托·鲍威尔论述宗教的那本薄薄的书^①中可以找到关于种种结合的一些提法。这些结合是由下列错误观念引起的，即实践哲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哲学，必要时需要另外某种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的支持。鲍威尔提出的政治原理是：政党的不可知论，容许党员自行分为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徒，等等。

注：人们倾向于为实践哲学寻找一种一般哲学作为基础，从而暗中否认它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任何独特性。这种错误的一种情况表现为：把一方面实践哲学奠基人的个人修养即他年轻时代深感兴趣的而且经常复述其思想内容的各种哲学思潮和伟大的哲学家（然而他在复述时总是采取超然态度，并经常附带指出他使用这种语言为了使自己的概念更容易被人理解）同另一方面实践哲学的来源或组成部分混为一谈。这种错误，特别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有其悠久的历史。大家知道，在一个时期内，追溯伟大诗歌著作的根源这一工作成了许多有名学者的主要任务。这一问题从表面形式看是一种所谓的剽窃；但同样真实的是，即便在一些“剽窃”和确实是文学上的改写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能说剽窃或改写*有独创性。可以举两个有名的例子：1.坦西罗写给瓦斯托侯爵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经您解释以后，我有了美好的希

* 葛兰西作“per l'opera plagiata o riprodotta”，可能是笔误。

望》，被卓尔丹诺·布鲁诺改写为《论英雄的愤怒》（或《灰烬的晚餐》）*；2. 德·安诺西作为他自己写的发表的悼念多加里的死者**的诗，实际上是从多玛塞奥的塞尔维亚诗歌集中逐字逐句抄来的。布鲁诺和德·安诺西改写的作品中都具有新的独创风格，使人们反而忘却了原著。

研究马克思这样一个人的哲学修养，不仅有趣，而且是必要的。但不能忘记，这种研究完全属于谱写他的思想传记的领域。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黑格尔、法国唯物主义等因素既不是实践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不能把实践哲学归结为上述因素。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它对这些旧的哲学的超越，新的综合或新的综合的因素以及理解哲学的方式。还要记住，这种理解哲学的新方式的因素包含在一些格言之中，或以某种方式分散在实践哲学奠基人的种种著作中。因此完全有必要鉴别这些因素并连贯地加以阐发。从理论方面说，实践哲学既不能与任何其它哲学相混同，也不能归结为任何其它哲学。它的独创性不仅在于它超越了以前的那些哲学，而且首先在于它开辟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彻底革新了理解哲学本身的整个方式。然而从研究历史传记来说，人们可以研究

* 鲁伊治·坦西罗（1510—1568）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小诗人。他在卓尔丹诺·布鲁诺的《“论英雄的愤怒”》这一对话中以假想的对话人之一的身份出现。坦西罗成了布鲁诺哲学的喉舌。以对话Ⅱ为例，布鲁诺让他援引他自己的一些爱情诗，似乎诗的内容不是对女性而是对知识的渴慕。柯罗齐在《“美学问题”》（1910年意大利文版）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这一作品的美学意义。柯罗齐的论文也就是莫兰西的出处。

** 多加里战役（1887），在向厄立特里亚的帝国主义出征期间意大利的前卫部队在多加里战役中全部被歼。

为实践哲学奠基人从事哲学活动提供机会的那些关系。这里，必须掌握青年学者的心理，他在理智上往往被他研究和考察的新思潮所吸引，并由于这一过程本身的结果形成他自己的独特性——由于试验和比较如此之多的相互矛盾的思想而形成一种批判精神和独创思想的威力。为此，人们就必须找出他所吸收并使之与他自己的思想融成一体种种因素，特别要找出这里有什么新的创造。无疑，黑格尔主义（相对地说）是我们作者最重要的哲学原动力，特别因为黑格尔主义试图通过一种新的综合中超越传统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概念。那末，这种新的综合无疑具有完全迥非寻常的意义，而且代表了哲学研究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机。所以，《读本》中说实践哲学中是从比喻上使用“内在性”一词的，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内在性一词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既不是“泛神论者”所指的意义，也不是任何其它形而上学的意义，而是一种新的需要详细说明的意义。人们已经忘记，就一个非常普通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要强调的是第一个词即“历史”，不是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词。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现世主义和世俗思想，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人们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去探寻新的世界观的线索。

《通俗读本》中把物质理解为什么呢？一部通俗读物，更甚于专家们的书籍，特别象这种自命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书，不仅对它的基本概念，而且对它全部术语都应当确切地下定义，以免科学词汇的通俗的和庸俗的用法造成谬误。很明

显，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既不能把“物质”理解为它在自然科学中具有的意义（指物理学、化学、机械学等等，必须根据它们的历史发展考察和研究物质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为它在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中具有的意义。构成物质本身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等等）属性，是应当考虑的（除非退回到康德的本体概念）^②，但以它们成为生产的“经济因素”为限。因此，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要研究的是为了生产在社会和历史上是怎样处理物质的。相应地自然科学应当被看成基本上是一种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形形色色的物质属性的总和始终是一样的吗？技术科学史表明并非如此。蒸气的机械力被人忽视有多久啊？能说机械力在人制造机器并控制它以前就存在吗？难道不能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说，自然界并不是对预先存在的力量（预先存在的物质属性）的发现和发明提供机会，而是对与社会利益、生产力的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的“创造”提供机会吗？根据唯心主义概念，自然界无非是经济范畴，那么只要清除它的思辨的上层建筑，难道不能把这种概念归结为实践哲学的说法并证明它在历史上是与实践哲学相联系的，是实践哲学的发展吗？实际上，实践哲学并不研究机器以便了解和弄清机器材料的原子结构或它的自然成分的物理、化学和机械属性（这是精密科学和技术学的事情）；而只是因为机器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它才是特殊的社会力量的所有权的客体并代表一种与特殊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力的总和是历史发展中变化最少的

一种因素，它是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测定和衡量的一种因素，因而可能引起实验性质的观察和标准的产生；从而得以设想历史过程的基本轮廓。物质生产力的总和的变化性质也是可以衡量的。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找出它的发展不再只是量变而成为质变的一点。物质生产力总和同时既是以往全部历史的结晶也是现在和未来历史的基础：它既是记录，又是能动的和现实的推动力。但应用于这种力的能动性概念绝不能与物理学意义的或形而上学意义的能动性相混和，甚至也不能相比较。电在历史上是能动的，但它不仅是作为自然力而活动（例如，放电起火），而且是作为受人类控制、包括在物质生产力总和中的一种生产因素、一种私有对象而活动。作为一种抽象的自然力，电甚至在成为一种生产力以前就已经存在，但电过去在历史上并没有起作用，而只是自然史中一种假说的题材（更早一些的时候电在历史上“无声无嗅”，因为没有人对它感到兴趣，或者说的确对它一无所知）。

以上的观察有助于说明，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解释人类史的原理实际上纯粹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如果不说实际上回到过去意识形态的解释的话。举例来说，〈读本〉肯定说现代原子理论摧毁了个人主义（鲁滨逊精神）*。但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是说历史是由科学理论，换言之即由意识形态推动的话，那么把政治理论和科学理论这样混在一

* “鲁滨逊精神”是人们（如马克思）根据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对从假想的孤立的个人需要引申出社会生活形式的思辨推理的命名。

起又意味着什么呢？可见，由于想当一个超唯物主义者，反而陷入一种古怪的唯心主义。如果认为，不是原子理论，而是原子理论所考察和阐述的自然现实，摧毁了个人主义，就不免陷入更加复杂的矛盾，因为自然现实当然先于理论而存在，因此，甚至在个人主义盛行时，就已在起作用。如果“原子”现实在今天和过去都是自然规律，为什么它不能一直起作用而一定要人类创立理论才能起作用呢？难道人们只遵守他们所知道的规律，好像这些规律是议会法案一样吗？谁又能根据不能以不知法律为借口的现代立法原则，强迫人类遵守他们并不知道的规律呢？此外，也不能认为一门自然科学的规律与历史规律等同；或者由于科学思想的整个总体是统一的统一体，就能把一门科学归结为另一门科学，或把一种规律归结为另一种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是物理学的这种特殊因素，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有权利被归结为世界观的统一性呢？

的确这只是《通俗读本》中的许多原理之一，它们表明了《读本》对实践哲学问题的提法是肤浅的，无法赋予这种世界观以它在科学上固有的自主权，以及它在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上，或者更糟糕的是在与民间甚至把魔术当作科学这种庸俗见解特有的一般而模糊的科学观的关系上的应有地位。难道现代原子理论是“最后的”理论，一旦创立就永远不变吗？哪个科学家敢作这样的论断呢？难道它不能无宁说只是一种可以取代的，就是说可被纳入一种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理论中去的科学假设吗？那末，为什么这一理论的引用会

有这种决定性的意义，从而结束了个人主义问题和鲁滨逊精神问题呢？（完全违反下列事实，鲁滨逊精神有时可以作为用来说明一种倾向或用于归谬证法的实际模式，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者（马克思）也求助于鲁滨逊精神。）但是问题不仅如此。如果原子理论是《读本》所说的那样，既然社会历史是一系列的大变革，并已有多种社会形态，而原子理论似乎是永恒的自然现实的反映，那么社会怎么没有一直遵守这一规律呢？或者说，从中世纪行会制向经济个人主义转变违反科学吗？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和自然的误会吗？按照实践理论，很明显，不是原子理论解释人类史，而是相反，换言之，原子理论和所有科学假设及观点都属于上层建筑*。

量与质

《通俗读本》中说（只是顺便提及，因为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论证或评价，也没有表达一种内容丰富的概念，而是随随便便的，前后都没有联系），每一社会都大于其单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的总和。抽象地说，这一点是真实的。但它具体地指什么呢？它的解释——从经验上来说——是十分古怪的。据说，一百头牛如果一头一头算完全不同于把一百头牛摆在一起，这时已成牛群——这就把问题化为术语问题了。同样据说，在数字上十二成为一打，就好象不存在成双，成仨或成四（couples, triplets and quartets）等只是不同的计

*第468页，原子理论可以用来把生物学上的人解释为不同个体的集合体，而且以同样方式解释人类社会。简直在谈包罗万象的理论！

算方法。然而，最具体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解释就是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找到的那种解释，其中说明工厂制度中存在一种生产定额，不能分配给每个单个的工人，而只能分配给全部劳动力，即人的集体。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存在类似的过程，社会建立在分工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因此它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究竟实践哲学怎样把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具体化”，是《通俗读本》并没有深入研究，而认为人所共知的另一个棘手的理论问题。它满足于卖弄水的状态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固体、液体、气体），是决定于外因（火、太阳、碳酸的气化等等）的纯粹机械的事实。

对人来说，这种外因是什么呢？在工厂里这就是分工，即人们自己创造的条件。在社会里，这就是生产力的总和。但《读本》的作者没有考虑到，如果每个社会集合体是大于（而且不同于）其各组成部分的总和的某种事物，那就必然意味着，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原则不是物理学规律，因为在物理学上，除非从比喻的意义上说，人们是不能超出量的范围的。然而在实践中质也与量相联系，这种联系也许是它最有益的贡献。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却把也称为质的那种神秘的东西实体化，它把质变成它自己的本质即“精神”，就象宗教对于神的观念一样。但如果质的观念是宗教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本质，那就是说，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而不是为了解释的目的所必需的分析鉴别过程。那么对庸俗的唯物主义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因为它把物质的本质“神化”了。

这种社会观的看法应该与行为唯心主义者的国家观相比较。对行为唯心主义者来说，国家正是这样驾于个人之上的实体，如此而已（鉴于斯皮里托唯心主义地把国家和个人在和财产的关系上等同起来的后果，金蒂雷在《一九三二年八月法西斯的教训》中谨慎起来，提出一些条件的限制。）*庸俗的行为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沦为这种老生常谈，即认为只有幽默的讽刺才是唯一可能的批评。那么，我们不妨想象有这么一个应征的新兵，他一边向征兵的军官解释国家驾于个人之上的理论，一边要求他们给他具体的和物质的人身自由，而只征收能对建设被称为国家的某种全国性的东西作出贡献的某种神秘的东西。或者不妨回忆《短篇小说选》**中聪明的萨拉丁解决酒店老板和乞丐的纠纷的故事，酒店老板要求对享受从肉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付钱，而乞丐却不同意。萨拉丁便把铜板的叮当声敲给酒店老板听，让他把声音收进口袋，正如乞丐把散发出来的香味吃掉一样。

* 斯皮里托是法人国家的理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本来是金蒂雷的弟子和追随者。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脱离了金蒂雷的行为主义。1930年左右，他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曾联合金蒂雷共同反对柯罗齐和艾劳迪，但是他关于公民通过“法人”从属于国家的观点比金蒂雷的观点更加激进，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意味（关于“法人即财产”，参看《狱中札记》第291页）。这无疑 是金蒂雷提出条件限制的一个理由。关于葛兰西对整个辩论的估计，参看《狱中札记》第271—272页，《过去与现在》，1951年意大利文版第31—32页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1948年意大利文版第275—277页。

** 《短篇小说选》或称《百篇古典小说》，是现存最早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是十三世纪的作品。葛兰西大致谈到的这篇故事是第九篇。

目的论

对目的论这一问题的处理更突出地暴露了《读本》的弱点，因为它把过去的哲学学说一概说成是肤浅平庸的，从而使读者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过去的全部文化都是酗酒者的呓语中捉摸不定的产物。从各方面看，这一方法都是应受指责的。想扩大知识面和加深理解程度的严肃读者深信他是受骗了，会怀疑到整个体系。一般容易认为，只要对一件事情贬抑一番就已过去了，但这是一种纯粹表面的幻想。凡事采取取笑的态度，对于伏尔泰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伏尔泰这样的大艺术家。

例如，《读本》以最幼稚的方式提出目的论的问题而忽视了康德对问题所提出的答案。也许可以证明，《读本》中残存着大量不自觉的目的论，不知不觉地重复了康德的观点。参看例如《自然界和社会的平衡》一章³。

*歌德的《二人集》(Xenien)：“我们目的论者极其谦卑地崇拜世界的好心的创造主。他一创造栓皮栎，也发明了软木。”③柯罗齐在他论述歌德的一卷(《全集》，意大利文版Ⅱ，12 [i] 第279页)中加注说：“这种针对十八世纪普遍接受而最近受到康德批判的外在目的论，康德用比较深刻的目的观念来取代这种目的论。”歌德在其他地方和通过其他形式重复了同一主题并声明是从康德那里接受它的：“康德是现代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他这个人的学说对我的思想的形成最有影响。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以及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内在原因这一科学原理(用一句俗语作例子，栓皮栎并不是为了向我们提供瓶塞而存在的)可以说是我和康德的共同看法，后来我对他的哲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历史使命”的说法，难道不能追溯到目的论的根源吗？的确，在很多情况下，这一说法已经具有暧昧的和神秘的意味。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它的确具有一种从康德的目的论概念看来可以用实践哲学说明和论证的意义。

论艺术

在论述艺术的一章中肯定说，最近的美学著作坚持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可以把这种说法看作说明作者在批判上没有能力弄清不同理论中概念的历史和辨别概念本身的真实意义的最突出的例证。事实上，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性是在唯心主义美学（柯罗齐）在唯心主义前提下用唯心主义术语予以肯定的。因此，“内容”和“形式”并没有《读本》所设想的那种意义。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性意味着，在艺术上，内容并不是“抽象的题材”，不是小说情节和普通情感的特殊结合，而是艺术本身，是一种哲学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因素，等等。形式也不象《读本》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技巧。

《读本》中关于美学和艺术评论的一切论点和提法，都应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同时还可把论述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的一节作为例子，其评价是肤浅的而且极其一般。据我们所知，作者既不知道歌德的这首颂歌的确切历史，也不知道普罗米修斯神话在歌德以前，特别是在歌德从事文学生涯以前和当时在世界文学中的历史。但既然对这些因素没有确切的了解，又可能作出《读本》中提出的那种评价吗？没有这种确切的了解，怎么能严格区分属于歌德个人的东西和代表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集团的东西呢？这种评价只有当它们不是包含一些毫无联系的东西的空洞概括，而是明确、确凿、肯定的时候，才是站得住脚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就只能是对理论的羞辱并鼓励以肤浅方式来观察问题。（我

们不妨再次回忆恩格斯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致一个学者的信中的至理名言。)*

注 释

①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英文版。

②参见《狱中札记》第三篇第二章介绍。

③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部分。

④马里奥·伽索第：《教师与学生》1930年米兰意大利文版第49页。

⑤米·布莱埃尔：《论语义学》1897年巴黎法文版。该书英译本：《语义学：语义科学研究》1900年伦敦英文版。

⑥参见《狱中札记》第348页。

⑦弗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唯物主义史及对其在当代的意义的批判》，1873—1875年德文修订第2版。

⑧关于这个问题，参见G. 鲍非多 (Boffito) 的《科学的工具与工具的科学》1929年锡伯尔国际图书馆佛罗伦萨意大利文版。

⑨参见柯罗齐：《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43页。关于马克思“卖淫”黑格尔的辩证法，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⑩奥托·鲍威尔：《社会民主、宗教和教会》德文版。参见《狱中札记》第387页注13。

⑪参见《狱中札记》第367页注61。

⑫《二人集》(Xenien) 是歌德和席勒以哀歌体对句形式写的一部短诗诗集。这里的译文根据柯罗齐的意大利译文，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原本。

(谭爱清、李振国译，孟北校)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见注②)：“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一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中译者注）

历史唯物主义者布哈林

〔意〕吉诺·皮奥维查纳*

作为政治现实和学术观点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俄国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正向全世界传播着。它不是以司徒卢威、波格丹诺夫或布尔加科夫的修正主义的形式，而是按列宁的阐释、斯大林的形式掌握着政权。在这里我们应当简略地叙述布哈林的历史观，因为他在斯大林著书立说之前、在三十年代之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代表。……

俄国只有极少数曾经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科学教育的革命家，布哈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了听取维也纳经济学派的代表柏姆-巴维克的课，特地前往维也纳；他写了《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这个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们看到这本书以后评论说：这是对柏姆-巴维克的最杰出的批判。其次，《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同《食利者

* 吉诺·皮奥维查纳(Gino K. Piovesana)，生于1917年，意大利人，曾在米兰的两所大学学习哲学与神学，后专修俄国思想史，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到日本，在上智大学任哲学副教授，著有《苏维埃文化与唯物论》、《经院哲学的存在论》等。本文是他的另一著作《现代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前半部分，译文是从该书日译本（创文社1955年版）转译的。——译者注

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证明他的能力和他对经济学、社会学的修养深度的佳作^①。除这两本著作外，由于《共产主义入门》，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问世，布哈林的名字不仅在俄国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国外共产主义者中间广为人知。特别是后一本著作几乎译成所有国家的语言，并在他政治上不幸的1929年以前，一直是作为苏联思想家最杰出的代表作而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他反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问题上，他和斯大林发生了意见分歧。斯大林送给他“背离左派”的名称。但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个今天常用的原则上看，必须指出这种背离是有其理论根据的。按照韦特尔的说法，它正是包含在布哈林的在物与现象的内部和本质中不承认辩证矛盾的机械论之中^②。

但我们不能认为，布哈林为辩证法所下的定义是过分强调其外在性质的。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认为，“辩证法、矛盾的发展，首先是‘存在’的规律、物质运动的规律、自然界与社会运动的规律”^③。布哈林在谈到研究众多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辩证法时，尤其是就历史现象明确指出这些现象的客观辩证法。但他在谈到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时补充说，“第二、必须把各种社会形态从其内部变化过程中去研究”^④。从纯理论上讲，布哈林的辩证法和俄国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之间看不出多大差异来。其次，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位作者有机械论观点，尚不清楚。例如，要证明布哈林辩证法的正统性质，我们必须注意他是如何讲辩证法

的飞跃即量变向质变的转化的^⑤。

从纯理论上讲，布哈林的新东西就是关于平衡的观点即“平衡论”。尽管作者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试图把这个观点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联系起来，但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这种观点。今天，即使在非苏联著述家中间，也有人根据苏联官方哲学的观点把他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的平衡论不管它是何种谨慎的尝试，但它毕竟是把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辩证法的障碍中拯救出来的尝试。布哈林用“稳定的平衡”、“积极的动的平衡”、“消极的动的平衡”状态代替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对此我们可以带着笑容表示欢迎。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追随者中间常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置，从纯理论上看不到任何扬弃的努力。但布哈林作了一个尝试，而这个尝试中，有着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所有哲学所具有的价值。同一个过程即一种“量的关系”，由于其内在的力，通过质的和积极的变化，以这种关系的稳定遭到破坏而告终。在布哈林那里，自然界和社会的力没有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在第三个阶段，降低引起消极的综合，接着又是降低，再次出现这种降低的破坏以及新的、局部的恢复。从这种煞费苦心的笔迹中亦能清楚地了解到，布哈林是如何论述事物“内部”矛盾的^⑥。他观察到事物的内部矛盾在外部矛盾的影响下，第一阶段上的局部的平衡遭到破坏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的名言“（社会的以及外部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最初的证明或说明。

关于布哈林的观点，我们必须研究俄国社会学家拉舍

尔申强调的意见。他说，对布哈林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一个历史和经济学，而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理论”；它不是破坏各门科学，而是引导它们和向它们提供一种方法和观点。布哈林并没有离开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并且给各种意识形态赋予价值，反对了历史的经济主义，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拉舍尔申也指出，他把各种问题公式化，过于简单化。布哈林自问道：“如果我们承认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承认甚至连资产阶级科学家也承认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将是如何呢？”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布哈林当然是不能回答的，但他又诚实地作出了答复。他用“前提的虚伪性”，用他的基本观念作了回答，即动力在于物质基础的力量；过去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本身的内部结构^①。

布哈林的历史观带有非常浓厚的历史社会学的色彩，这一点似乎不需要再作说明。例如，第二章关于自由和社会学的决定论问题；第四章社会对个人的首要影响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不管它的理论价值多寡，今天他的观点已被抛弃，因此关于这位思想家也不需要评论更多的东西了。

注 释

①G.A.韦特尔：《辩证唯物主义》，维也纳1952年德文版第165—171页。

②同上，第166—167页。

③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俄文版第76页。

④同上，第70页。

⑤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俄文版第81页。

⑥同上，第79页。

⑦M. M. 拉舍尔申：《俄国社会学》，载于G. 古尔韦奇、W. E. 穆尔编的《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巴黎1947年法文版第695—697页。

(宋益民译)

平衡论批判简介*

〔日〕岭野修

上面谈到方法论的基础，但还不是经济学的具体方法论。在更具体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引人注目的和代表布哈林方法论特点的就是平衡论。克尼尔施说：“平衡规律的发现构成了理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这种平衡条件下观察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就是理论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以下见“克著”第28—31页）

布哈林讲的平衡这个概念本身具有非常突出的布哈林式的特点。“某种体系如果不能自动（即没有从外部加给它的能）改变本身的状态，人们就说它处于平衡状态。”^①布哈林从自然科学、力学中采用平衡这个概念，并转用于社会现

①

* 此文是岭野修《布哈林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关于平衡论的评介，标题是译者加的。作者就彼得·克尼尔施《布哈林的经济观点》（西柏林1959年德文版，本译文中简称“克著”）一书，分方法论、帝国主义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几部分较全面地评述了布哈林的经济理论。关于一些历史背景材料，作者均用脚注方式作了介绍。此文原载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第21卷第3期（1971年）上。——译者注

象。根据布哈林的说法，这就是“物质形成的辩证法”^{*}，而且只有它才能反映唯物主义的观点。

布哈林进一步把平衡区分为“稳定的平衡”和“不稳定的平衡”。在稳定的平衡中，体系处于不变的状态，或即使遭到破坏，又能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②。但是，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这种稳定的平衡，“平衡的破坏在现实中并不是导致丝毫不差地在同先前一样的基础上恢复平衡，而是在新的基础

^{*} 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年）一书中提出了平衡论。后来发表了不少对他这本书的批判文章，于是他进行反驳，1923年发表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一文，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迄今为止——而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人们试图使思维的过程脱离物质的过程，即试图把辩证法变为单纯的思维结构，变为同任何现实都不相符合的某种方法。在这方面，以麦克斯·阿德勒为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应当怎样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行为，即公然反唯物主义的歪曲行为进行斗争呢？十分明显，应当揭示辩证法的物质根源，也就是在运动着的物质的形式中找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相符合’的东西”。他又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中使辩证法摆脱了它的神秘主义的外壳，也就是把辩证方法唯物地应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领域。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理论上系统地叙述这一方法，并同样地在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论证。平衡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③布哈林很自负地认为，只有用揭示“物质的过程与物质形式的运动”的唯一方法即平衡论，辩证法才能成为唯物辩证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皮奥维查纳《现代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完全接受布哈林的上述观点并作了如下的评价：“布哈林的平衡论，不管它是怎样一种谨慎的尝试也罢，总的说来，它是从黑格尔辩证法的障碍中挽救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布哈林用‘稳定的平衡’、‘积极的动的平衡’、‘消极的动的平衡’等状态代替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对这种替代概念我们可以带着笑容表示欢迎”。他又说，“在马克思、列宁的追随者中常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置停留在纯理论上，看不出任何扬弃的努力，而布哈林却作了一个尝试”^④。

上造成新的平衡”^⑤。现实中只存在动的平衡。布哈林从这里引申出万物发展的本质和形式。他说：“世界上存在着各种起着作用的互相反对的力量。它们只是在某些例外的场合才在某一时刻互相平衡。……但是，只要其中的一个力量改变，

‘内在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平衡遭到破坏，如果立即确立新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是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各种力量的另一种结合下确立的。……运动是受各种不同倾向的力量的‘斗争’、‘矛盾’即对抗制约着”。“这个过程的形式：第一、平衡状态；第二、平衡的破坏；第三、平衡在新的基础上的恢复。……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全部运动的过程，它的基础就是内在矛盾的发展。”^⑥布哈林很自负地认为，把现实社会看作通过平衡、平衡的破坏、平衡的恢复而运动和发展的“动的观点”，彻底发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同时剥去其神秘的外壳，建立了真正的辩证法即平衡论这个唯物主义的基础。

布哈林的平衡概念又分为“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以下见“克著”第30页）。“内部平衡”表述作用于体系（事物）内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例如，人类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结合方式、生产部门之间以及产品的社会分配等等，亦即“结构矛盾”）。“外部平衡”表示体系（事物）周围的外部自然（环境）和体系之间的关系，它决定体系的整个状态、体系的发展、衰落和停滞。这就是说，就构成一切运动基础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关系而言，前者依赖于后者，内部矛盾的发展是通过内部平衡

与外部平衡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而实现的，而且只有内部平衡（内部结构）适应外部平衡时矛盾才可得到解决。“环境与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决定任何体系的运动的因素”^①。把这种平衡论应用于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由社会内部结构的矛盾决定的，而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的作用”决定的。自然的作用通过外部平衡及其破坏不断地作用于经济结构，并且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由上可知，布哈林的辩证法把事物与体系的运动，归根到底，不是用内部矛盾来加以解释，而是用环境与体系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平衡的破坏来加以解释，这是基本特点。这不仅是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一切事物是由于本身的内部矛盾

* “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并由各个部分（因素）组成的”事物即“体系”，被“自然界的其他因素”即“环境”包围着。体系本身包含着由内部结构（内部平衡）产生的“结构矛盾”。但是，譬如从人类社会看，“这些矛盾本身还没有消灭社会。它们是能够消灭社会的，……但暂时也可能不消灭”。因为它不取决于内部平衡的破坏（内部矛盾），而是取决于环境与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外部平衡（外部矛盾），它必须“依赖这种关系而变化”（我们可以认为，当布哈林说外部平衡时实际上考虑到“生产力”，这一点将在下边论述）。

布哈林把环境与体系之间的关系（外部平衡）区分为：1. 稳定的平衡——“以同一个量的对比关系重现出来”；2. 积极的动的平衡（体系的发展）——“将在新的、‘更高级的’基础上重现”；3. 消极的动的平衡（体系的破坏）——“新的平衡……将在降低了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他认为：“经常重现的环境与体系之间的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的基础”，“体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因素”。“体系的整个状况、它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衰落、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性质，决定着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向”、“内部结构（内部平衡）必须适应外部平衡的性质，……依赖外部平衡”^②（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而发展变化的观点格格不入的外因论，而且也不能解释何种原因引起环境与体系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它被批判为“波格丹诺夫的唯一论”和“机械唯物论”^⑥。

* 三十年代系统地批判布哈林的先驱是德波林。他在整理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根据列宁的评注写了《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批判》（1929年）一书。此书对布哈林的批判在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列宁的评注写的。这种做法在加·克鲁敏的批判中更为典型。他抓住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对布哈林的影响，列举布哈林的“辩证法的历史方法”、“资本主义的敌对矛盾体系”、“辩证法的历史观点”、“客观的社会的观点”、“社会体系”、“社会阶级关系”、“观点”、“体系”之类观念，批判了布哈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批判布哈林的很多文章中，批判他的平衡论最成功的文章便是阿·德波林的《平衡论与唯物辩证法》一文^⑦。德波林认为，布哈林受了波格丹诺夫的影响（布哈林本人在《自传》中说：“这个时期（即1908—1909年）我倾向于带有异端倾向的经验批判论，阅读了在俄国出版的有关这个方面的所有文献”），并继承了波格丹诺夫的思想。他写道：“布哈林试图把运动‘物质化’，同时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机械运动上、……在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个别形式之间划了等号。实际上，他是用最简单而低级的种类即在空间与时间中的简单的位移来代替了运动的所有实在的种类与形式。……机械运动不能包括自然与社会中存在的所有运动的质的多样性。这种运动形式只表现为不变的事物的简单的移动。但是，实在的运动不仅存在于物质、对象以及现象的简单的移动中，还存在于其质的变化及转化中。……他拒绝研究质的变化，用简单的量的增减代替质的变化”。因此，布哈林所讲的环境与体系之间的矛盾就“否定了决定物体运动的自己运动和内部原因；而对立统一规律就转化为纯粹外部的对立”，“否定了自己运动的原理”。德波林进一步指出，布哈林的平衡论与辩证法毫无联系，并作如下的结论：“平衡论的根本错误是把平衡普遍化、绝对化，因而把平衡从运动的特殊状态、运动的表现形式变成某种独立的、自成原因的东西。……运动过程的一刹那被固定下来并成为判断的出发点，变成整个理论的基本前提。归根到底，对象本身不变，运动是因某种纯外部的原因引起的，决不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把运动‘物质化’，但他实际上走到了否定运动本身的地步”。

拉·卢达斯批判了布哈林的因果理论。他认为，虽然布哈林没有完全忽视质

的差别，但他否定了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因而陷入决定论，最终陷入主观主义和唯心论^⑩。

马尔丁诺夫批判了布哈林把发展的概念同量的增加的概念等同起来的明显的错误，并就环境与体系之间的关系，亦即外部平衡的三种类型以及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展开了批判。在布哈林看来，社会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增长。马尔丁诺夫认为，布哈林“把社会的发展、衰落、停滞只在社会成员数量的停滞、增加、减少的意义上加以解释，……而在这个发展的模式中，社会的一切质变消失不见了”。但是，布哈林没有把上述逻辑贯彻始终，同时又承认了“质变”，于是这种尝试只能陷入折衷主义。布哈林“在说明矛盾的发展时，把只能用革命的方法解决的基本矛盾同那些用‘适应’的方法容易解决的次要矛盾等同起来”，因此在他看来，所有矛盾都可以用“适应”的方法加以解决。马尔丁诺夫认为，布哈林“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在于此^⑪。

米丁说，如果用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平衡的破坏解释运动，那么破坏本身又从何而来？于是只能求助于某种超现实的力量^⑫。

另外，在日本批判布哈林平衡论的代表之作可举岩崎允胤先生的《现代逻辑学》。书中认为，“用平衡的观点代替对立统一的观点，从外部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最后归结到内部与外部之间的量的关系上。……平衡无疑是哲学范畴，但还不是象‘运动’、‘矛盾’这样的基本的哲学范畴。而布哈林把它绝对化，并视作基本范畴，这种形而上学只能陷入外因论与被动论”。他还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的哲学基础是马赫主义^⑬。

最后，提一下可认作布哈林批判的总结性论著斯托里雅罗夫《机械论与辩证唯物论》。他把“机械论者”布哈林的所有错误归纳为如下几点：“（1）把一切运动，包括自然界与社会的一切运动都归结到空间中的机械运动，即和位置的移动等同起来；（2）把所有质的区别还原为象‘第一物质’那样没有质量的微粒子的纯粹量的结合，于是就回到毕达哥拉斯以前的那种‘世界的本质即数’的表述上；（3）陷入否定质的客观性质的主观主义；（4）错误地认为，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化复杂的东西为简单的东西’（比如，社会现象归结到生物学的现象，最后归结到力学现象等）；（5）用纯粹量的‘不断’增长代替‘质与量’的发展，否定‘飞跃’，从辩证法滑到庸俗进化论；（6）片面地机械地解释因果关系，否定作为必然性的一种表现的偶然性范畴的客观意义；（7）机械论者错误观点的方法论基础是不理解对立统一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辩证概念。按照他们的理解，对立统一就是相互对立的力的外部冲突。他们不理解对立物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关键范畴，因此也就不理解整个辩证法的体系。”^⑭

克尼尔施认为，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哈林的平衡思想是一种“平衡假设”（以下见“克著”第30—31页）。这就是说，在平衡状态的假设下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的出发点是某种现存的经济体系，而这种体系是以一定的平衡状态为前提存在下去的。这就需要考虑这种平衡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要分析抽象的理论模式中设想的稳定的平衡体系，并把复杂的因素放入其中，然后明确体系即使有变化亦能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平衡的必然性。

克尼尔施认为，在提出平衡假设的同时，布哈林又提出静态的与动态的观察方法。布哈林认为，从静态中研究稳定的平衡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这是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接着认为，动态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最重要的组成因素。现实中没有凝固不变的，一切都处于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万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因此，为了认识某种现象，就必须从其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进行考察，简言之，从运动中进行考察，而不能从假设的静态中加以考察”。布哈林认为，这种动态的观点与“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社会诸现象（自然界也如此）的规律性构成了上述动的平衡的基础。“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存在着客观的、各种现象本来所具有的规律性”，而“经济学的首

* 米丁说，布哈林把动态的立场与“辩证的、历史的立场”等同起来，并把“平衡”看作是“消除了更一般的观念因素的、运动着的物质体系的规律的表述”。

要任务”就是发现这种规律性。所谓“本来所具有的规律性”，就是指“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见到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布哈林认为，只有这种因果关系的说明才是“唯一科学的”^⑩。

* 勒维把布哈林同平衡论的因缘追溯到布哈林幼年时期的素质上，即他“对混沌状态的恐惧，向往秩序和平衡”，“倾向于系统组织起来的人”（这一点托洛茨基也曾指出过）等，同时归因于他没有学过哲学，尤其是实际上没有学过黑格尔哲学。因此，他只能以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偏爱和波格丹诺夫哲学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勒维认为，“布哈林的哲学处于法国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中间地位”^⑪。他还简要地介绍了卢卡奇和葛兰西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评论^⑫。

注 释

①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汉堡1922年德文版，第74—75页。

②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5、77页。

③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载于《进攻》，论文集，莫斯科1924年德文版。

④参见岩崎允胤：《现代逻辑学》，引文堂1961年日文版第204—205页。

⑤同注②，第78页。

⑥同注②，第75页。

⑦同注③。

⑧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23章。

⑨阿·德波林：《平衡论与唯物辩证法》，原载《真理报》1930年1月11日。

⑩拉·卢达斯：《机械的因果论与辩证法的因果论》，原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9年德文版（1967年重印）。

⑪亚·马尔丁诺夫：《社会的动的平衡以及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原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36年德文版（1967年重印）。

⑫亨·米丁：《辩证唯物论》，科学出版社1934年俄文版，第425—426页。

⑬参见岩崎允胤：《现代逻辑学》，第3章第1节。

⑭弗·伊·斯托里雅罗夫：《机械论与辩证唯物论》，白扬社1930年日文版，第37—38页。

⑮马·米丁：《辩证唯物论》，科学出版社1934年俄文版，第417—418页。

⑯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维也纳—柏林1926年德文版，第172—174页。

⑰勒维：《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的共产主义观》，维也纳1969年德文版，第28页。

⑱卢卡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载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论文集》，1925年德文版；葛兰西：《对一种通俗的社会学的尝试的批判性札记》，载于《现代君主及其他》，伦敦1957年英文版。

(宋益民译)

布哈林和列宁

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理论*

[美] 斯蒂芬·F·科恩

“布哈林……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列宁（1922年）

1914——1916年是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形成期。虽然作为俄国激进主义政治运动之一部分的布尔什维主义很早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许多特点，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才开始以脱离欧洲马克思主义主流而独树一帜的思潮的面貌出现。当时列宁及其反战派追随者，试图从投票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即将来临的大屠杀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大多数领袖们手里“拯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在这一愿望的鼓舞下，主要由侨居国外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使几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

* 本文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支持下写作的长篇著作《布哈林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1888—1938》中抽出来的一部分。作者在此还要特意感谢亚历山大·厄里奇和罗伯特·C·塔克所作的极为有益的评论。中译者注，科恩的这部著作于1973年出版，书名改为《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部政治传记（1888—1938）》。这是该书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正式出版时个别字句有改动。标题是本译文集编者加的。）

理论激进化的工作，从而促成了上述演变*。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是两项布尔什维克理论（即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和关于国家问题）的来源，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创立这两项理论的过程中布哈林和列宁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

人们知道布哈林在1917年以后，身居党的主要理论家的重要地位。可是他在革命以前的事业，尤其他在1915年至1916年间写的理论著作，人们就不那么熟悉了。尽管无论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还是对于布哈林本人的思想史说来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阶段**。1911年，二十三岁的布哈林流亡到德国，1912年定居于维也纳。这一年发生了他和列宁的第一次个人接触，布尔什维克史上风浪最大的、但有时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虽然他们早期的关系一般说是好的，但是在1915——1916年的激烈争论以前，在三个较小的问题上就有过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后来的大争执的先兆。第一件事涉及到列宁在俄国的受信任的助手

*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历的非激进化和再激进化的交替过程的研究，见罗伯特·C·塔克《马克思的革命思想》（纽约，1969年）第六章。当然，由布尔什维克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只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反战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恢复意识形态战斗性的运动的一部分。

** 关于布哈林在革命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贡献（此处指对国家理论的贡献）的最早的研究，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的《“国家消亡”的理论和实践》，载于阿莱克斯·英克勒斯与肯特·盖格合编的《苏联社会：论文集》（波士顿，马萨诸塞州，1961年）第113—126页。关于布哈林的党内历史，见德·马列茨基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载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8卷（莫斯科，1926年）第271—284页。（中译文见本译文集）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布哈林等人正确地(1917年得到证实)怀疑他是警察局的特务。第二件事是布哈林和另外两个青年布尔什维克1914年末建议发行一份新的党报。这种独立姿态招致了列宁的怒气冲冲的反对。最后一件事发生在1915年2月至3月的伯尔尼会议上，布哈林对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策略和口号提出了非难。

然而，他们之间所有这些实质性的分歧，包括伯尔尼会议上的分歧在内，都得到了和好的解决*。1915年夏天，经列宁同意，布哈林和另一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尤里·皮达可夫以及后者的妻子叶甫盖尼娅·博什迁往瑞典，以便加强党在俄国与欧洲之间主要地下交通线上的活动。布哈林在这里完成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并且开始写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阐释。这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新意识形态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两本书，代表了他在1917年以前主要的理论成就。

—

完成于1915年秋但1918年才全文发表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是对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布哈林主义”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观点的最早的和最重要的论述之一。布哈

* 西方史学家一向跟在苏联1928年后发表的叙述后面，夸大布哈林和列宁在伯尔尼会议上的分歧，错误地认为他们后来的争论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会议在三月结束后他们两人和鹿地分手，而在1915年末以前的通信中既没表现出感情上受到什么伤害，也没有观点上的冲突。见列宁信件，《列宁全集》第49卷（第5版，莫斯科，1964年）第86、88、108页。

林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来的一些概念和命题，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此后二十年间他关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想法里。这本著作包含的论点，对他后来作为左翼和右翼布尔什维克领袖而提出的政治路线，也产生了影响。《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划时代作品，它是出自布尔什维克之手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一篇理论阐释。这本书的完成比列宁的更为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要早好几个月。列宁曾从其中借取过许多内容*。

这本书的独到之处主要还不是它的个别思想，而是布哈林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和推广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方法。对于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它在国内的巨大增长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扩张政策，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和探讨。他们大多数一致认为，马克思关于这些新现象顶多只作了一点暗示；现

*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彼得格勒，1918年）本文提到它的时候都用该书的英译本书名《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纽约，1929年）。这本书的简略本最早刊登在1915年9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共产党人》第4—44页上。列宁在1915年底收到了该书的手稿。他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称赞的序言，与手稿一并送往俄国出版。在一次警察的突然搜查中两者都遗失了。布哈林的这本书终于在1918年得以问世，但列宁在1915年12月写的序言是以后才找到的。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1月21日的《真理报》上，英译本予以收入，见该书第9—14页。列宁在1915年底开始为自己的《帝国主义论》收集材料，1916年6月完稿。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路易斯·费舍尔《列宁生平》（纽约，1964年）第95页。书内有一处引用了布哈林的手稿。（《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65页）。列宁准备写作自己的著作时曾利用过布哈林手稿的另一证据，见《列宁全集》第27卷（莫斯科，1934年）第162、188、198页。

今的资本主义令人遗憾地和《资本论》里分析的“古典的”自由企业制度完全不相象了。1915年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预测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适应的著作*。正如他本人所乐于承认的，布哈林从这些著作里汲取了许多东西；但他的出发点和基本的启示是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里得来的。那本书于1910年一经问世就被公认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

希法亭的成就之一，就是他把帝国主义的出现和民族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深远的结构变化联系起来，也就是和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分析，进而描述了各种联合的所有和管理形式、特别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吞并和取代小企业的托拉斯和卡特尔的迅猛增长。希法亭尤其重视银行在垄断过程中的新作用，指出资本的集中是在银行系统的集中和积聚的伴随和推动之下发生的。他说，现代银行变成了大部分工

* 其中以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的著作贡献最为卓著。关于他们的著作以及一般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见E. M. 温斯基《帝国主义的模式：政权理论研究》（纽约，1948年）；乔治·利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及批判的研究》（纽约，1962年）第301—324页。

**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第三版，彼得堡，1918年）。此书俄文版最初于1912年出版，到1923年为止共出四版。尽管1917年以后希法亭站到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立场上，但他对苏联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学者们的影响仍是十分巨大的。

业资本的所有者。为了适应这个现象，希法亭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概念——金融资本：“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这种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叫它作金融资本。”^①他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并且进一步极为详尽地展示出它是一种因具有强烈的组织趋向而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模式根本不同的独特的制度。一旦金融资本渗透于整个经济，庞大的联合企业变为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有计划的调节便逐渐地消灭着以前小企业间放任无羁的竞争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民族的资本主义愈来愈成为受到调节的经济体系，或者用与希法亭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术语来说，变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金融资本》涉及的主要是新资本的民族的结构。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只不过是这个中心分析的“副产品”^②。垄断资本主义垄断了国内市场并且建立了对付外国竞争的高率保护关税以后，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走上了扩张主义政策的轨道；它向殖民地获取原料，更主要的是获取输出资本的市场。按照希法亭的分析，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在经济上合乎逻辑的对外政策。他概括地展示了，抱着同样动机的资本主义列强，就象过去个体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那样，为获取殖民地市场而进行着竞争。现代资本主义的日益军国主义化以及国际关系中不断增强的紧张局势（他是在战争爆发很久以前写出这些话的）都可以从这种发展趋势中得到说明。

布哈林把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拿了过来，但是力图把它革新并且在若干重要方面使它变得激进化”。他给帝国主义

下的定义也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政策”，但是他断言“金融资本除了帝国主义政策以外不能实行任何别的政策……”，因而“帝国主义不仅是与现代资本主义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体系，而且是后者最基本的要素”。布哈林比希法亭稍稍教条化一些，他把帝国主义规定为在资本主义特殊的（最后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出现的“历史范畴”。提供原料、过剩商品和资本的市场的殖民地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本身必不可少的因素：帝国主义“支撑着金融资本的建筑”。布哈林以这个论据去批驳当时盛行于社会民主运动中的观点：帝国主义政策尽管是可叹的，但它毕竟不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特征③。

既然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有机表现，这便导致布哈林和希法亭一样去分析战争的问题。但是，他在这方面和希法亭也有区别，他确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广泛传播的关于帝国主义各国可以不发生战争地共处、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将会出现世界经济的和平组织化（即考茨基说的“超帝国主义”）的假设都不过是“幻想”。在实行殖民地化的初期，帝国主义列强曾通过“占据无主土地”，以最小限度的冲突扩张自己的势力。然而，现在已经没有未被殖民化的地区了，出现了“彻底再分割”的必要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发展到了最尖锐的形式——武力争夺，它们拚死地争夺新的市场，

③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莫斯科，1925年，第107—108页。

* 他充分地表示了感谢。见《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36、64、71、107、109、123、135、136、142各页。

彼此以“火与剑”相向，弱者沦为强者的殖民地。

布哈林的主要论点当然是说，1914年的战争既不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一场孤立的火灾，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连串的“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但他的结论是，虽然帝国主义时代带来战争的恐怖，它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布哈林的总的论点和希法亭的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把希法亭的观察和逻辑关系改变为一条必然的、循序发展的历史方程式：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这个图式人们觉得很熟悉，那是因为它重新出现在（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并且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正统阐释的缘故。然而帝国主义理论（更不用说关于殖民地的理论）仅构成布哈林这本书的一个部分，因为他最感兴趣的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民族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和希法亭有些相象，而和列宁则很不相象^{**}。正是在革新和发展希法亭在这一领域内的新发现的过程中，他制定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围绕着这个概念，

* 见《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95、103、121、133、139、142页及其它各处。例如，希法亭虽然论证说军国主义政策是帝国主义的必然后果，但他似乎并不排除通过激进的政治行动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见《金融资本》第25章。

** 在《帝国主义论》里，列宁在讨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以前，写了一段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作为引言。然而他写得很简略，而且对希法亭没有做什么值得注意的补充。他的兴趣主要在国际的发展方面。布哈林和列宁的兴趣各有不同还反映在对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1902年）的态度上。这是一本专门谈帝国主义发展的著作。列宁十分看重它。布哈林根本没有提到霍布森，他的主要来源是希法亭。

他和列宁后来进行了许多年的争论。

布哈林认为，自希法亭的著作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化和托拉斯化进展得更加剧烈了。弱小的竞争者和中间形式的所有制的被消灭或从属化，与金融资本的无情的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把整个‘民族’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各生产部门之间有着组织联系的联合企业”。布哈林有时把这仅仅设想为一种趋势，但更经常是把它当做既成事实提出来的：“每个资本主义先进的民族经济都转变成某种‘民族的’托拉斯”。这是希法亭的分析中没有见到的论点。因为托拉斯化最终导致工业和银行的利益与国家政权本身的融合，所以他把这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而把这种制度叫做“国家资本主义”。他虽然指出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主要是战争动员所引起的，但仍认为这是一种长久的发展趋势：“未来属于那些近似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

布哈林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最惊人的特点是国家的新的干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指出，国家已经不单纯是某个（或某几个）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了，不单纯是各资产者集团之间自由经济竞争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了，它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73—74, 108、118—120页及第13章。虽然这是一个已经在使用的术语，主要和德国的战时经济有关，布尔什维克的作者们仍经常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光荣归于布哈林。例如，见恩·奥新斯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原载《共产党人》（莫斯科，1918年），第2期，第24页；列·克里茨曼《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2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19页，注3。布哈林曾声明对“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一词有发明权。

通过金融资本的作用，变成了经济中的直接组织者和所有者，“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特大的股东”和它的“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顶峰”。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庞大的、几乎象怪物一般的威力”④给布哈林的印象是这样强烈，以至在写完《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以后，他又马上着手写一篇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长文。这篇论文于1916年7月脱稿，实际上成为该书的续篇*。他在其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作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解释。

他从“拯救”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原来的看法入手。他解释说，有必要重述这些“老的真理”，因为热衷于同资产阶级国家合作并力求对它进行改良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忘记了或有意地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他们背弃了马克思的一条基本提法：“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最一般的组织，它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和扩大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与改良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不把国家看成一种“永恒的”现象，而看成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范畴”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按其定义应当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布哈林接下去说，与此同时，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反映着阶级社会的变化着的经济基础。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国家形式：自由资本主义表现为自由主义的、不干预主义的国

* 虽然1915年和1917年曾发表过这篇文章的摘要和内容概述，但全文（除了已遗失的结论部分）直到1925年才发表。〔《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载于《法的革命》第一辑（莫斯科，1925年），第5—32页。〕

家；金融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⑤。

现代国家与以往国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在重复他的关于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

地说，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资产阶级能让它继续保持完全无组织的状态”。所有其它的社会组织正在变为仅仅是“巨大的国家机器的部件”，最后只剩下无所不包的和全能的国家本身。他的描绘好象一场恶梦：

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最终类型，即一个把社会的活的躯体紧握在执拗而贪婪的巨掌中的铁的组织，就这样产生了。这是一个“新利维坦”，托马斯·霍布士的幻想在它面前好象是儿戏。甚至“*non est potestas super terran guae comparateur ei*”（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和它相比）^⑦。

正是这种民族的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构成了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寻求超额利润的帝国主义贪欲的驱使下，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利维坦投入了在国际竞技场上进行的流血斗争。帝国主义在他的理解中“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竞争的表现”，是“在世界的‘民族’大比武中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各个庞大的、联合的和有组织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⑧。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全球规模及其空前的残酷性就是由此而来的。

二

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模式，作为一个总

体来看，具有相当强的理论说服力和内在的一致性。它给马克思逝世后三十年内生活在与马克思所研究过的，显然不同的社会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崩溃，反而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在国内外继续扩张。同时它又在帝国主义的模式中找到崩溃的苗头，从而尽责地保持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即关于革命激变的假说。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被致命的矛盾所困扰，它注定要被革命所毁灭，战争就是它灭亡的催化剂和报信人。但是如果认真地逐字逐句地读，布哈林的理论就会引起一些麻烦的问题，有一些恐怕在当时就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是随着事件的发展才显示出来。

他的辩护者们后来争辩说，应当把布哈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理解为抽象的分析（类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所做的），理解为并非要和现实的每一方面相符合，而只是为了揭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过渡性趋势而设计的“化学纯”的模式。这个限定是有道理的，布哈林本人有时候也加上这样的限定*。但就其理论的大部分来说，布哈林十分明确地表示过应当按照它的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至少在大

*可参阅马列茨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载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8卷（莫斯科，1926年），第276—277页。布哈林在别处提到他的模式时说它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幅理想的图画”，然而又补充说“最先进的国家已经到达这个阶段……”。见《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甘金和费希尔译，载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斯坦福，1940年）第238—239页。另见他在《国家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批评者的答复，载于《新世界报》（纽约），1916年12月2日，第4、6页。

体的轮廓上。在1920年出版的有名的并引起争论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以及二十年代末期出版的修订本里，布哈林再次详细地陈述了这个理论。他原来观点的基本要素在这两个版本中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布哈林把自己的理论看作对当前资本主义现实的确切描绘，关于这一点的最清楚不过的证据，就是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在他心里引起的恐惧。他提到“今日的怪物，当代的利维坦”^①时的异乎寻常的带感情色彩的语句不是抽象分析的公式，而是激情的流露。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反复地使用“军国主义国家的铁蹄”的形象。这个措词肯定是从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里借用来的。这是关于将要到来的残暴的、法西斯型的残暴秩序的恶梦般地描写。其中的独裁“寡头”无情地粉碎一切反抗，宣称“我们要把你们这些革命分子踩在我们的铁靴下碾碎，我们将要在你们的脸上散步。世界是我们的……它将永远是我们的……”。从杰克·伦敦起到写出“永远踩在人脸上的皮靴”的警句的乔治·奥尔维尔，在全部反空想主义文学里，一直贯穿着这个“铁蹄”的形象，作为压在公民和社会头上的专制国家权力的隐喻**。布哈林也在展望

*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3章，以及他1929年5—6月间写的两篇论文，收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学院论文集》（第2版，莫斯科，1930年），第158—199页。

** 杰克·伦敦的这篇小说发表于1907年，为社会主义者所熟知。布哈林后来的著作中也有几处提到它。例如见于1919年9月14日的《真理报》，布哈林第一次用“铁蹄”这个措词是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里，见该书第62页，此后经常使用。关于伦敦和奥尔维尔，见马克斯·勒纳为《铁蹄》写的序言（纽约，1957年），第9页。

未来，从他的激动的语言里可以看出，他所见到的东西，使他心惊胆战。如果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必将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集权化成为兵营式的集权化；上层人物中的最卑劣的军国主义和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管制与血腥镇压的加强都是不可避免的”^⑥。

在他对于全能的“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的描述当中，布哈林预见到后来被称为“极权国家”的那种东西的到来^{*}，尽管是以他惯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也预感到这种发展趋势，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提出的那个极为痛苦的问题：“国家化”可能实行得如此广泛——社会经济基础将如此全面地从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并受它的控制，——以至自发的经济力量和危机将会消失，从而革命的前景也会消失，在理论上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吗？简言之，第三种现代社会——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可以想象的吗？布哈林从来不是一个回避不愉快的理论问题的人，从1915年到1928年，他先后四次提出过这个问题。每一次他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尽管他强调说，这种社会虽然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通过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1915年他第一次思考一种既非社会主义的又非市场的经济的可能性：

^{*}他写道，其他的社会组织“有一种倾向：互相联合起来变成统治者的一个组织。……这样就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即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全能的组织，它具有无数的职能，拥有巨大的权力，采用精神的……以及物质的方法……”。（《帝国主义强盗国家》）

我们可能得到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已经消失了；它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权力还保持着（甚至更会加强）。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可能和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经济最为相象。

在1928年又说：

在这里存在着“有计划的经济”，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方面而且在消费方面也实行着的有组织的分配。这个社会里的奴隶取得他的一份口粮，他的一份构成总劳动产品的实物。他取得的也许很少，但照样不会发生危机*。

即便在理论上这也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可能性。因为这意味着，历史的发展不一定导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可能带来另一种更加残酷的剥削制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关于公正制度的信念就会连同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一道化为乌有。布哈林从来不承认这样的结局是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它在他的头脑里盘桓了十三年（恐怕还要

*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57页，注2，《关于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第一部分的若干问题》，载于《共产国际》，1928年，第31—32期，第35页。他另两次提出这个问题，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26页；以及他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第4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92页。

** 这是斯蒂芬·科恩在他分析布哈林国家学说中得出的观点。——编者注

长久)。1917年以后，当需要联系着新出现的苏维埃制度考虑这个危险性的时候，利维坦国家的怪影无论在他的1918年初的左派共产主义，还是二十年代的渐进主义政策当中都是起作用的因素。虽然这个因素曾促使他为苏维埃发展倾向作过一些最不诚实、最牵强的辩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成为他的布尔什维主义里的自由化成分，并且是布哈林这个在公众面前一贯乐天的人产生内心恐惧的部分原因。这有力地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按着同一个鼓点前进的。

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了另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虽然布哈林在1915——1916年夸大了“国家化”和托拉斯化的规模和持久性，但是他判明了二十世纪的基本发展趋势。后来的几十年人们见到的果然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消失和以不同方式和程度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新型国家的出现，从受管理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到苏联和战时纳粹德国的那种高度动员的经济。布哈林的理论洞察力是现代的和适时的；在若干重要方面，他在1915——1916年的著作走在后来许多分析经济的国家调节问题的文献（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著作）的前面，这些文献的大部分也是围绕着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但是在对发展前景的描述上，他不得不对马克思关于反资本

* 这个问题经常和纳粹德国及斯大林俄国联系在一起讨论。例如，见弗雷德里克·波拉克《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界限》，载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第5卷，第2期，1941年，第200—225页；弗朗兹·纽曼《巨兽》（纽约，1966年），第221—234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定义的启示者希法亭反对把这个概念用于德国和苏俄。见他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国家经济？》，载于朱利安·斯坦伯格编的《三十年代的判决》（纽约，1950年），第445—453页。

主义革命到来的理论作出重要的修正。他把“集体资本主义”的组织能力描写得十分强大，实际上排除了这个制度的造成危机的内部矛盾。布哈林的模式对于前垄断的市场经济（更不提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没有给予什么重要地位，从而也没有重视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源的激烈竞争的作用。

个体的资本家正在消失〔布哈林解释说〕。他转化为 Verbandkapitalist（集合的资本家），即某一组织的成员。他不再和他的“同胞们”竞争；他们合作，因为竞争的重心转移到世界市场上，而国内的竞争正在熄灭下去^②。

正如他的党内批判者后来攻击的那样，这种观点和被布尔什维克视为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基础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极为相似的。

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布哈林把资本主义固有的最后灭亡的机制搬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舞台上。他断言资本的国际化造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此他在国际的规模上复制了一张马克思的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图画。“世界经济的特点，是结构上的高度的无组织状态”，它“可以同到本世纪初为止的典型的‘民族’经济相比较……”资本主义的危机现在更多是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战争是它的最高的表现^③。

通过把战争解释为经济竞争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形式，布

哈林在民族体系之外找到了革命的基本催化剂。以前，实力雄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曾经利用从殖民地榨取的“超额利润”减弱本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用牺牲被剥削的殖民地土著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办法提高工人的工资”。因为帝国主义的“惨祸和丑行”被局限在遥远的国度里，所以在西方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连结的纽带”得到加强。对祖国的感情和爱国主义“如何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便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世界大战“向欧洲的工人阶级显示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因而有可能“打断把工人们和……帝国主义国家捆在一起的最后一根铁链”并且动员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统治的”革命战争：

和成百万被屠杀的工人、被战争吞噬的亿万元财富、猖狂的军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压迫、对生产力的野蛮破坏、飞涨的生活费用与饥饿比较起来，欧洲工人们多得到的几文钱……算得了什么❶？

对于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文章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先进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要依赖于战争的提法是不会带来什么难题的。布哈林的主要目标是想把对革命的期待集中到另一焦点上，并在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恢复马克思的反国家主义观点。社会民主运动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无产阶级直接的革命目标应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从内部炸毁它”❷。但是，到了后

来，大战结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孤立的革命，布哈林面前只剩下一个颇为尴尬的设想，即今后的欧洲革命没有一次全面的战争是很难（如果不说不可能）发生的。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这个见解和他的稳健的国内政策发生了痛苦的冲突，那种政策是立足于欧洲的长期和平的。这意味着脆弱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国际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最后由于他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考虑了进来（这是他在1915——1916年并没有强调过的一个因素），使这个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那个根本问题，即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革命没有一场大的战争是否可能发生？直到最后仍然使他苦恼；在1928年至1929年，这成为他和斯大林之间在共产国际政策上发生的争论的主要问题。

三

和他以前的著作明显地不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领域（至少对于布尔什维克作家们来说），具有纲领的意义，也因此而引起了和列宁的严重争论。从表面上看，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几个月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提出的理论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两者对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给予了相同的总的解释，最后都作出了战争和革命不可避免的相似的结论。列宁看过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手稿，在准备自己的著作时曾利用过它；他没有表示过什么重要的不同意见，并且在

1915年12月为它的出版写了一篇极力称赞的序言*。布哈林无论当时或以后对列宁的作品，也没有表示过任何保留。直到1929年因他政治上的失败几乎所有他的理论著作都遭到攻击时为止，他的这本书和列宁的一样在苏联被奉为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布尔什维克的经典论述**。但是，他们俩人对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处理，仍有一些重要的不相同的地方。其中有两点可能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列宁的帝国主义模式建立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显然不同的认识上。虽然他也强调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基本的现象就是……自由竞争被……所代替。”但他却远远不那么倾向于作出民族经济中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已经消灭的结论。反之，他却论证，经济的部分垄断化“加剧着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看到的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图画——“某种过渡状态的东西，即自由竞争与垄断的混合物”，并得出结论说：“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驾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而且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列宁认为，所谓托拉斯化可以消

* 见第315页脚注。布哈林1915年以前的理论著作主要是谈奥地利的边际效用理论及其向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提出的挑战。见他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莫斯科，1919年），1912——1914年写于维也纳。

** 这是指两者都被列为党的教育机关的教材。另见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在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版，莫斯科，1923年）第五章里写的按语。

除内在危机的说法，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散布的神话……”，因而他比布哈林更着重强调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衰老。这种态度和布哈林的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大不相同，而那对于布哈林说来则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和基本的事实*。布哈林后来认为列宁未能理解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现象，这一点竟成为这两人之间从1917年开始持续到二十年代的一长串分歧的中心问题。

第二个重要分歧涉及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的作用。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里的论点与后来兴起的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并不矛盾。他后来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以上一点。但是在1915——1916年他确信帝国主义已经使经济的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变成了时代错误（他写“民族”这个词的时候打引号的习惯就是从这里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按其定义就是依靠暴力重绘“政治地图”，从而导致“独立小国的崩溃”**。在这方面，他的立场和

* 应当指出，列宁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议论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见《列宁选集》（3卷集，莫斯科，1960年）第1卷第723—724、731、740、781、790、812页。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分歧的程度直到1920年布哈林发表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才变得明显起来。他在那里写道：“金融资本消灭了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列宁纠正：“没有‘消灭’”。（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页）从1929年开始，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认识上的分歧被用来作为斯大林分子攻击布哈林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材料。例如，见M. 约埃尔逊《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载于《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8期，第26—43页。

**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20、144—145页；另见他的《小国出路何在？》，载于《新世界报》，1916年12月20日，第4页。例如，他认为比利时继续独立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

罗莎·卢森堡的激进的国际主义相似，尽管他们的帝国主义理论总地说来是不同的。

布哈林未能把反帝的民族主义看作是一支革命力量，这是他关于帝国主义的原来的论述中最明显的缺陷；他没有预见到战后时期的历史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反之，列宁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起义的可能性上，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方面的问题比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结构怀着更深的兴趣。他在资本的普遍国际化当中发现了一个为帝国主义灭亡准备条件的因素，那就是他称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东西。争夺殖民地的剧烈竞争和殖民地人民的日益增长的反抗都能以这个规律作出解释*。正如他在完成《帝国主义论》几个月以后很有远见地写到的：“〔……我们欧洲人〕……往往把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叫作‘殖民战争’。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⑥

列宁早期对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民族主义潜在的革命作用的关切，1914年以后在他对自决权口号的热烈鼓吹中得到反应。这必然使他和布哈林及另外几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那些人象大多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反对诉诸民

* 《列宁选集》第1卷，第705、788、812页。布哈林也承认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但是他更倾向于强调“经济的均等化”（《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07页）。

族主义，认为它是不适当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争辩开始于1915年末，表面上是围绕着《共产党人》杂志的控制权的问题，它是商定由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列宁以及他的助手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共同编辑的一份新创办的杂志。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登载了一篇与布尔什维克流亡者接近的东欧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狄克的文章。拉狄克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与罗莎·卢森堡、皮达可夫以及当时的布哈林的想法接近。列宁反对文章的观点，拒绝继续参与《共产党人》的工作，同时要求这个杂志停刊。理论上的分歧立刻转化为派别的对立。11月，设在瑞士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剥夺了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博什的斯德哥尔摩小组单方与俄国国内进行联系的权利，斯德哥尔摩三人集团的反应则是宣布他们这个布尔什维克支部自行解散^⑥。

11月末，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博什给中央委员会寄去了一组文件，概括了他们在自决问题上的立场，对列宁的立场进行了攻击。他们断言，这个口号“首先是空想的（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和有害的，这是一个散布幻想的口号”。帝国主义已经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直接的历史可能性；用民族的、“亲国家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唯一正确的策略是“不断把无产阶级推上世界斗争的舞台，经常把真正世界性的政策的问题摆在它的面前……使无产阶级的意识空前革命化”。虽然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特意从他们的论据中把“一些非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者说带有萌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殖民地）”排除

在外，他们在把自决的总原则当作纲领性口号的问题上和列宁仍有不可调和的分歧^①。

在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争论一直继续着并且变得愈来愈尖刻。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们被列宁对他的批评作出的激烈反应惹恼了。他们提醒他：“一切具有周密的理论的极左派”都反对自决的口号，“难道他们都是‘叛徒’吗？”另一方面，列宁把他们在在这个单独的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仅看作是理论上“无聊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上不忠实的表现。他指控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同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都毫无共同之处”，说他们要求进行公开讨论反映出他们的“反党的”态度^②。虽然在关于自决权的论战中列宁显然是把皮达可夫看作主要的恶棍*，但他对布哈林的攻击同样是非常激烈和不妥协的。他们之间的信件来往只起了扩大鸿沟的作用，其他布尔什维克所作的调停的努力反而使得列宁更加恼火**。根据某种不可靠的推论，他逐渐确信不仅从伯尔尼会议开始的布哈林的那些异端邪说，而且自1912年以来发生的所有那些较小的分歧，包括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分歧，都是一回事：“尼古·伊万，是个勤奋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向是支持他的。但是他（一）轻信流言蜚语，（二）

* 见克鲁普斯卡娅的著作，另，列宁所表示的尽管和布哈林有争论但仍然可以与布哈林共同工作的意见，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416—417页。

** 亚历山大·施略普尼科夫和季诺维也夫（后者至少有一次）试图调解争论。见甘金和费希尔上述著作，第245页；以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03—207页。

政治上极不坚定。战争使他沾染了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考虑到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一致看法，很难理解为什么列宁竟使他和布哈林的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非政治的因素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列宁的有名的爱争吵的脾气在1916年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处在一种“不能和解的情绪”当中。没有直接卷进这场论战的布尔什维克们对他的“不随和的气质”以及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不讲分寸”的作法提出过责难；布哈林表示希望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待西欧同志不要象对待俄国人那么粗暴，这大概是说出了许多人的意见^⑨。除此以外，看来列宁对于他这个年轻的弟子和各种非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广泛联系变得愈来愈气愤和疑心了。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布哈林成了主要由激进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反战运动中的出名的活跃人物。他和列宁周围的一群人脱离得愈远，就愈变得象是欧洲青年左派的一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员。至少在列宁看来是如此**。四十六岁的领袖和二十八岁的布哈林之间的两代人的摩擦几乎经常显露出来。列宁以他最好的家长风度议论说：“布哈林一伙的‘不能容忍的’”错误是由于“年幼无知……过五年也许会有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00页，以及208—209页。布哈林写给列宁的关于自决的信件没有发表。可以根据列宁的通信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0页的一篇文章判断出这些信的内容。

** 关于布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见迈克尔·富特勒尔的《北方地下》（纽约，1963年）。列宁对布哈林称赞荷兰左派领袖提出的批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列宁全集》第3版，第30卷，第251—256页）。

所转变”。反之，布哈林指责列宁思想守旧：“这是怎么回事？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对于二十世纪是‘有教益’的？……在自决口号方面，您是站在‘上一世纪’的观点上”^①。

列宁的态度同时也证实了别人的一种印象，那就是“人们和列宁的关系愈亲密，他和他们争吵得愈激烈”^②。这是因为即使在他们关系最恶劣的时期，他们相互间内心好感的证据仍时时有所表现。布哈林有时试图诉诸这种感情。他请求列宁不要“发表使我不可能恭敬地回答的那类反对我的文章……我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希望……分裂”^③。也不能说列宁总是无动于衷的。1916年4月，布哈林在斯德哥尔摩因参加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大会而被捕。听到他出事以后，列宁发出了一份紧急的营救呼吁；四月末，布哈林被驱逐到奥斯陆（当时叫克里斯蒂尼亚），列宁给在挪威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写信，请他向布哈林致以问候：“衷心地希望他好好休养，很快地恢复健康。他的经济情况怎样？”信很简短，但就当时情况来说，是温暖的，甚至是慈父般的。但慈爱的态度保持得不久。到了七月，列宁又告诉季诺维也夫说：“我现在对布哈林也恼火得无法写信”^④。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00页）；另，列宁关于对任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应抱容忍态度的慈父般的呼吁——这是他本人很少遵循的一条忠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4页。布哈林的言论，见Д.巴也夫斯基《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载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29年，第11期，第37页）中援引的布哈林的未发表的信件。

四

列宁和布哈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尽管有一些引起激化的附带因素，但本身的确是实在的和持久的，一直到1919年，还时而爆发出来。但是，现在冒出来的这个更加严重的分歧，情形就不同了。1916年初，列宁决定亲自主持出版一本纲领性的论文集。他约布哈林写一篇“经济问题”的文章^③。布哈林却给他寄来一篇描绘出一个“新利维坦”形象的论文《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最使列宁恼火的那一部分包括了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阐述、他的“用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号召以及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差别只是在经济集中化问题上的挑衅性的结论：“并不象许多人以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④。恢复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国家主义论点对布哈林具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是从他对“新利维坦”恐怖的预感中得出的结论，并且能够满足他强烈的爱好自由的意向；其次，这是他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激进化的主要尝试。这类战斗性的信条无论在爱德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那里，还是在考茨基正统学派那里都被彻底抛掉了^⑤。少数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是安东·潘涅库克和瑞

* 布哈林就这件事对罗格伦和潘涅库克都曾加以赞扬（《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30页；还有他1916年10月给列宁的信，载于《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7页）。

典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策·霍格伦——更早就回到了反国家主义的命题”。但布哈林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布尔什维克，光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列宁的不愉快。

列宁最初想把这篇文章作为“供讨论的论文”发表出来，但因为他正为他们别的分歧生着气，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认定这“无疑是不合适的”。整整两个月，他既不说明理由也不通知布哈林^⑨。最后，1916年9月，他才写信告诉他稿子不登了（“很抱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那一部分，列宁解释说：“很好，有用”，“但十分之九可以公开发表”，应当“稍加”修改后在其他地方发表。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国家问题的理论阐述却是“根本错误的”；列宁反对布哈林对国家的“社会学的”（阶级）分析；他指责说，作者援引恩格斯的话是“分割了的”；最主要的是，布哈林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没有差别、关于“社会民主党应该坚决强调自己同国家政权在原则上的敌对性”的论断是“极不确切的，或者可以说是错误的”。列宁宣称布哈林的思想是“没有经过周密考虑的”，甚至是幼稚的，奉劝他：“让你的……思想成熟起来吧”^⑩。

布哈林对列宁新近的不满，事前是一无所知的，拒登稿件使他很受刺激并且发怒了。他们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辩论，这时他已经无意让构成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的关于国家的思想“成熟起来”了。他在写给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信件里为他的思想辩护。通信战从九月打到十月；象以前一样，每来往一次信件都使争论变得更加尖锐和

扩大”。列宁（在季诺维也夫支持下）指责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忽视革命后国家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错误地把……‘炸毁’国家……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等等“很大的错误”^⑧。这一场反对他的新的运动，使布哈林确信列宁的不满已经不仅仅限于理论问题，而是“在于全盘”的。他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很清楚，你不过是不想要我这个合作者而已。请不要担心：我不会死气白赖”。他挑战式地开始发表自己关于国家的见解**。和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正式领导的彻底分裂似乎迫在眉睫了。

9月末，布哈林从挪威转移到哥本哈根，决定去美国。促成这个决定的原因不完全清楚。他和列宁关系的恶化大概是主要原因，虽然其它因素——他的天生的流浪者的性格，在现代资本主义要塞内部开展党的工作的愿望——也可能起了作用。这时候他们的争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活动。在这里“笼罩着伤心和沮丧的气氛”^⑨。十月初，布哈林回到奥斯陆，从这里登上了赴美的轮船。

* 与这次争论有关的几封信，包括列宁的信在内，还没有发表。关于至今未发表的列宁的信的证据，见《列宁全集》第五版，第49卷，第297、478、541页的注378；还有《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8页的注1和注4。不过，从该期《布尔什维克》（第86—93页）发表的几封信以及《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306—310页列宁10月14日的信里可以判断出未见到的几封信的内容。

**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6—87页。九年以后，在发表他原来这篇论文时作的脚注里，他对他违抗列宁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决定作了解释。（《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5页，注1。）

在这个时刻，列宁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已经使布哈林不可挽回地疏远了他们。他焦急地向斯堪的纳维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组织者亚历山大·施略普尼科夫指示说：“请来信坦率地告诉我：布哈林动身时情绪如何？他是否会给我们来信？是否会履行对他的委托？……”^⑧正当列宁突然感到不安的时候，寄来了一封布哈林的长信。这是一封告别信，布哈林在其中再次坚决地顶回列宁的指责，谴责他制造和夸大了他们的分歧，捍卫自己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说那是“正确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随后，他又用了引人注目的一段话转述某些社会主义者是怎样解释列宁发动的反对他的运动的：“他们说，我所以最终被踢了出来，是因为‘你的列宁不能容忍任何另外一个有头脑的人’……”。布哈林把这类臆测斥之为“无聊”，然而他这是于无意中一语道破了他和列宁之间的紧张状态的隐藏的根源以及他本人对领袖身边的谄媚的随从们的看法。不过在信尾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恳求：

我对您有一个请求：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论战以及其它等等，请保持一种不至于引向分裂的语调。如果共同工作，即便是将来的共同工作，竟变得不可能的话，我将感到非常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我对您怀着十二分的敬意，把您看作是我的革命导师而爱戴您。”^⑨

这是一个强烈的呼吁，列宁作出了好意的反应，虽然是

以他本人特有的方式。他立刻给布哈林写了一封“温和”的信，坚持他的指责仍然有效、分歧“完全是”由于布哈林的错误主张造成的，与此同时也夸奖了他几句并且断言：“我们对您的评价一向是高的”。他最后说：“如果论战只在同挑起论战的基辅斯基〔皮达可夫〕之间进行，如果和您的分歧得到消除，我将感到由衷的高兴。”至少在私人关系方面，这已经是列宁作出的很大的让步。布哈林对这封信也是这样理解的，在启程以前发出了一封最后的表示和解的短函，重申他与皮达可夫的“绝对的一致”，但为此事导致了与列宁的冲突而深感遗憾。他最后写道：“望顺利，并请对我宽大为怀……我拥抱你们大家”^②。

五

最后的决裂避免了，但是他们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的令人大吃一惊的收场却还在后面。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说他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二是他忽略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后一条指责来得特别奇怪，因为布哈林小心翼翼地强调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关，而不是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有关。他在几个地方着重说到在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它自己的暂时的国家权力组织……”^③。布哈林被列宁的指责搞得莫名其妙，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在斯

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被认为是走在反无政府主义的行列最前头的人，而您却批评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⁸。列宁之所以会误解，看来有意或无意地是他对布哈林的新立异的企图一开始就抱有敌视态度的副产品，布哈林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新解释制定出一个与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对立的激进提纲。在布哈林提出来以前，列宁没有想过这个问题；1916年12月，列宁许愿说以后要“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⁹。其结果是他的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1917年2月17日列宁忽然告诉另一个布尔什维克：“我正在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跟布哈林的见解固然不同……，跟考茨基的见解更是针锋相对。……布哈林比考茨基要好得多……”列宁仍作了保留：“可是布哈林的错误在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中也可能使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但是两天之后他再次声称布哈林（尽管有些“小错误”）“比考茨基较接近真理”并说他现在建议把布哈林的文章发表出来¹⁰。他剩下的疑问很快就消逝了。1917年夏天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带来了领袖的口信——“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告诉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

⁸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8页。布哈林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和列宁的误解在悉尼·海特曼《布哈林的无政府主义神话》一文中作过结论，该文载于《洛矶山脉社会科学杂志》（1963年4月），第39—53页。

了”**。

列宁的大转弯的最充分的证据是1917年的晚些时候出现的，也就是在他完成了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其中的论据和结论都是布哈林的。列宁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暂时还需要一个新的、革命的国家，但它必须“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因此“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然后他泰然自若地总结说：“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虽然这是在1917年以后并未实现的诺言，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总算是把反国家主义的态度变成了正统布尔什维

* 布哈林1925年发表该文时附带说明了这一情况，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5页，注1。关于他讲的克鲁普斯卡娅带口信的事实，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甚至斯大林在1929年也认为：“很可能，娜提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真地向布哈林说过布哈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斯大林解释说，这仅仅表示列宁相信布哈林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1页。布哈林可能在克鲁普斯卡娅传话以前就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写的片断文章里，或从当时也在纽约的柯伦泰那里知道列宁改变了想法。实际上，列宁很可能在至今没有发表的1917年2月17日写给布哈林的那封信里已经告诉了他。见《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479页。

**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93、423、464页及其它各处。题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这本著作是列宁于1916年12月决定写一篇有关这篇文章的产物。在1929年以前，苏联公认是布哈林首先恢复了马克思的反国家主义观点，而列宁后来的表述是在他的带动下产生的。

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很少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哈林，还是对此作了大量阐释的列宁，都没有预见到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产生的那种国家。布哈林想象的仅是一个“管束被推翻阶级的工具”的革命国家。列宁把它想象成一个已经处于“消亡”过程中的非官僚主义的“公社国家”。这两者都是虚幻的构想，和1917年以后关于苏维埃国家是实行现代化的工具、是“改造社会的基本杠杆”^②的新认识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1917年，反国家主义的主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促进了全党的激进化，帮助造成了举行打倒取代了专制制度的临时政府的起义的社会舆论。列宁的权威使反国家主义的观点获得了合法地位，但真正的首创权却属于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也正如在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作中一样，他对于俄国革命前夜出现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形成，作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的贡献。

* 见《列宁文集》第2卷，第284页注7。马列茨基在他1926年写的布哈林传略中也是这样申明的。见《布哈林》276—277页，直到布哈林倒台为止，这种论断没有遇到任何异议。在布哈林倒台后，首创权交给了列宁，有时交给了潘涅库克。见巴耶夫斯基《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第42页。不过，即使在1929年以后，有大量材料为证的列宁受惠于布哈林的事实有时候也得到承认，尽管是勉强和拐弯抹角的。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19卷，第479页注155。在二十年代中期，在回顾那次争论以及列宁最初的“不正确的”立场的时候，布哈林认为列宁的功绩在于测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5页注1；《进攻：论文集》第267—270页。关于这个问题另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国家消亡”的理论和实践》，载于阿莱克斯·英克勒斯与肯特·盖格合编的《苏联社会：论文集》（波士顿，1961年），第113—126页。

注 释

①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第3版，彼得堡，1918年）第332页。

②温斯娄：《帝国主义的模式：政权理论研究》第159页。希法亭仅在《金融资本》的结束部分分析了帝国主义问题。第438—553页。

③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84—85、104、114、149页及整个第九章。

④见上书第129页，以及第124—129、148—149、151、155页。

⑤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载于《法的革命》第一辑（莫斯科，1925年）第6—14页。

⑥同上，第15—18、21—22、25、27页。

⑦同上，第18、28、30页。

⑧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20、135页。

⑨布哈林：《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第238页；另见《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29页。

⑩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31页。

⑪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17、25页；另见《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53、119—120、124、164页。

⑫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53—54页；另见第87、106—107、119、120、123—124页。

⑬同上，第164—167页；《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第239页。

⑭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30—32页。

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4页。

⑯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斯坦福，1940年）第215—216页。

⑰这些文件转载于同上著作，第219—233页。

⑱同上，第221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页；《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214页。

⑲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239页注156；还有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32年第22期，第86页上的布哈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②① 贝特兰·D·沃尔夫：《列宁主义》，载于米罗拉得·N·德拉哥维奇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世界》（斯坦福，1959年）第51页。

②② 摘自《列宁全集》（第3版）第29卷第261页注解9中援引的一封没有发表的信；同样见于列宁在1916年后半年写的并于1932年在《布尔什维克》第22期第87—88页发表的另一封信。

②③ 《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213、220、260页，他提到布哈林时语气再一次尖锐化（第254、255、283页）。

②④ 同上，第222页。

②⑤ 见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13页。

②⑥ 见罗伯特·C·塔克：《马克思的革命思想》（纽约，1969年）第188—198页。

②⑦ 见列宁7月末和8月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271、287页。

②⑧ 同上，第293—294页。

②⑨ 《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293—294页，还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5—166页。列宁对Nota-Bene（布哈林）的攻击。

③⑩ 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斯坦福，1949年）中收入的施略普尼科夫的回忆录，见该书第250页。

③⑪ 《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302页。

③⑫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2年第22期第87—88页。

③⑬ 《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305、306—310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32年第22期第87—88页。

③⑭ 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第32页；另见第13、30页；同样见于《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66页；还有《新世界》（纽约），1916年12月2日，第4、6页。

③⑮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5—166页。

③⑯ 在给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里，见《列宁全集》（第5版）第49卷第388、390—391页。

③⑰ 见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第166页。

③⑱ 见布哈林：《进攻：论文集》（第2版，莫斯科，1924年）第268页。

（田大畏译自《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 杂志
第21卷第4期，第436—457页，1970年4月出版）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经济发展论*

〔日〕日向健

一 序

苏联二十年代关于工业化的论争以及从二十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经验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它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后进各国不能沿着古典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这在目前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现在，人们把发展看作是实行何种政策的结果①。的确，苏联的经验是在完成对旧社会的社会及阶级结构的基本改革之后，实行某种政策——虽然也有人认为实际上并无计划——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集体化的时期，党的领袖是斯大林。他于1922年4月就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在党的组织中迅速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②。但除了民族问题，他并没有被人

* 标题是编者加的，原标题是〈斯大林的经济发展论〉。

** 1928年斯大林在评论彼得大帝时说，他“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引自《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5页。）

们看成是理论家。实际上，在有关工业化的论争中，他的态度也许是如厄利奇所说，是站在右派和“左派”的“跷跷板”上；又如塔克所说，是道地的斯大林式的发展^③。但是，如果把他视为一个用理论来表达没有定形的有力见解和感情的领导者，那么，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的观点去读他的著作^④。分析斯大林的思想，就可以预见后来的党的政策及其变化。我们可以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反映了许多内容，它是二十年代末工业化与集体化的转折中决定历史的重要因素。

二 一国社会主义论

斯大林关于发展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是不是他的发明，尚有争议，但强调“一国”者就是他一个人^⑤。

一般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开端是斯大林在1924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如下提法：“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但“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⑥。他在1926年1月说：“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问题即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上面的提法“就有缺点了”^⑦。他把“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

社会主义的问题”和“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分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了后者^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式。但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主张，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1917年8月，斯大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⑥1920年10月，他又说：“只有在俄国革命之后西方紧接着爆发更深刻和更严重的革命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的观点已“被事变推翻了”^⑦。接着，他又列举了“支持”孤立无援的社会主义俄国继续存在和胜利的条件，即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红军，还有西方的革命运动等条件^⑧。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说，重点当然在于前三个条件。1921年8月，他还说，经济落后的俄国“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搞经济建设，并且俄国这个“社会主义孤岛”，“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就不得不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进行妥协，“以便取得必要的技术装备”^⑨。在这个时候，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仍不明确，直到1924年5月才首次提出了上述公式。同年12月，他不恰当地援引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并指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但“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个观

点与1926年的公式是一致的^④。因此，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指责上述观点说，好象托洛茨基主义就意味着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但它的本来意思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掌握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⑤。不过，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本来就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意思^⑥。

但是，溪内谦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争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场论争既不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也不是应不应在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前一个问题已经由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用行动回答了，而后一个问题，在1923年西欧革命已变成遥远的事情之后也就成为自明的道理。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看，问题在于俄国要单独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⑦。从这个角度上看，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还反映了要“把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俄国的自然条件结合起来，俄国不依赖欧洲革命而只靠一国力量能够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落后国家领袖的……健全的……富国强兵的思想”^⑧。在这里，社会主义的概念有些变化，它的确符合和体现了处境严酷、孤立无援的苏维埃俄国的民族主义。但是，溪内谦认为，斯大林把随机应变的手段提高到原则的高度。从斯大林的信念来看，这个意见并不一定妥当^⑨。斯大林一贯坚持的信念是，落后的俄国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从上面援引的斯大林论文发表的日期上看，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与其说是党内论争的产物，不如说是他的信念在论争过程中表述得越

来越明确了。即使是孤立无援和贫穷落后，共产主义者应不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呢？这个问题提得无疑是正确的。因此通常指责左倾反对派的要点之一，就是说他们缺乏这种信心^⑧。但是，在这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低生产力、低技术、低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它给社会主义的质带来的影响等问题，缺乏一种客观的洞察^⑨。

的确，正如塔克所说，斯大林强调“一国”。塔克把这一点看作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区别，并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有两种类型，承认有斯大林的类型。因此，那种认为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只是采用了左派政策的看法是不充分的。他过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布哈林派人物^⑩。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斯大林的主张是怎样沿着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轨道发展的。

三 工业化、集体化与斯大林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工业化论争的初期没有作出显著的贡献，他只是布哈林派的一个成员。按照塔克的说法，布哈林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创始人。但斯大林不是死心踏地地做布哈林派，他后来分道扬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述。的确，斯大林最初是一个布哈林派，所以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布哈林的观点。

1. 布哈林

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属

于党内的极左派。1919年曾与他后来的论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过《共产主义入门》。由于战时共产主义受到挫折转入新经济政策体制时，布哈林变成了典型的新经济政策拥护者。他曾经这样来表述他的思想：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些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②。他又说，由于俄国的特点是广大农民的可怕的半封建的野蛮性、经济上的落后性和西欧资本主义的近代形式相结合，而布尔什维克继承了这一点，所以“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相当长的”，对广大农民阶层的改造只能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农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的农业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③。这就是布哈林对新经济体制的俄国长入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他把重点放在农民经济与农民市场上：“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同样，“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这种互相依赖的系关是最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④。重点在于使市场关系得到稳定地、顺利地发展。他认为，对于苏维埃的工业来说，市场主要是指农民市场，所以工业品的高价政策只能缩小农民市场，即便它在短期内能够获取高利润，但从长远上看，就会导致工业的慢性停滞，因此他反对这样的政策^⑤。他认为，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的汪洋大海与社会主义工业的有机结合，这便

是市场关系，苏维埃的制度也依赖于这种关系。因此，必须在“不使自己脱离农民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工业”^⑧。也就是说，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恢复市场关系，促进农业的复兴与发展，它又反过来扩大国营工业的市场，发展工业。这就是所谓螺旋式的关系^⑨。在这种看起来过于乐观的想法中，包含着对新经济政策的如下的理解：无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化了的大工业、运输、银行、信用制度等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如同一张网，自上而下地管理着国民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个体经济的发展通过与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交换能够加强社会主义化的部门，也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加快改造农业所必需的工业力量的形成，因而商品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危险；因此，关键在于维持市场平衡的条件下稳步发展，而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必须“从非计划经济逐步地”向“计划经济”过渡，所以这个市场平衡就是决定性的因素^⑩。

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到了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就产生了变化。恢复期即利用闲置设备的阶段结束了，转入以新设备的建设为重点的改造时期。于是，产生了新问题，即必须把经济拉到新技术的基础上来，这就需要巨额的固定资本。从何处找到这个资金的来源呢？这就成了问题^⑪。布哈林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不曾怀疑过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因此，斯大林转变态度后开始批判他了。布哈林一贯重视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无产阶级政权相结合的市场关系，而为了使这个市场顺利地发挥其作用，他强调了维持平

衡的必要性。他认识到农民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斯大林把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格申克龙在和维特做对比时曾说：“农民市场问题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重要性。它对工业化的关系也已经根本颠倒了。……降低农民的需要就意味着国民产值中投资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出口量的增加”^⑧。关于这一点需要用统计方法进行研究，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农业的地位颠倒了，并推行了全盘集体化，结束了新经济政策的体制。

2. 斯大林（之一）

斯大林在1925年12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亲自支持了布哈林，并表示将来也继续支持他。由此可知，到那个时候为止，斯大林并没有什么与布哈林的路线特别不同的主张^⑨。

斯大林关于农民经济的思想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关于俄国农民的特点。他认为俄国农民由于跟无产阶级一起经历了三次革命的锻炼，因此“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他们习惯于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他们是实行工农联盟的最好对象^⑩。接着，他就农业的社会主义化问题，发表了和布哈林相同的观点：“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⑪。但到了1929年12月，他把关于俄国农民特点的论述进一步推向极端，甚至说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化的纲领不适用于俄国。关于这一点将在后

面详谈。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与布哈林的观点不同的。布哈林曾说，俄国农民不论贫富，都把自己看成是十月革命前的庄稼汉，他们都希望经济上富裕起来，因此穷的对富的又妒嫉又尊敬。尽管农村里有剥削的和被剥削的人，但不一定憎恨富裕农民，所以，农民是一种既可走向资本主义也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稳定的力量。因此，只能通过使农民阶层中的核心即中农得到好处的合作社，把农业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②。在这里没有象斯大林那样的对农民的乐观态度。布哈林的方针和斯大林把农民与合作化相结合的做法也有明显的区别。布哈林说的合作社，是和农民的利益实行妥协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

斯大林农业观点的第二个特点是，认为农业集体化不一定以工业化为前提，它本身就包含着解放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他说，即使没有改良土地和机械化措施，只精选优良种子就可以提高生产^③。1929年12月，他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甚至认为，只要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成立“初级集体农庄”，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④。农业集体化不一定以工业化为前提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可以说，这种早期断断续续提出来的意见，后来就成为颠倒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当然，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就上述第一和第二点上曾经也讲过党内公认的观点。但可以说，到了1929年底，他很明显地抛弃了这些观点。于是，他和布哈林发生了分歧，但这时还没有发展到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对立。

工业问题也是如此。斯大林曾经说，通过粮食等农产品

和工业品的交换，工业和农业相互依赖，“工业所赖以生存的是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发展工业的顺序应该是“首先扩大轻工业和金属工业”^⑧。由此可见，在这里他和布哈林是一致的。可以说，在1927年，在实际政策问题上他确实属于始终如一的布哈林派。但是，在新经济政策体制问题上，我们不能说他的观点一直是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下面就谈谈不同点。

在1924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出农村工作中的缺点，承认农村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的弱点^⑨。同年10月，他说：“农业的发展却引起农民的瓦解和分化，形成两个阵营”：“富农阵营”和“贫农阵营”。关于农村中商品短缺等问题，他说：“在市场上和在农村中煽动对苏维埃价格政策进行这个新斗争的是富农、投机分子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贫农“愿意保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愿意保存专政所赖以支持的那些“经济杠杆”^⑩。这些话使我们联想后来的大转变。另外，1924年末至1925年初外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的暴动，似乎给他以很大的刺激。

1924年12月，斯大林说，如果不改进农村工作，“俄国各地都会重演格鲁吉亚发生过的事件”^⑪。第二年1月，他甚至说：“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新的唐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⑫。同年11月，他说，八年前的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和“目前时期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反映了我国革命发展中的转折点”^⑬。

他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农民个人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和他们为进行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留下的农产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接着又警告说，在农民中间普遍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了^④。他在这个报告中还批判了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⑤。由此可见，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界限早已存在。

关于工业化，他在上述报告中提出了“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的主张^⑥。翌年即1926年，斯大林的观点就更加明确了，他放弃了过去对农民的乐观态度，认为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它既可走向资本主义也可走向社会主义，极不稳定，其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和无组织^⑦。同年4月，他又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而现在“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商品奇缺的原因是工业生产力落后，因此必须迅速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中心……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机器制造业”，“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⑧。这样一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调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了。尽管如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仍然强调农民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指出在缺乏资金来源的情况下，迅速增加投资是不切合实际的。1926年4月，他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德聂伯水电站计划^⑨。总之，基本上以新经

济政策为前提，这一点与过去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工业，特别是第一部类的工业，这是和布哈林不同的地方。

斯大林是从对农村状况的担心以及对农村的基本认识出发，把重点移到加快工业化的问题上来的。但是，他在1927年3月发表的题为《关于我国工业政策的问题》的报告，仍然与布哈林的观点完全一致。其中提到：由于降低工业品价格，扩大了农民市场，农民的需求决定工业的发展^④。同年9月，他在谈到农民阶层的分化时还说，富农只占极少数^⑤。他还说，农业集体化要逐步实现，因为集体化的前提是农业机械化，而现在无法筹措农业机械化需要的大笔资金^⑥。但是到了同年11月，为了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他肯定了相对地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作为一个资金来源提到伏特加的专卖问题^⑦。尽管如此，他的整个调子并没有多大变化。

3. 斯大林（之二）

在1927年1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农业状况明确地表示失望。他抱怨发展速度缓慢、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村文化水平太低”以及经营状况分散等，并断言农业“还是一个便于富农分子进行剥削的场所”，因此它的出路在于“国有化工业应当而且一定要加速发展”，这是“农业机械化”的保证，同时为了使它具有实际意义，农业经营必须采用集约耕作的大农庄^⑧。摩西·莱文指出，斯大林使用“集体农庄”一词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的^⑨。尽管如此，“在斯大林那里，集体化尚未变成实践的课题”，“集体化

……还不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论”^⑤。从后来的实践来看，莱文的话是正确的。莫洛托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报告，其内容与布哈林派的意见一致。但是，我们看不到斯大林对农业表示满意的评价。关于农民阶层的分化，他说：“富农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因此，“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⑥。

对工业的看法也有变化。由于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商品荒暂时还不能消除。他说：“况且不加速发展重工业，要充分发展轻工业也是不可能的”，“我想，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一切都很好的”^⑦。过去他在第聂伯水电站工程问题上批判过托洛茨基，而现在对巨大建设项目、巨大企业给予高度的评价^⑧。他在总结中说，苏联“现在正处于从恢复工业和农业转到改造全部国民经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全部国民经济的时期”^⑨。不过，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主张。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报告中甚至说，苏联的工业是世界上最大最集中的工业^⑩。转折接踵而来了。但再看不到斯大林对工业的这样乐观的言论。1928年1月，他谈到工业的“严重落后性”和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赶超先进国家的问题^⑪。

转折是从粮食收购危机而来的。1928年初，大批左派超工业化论者被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西亚。“但是，同时他们的可怕预言也变为现实而展现在眼前了”^⑫，粮食收购量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比城市人口需要量少二百万吨。

1928年初，斯大林到西伯利亚。他把造成危机的原因归

于富农的行动。他在此前不久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还说，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商品率都很低以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但这一年的收成并不很坏，因此把直接的原因归于富农^②。他认为，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搞集体化，而且“单靠农业局部集体化却是完全不够的”^③。他还说，苏维埃制度不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与个体小农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之上，但必须“逐步”实行集体化^④。

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则，在1919年的党的纲领中也提到了。但它必须在能够装备农业的工业和自愿的原则基础上实现。这是恩格斯的思想，也是党内普遍的看法^⑤。但是，斯大林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指出，第一、单是把小农的农具集合起来使用的“初级集体农庄”就很有效，只用精选良种、用铁犁代替木犁就可以把产量提高百分之十五^⑥。这就是说，集体化不一定要以工业化为前提。第二、由于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教训，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斗争，因此，他们是实行工农联盟的最好对象。接着，他又说：俄国“没有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⑦，因此，苏联农民与西方农民不同，恩格斯的提法不适用于俄国。他强调俄国农民的特殊性，并主张集体化不要以工业化为前提。这个演说发表在1929年12月，而加速推行集体化则从10月份早已开始了^⑧。集体化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统一认识，但在如何实行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日期上看，斯大林的讲话

是宣传正在加速推行的集体化的正统性，而不是提出施政纲领。他在这个报告中，也提到了消灭富农的问题^⑨。

粮食危机不仅仅是农业危机。和过去相比，“国家只能收到所有谷物的一半，只能出口二十分之一。而旧俄国曾出口一千一百四十万吨的谷物”。虽然从1926年开始恢复了粮食出口，但到1928年实际上又停止了^⑩。这就危及工业化本身。同农民的关系，不仅影响粮食出口，也关系到制度本身，“新经济政策和制度面临着真正的危机”^⑪。

斯大林分析困难，把原因归到工业落后的问题上。他说：“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大量供应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⑫只要农村仍然停留在低生产力、低商品率的小农经济状况，两者就会发生矛盾，正如厄利奇所说，这“完全是死路一条”^⑬。加之，去年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实际需要也就增加了，这就加剧了商品荒。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谷物价格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要工业品的供应量不增加，就只能产生通货膨胀。到二十年末，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以能够消除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其原因就是他们都企图以新经济政策为前提，在这个范围内想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1928年，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说，不反对从农业中吸收工业所需要的资金，但工业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农业，农业提供的原料以及出口剩余粮食的多寡制约着工业发展的速

度。这是以农业为主导的思想，是维护工农业之间平衡——不是简单的静态平衡——的主张，是为新经济政策体制的正当性而辩护的主张^⑮。

但是，斯大林已经把情况看成死路一条，因而他的对策也不同。他从加速工业化中寻找出路。他说：“工业的改造意味着把资金从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去”，但“只有在三、四年以后才能出产大批新商品”，因此还不能马上从根本上解决商品荒问题^⑯。那么，从什么地方得到加速工业化的资金呢？可以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后者不仅向国家交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这是一种向农民征收的“额外税”、“贡税”和“超额税”。这虽然是在发展工业、“消除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之前无法避免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我们工业和我们的国家……不能不向农民征收这种额外税”^⑰。问题是如何征收。斯大林说：“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食的”，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体制就不全面了，而布哈林还不能理解这一点^⑱。似乎集体化发挥了作用，政府能够把余粮控制起来，出口粮食也随着集体化的进展急剧增多了^⑲。这就使我们看清斯大林关于集体化的独立见解的意义和重要性。集体化是实现工业化的保障。

可以说，1928年1月是斯大林观点的转折点。在他着重考虑的工业化问题上，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能够看出有些变化，但他对今后的预测仍然是乐观的。到了

1928年1月，调子完全变了。总而言之，农业集体化保证了出口大量谷物来换取大量的设备，也保证了日益发展的工业工人的口粮。

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斯大林的提法是始终不渝的：主导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工业，而不是农业；必须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工业。1946年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到消费资料工业。1952年，他亲自总结自己的经济观点时说：“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④这也就是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总结。

因此，这里所说的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规律带着这样的一个烙印，即它是对从帝俄接受下来的、非独立的、依赖外资的产业结构中建立独立经济结构的基础的这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总结。关于这一点，冈稔先生早在1956年在《对苏联工业生产的分析》一文中已经提到了。

注 释

①宇泽、稻田，《经济发展与变动》，岩波书店1972年日文版第62—63页。

②E.H.卡尔，《一国社会主义》，企鹅出版社1970年英文版第1卷第191页、第2卷第219—246页；I.多伊彻，《斯大林传》，企鹅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232—238页；溪内谦，《苏共党内官僚制度》，载于《现代行政与官僚制度》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日文版上卷第183—219页。

③亚·厄里奇，《1924—1928年苏联工业化论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英文版第94页；R.C.塔克，《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载于《斯大林主义》一书，诺顿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77—108页。

④I.多伊彻，《斯大林传》第292页；溪内谦，《现代社会主义之考察》，

岩波书店1978年日文版第225页。

⑤R.C.塔克：《革命家斯大林》，查特与温达斯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第377页。

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61页。

⑦同上，第61页。

⑧同上，第64—65页。

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74页。

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30页。

⑪同上，第331页。

⑫《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87页。

⑬《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4页、第7卷第17、139—141、169—170页。

⑭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山西译，角川文库1968年日文版第6分册第259页。

⑮参见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总结与展望》、《不断革命论》等文章。

⑯溪内谦：《现代社会主义之考察》第219页。

⑰同上，第221页。

⑱同上，第223—226页。虽然注⑰、⑱援引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认识到俄国革命结束了—个清—色的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意义。作者拥有一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看作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下位概念的思维框框，并认为这是至今在西欧是普遍的观点，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出奇。落后性本身就是发展缓慢的产物，因此确如作者所言，应该用过去式来讲。参见该书第315页。

⑲A.诺夫：《苏联经济史》，企鹅出版社1972年英文版第128页。诺夫说，这种非难是没有根据的。另参见溪内谦：《现代社会主义之考察》第215—216页。

⑳M.马科维克：《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载于塔克编《斯大林主义》第299—319页；参见渡边宽：《列宁与斯大林》，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日文版第四章至第六章。

㉑塔克：《革命家斯大林》第377页，《斯大林主义》第94页；参见渡边宽：《列宁与斯大林》第95—96页。

㉒尼·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载于《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上册第441页。

㉓同上，第475页。

⑭《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上册第422—423页。

⑮《布哈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上册第424—425页。

⑯尼·布哈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文献》，日本希望阁1929年日文版第73页。

⑰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理解，请参阅C.亚伯拉姆斯基编：《纪念E. H. 卡尔论文集》，麦克米伦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第183—203页。

⑱尼·布哈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文献》第13—14页。

⑲布哈林、斯大林：《给工人》，龙口译，希望阁1929年日文版第23—24页；布哈林：《建设社会主义》，上西译，白杨社1927年日文版第3—4页。

⑳格申克龙：《历史展望中的经济的落后性》，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第125页；参见A. 诺夫：《苏联经济史》第19页。

㉑亚·厄利奇：《斯大林关于发展经济的观点》，载于E. 西蒙斯编：《俄国与苏联思想中的继承与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86页。另，斯大林关于将来也继续支持布哈林的表态，在《斯大林全集》中找不到，但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有记载。

㉒《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17页。

㉓同上，第119页。

㉔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载于《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中文版，上册第427、470页。

㉕《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99页。

㉖《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37页。

㉗《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11、214页。

㉘同上，第261—263页。

㉙同上，第270、275页。

㉚同上，第267—277页。

㉛《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3页。

㉜同上，第209页。

㉝同上，第266、268页。

㉞同上，第128页。

㉟同上，第294页。但也在同一个报告中预料到，恢复期即将结束，要继续发展工业就需要新的投资，但因资本不足，今后工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缓慢下来。

④《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77页。

⑤同上，第111—113页。

⑥亚·厄利奇，《1924—1928年苏联工业化论争》第94页。

⑦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76页。

⑧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91页。

⑨同上，第190页。

⑩同上，第167、195、198页。

⑪同上，第260—261页。

⑫摩西·莱文：《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伦敦乔治·艾伦与乌恩出版公司1978年英文版第163页。

⑬同上，第163页。

⑭《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

⑮同上，第266页。

⑯同上，第272页。

⑰同上，第320页。

⑱同上，第258页。

⑲《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7页。

⑳亚·厄利奇，《斯大林关于发展经济的观点》，载于E.西斯蒙编：《俄国与苏联思想中的继承与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91页。

㉑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页。

㉒、㉓同上，第7页。

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80页。关于这一点，当布哈林还是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就反对把小工业、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国有化，并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是自发的。另外，在1919年的党的纲领中说，今后小农经济还要长期存在下去。参见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入门》，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6年英文版第262、394页。

㉕《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37页。在这里，斯大林提到了初期集体农庄，这是1929年12月。另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98页（1923年12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60页（1925年12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9页（1928年5月）。从这些日期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很早就有这种想法的。

㉖《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36页。斯大林本人在多大程度上确信这一点，难以断定，因为他同时也讲了相反的意见。参阅莱文，《俄国农民与苏

维埃权力》第10章。

⑳伊·阿·格拉德科夫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莫斯科1977年俄文版第377页；大内力编：《现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日文版第8卷第88—89页；溪内谦：《斯大林政治体制的形成》，岩波书店出版社1972年日文版第2部第621—635页。另，斯大林的《大转变的一年》也发表于同年11月。

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48页。

㉒摩西·莱文：《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第143—144页。

㉓同上，第144页。关于1927至1929年谷物生产的停滞不前、从1927年冬季开始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出口量的减少，但在另一方面进口设备剧增等情况，请参阅E.H.卡尔《计划经济的形成》，企鹅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第997、1000、1007—1029页。

㉔《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5页。

㉕亚·厄利奇：《斯大林关于发展经济的观点》，载于E.西斯蒙编：《俄国与苏联思想中的继承与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93页。

㉖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载于《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中册第270—290页。

㉗《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29页。

㉘同上，139—140页；第12卷第45—46页。

㉙《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4—55页。

㉚优·阿·莫什科夫：《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年代的谷物问题》，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第52页；《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6年俄文版第686页。

㉛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于《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56页。塔克的评论中说，维特曾主张落后国家可以用优先发展机器制造工业来实现工业化，克服落后性。厄利奇把斯大林的公式评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义的应用。参见塔克：《斯大林主义》第102页；厄利奇：《斯大林关于发展经济的观点》，载于E.西斯蒙编：《俄国与苏联思想中的继承与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99页；野野村编《社会主义经济论讲义》，育林书院新社1975年日文版第165页；宇高编《社会主义经济论》，有斐阁1975年日文版第40页、123页。

(孙晓燕译自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会《经济论丛》
第123卷第6号，宋益民校)

布哈林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美〕斯蒂芬·F·科恩

**在二十年代，党在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上，
特别在工业和农民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

1923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党在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上，言外之意，也就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未来道路问题上，又发生严重分歧。起初，相互对立的交锋与倾向，被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之间新出现的公开争夺权力的斗争所掩盖。但在1924年秋，一些事件证实并加深了一个谨慎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与一个左翼反对派之间的鸿沟；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在革命内部，国际与国内、城市与农村的各种对立情绪都明朗化了。二十年代的大辩论，首先是关于工业化的大辩论真正开始了。

真正的或所谓左派的思想及其纲领的特征首先形成。托洛茨基鼓吹的“十月革命的教训”激起多数派把愤怒倾泄在他二十年前提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上，该理论现被正式称为

* 本文是作者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部政治传记（1888——1938）》一书的第六章，文内小标题系中译者所加。——译者注

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分歧所在。托洛茨基被指控为“低估农民”和对俄国本国的社会主义潜力缺乏信心。官方公开表示的（如果需要）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1925年驳斥了这种悲观主义^①。同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他的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实质上是提出要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迅速增加国家工业资本。他的论点很快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基础”^②，这也许是矛盾的（没有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如何在一个被孤立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理与托洛茨基强调一次欧洲革命的关键作用之间的矛盾感到吃惊）。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认真地去否定这种联系。从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就成为左派经济纲领的核心。

左派的所谓超级工业化与多数派领导立场之间的深刻分歧，于1924年至1925年间由于新经济政策大大地放宽而变得惹人注目了。一次令人失望的收成和严重的农民骚乱促使领导（用当时的口号说）“面向农村”。1925年春通过对农民、尤其是对中上层农民的四项经济让步：放松了国家对购粮价格的制定，减少了农业税；延长了被批准的土地租借期；使早先限制在收获季节的雇佣劳动合法化；取消了自由贸易管理上的各种障碍^③。制定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恢复。

* 第一次出现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中（《共产主义学报通报》1924年第8期第97—116页），第二次出现在《新经济》一书的第2章中（莫斯科1926年版）。

对主张这些措施的人来说，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宽容原则扩大到农村的常识问题。然而对左派来说，这是“亲农民主义”，甚至是“富农倾向”当道的证据。

不久因就对外事务的喧嚣争吵而加剧了的在工业和农民政策上的这一根本分歧，构成了二十年代的党内辩论。个人怨恨、争权夺利和对革命的性质与方向问题上的实质分歧已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直到1926年至1927年当双方缓和各自的立场时，左翼反对派与官方领导的和解或许还是可能的，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寻求这种和解。随着争执的扩大，双方都使辩论升级，对妥协的途径不屑一顾，都把冲突描绘成对革命不同理解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各方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对方，而越来越肯定对方是背叛。

**布哈林与斯大林一起成为党中央委员会
内多数派的领导人。布哈林被
认为是多数派政策的制订者**

布哈林同样也持这种孤傲态度，1924年至1925年的事件使他在党内斗争的作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三人联盟突然瓦解时，他从一个反托洛茨基运动的配角变成了一个舞台中心人物。早先不甘后人地积极提倡抚慰农民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初是赞同这些新的农业政策的。但进一步考虑到它们的含意后，两人都感到不安，同时由于嫉妒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于是在1925年秋转而反对那些政策。他们象托洛茨基左派一样攻击斯大林对党的机构管理不当，攻击多

多数派的经济政策和官方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包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④。次年他们就与托洛茨基左派联合了。

三人联盟的结束，把布哈林推到与斯大林一起对多数派共同领导的地位，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因为布哈林是这些引起争论的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到1925年夏，这些政策和他自己对革命和在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已经修正的认识形成一体。他的经济纲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更广泛的纲领性理论已变成正式的党的教义。由于他政治地位提高而出头露面，他被认为是多数派政策的制订者，并且由于充当当时占优势的正统观念的官方发言人而加倍地令人注目，他成为反对派打击的主要目标。从1925年起他一直是严阵以待，在派别斗争中是一个关键人物，在这些冲突中，当时称做“布哈林学派”的布哈林主义，是一个中心问题*。

这种激烈的政治环境显然影响了布哈林对讨论中重大问题实质内容的思考及其表达方式。从1924年至1926年的中期，他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业化纲领，并在理论上说明这个纲领将如何实现苏维埃社会主义。在领导者中间，只有他一人在努力探索一套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理论。但是，他很少系统地或是平心静气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分散在十几篇激烈的辩论发言和文章中**。结果，正如

* 关于布哈林二十年代中期的政治观点，参见本书第7章。

** 布哈林的观点在他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不过，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不具备其它著作的理论深度的特点。后来，他曾开始写较完备的理论著作，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始终没有能完成。参见《真理报》1926年7月1、3、7日。

布哈林在1926年至1927年提出重要修正意见时默认的那样，他在1924年至1926年提出的经济纲领最初蓝本的重要方面存在缺陷，有的是由于错误估计造成，有的却是由于敌对性的论战而引起。由于决心建立并捍卫他所相信的几条基本真理，布哈林夸大了他的论证，对别人相反的论证却不予考虑。他充满了革命想象力和正义感的激情，象其他人一样，经常忙于答复他的对手提出的挑战，而不是对国家真实的经济状况做出回答，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则是这些对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
“规律”，主张将农民经济的剩余价值大量地
转让给国家工业部门作为迅速
实现工业化的解决办法**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分析、壮丽的历史对比、理论革新和经济政策的雄心勃勃的大杂烩。富有远见的分析使他的“规律”在促进工业化辩论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自1921年起，官方的雄心壮志集中在把受到破坏的经济，特别是工业，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也就是集中恢复毁坏的和闲置的生产设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超越这个短期目标，看到了现存工厂充分开工以后的情形。在论证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高速工业化时，他提出了集约投资，尤其是在资本货物生产部门集约投资获得财力的问题。不仅为了弥补非生产消费和自1913年以来固定资本的正常折旧

费，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为了把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工业基地加以扩大和重建提供资金也有此需要^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要关心的是苏维埃俄国的基础落后，而不是它暂时的破坏；是进一步工业化，而不是简单的恢复。为此，他比以往更清楚而系统地提出了工业化的长远问题，并迫使对经济政策的讨论逐渐改变方向。他把官方的经济思想解释为一种由于恢复时期比较顺利、代价较低而产生的虚幻的信念，认为国家工业部门本身可以生产出足以满足广泛工业化所需要的剩余资金。他的论点与此恰恰相反：在工业内部自给的积累开始之前，必须有一个最初阶段，在此阶段中，主要来源于“国家经济体之外”的大笔资本必须集中起来由国家掌握。考虑到被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选择余地很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得出结论——投资的根本来源只能是农民经济。他把农民经济的剩余价值大量地初步地转让给国家工业部门作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解决办法^⑥。

为了使他的论点引人注目并赋予理论上的连贯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比做是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他如实地回忆起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即早期资本主义如何通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系统掠夺”（对殖民地的劫掠盘剥、横征暴敛），用“一切强迫和掠夺的手段”获取剩余资本，终于寄生虫般地养肥了自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没有提倡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积累；有些方法“根据原则”被认为不合适^⑦。但他保留了“剥削”与“剥夺”两个词来形

容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认为社会主义部分和私人部分只能是一个“吞掉”另一个。更为露骨的是，他的论点强烈地暗示，国家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与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相似。他的反对者指责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看成是工人国家的早期殖民对象。他后来降低了这些暗示性词汇和形象的调子；但人们没有原谅他，也没有忘记他的话。

实际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真实计划并不象他的比喻所暗示的那么残暴。他反对暴力和没收，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办法。他建议，通过工业和农业两个部分在市场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来积累新的资本。他认为这种办法比直接征税更为有效，而不那么令人反感。国家工业应利用其独特的超垄断地位来实行“一种旨在剥夺各种私人经济的价格”^⑥。工业品的价格将人为地抬高，而农产品的价格则相对压低，国家贱买贵卖。这个建议实际上自1923年以来已成为左翼的纲领，是直接针对着官方政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蔑视领导缩小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差别的努力；相反，他赞同把1923年的“剪刀差危机”价格结构做为社会积累的关键手段。

如果不涉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和倒霉的比喻的话，他对新固定资本的需要与来源的分析确是对工业化问题的重要有识之见。在1924年后期他提出以前，这个问题几乎完全被人忽视。1925年后，领导慢慢地察觉到，苏维埃经济的慢性病不在于1923年显著的消费不足，而在于周期性的

“货品荒”——国家工业不能有效地满足消费需求，这时，他的判断就显得更富有洞察力了。据此看来，上述比喻不是他基本论点的实质。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可能认为，他的比喻表达了他对此问题的固执态度，但这种比喻确实满足了他在理论上的雄心大志，即制订一个与支配私人经济价值规律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的“根本规律”或调节器^⑨。这是一个与布哈林1920年发起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有关的单独理论问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关系。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宁愿让他的模式作为一个整体而成立；作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为左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第一流的经济发言人。不难理解，布哈林在他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后半生中一直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进行斗争，甚至在1928年至1929年，当他觉得斯大林已采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时，也未停止斗争。

布哈林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告诫人们，反对农民的政策等于自杀

布哈林虽然在1924年秋以前就明确相信经济发展要有一个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点的发表促使他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信念。捍卫多数派的临时政策并使之目的明确和思想连贯就成了领导层内唯一有造诣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的任务。在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整个左派的过程

中，他形成了自己的纲领”。由于他多半是以批判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纲领，布哈林倾向于以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的口气陈述自己的纲领。总的来看，他提出了三点相互联系的反对意见：经济的、政治的和可能被理解为道德或伦理的反对意见。尽管经济论点理所当然地在讨论中占了主要地位，但后两点却强烈地影响了布哈林对经济的思考，因此将首先讨论这后两点意见。

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对意见体现在一句格言中：“一个与农民作战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强大。”^⑩他坚持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纲领会疏远农民，破坏联合，危及政权的生存。到1924年，每个人都承认，没有足够的刺激，农民是不会自愿地生产或上缴剩余粮食的。采取新经济政策显然就是承认苏维埃生活中的这一事实。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不等价交换”似乎要取消市场刺激，而又不回答如果农民面对显然不利的价格结构拒绝出售剩余产品该怎么办的问题。布哈林相信，这必将回到征收（粮食）的年代，再次使党与农村人口处于对立地位。他认为，这就是左派的“凶狠

* 1924年11月和1925年1月之间，布哈林发表了有关经济政策的三篇重要著作：《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4期第25—36页，本文被收集到布哈林的论文集《经济政策的某些问题》，莫斯科1925年）；《关于苏联经济的新启示，或者是工农联盟的尽快毁灭》（《真理报》1924年12月12日，本文被收集到《为列宁主义而斗争》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对反对派经济行动纲领的批评（1923年10月的教训）》（《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期，也收入《经济政策的某些问题》）。这三篇文章都在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但在第一篇中没有直接点名。

逻辑”——“绝望姿态的心理、超人的压力和任意的冲动”——所将导致的结果^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历史比喻只能使布哈林更加坚信，左派的纲领意味着内乱和灾难。

任何冒风险与农民冲突的政策，不管它在经济上的道理多么令人信服，对布哈林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党会失败。他现在认识到，必不可少的农民支持——不可侵犯的联合——是俄国革命历史的主要教训：“1905年的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城市里的运动和农民土地运动之间没有联合”。这“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首要的教训”，突出了“工农联盟的全部重要性”。1917年的事件证实了这个历史真理，“一场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巧妙结合带来了胜利。这种“相当奇异独特的形势是我们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新经济政策把原来是破坏性的联合改变成了一个建设性的同盟，没有它，党的专政就注定要失败：“如果失去这种特别有利的阶级力量的联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基础就会崩溃”^⑪。

布哈林关于1917年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解释是从列宁的一个旁注发展而来，有三个并行的目的。它提出把当年的“伟大的土地革命”作为“我们革命”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早先把它看作是一个外来运动的习惯提法。其次，它因此反驳了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有联系的对一九一七年的解释。最后，它使布哈林得以论证，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早期的勾结联盟，而不是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暗示的那样，是一

种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⑧。但布哈林解释的中心是教诲谨慎与和解——这也是布哈林主义的格言。它告诫人们，反对农民的政策等于自杀，它还是布哈林反复警告的主要内容：他的党不得不“在刀尖上行走”^⑨。

布哈林在1915年至1916年就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描绘成一种具有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国家，现在却把苏维埃国家看成是不稳定地依赖于对农民的继续容忍。这也许令人感到奇怪。1920年至1921年农民暴动期间个体农户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独立性给布哈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农民的集体的弱点正是他们的散居和个人自主性。1929年至1933年间，苏维埃国家将要发动并赢得一场打击农村群众的决定性内战，证明农民的离心离德对政权来说并不是致命的。然而，布哈林认识不清的错误仅仅是局部的错误。他明白，或起码感觉到，强行与农民为敌将带来什么后果，这种前景使他为之毛骨悚然，并成为他的又一个长期的恐惧。正如一位甚至并不同情他的作家所说：“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如果“任意的冲动”盛行，“复仇女神将降临这个国家”^⑩。

伦理标准成为布哈林对敌视农民 政策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内容

然而，布哈林关于党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只是他反对敌视农民政策的一个部分，而且他从不只是依赖这一点。1924年至1929年间，他还表示从道义上反对任何对农民进行系统的政

治或经济虐待，尽管他的反对意见确实不是前后一贯或始终鲜明的。考虑到布哈林思想中的这种因素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因为布哈林肯定会否认其重要性。而且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有一种反对在社会判断中注入道德价值的强烈传统。

这个传统来自马克思本人。尽管他的许多著作中充满着明白无误的道德观，马克思却刻板地坚持要以严格的非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和整个历史的研究。除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规律以外，他严肃地拒绝用其他的方法来推理。这一点在他的一句名言中得到反映：“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他认为，这才能使他把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区别开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马克思1875年对哥达纲领的尖刻讥讽——他把哥达纲领要求“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斥之为“陈词滥调”和“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他们受到这种反对伦理判断的偏见的深刻影响^⑩。伯恩斯坦晚期想把剔除了“科学”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康德主义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修正主义尝试，反映了原先马克思主义中反对伦理和科学设想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使任何想进一步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伦理观念混为一谈的人倍加可疑。

在这方面，布哈林十月革命前的观点完全是正统观念。1914年，他提醒读者注意：“没有什么比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伦理’理论的企图更荒谬的了。马克思的理论除了因果

规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自然规律，也不会承认其他自然规律”。他还补充说，“我们无需认真对待伦理的花言巧语”^⑩。1917年后，反对伦理的传统开始影响布尔什维克的决策，经常表现为在“客观情况”面前蔑视道德约束。这种推理在内战时期很平常，党的过火行为被轻松地说成是历史的需要，或者由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而被证明是合法的手段（布哈林的《经济学》一文在鼓励这种求证方式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观点并未与内战一同结束。1922年，布哈林为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辩护时，他拒绝将其无罪抗辩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是放在唯一可接受的标准——“政治的权宜之计”上。1924年，他在回答伊凡·巴夫洛夫的反布尔什维克声明时宣称，他“一不效忠于康德的绝对命令，二不效忠于基督教的道德戒律，只忠于革命的权宜之计”。一年后他抱怨说，有些人“常常用道德的思维来代替理智的思维，而前者与政治毫不相干”^⑪。

二十年代期间，对布哈林本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抱怨。比如，与旧的传统和他自己的声明恰恰相反，在他对国内政策的观点中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伦理标准。从1924年12月他第一次谴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是“可恶的比喻”和“可怕的恶梦”开始，到1929年他指责斯大林的纲领等于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伦理的修辞学”成为他对敌视农民政策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内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责布哈林“发泄道德义愤”^⑫，所指的就是这点。马克思在谈到工人阶级时曾说：“他们没有理想可实现……”，对布哈林来说，一种

理想已成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任务的关键。

**“胜利后，无产阶级无论怎样也必须与农民融洽相处，
因为农民拥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占人口的多数。”**

他思想中的这个新因素与他在1923年已经明显的认识有关，即苏维埃无产阶级的少数地位不是个特殊的民族现象。布哈林怀着一种迟迟才发现被忽视的真理的人所抱有的那种热情，并掌握各种统计资料，在1924年和1925年抓住每一个机会要他的听众牢记，从全球来看，“无产阶级……只是无足轻重的少数”，而农民、多数在东方农业国家的农民，“是我们行星上的绝大多数”。他对世界革命的修正了的认识是以对俄国经验的推断为基础的；因此他反复得出“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形象，“西欧和美国工业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农民之间”的世界“联合”的形象，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②的全球形象。在承认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下，他在1925年预言，农民“将成为——并正在成为——我们时代伟大的解放力量。”但是，正如在苏联一样，“关键问题”仍然是：胜利了的世界无产阶级仍将是少数，“胜利后，无产阶级无论怎样也必须与农民融洽相处，因为农民拥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占人口的多数”^③。

在一定程度上，布哈林的话代表了一种企图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使它适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激发的农村革命运动，而这个理论在传统上把农民看作是反动的封建主义残余。他的话也针对着党内重新出现的敌视农民的情绪。

他向1917年属于他自己的而现在正式作为托洛茨基的信念挑战，该信念认为，农民对革命的贡献只是“在与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斗争中充当炮灰而已”。相反，无产阶级在整个过渡时期都需要农民的支持：“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不得不带着农民一同干”^②。尽管布哈林的观点不是民粹主义美化俄国农民和乡村生活的“亲农”思想，而是对阶级力量的实用主义的评价，他确实希望城市布尔什维克同情地对待其同盟者，懂得农民的社会落后“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他主张，不要怀着“厌恶和蔑视”的心情，而要以“真诚的爱”去接近农民，反农民主义同“无产阶级的职责”是水火不相容的，尤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灵魂”的时代更是如此^③。

这种把苏俄看作是世界上各个阶级的微观世界的想法，促使布哈林的想象力向另一个更重要的方向发展。他的“世界农村”的见解，恰好与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现代化促进者的概念同时产生。1924年至1925年，“资本主义稳定化”使他们对早日实现欧洲革命的希望化为泡影，经济大辩论的开始反映了党无论如何是暂时认识到，苏维埃俄国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了。布哈林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启示：经济落后是一个国际现象，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象苏俄一样基本上处在工业化的前期。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因此为他揭示了另一层意义。它不仅是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家走上了通向工业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从而俄国的农民群

众和其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式能否“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显得与所有落后国家都有关系。从这点和从这场实验是在“没有千百年来发号施令者”的参与下进行的这一“前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实中，布哈林看到了“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劳苦大众都具有最巨大的意义”^④。

**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不是一个寄生性过程，
而是实现农村最伟大的变革与进步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他在道德上对反农民的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打破了工业化纯粹是资本主义的任务这一陈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假设。代替这种假设，布哈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和以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之间进行历史性对比的思想。前者与后者在性质上被证明是截然不同的，他所想象的残忍的资本主义实例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这一实例产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无情地剥夺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的时期。那时，“征服、奴役、掠夺、杀戮，简单地说武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些相当于“原罪”的资本主义的行径就是“使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的历史过程”，“变封建的剥削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这一过程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布哈林认为，此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遵循了相同的模式：其“推动性的动机”是要取得“越来越高额的利润——剥削、破坏和毁灭，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真

正的关系结构”；基于“殖民剥削”的帝国主义“不过是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⑤。

对布哈林来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对农业和农民的“寄生性”影响。城市是靠大量吞噬乡村的财富并使其贫困化而发财致富的：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这就是城市对农村的寄生性，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寄生性。随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业的恶性膨胀和畸形发展而来的，是对比之下农业经济状况、特别是农民的农业经济状况的极端落后。

这一“吸血过程”的“万恶的遗产”——“贫困、愚昧无知、文化落后、不平等状态”——便由此产生了。马克思称这种状况为“极端愚昧的农村生活”^⑥。“我们工业化样式”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从1924年至1929年间，布哈林多次提出：

同时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实行的，它对农民经济产生另一种影响，它对整个农业抱另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使农业受轻视。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来说不是寄生性过程，……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巨大增长的手段^⑦。

他屡次讲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任务”，所要表达的就是这种远见。与在它以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苏维埃的

工业化有责任使农业部门在经济和文化上得到发展，在城乡关系上“开拓一个新纪元”，以消除对乡村发展的有意阻碍……，使工业“面向农村”……，“使农村从历史的死角走向经济历史的前台”。由于这是史无前例的冒险事业，所以，它具有历史意义。这成为布哈林1925年1月在一次共青团集会上发表的一篇狂热讲演的主题：

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在任何时期，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在东方专制主义时代，还是在所谓古典世界时期，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曾有过这种先例，即统治阶级把克服与消灭掠夺性的城市和被它掠夺的乡村之间、获得文化带来的所有利益的城市和沦为愚昧无知的牺牲品的乡村之间的差别作为其根本任务^②。

布哈林是在摸索一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德观，一个划分容许与否的重要标准。他相信，苏联的经验要在资本主义历史这面镜子的对照下加以估价，并希望对它的反映不仅仅是提高了生产力，而且更人道、更有益于人民，他看到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价正在酝酿之中。苏维埃俄国是否能够不用资本主义模式所用的暴力就实现工业化呢？如果不能的话，他似乎在暗示，其结果将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要由手段来决定。他在1926年1月解释说，“我们不想用铁扫帚，用战时共产主义的力量强行将中农驱入共产主义。”这种做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正当和错误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

观点的”。布尔什维克是“先驱者，但我们不搞试验，我们不是拿活的生物开刀的……活体解剖者；我们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④。

布哈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这种特殊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如此激烈地反对反农民的政策（和我们将会看到的他最初在经济上的自满情绪）的原因。他激烈地把“第三次革命主义分子”斥责为提倡“集体迫害”的人——“对农民资产阶级宣布实行‘圣巴塞洛缪之夜’的狂热鼓吹者。”^⑤布哈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以往的掠夺和剥夺的乞灵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永久性的剥削制度。这也说明了他为何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表现得义愤填膺。布哈林坚持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公式只适用于一种情况：

如果所进行的讨论不是关于朝着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问题，而是关于朝着永远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朝着维持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并使其堕落成为一个真正的剥削阶级前进的话，那么，剥削的概念就可以正确而且毫无保留地适用于这一制度。同样，把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称为“无产阶级的”殖民地，也就是正确的了。

但是，他反问道：“能不能称无产阶级为剥削阶级……呢？不能！一千个不能！但这绝不是因为这一名称‘不好听’。……而是因为这一‘名称’与客观实际和我们的历史任务不相符合”。那样做就是“看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是一创

举”，“就意味着不理解其历史实质”^⑧。

除了其道德基础以外，在布哈林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积累所做的对比中，隐匿着巨大的前后不一致之处。尽管他把资本主义模式描绘得凄凉不堪，但他明白，至少有一个国家——美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农业也日益繁荣^⑨。真正使他对农村过去遭受剥削这点形成概念的，似乎是俄国农民阶级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幸。一个贪得无厌地掠夺农民的专制制度的形象，一直是马克思以前俄国激进思想的有力主题。布哈林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二月革命以前，他回忆说，受到“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处于半贫困状态的农民”，仍在“地主的铁蹄下”和“不过是依附于国家机体上的一只庞大寄生虫”的专制制度下遭受苦难。布哈林所指的“寄生虫”的典型，似乎真正来源于沙皇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在一次揭露性的论战中，他愤怒地警告说，超级工业主义的计划将“使苏联在历史上成为和老俄国一样的货色，……”因为它的“农业处于半农奴制的落后状态，农民饥寒交迫，并遭受残酷的剥削……。”^⑩

虽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从未使这一论点脱离其他论点或以适当的名字来称呼它*，但这一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布哈林在整个二十年代争论中所提出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影响。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应有有益于农民群众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一信念反映在他的主要经济主张之中：“群众的消费”

* 尽管他确实含蓄地把这个论点称之为“原则”问题。（《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8页）

——“群众的需求”——是“发展的真正杠杆，可以产生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或者正如他在纲领中表示的那样：“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不是相反。这一点永远也不应忘记。‘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其标准……。”^④这一主张巧妙地将道德与经济论点融为一体。然而，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必须使党相信，他提出这一主张是因为它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不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更为可取。

“农民经济中戈比的积累为社会主义工业中卢布的积累打下了基础。”

构成辩论主要内容的仍然是经济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左派在两个重要方面意见是一致的。第一，象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布哈林同意把工业化作为党的首要目标。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包括民族自尊心和对民族安全的考虑，把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及存在于农民占优势的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政权永远是不安全的观点所引起的担心。他还象左派一样，特别希望工业化的进程能够产生一个大型的资本货物部门：“金属工业……这是基本支柱，是我国工业的骨干。”^⑤

第二，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致同意苏联的工业化必须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此外，布哈林还赞成工业化需要一个由农业向国家的工业部门转让资源的过程，或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为从农民经济中“抽汲”资源的过程。布

哈林坚持认为，真正的分歧意见在于方法和限度问题上：

工业只能靠本行业范围以内的产品进行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整个问题牵涉到我们从农民阶级那里可以得到多少东西……我们可以抽汲的程度、方法、范围和如何……取得最佳效果……这就是我们与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反对派同志们赞成的是过多地抽汲，是让农民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是不可容忍的。我们的主张决不是不要这一抽汲；但我们冷静得多地进行估计……^⑥。

布哈林在经济上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的关键以及他自己的计划的依据，在于他相信工业的增长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他在1924年春天发表的一系列表面看来与党内出现的辩论无关的理论文章里，首次婉转地提出了这一论点。经济学家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是他批评的对象之一。党内讨论涉及了此人早期的有关经济危机的理论。在谈到他对危机问题所持的关于“比例失调”的论点的时候，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否认生产与群众消费之间存在必要的依赖关系。他认为，只要在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按正确的比例进行计划，不管社会的消费水平如何，资本的积累就会增长。他

* 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布哈林也欢迎外国贷款，但同时怀疑能筹积到的贷款不会超过“沧海里的一粟”。参见他的《论党对工农通讯员的领导》，《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和《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4页。

实际的意思是，工业可以为自己的产品提供足够的**需求**。布哈林断然拒绝了他的这一把生产与消费脱离开来的“极端愚蠢的乌托邦”。他坚持认为，生产的“链条”“必须永远以进入个人消费过程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为其终点……”^⑧。

乍看起来，他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的论点采取固执态度似乎难以理解。布哈林本人毕竟也曾经常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调节能力，后来甚至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在“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自由的市场）下，在消费落后的情况下，生产仍可继续进行而不致发生危机^⑨。在他坚持的生产必须最终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的观点中，似乎隐约地存在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应该”的意思。然而，几个月以后问题就清楚了，他的观点更多地是针对新的而不是过去的争论的。他在提出他主要的经济原理时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制度，即工业已经为农民市场服务，而且没有与这个市场联系它就不能存在的话，那么工业的情况、积累的速度等等也就不能脱离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独立存在了。”他所指的当然是在俄国，随后他又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构成了一个以“实用杜冈主义”为基础的计划，这是他在整个二十年代不断提出的指责^⑩。

布哈林相信，左派关于“工业的绝对权力”的号召忽视了农民的需要这一关键问题。（他补充说，这一问题在推翻沙皇制度中起了辅助作用^⑪。）因此，在1924年到1926年间，他不厌其烦地重申的主要经济论点是：“没有农民经济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就不能持久。”所以，“国内市场的能

“……是我们经济的中心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适当解决，前景是有希望的：“农民阶级的购买力越强，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越快。”或者象布哈林言简意赅地保证的那样：“农民经济中戈比的积累为社会主义工业中卢布的积累打下了基础。”^④

左翼反对派的“超级工业主义”使布哈林认识到，他们没有看到城乡部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农业和工业不能互相作用，“就会出现工厂阒然无声……农民经济衰退，以至全面倒退的局面”。因而，他坚信真正的发展指标并不仅仅是工业投资这一项，“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它是从生产开始到军队和学校为止所有部门发展的基础”^⑤。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和许许多多农民经济之间建立了一个结合部，解决了把两个部门连接起来的关键问题。这一结合部就是贸易，通过它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⑥

布哈林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相互作用体现在彼此的供求关系上。农村的需求是双重的：农民首先期望得到消费品和简单的农具；但在农民经济的积累有所发展以后，他也会需要象拖拉机这样的复杂的生产资料。因此，农民的需求有助于刺激轻重工业各部门的发展。同时，农民在农业上的技术进步有赖于他们是否可以得到特别象化肥和机械一类的工业产品^⑦。布哈林继续说，从城市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反过来国家的工业可以得到例如粮食和经济作物等基本必需品，前者可以作城市工人的口粮和出口以换取所需的设备，后者为进一步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⑧。只有两个部门之间的这种

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解决他所认为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征粮和疲软的国内市场。

党的目标不是“贫困中的平等”，也不是“削弱比较富裕的上层，而是……把较低的阶层提高到这一高水平上来。”

布哈林为有争议的1925年土地改革所提供的正是这种理论说明。这一土改运动消除了在发展农民经济当中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法律障碍，从而在农村推广了新经济政策^⑥。他的计划的关键是鼓励农民搞私人积累，从而扩大乡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并使农民增加可供销售的农业剩余产品。他希望把农业部门从“一个自然消费的经济改造成为商品生产的经济”。这就意味着鼓励农村所有阶层的人，特别是中农和经济境况较好的农民发家致富。而只同情贫农的左翼则认为这种前景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思想上是可憎的。布哈林捍卫改革的行动也体现了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任务”在道德方面的理解。他坚持认为，党的目标不是“贫困中的平等”，也不是“削弱比较富裕的上层，而是……把较低的阶层提高到这一高水平上来”。针对左派他又说：“贫穷的农民社会主义是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只有白痴才会说，世上总会有穷人。”^⑦

然而，他的基本论点是实用主义的。农村需求和销售产品的有意义的增加，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必须依靠那些能够进行货币积累和扩大生产的资力较为雄厚的农民。但这些农

户的经济发展尤其受到法律限制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变的管理方法的阻碍。布哈林这样解释说：

富有的上层农民和也渴望致富的中农目前不敢进行积累。有这样一种情况：农民由于害怕被称为富农而不敢安装铁制的屋顶；如果他购买机器，他也要以共产党员不能察觉的方式进行。取得较高的技术却成了阴谋活动。

所进行的改革就是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它们将适用于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布哈林在引起了1925年政治丑闻的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说：“应该向全体农民，向农民的所有阶层讲：发财吧，积累吧，发展你们的经济吧！”^④由于政治的原因，他被迫收回了“发财吧”的口号，但没有收回其含义。他说，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观点，只是提法上有错误而已。”这一观点就是：“我们不阻止富农进行积累，我们不再试图组织贫农第二次剥夺富农的财产。”^⑤

这些改革的更广泛的目标是“使商品周转不受限制”。布哈林称这一目标为“我们经济政策的总路线”。他相信，贸易的兴旺可以使经济得到最快和最有保障的发展。扩大市场的吸收能力、提高商品总量和加快商品在工农业之间以及工农业自身内部的流通，“是加快我们经济生活发展速度的主要方法”，“将为生产力提供最充分发展的余地”^⑥。因此，国家部门以外生产的制造品就会受到欢迎。这些改革并不仅适用于农业生产，也同样适用于广泛的小手工业网。小手工业制造种类繁多的货品，其发展将为国民收入总额的增长作出贡

献。同样，布哈林极力主张在必要时进口工业产品以满足国内的需要。用他所举的例子来说，一台进口的拖拉机可以提高国内市场的能力，而且必将扩大对苏联的工业品的需求^⑧。

**最快的工业增长率不是来自“卡特尔式的
超级利润”，而是来自“每件货物的
最低限度的利润”**

布哈林正确地评论说，他的计划与左派把生产放在首要地位的计划不同，其不同之点在于他的计划是要“从流通（货币、物价、贸易）到生产”进行运转。这就是他激烈力争的“通过交换长入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下面要更详细地说这个问题）的实质。他在1925年解释说：“加快周转，扩大市场，并在这一基础上扩大生产——这样，进一步降低物价，进一步扩大市场，等等，就有了可能。这是我们的生产途径”^⑨。这样一个计划要求党遵循三项基本政策：宣布和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从中央市场到地方集市各贸易场所的正常秩序，并减少国家的干预；不断压低工业品价格。

1924年到1926年间关于革命的重大问题的争论常常是围绕着官方的物价政策这一切身的实际问题进行的。工业和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比率不仅关系到农村是否会出现动乱，而且关系到哪个阶级将承担工业化的负担和将从农业部门“抽汲”的程度多高的问题。因此，就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左派要求较高的工业品价格的同时，布哈林为相反的政策提出了两点论据。

首先，他设想（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截然不同）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有极大的伸缩性。较低的价格可以多销商品，从而增加总利润。此外，还能加快资金周转，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加产量和合理安排生产而在许多方面降低成本。反之，布哈林警告说，人为地抬高价格的政策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将降低农民市场的容量，重演1923年的“销售危机”以及由于工业失去市场和原料而导致“工业的停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意味着“杀死下金蛋的鹅”^④。尽管布哈林有一次宣称：“若我们放弃使用我们的垄断地位，那将是不明智的”，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只赞成“降低每一连续生产周期的价格”，断定最快的工业增长率不是来自“卡特尔式的超级利润”，而是来自“每件货物的最低限度的利润”^⑤。

对这一反对高工业品价格的论点，他又补充说：“任何垄断内部都隐伏着……衰败和满足于以往成就的危险。”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受到竞争的驱使”而使生产变得更便宜、更合理。苏联的工业则缺少这种内在的动力：

如果我们这些实质上……实行国家超级垄断的人不推动、逼迫甚至鞭笞我们的干部，促使他们降低生产成本和改进生产的话，那么，……我们将面临垄断衰败的一切先决条件。在我们这里，群众需求所不断产生的压力应该起到资本主义社会里竞争所起的作用^⑥。

布哈林有时把这种危险称为“垄断的寄生性”和“官僚主义的蜕化”，但促使他作出这些评价的不仅是“官僚主义的

不当管理”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我们认为，它们反映出他对产生一个新阶级的无休止的忧虑。他告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我们的经理都是无产阶级战士，但他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具有弱点。”实行垄断价格政策是一种“错误的哲学”，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提倡了另一种标准，即他后来所说的“是人民为领导，而不是领导为人民的标准”^⑤。

苏联工业化资金的三大来源

因此，在回答苏联工业化的资金从何而来这一关键问题时，布哈林指出有三个来源。第一，国家工业本身在扩大销售和降低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的利润。第二，对日益繁荣的资本主义成份征收的累进所得税的新收入，这一收益表明对人民之中的这部分人采取允许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三，在苏联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自愿存款，这些存款起先来自富农和资本家存户，然后布哈林希望也能来自小农存户。他把前两种来源看作“基本的来源”，对自愿的存款只在1924年和1925年作为插话提了一下^⑥。但是到了1926年初，他也强调了第三种来源：“我坚持认为，把农民的少量积累集中在我们的信贷、合作和类似的机构里的政策，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吸收更多资本的主要方法之一。”当他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利用小储户的存款时，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也这样做呢？”^⑦

他对自愿存款的关心，说明在纲领上，他与寻求强迫存款办法的左派有重大的分歧。正当左派强调国家急需对工业

化进程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的时候，布哈林特别在二十年代中期，却在注意着国家部门以外的经济部门自发、自动和自愿的贡献。除了在经济上可行这一点外，这种办法由于部分地从传统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中吸取了经验，故具有为大家所熟悉的优点。（布哈林的对对手把他的思想称为“我们苏联的曼彻斯特学派。”）^⑤这种办法通俗易懂，当辩论在各个地方展开的时候，这是个不小的优点。布哈林在1926年2月的一次地区党组织会议上关于他的观点的总结（这时已是官方领导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先，如果国内的商品周转增加了，这就意味着生产提高了，购销增长了，积累扩大了；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积累加快了，即我国的工业发展了。……如果总的商品周转……加快了，我们经济机体的血液循环就加快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工业中的周转加快了。如果以前我一个月出售一次，而现在一个月出售四次，我口袋里装的就是四次而不是一次的利润；这就意味着，我们增加了工业中的积累，从而加快了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其次，我们从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成份那里，以不断增长的税收的形式取得了额外的收入……。我们从这两个基本来源拿到手的附加收入，使我们有更雄厚的资力来向各种社会主义形式，包括乡村的穷人在内，提供物质援助，以抵制资本主义形式^⑥。

布哈林经济纲领的基础是，明确承认新经济政策下的混合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借以发展的适当的过渡结构

这就是1924年至1926年下半年期间布哈林的经济纲领。构成这个纲领的基础是，明确承认新经济政策下的混合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借以发展的适当的过渡结构。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下的经济是由两种成分构成的——公有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或者社会化了了的——他交替使用这些术语）和私有部分。公有部分包括那些通常被称为占“统治地位”的组成部分——大工业、银行、运输和外贸——以及有时被布哈林包括在内的两项：合作社和国内贸易^①。他把合作社包括在社会主义成分之中（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一项有理论动机、有争议的决断；他把国内贸易包括在内的作法，则是随着他对国家和合作社的机构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成败所持的乐观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私有部分包括个体农业，家庭手工业，私人贸易和其它私有资本的小本经营。这说明，布哈林把这两种成分与国家工业和个体农业等同起来是不严密的。他曾经说过，这种经济更象“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色拉*”^②。然而，这种等同的作法确实反映了这一体制从根本上可以一分为二的性质。

布哈林谨慎地指出，这种双重体制只是在1924年至1925年，当对私有部门的限制放宽了的时候，才开始充分发挥作

* 西餐中的一种凉拌菜。——译者注

用的。他解释说，在1921年到1923年间，遭到战争破坏的国营成分没有竞争能力，而且，如果私有成分任其自由发展，它就会在经济上淹没后者。然而，到了1924年至1925年，国营成分就不再是一个脆弱的“绿洲”了，它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布哈林争辩说这个事实愈来愈变得愈真实、愈明确。尽管布哈林把混合经济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为期“几十年”^⑧的长期安排。而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私有成分和公有成分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半自由化的市场的作用来维持和制约的，它的职能的大小是随着国家调整权力的行使程度而变化的。

市场除了把这两种成分联系起来、分配商品以及帮助分配原料外，它还可以使苏联国家从它“在经济领域中的大批既是朋友又是敌人和公开的敌人”^⑨进行的私营活动中获益。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新经济政策下的市场经济确立了“小生产者的私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利益之间的正确结合”。通过刺激农民、工匠和工人，“甚至资产阶级的个人积极性……我们在客观上已经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了”。他对富农的态度（“我们帮助他，而他也帮助我们”）代表了他对私人资本的一般态度。私人资本的发展，不管它愿意与否——“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是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的^⑩。而且最终，国有成分受益最大，通过它在市场上较强的竞争能力和效率以及它掌握的原料，它将逐步地在贸易和生产中取代私人资本。布哈林是怎样设想“通过市场征服市场”，下面将会讨论这个问题；这里重

要的是，他对混合经济和市场的承认决定了他对争论中的三个关键问题的态度，这三个问题是计划、工业部门之间的增长比例和经济增长率本身。

**脱离市场力量和农民方面的供求关系而制定出来的
工业计划，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计划的想法和它在“经济合理化”上的可能性，激发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想象力。关于它的优点和可取性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几乎没有人赞成它的含意或把它付诸实施^⑥。制定一个单一的工业计划是左派的伟大事业，它是如此迷人，以至把反对派中的几种不同倾向统一了起来。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部分地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计划上的过分集中的反对，布哈林在1924年到1926年期间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常常是否定的。他讥讽上级强迫制订全面紧急计划的想法——“象戏剧中的奇遇一样”变成现实——认为这是战时共产主义幻想的残余，它“在无产阶级的军队占领了彼里考普时”就应该终止了。更切中要害的是，他批评脱离市场力量和农民方面的供求关系而制定出来的工业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工业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由同农民市场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忽略了这种相互关系的‘计划’就不是计划，因为这种相互关系是整个计划的基础。”^⑦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积极的评论吸收了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知识。只有当国家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把私人经济驱逐出去，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起来的时候，才能逐步制

定出“真正的”、“严格的”计划。走向计划经济的路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同时，布哈林从国家通过控制它的“占统治地位的部门”对经济的调节和在批发和零售价格方面的计划性，看到了“一个有计划的开端”。尽管对“经济未来主义”的敌视使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趋于否定，他在1926年后提出的更有雄心的计划建议中却勾画出了这一哲学的轮廓。1925年4月，他解释了真正的计划应该具有的方向：一方面，工业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要确定比例；另一方面，工业和农业之间要确定正确的关系。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工农业之间没有某种比例关系，那么生产的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就完全是空的，纯属虚张声势。”他认为，计划的起点是保持比例关系，而不是他认为左派所鼓吹的“有系统地破坏社会需要的比例关系。”^⑤

从提高最轻的工业部门着手，然后是中间工业，最终达到生产的根本环节——基础资本（即金属）的生产

左派把计划看作是促使对重工业进行直接和广泛投资的一种途径。布哈林的纲领设想了一种工业增长的不同模式，即以大量的消费作为动力，按照国内市场的能力来决定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使“工业适应于农业市场”^⑥成为必要。这意味着，从发展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例如纺织）着手，使重工业作为一系列连锁反应过程的结果得到发展。布哈林论证说，1921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恢复证明这种模式（他

还把这种模式同战时共产主义的谬误进行对照)是有生命力的。“我们从提高最轻的工业部门即那些可以获得与农业经济进行商品结合的部门着手,通过这些部门的提高轻工业有了起色,然后是中间工业,在这个过程的最终达到了生产的根本环节——基础资本(即金属)的生产。”他设想这种平衡发展的远景,预见到轻工业的稳步发展以及重工业对“同农业经济充分联合”^④的继续依赖性。

依靠从农业进行最大限度的提取,决不能 保证工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最后是速度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讨论中随着党对苏维埃俄国同其它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的看法而变动,而且这个问题常常是按照猜测式的哲学进行讨论的。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工业发展能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左派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急迫感,一方面又象多数领导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不够确切。布哈林的公开说法使这个问题更加混乱。从1924年到1925年,他坚持认为他的纲领,而不是左派的纲领,将会“取得一个非常快的发展速度”,他使苏联的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形成对照。因此,在1924年初,他宣称:“在五年到六年的时间里苏联将会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⑤然而,1925年中出现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稳定”促使他产生了一种新的较为清醒的想法:“我们在发展,他们也在发展,这是一种新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比我们的一些邻国发展得更快些,异乎寻常地快些。”这要靠

“放手进行商品周转”来保证^②。

但是，在同一时期，布哈林又反复地使用了似乎是意味着慢得多的增长率比喻说法。为了强调工业的发展需要同农业部门相联系时，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想法：例如“缓慢地向前……笨重的农民的大车在我们后边慢吞吞地移动”，或者“全体农民这只巨大的沉重的驳船……在后边慢吞吞地移动”^③。“极小的步子”这种比喻（正如他在其它地方使用过的）怎么能与他同时许诺的一个“极快的速度”相协调呢？部分原因是，这种比喻指的是使农民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的长期过程（“几十年”），而“快速”仅仅指的是经济增长。但是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既不清楚又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布哈林在1925年12月（重申“我们将会很快发展”的两个星期之后）的一次党代会上说“我们甚至能够在这个可怜的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以蜗牛的速度爬行……”以后，可以预见，左派的攻击会集中在“极小的步子”的含意上。如果这意味着工业化将以“蜗牛的速度”^{*}进行，那么这种说法不会使任何人，包括布哈林，感到满意。

当他象以往那样决意把速度和“抽汲”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且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时，他的理由就更充足了。布哈林争辩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无规律的抽汲”的计

*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页。布哈林在其他地方争辩道，用“蜗牛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在列宁1923年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找到。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22页。关于他使用这种比喻的另一种不同解释，见厄里奇的《苏联的工业化》一书第78—79页。

划最初会引起基本建设开支的上升，但是接着必然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与此不同的办法则是，为了“保证每年都使整个经济得到扩大”，“我们制定的方针不能只为一年打算，而是要为许多年打算”。1926年7月他对这个论点的总结就更站得住脚了：

依靠从农业进行最大限度的提取，决不能保证工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这个问题决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从农业中少提取一些，我们就可以使农业多积累一些，从而就可以保证明天对我们的工业产品有更大的需求。通过保证农业增加收入，我们明年从这里边就可以比上一年提取的更多，而且保证我们在未来的年月中有更大的发展，使我们国家的工业有更多的收入。如果在第一年里……我们不是用很快的速度发展，那么到头来，我们的增长曲线将会更快上升^④。

关于速度问题的讨论突出了经济争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些争论与那些非经济性的考虑密切相关，并且受其影响，其中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以及起同样重要作用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对于注意从理论上考虑问题的布哈林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虽然他提出了反对左派的政治上的、伦理上的、以及经济上的论据，然而他自己的纲领只不过是关于苏联进行社会变革的更广泛的理论的一个部分。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锋中，布哈林力图证明他阐述的新政策和他的纲领同“历史上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断定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从1917年到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意识形态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1924年这种意识形态就变得混乱不堪了。粗暴地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出现以及它在“社会经济关系中造成的极度混乱”，欧洲革命失败引起的“心理上的意志消沉”，列宁的逝世，以及他的继承人们主张效忠各种不同的列宁主义的状况——所有这一切都使早期的信仰和确定无疑的信念破灭了或遭受到严重的破坏^⑤。“我们的幻想的破灭”是我们过去的殷切的设想的破灭，是过去的理论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颓丧和悲观。出现了很多征兆，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则是不样的：工人对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人的妻子的华丽服饰表示不满；农村的共产党员被放宽了的土地政策弄得晕头转向；而且最严重的是新经济政策在党的忠诚的党员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带来了“某种士气低落和思想危机”^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幻想的连续破灭使布尔什维克不再天真地相信理论是万能的。甚至布哈林现在也喜欢引用：“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然而生命之树长青。”^⑦ 尽管如此，党的领导者仍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重建布尔什维主义并且重

申它是一种前后贯通一致的意识形态。1924年布哈林警告说，有文化的大众正在愈来愈多地提出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要求和质疑”；如果我们党不提供答案，有人会这样做^⑧。在党的辩论中，提供答案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争论的各派都想争取更多的党员和自己的选区的所有工人选民。现任领导和反对派都投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锋，每方都声称唯独它的纲领才符合并贯穿着“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或者是布哈林虚伪地所谓的“历史上的布尔什维主义”。左派满足于用现存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包装自己的建议，左派主要求助于人们过去的价值观和觉悟。它看不到进行广泛的理论革新的必要性，倒是喜欢侮辱多数派“对经济上大胆的首创精神的恶意怀疑”是实践上的机会主义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⑨。

另一方面，“思想危机”赋予布哈林一项特殊的职责。作为官方的理论家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他对重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负有双倍的责任，至少在涉及到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时是如此。1923年以后，他很少致力于与党的争论无关的学术性讨论，而是专心于从理论上阐述新政策和他的纲领，并在这个过程中力图证明它们同“历史上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在此他再次面对一个特殊的问题。左派能够有效地使既定的（或许可以说已经受到玷污的）思想还魂，而布哈林却忙于揭露其中有很多思想是过去的幻想。例如，他断定布尔什维克的为时三年的狂热即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⑩。他不断地对来自“旧书”

的思想表示轻蔑，这意味着他必须创立新的思想。因为如果说党的基本认识确实有了大的改变，那就需要有新的理论。而且尽管布哈林也能够有效地引用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中的改良主义，他还是很快地就承认吟诵大师之言是不够的^②。

政治家式的格言也不是解决办法。布哈林按照他的新实用主义，开始不断地激烈抨击“歇斯底里的”政策，赞扬一条“既不右也不左，而是……正确的”道路。麻烦的是这类中间道路的格言和诸如“我要说两万遍我们绝对不能违背新经济政策的原则”^③一类的宣言有点保守主义的味道，因此引起人们怀疑多数派的政策背叛了革命的理想。必须驳斥一些非布尔什维克人士希望实现的预测：“革命的天使正在无声地飞离这个国家”，因为这种预测也是反对派的看法^④。1922年布哈林自己曾经想到：“历史上充满了革命党转化成为秩序党的例子。有时一个革命党留下的唯一可以引起人们回忆的东西就是刻在公共建筑物上的口号。”^⑤反对派称此为“热月党人的反应”。

总之，不仅需要新的理论，还需要乐观的理论。布哈林懂得，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引起了悲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表面上看起来它并不堂而皇之^⑥。混合经济表面上的花哨和俗气使他很容易受到指责，说他的想法是“对新经济政策的理想化”，说他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而正如一个机智的反对派分子给他起的绰号一样，是“新经济政

似乎仍然只意味着后退。这就有必要说服党员：事实上这些新政策象征着社会主义的前进，而不是“后退”。必须驳斥所有那些“认为谁讲我们在前进就是失言”的“暗藏的怀疑论者”^②。1923年，在纪念建党二十五周年时，林布哈写道：

“我们开始了一次连哥伦布也从来没有想象到的航行。”^③这时他必须表明这个航行在继续进行，他的人所共知的改良主义、他的“新经济学”正在导向社会主义。

布哈林形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细目以前，首先需要确定在一个孤立的农业国里是否存在着哪怕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早期理论中有一个占重要地位的预见——成熟的工业制度的矛盾将带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预见清楚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纵然党的左派发言人谨慎地承认在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是可能的，但是他们仍然为过去的主张辩护，虽然不能始终如一或者轻易地进行这种辩护。然而，他们激烈地驳斥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的论断。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主张是正统的、现实的，而且是坚持不懈的国际主义的^④。但是1917年以来事物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广泛地被“跃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所说服，以及对列宁于1922年至1923年期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进行的令人鼓舞的重新估计——却昭示着一种不同的结论^⑤。这就

是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作出的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的结论。

在反对“不断革命论者”的运动中，斯大林是首先明确提出这一学说的人；然而布哈林使它变成一种理论，从而在二十年代规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正式含义*。正如我们所知，自从1922年11月布哈林就开始形成这种概念，在当时是一种“长入社会主义”的含糊设想。布哈林只是在1925年斯大林发表讲话三个月之后才开始公开地明确地谈论这个问题^①。有时他否认这种学说是对其早期思想的修正，虽然他的同伙在否认时是半心半意的。而且这样做是对的：从1917年到1921年，根据记载，他象其他人一样，认为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②。虽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可以追溯到十月政变，而且从1922年至1923年期间列宁写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它的出处，但是这种学说的正式表述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正式思想，正如布哈林默认的那样：“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多，结果证明它并不象过去看起来那样简单。”^③

为了回答在欧洲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能否在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布哈林经过考虑之后提出了一个由

* 见瓦连丁诺夫：《学说》，第52—53页，第60页，多伊彻：《斯大林》，第299页。辩论的双方对该思想的正式出处并不始终清楚，反对派人有时把它归源于斯大林，有时又归源于布哈林，或归源于他们两人。参见卡尔的《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卷第43页注释3所引用的反对派言论；另参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所编写的《共产主义的纪实史》第2卷第13页（纽约1962年版）。

两个部分构成的程式。这个程式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国内的情况，它的资源和阶级。布哈林这时得出的结论无疑是肯定的。为了驳斥“我们一定会由于技术上的落后而毁灭”的推测，他发表了著名的断言：“甚至在这个可怜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以蜗牛的速度爬行，但是……我们仍然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②他争辩说，这是列宁的“遗嘱”中的观点，他从其中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必备条件”。如果确实如此，上边的话就意味着“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建设会是不可能的”。一个潜在的障碍的确存在，而且布哈林提出的程式中的第二部分谈了这种障碍：只有在国际上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苏联才能免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和战火的波及。因此，从保证不受外来威胁这方面说，“没有其它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帮助，在我们国家取得实际上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③

布哈林的程式是他在重申他的国际主义的同时而又乐观地回答当前的问题——我们往何处走——的方法。通过区分国内潜在的威胁和国外的威胁，他实际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代化的前景上。他的思路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雄辩中，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不分派别的实质问题。不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远见就能够象布哈林那样论证说：“我们能够站稳脚根”，“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们将克服经济技术上的落后状态。”^④换句话说，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没有已经胜利了的欧洲无产阶级国家，或者用今

天的话来说，没有富裕的赞助国援助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问题。

尽管在整个论战中布哈林都在为他的程式辩护，然而这一程式中的一股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气味明显地使他感到不安。他显然认为，他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同他自己对世界革命承担的永久义务（“不是柏拉图式地……而是实际地”）调和了起来^②；但是他也知道左派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指责暗示着一个真正的、正在增长的危险。尽管他个人没有民族主义的狂热，然而他的讲话并不代表一般党员，很多党员在这个学说中看到的主要是俄国民族命运的希望。布哈林认识到这一点，他力图通过三个途径来阻止民族主义的倾向。首先，强调社会主义“最少”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其次，反复说明，即使到那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还将是“落后的社会主义”。最后，狠批苏联的事业是“所谓的‘民族’任务”的观点，并且警惕他自己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固有的危险：

如果我们夸大了我们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出现一种“藐视”世界革命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产生它自己特殊的思想体系，一种特有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在精神上与此类似的东西。这离一些更有害的思想就近在咫尺了^③。

“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实际上是关于“我们的革命性质”的讨论，亦即在革命中登台表演的各阶级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的讨论

不管倒不倒胃口，这个学说为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如何能够演化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扫清了道路。布哈林始终坚持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实际上是关于“我们的革命性质”的讨论，亦即在革命中登台表演的各阶级的性质的相互关系的讨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味着布哈林的理论必须从分析苏维埃俄国的阶级着手。地主和大资本家作为一种势力在内战时期已经被消灭了，据官方宣布在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中存在着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新资产阶级”^⑤。城市居民的问题没有引起任何理论问题或者严重的意见分歧，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工业无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是社会主义的输送人。在划分城市反动派即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的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在官方禁止的范围内进行贸易投机以获得“反社会的利益”：这些人和他们在农村的伙伴富农都属于“新资产阶级”。可是，大家能取得一致的问题只限于城市的范围之内。

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农民的划分上，集中在把过去制定的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划分方法应用于已被1917年到1920年的革命改变了和夷平了的农村。不仅是划分的类别含糊不

清（例如，富农，与其说这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上的分类倒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蔑视的词罢了），而且统计材料也是不可靠的、矛盾的，并且经常受到出于政治原因的操纵。据1925年的一个官方统计估计，贫农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中农占百分之五十一，富农占百分之四。在二十年代，这几个数字都受到怀疑并且进行了很大改动，特别是最后一个数字。对于富农占的百分比看法不同，从零（有人争辩说1917年以前的那种在农村的可恨的剥削者已经不复存在了）到百分之十四。由于问题涉及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农户，在一项广泛的估计中（认为富农大约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到五）那怕是很小的变动都会对政治和经济方针带来重要影响^④。

左派惯于接受有关富农的较高的数字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辩论。一小部分极端分子是这样，他们期望看到一场对富农的剥夺；反对派的主流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带来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分化相类似的过程。他们预见，穷富农民之间两极分化的扩大、从事剥削的富农在农村作为一股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蔓延，将不仅危及农村的革命成果，而且会危及城市的革命成果。这就是左派反复提出的论点的核心：新经济政策，特别是1924年到1925年这一政策的扩大，有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⑤。

富农不单独构成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威胁

布哈林对反对派的说法也并非一律断然驳回。他同意，

乡村中的分化自1923至1924年已再次开始发生。但他坚持认为，土地国有化在结构上限制了分化的进程，而与国家的“统治地位”有关的强制力确保了这一进程不会有严重的发展^⑤。他也象左派一样，虽然他有所保留，在理论上接受了最重要的教条：被认为是农业无产阶级的贫穷的、不占有土地的农民是党在农村的天然“支持者”，而富农则是“我们的敌人”^⑥。但是，他对富农的论述，以及同样重要的他对中农——在左翼对两极分化的分析中趋向于消失的一类人——的论述，则体现了他在对乡村阶层分化及其影响的理解上有很大的不同。

“富农”这一术语，典型地代表了布哈林在变通现行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使之适合于一个改良主义纲领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意识形态上的专用语汇，例如“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战争”等，是挑衅性的好战的语汇。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是在预料和处理内乱的过程中产生的，把它们加以变通使之适合以和平为基础的政策并非易事。大部分激进的术语出自马克思主义原著，或者更恰当地说，出自法国的革命史；有一部分则源出于俄国的传统，如“富农”（Kulak）一词。在1918年党提倡农村阶级战争的短时期内，列宁曾宣布对富农进行“无情的战争”，他称富农是“吸血鬼、敲榨勒索者、劫掠人民的盗贼”。但是，列宁在1922年至1923年间的“遗嘱”中，甚至未提到富农，这或许是因为他承认，内战已使农村居民削弱成为在很大程度上难于划分的众多的穷苦农民^⑦。尽管如此，富农一词的极可憎恶的涵义却继续存在，左派曾

凭幻想用它来隐晦地暗示布哈林曾建议同“吸血鬼”和“劫掠人民的盗贼”进行叛逆性的经济合作^⑧。

布哈林也知道问题的所在。从1924年起，他就有条不紊地在他的各个政策声明中一开始就提出党内潜伏着“富农危险”的忧郁的警告，声言（令人看来是正当的）他是首先明确指出这个危险并告诫人们不要把新政策说成是“把赌注押在富农上”的，宣称他对富农的看法是“绝对清楚”的^⑨。但是在这些严谨的词句背后，布哈林却竭力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改变方向。他似乎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要论证苏维埃富农不同于“老式”的富农。但他采取了更稳妥的论点，说富农和富裕农民只占农户总数的“大约百分之三，不多于百分之三至四”，同时把他们区分为贪婪的“富有的小旅馆老板、乡间的高利贷者、富农”和雇佣一些农业工人的资力雄厚的业主……”。这种区分反映了布哈林不愿意把每个有事业心的农民都扣上富农的帽子^⑩。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关于富农不单独构成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威胁的论点。尽管农业资本家可能会暂时繁荣，但他们只有随着国家经济部门的扩展才能繁荣，国家部门的“支配地位”限制和指导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布哈林坚持认为，出于这个原因，鼓励富农发展生产的有利的政策本身不是危险的，并且“到头来富农的孙子可能还会感谢我们这样对待了他的爷爷。”^⑪ 政治威胁，如果理解错误，是更严重的，因为这关系到富农是否能够对农民群众，特别是对中农施加影响和进行领导。布哈林解释说，这个危险同农村对苏维埃政权满

意与否是成正比的。在由于官方施政不当而产生了广泛的不满时，“中农把富农看作，用家长式的话来说，是父亲般的恩人……”。富农间或在地方苏维埃和合作社的选举中取胜的情况被说成是由于这种中农不满情绪的表现，如果允许这种不满情绪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现象，那将使富农得到对“占人口压倒多数”的人的领导权^⑩。

农民政策就是对待中农的政策

正如布哈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所争辩的那样，他争辩说，党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所谓富农的危险上，而应放在中农的不确定的同情心上。他说，布尔什维克的老的战斗性的格言“谁战胜谁？”已不再适用，现在的格言应是“谁将同谁结盟？”^⑪自1918年起他即强调党在战略上需要与既不富又不贫的农民和解。而新经济政策的出现给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迫切性，列宁宣布的中农已成为“我们农业的中心人物”证实了这一点。这种社会学的洞察力始终贯串着布哈林的思想。他有一次说，他的土地纲领是部分地把“赌注押在中农身上”。他的反对派并非不恰当地驳斥说，布哈林主义是“中农布尔什维主义”^⑫。

布哈林把中农形容为“最重要的阶层”和“基本群众”，他想以此向党表示三点互相联系的看法。第一点看法是社会学的：由于在“我们伟大的土地革命”期间消灭了地主和富农并重新分配了土地，结果导致了“农村的中农化”——中农已成为土地上的多数人物。第二点看法是经济学的：中农

经济是苏维埃农业的支柱。最后一点看法是政治方面的：得到中农的效忠是争夺农村领导权的关键因素。布哈林认为，这些经验主义的意见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我们政策的基本路线在于把这个阶层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⑩在他看来，农民政策就是对待中农的政策。他在这个等式上建立了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农民的理论。

布哈林认为，中农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另一条路通向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发言人曾暗示中农的事业是资本主义的，布哈林有力地批驳了这种意见。他阐述说，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农是“简单商品生产者”：“他从事贸易但不剥削雇佣劳动”。所以，他不是资本家，在阶级上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经济趋向于成长为资本主义经济，简单商品生产者成为小资本家，或许，如果不能成为小资本家就成为无产者。但是在苏联社会中，中农演变的前途是开阔的，因为存在着“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⑪。这一史无前例的选择余地是可以想见的，如布哈林所说，农民有“两个灵魂”：一个是与社会主义热望相一致的“劳动的灵魂”，另一个是“对大所有者怀有某种尊崇”的小所有者所具有的“非劳动的灵魂”。哪个灵魂将占上风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有关条件”^⑫。

显而易见，对布哈林来说，中农不仅已成为“最重要的阶层”，而且已成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象征。中农的“灵魂”的两重倾向是农民的一般特征，“甚至劳动农民”也是如

此^⑧。这个非正统的联想也反映在布哈林习惯于去掉中农的“中”字而说“农民”，就象当他阐述世界范围的“为农民的灵魂而斗争”的那样。同样，布哈林对“地主资本家集团”的推论和他的关于苏维埃工农联合来源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的论点，都不曾给布尔什维克对农民各阶层的传统划分留有任何余地。

但他倾向于从不加划分的农村居民出发考虑问题，最明显的证明莫过于他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基本上是两个阶级的社会”。尽管在形式上他也提到有三个阶级，关于“两阶级社会”的理论——一种建立在“两个劳动阶级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表明了他对过渡时期及其主要问题（“关于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大生产与小生产，合理的计划和无政府的市场，以及……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关系的问题”）^⑨的根本的理解。他的反对派马上指出，这种二元论所略去的恰恰是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和“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关于富农的任何概念。但是将中农至少等同于“农民群众”对布哈林来说是理论上必不可少的。这说明了，比如说，为什么他要反对那些竭力主张“中立”中农而不是同他们结成“巩固联盟”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也同布尔什维主义的“保证每个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⑩。

**“集体经济不是使农民通向社会主义的干线公路，
也不是最好的途径或主要的道路。”**

阶级理论的另一面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社

会阶级是作为不同经济活动形式的代表而逐渐形成和行动的，不同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中占上风。工业工厂所集中体现的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的胚胎，而私有制和个体劳动则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因而，在布哈林的两个“基本阶级”论中，无产阶级在理论上与组织上都不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它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前途。但是，1925年，决心抵制他们所认为的多数人把新经济政策理想化的现象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突然推论说，苏联的国家工业并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⑩。

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自拆台脚的策略至今还是个谜。正如布哈林指出，早期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完全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所涉及的是存在于苏维埃经济中的大私有资本而不是国有化工业的性质，列宁说国有化工业的性质“始终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反对派明显地没有看出他们提出的批评所引起的问题，因为，正如布哈林所质问的，如果国家工业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那么“我们的希望又在哪儿？”这将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一种“剥削制度而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接着用戏剧性的口吻说，如果真是如此，“我就退党，着手建立新党并开始宣传反对苏维埃现政权的第三次革命……”^⑪。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看来，他的论点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它的依据是对领导和反对派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设想：“用黑格尔式的语言来说，社会主义在这里不是‘存在’而是‘正在形成’，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它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⑫布哈林

在这次交锋中轻易地取胜了。

农民式的农业是个更棘手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时相信大规模的、集体化的农业生产的教义的神圣性和经济优越性。但是，1917年的革命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它使大庄园解体，产生了成百万的新的新农土地所有者。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开展过短暂地建立各种类型集体农庄的不成功的运动；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出现，这种努力在大范围内的直接可行性就作为另一种幻想而被打消了，虽然对未来实现集体化农业的口头承诺，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左派当中，还继续存在下去。1921年以后，官方的漠不关心和农民的敌对行为使得集体耕作的土地面积减少，1925年只剩下约百分之二。但是，同年，联系到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论并出于对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支配地位”以抵消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愿望，集体化农业又一次成为讨论的题目并在党内有了一小批热情的支持者^④。

集体农庄的支持者遭到了惨重的（虽然是暂时的）失败，对于他们的失败和党内“反集体农庄情绪”^⑤的产生，起作用者莫过于布哈林。并非所有他的话都是断然否定的。比如，他坚持说，布尔什维克仍认为，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大企业都是“比小企业更为合理”的。他承认“集体农庄是一种强有力的事物”，并认为有这种前景，即某些贫穷和无地的农民，由于贫困，将自发地“倾向于”集体的农业。但是，他补充说，即便是考虑到这些最低阶层的人们，农民的传统的主人灵魂——“从祖父和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旧习

惯”——也在反对接受集体农业。所以，“根本不能想象集体农庄运动会赢得全部的广大贫农群众”^②。

不能想象这个运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苏维埃俄国的“基本的农民群众”——中农当中会得到任何成功。对布哈林来说，这是一个“算术般的真理”。集体化农业充其量不过是个远景，其最终实现取决于自愿的、机械化的、自给自足的集体农庄在公开市场上与私人农业的竞争中表明其经济优越性的能力。他告诫说，人为地制造集体农庄将铸成错误；这样的农庄将变成“共产主义的寄生机构”，靠国家的资金供养过活，并且只会助长农民以为“私人经济是很好的事”^③的信念。在举出了反对集体化农业的明显事例之后，布哈林进而抛弃了根深蒂固的布尔什维克的设想，他说：“集体经济不是使农民通向社会主义的干线公路，也不是最好的途径或主要的道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他在1925年3月和4月间官方召集的四次会议上，其中一次还是集体农庄庄员的首次大会，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反复讲了他的这一看法^④。

**销售、购买、信贷的合作社是农民的
“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关键和农村
“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

因为国营农场对农民的吸引力更小，布哈林的断言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农村“从生产的角度上讲……不会开始”^⑤。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在社会关系的形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解，这是一个奇特的断言。如果这样的话，农民又怎

样走向社会主义呢？布哈林的回答是：通过“普通的合作社——销售、购买、信贷的合作社。”在这里，他的理论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列宁的“原来的‘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主义的计划作为指示，作为途径，作为一条大道传给了我们”^②。因为虽然自1921年起官方即开始为合作社恢复名誉，但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看来，合作社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机构。而对布哈林来说，合作社是农民的“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关键和农村“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他的纲领，正如他1924年以后经常指出的，也是“把赌注下在合作社上”^③。

新经济政策的共同智慧教育人们，不能不迁就农民的业主利益。按布哈林的话说，这是合作社的一大优点。合作社对“作为小所有者”的农民有感召力并给农民以“直接的好处”：

如果是信贷合作社，他应能得到低息贷款；如果是销售合作社，他应能更有利地出售他的产品从而成为得益者。如果他想买什么东西，他应能通过他的合作社……而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

在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中，农民将发现“组织在合作社里……是比留在合作社外更有利的”，并因而愿意接受其它有风险的集体事业包括集体农业^④。

但是，按照布哈林的设想，农业合作社也起着更高的作用。通过“与个体农民事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起着“国家工业与农民经济相结合的……有组织的桥梁”的作用。换

句话说：

无产阶级的城市和劳动的乡村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合作社，合作社恰恰处于城市与农村接触的结合部，首先是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结合……。

通过它们同国家经济机关的密切联系，合作社提供了通过市场使集中的国家工业和成百万零散的农民经济“连结在一起”并使后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布哈林用另一个比喻解释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汽船，即我们的国家工业，将首先牵引着合作社；合作社是比这个汽船更重的驳船，它将用成百万条线牵引着巨大沉重的全部农民的驳船。”^⑧

“我们将通过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将通过合作社达到社会主义。”

销售与信贷合作社不同于集体农庄，它们能够成功地吸引农民，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严重地触犯布尔什维克的情感，这些合作社在革命前就在很大的规模上吸引了农民。更加奇特并使许多人震惊的是，布哈林认为，这些前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机构的整个“阶梯”将“长入社会主义”，它们的成长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细胞的持续而系统的成长”^⑨。他不断表示他对“普通的合作社”将有一天会领导农民从事集体耕作的乐观态度，他的主要观点是：“在这里我们将通过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将通过合作社达到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如一位斯大林主义批评家后来所说，是“布哈林合作社计划的全部内容”^⑩。

对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不仅因为它看来无视了生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倍受推崇的作用，而且还因为合作社同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长期联系。

布哈林试图使合作社的令人怀疑的历史成为对他有利的事，他提出了如下论点：民粹主义者和在所谓“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提出农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种可悲的改良主义乌托邦”的供应者，因为他们想象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演变。实际上，同资本主义的银行、工业和资产阶级国家并存并依赖于它们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陷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之下”；它们逐渐“被融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并最终“被变成资本主义企业”。简而言之，“它们长入资本主义”。但是，经过同样的过程，在无产阶级专政内发挥作用、依靠社会主义工业和银行并与之联系的苏维埃合作社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经济肌体的组成部分”。“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它们一定会“长入社会主义”：“合作社将长入我们的机构体系，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们长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这样，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为了现实”^⑧。

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这样的推理为论据。把合作社看作实行过渡的工具，使得他能够提出论点说，同样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发展过程相似，“小所有者必然长入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

度……”^④。这个“长入”理论很明显是从他已坚持十年之久的关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引申而来的，在这个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部门通过银行和金融资本的集中混合体吸收较小的、以前是自治的经济单位并使之处于从属地位。他早些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生产基础支配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论断所做的含蓄的修正，这时在有关苏维埃问题的讨论中实际上明朗化了。他争辩说，无产阶级国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由于它包含着“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它也是“苏维埃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即‘基础’的一部分”。因之，（出现了）苏维埃社会中“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独创性”：“‘第二位的’（上层建筑）调节‘第一位的’（基础）……。”^⑤这个推理支持了布哈林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部门将通过自然演变使“沸腾的、无组织的经济置于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的论点。只要有“社会主义的支配地位”，苏联小资产阶级的和合作社的经济将沿着社会主义的路线发展。更具体地说，这个推理使布哈林所坚持的看法合理化了，他认为在农业中不需要有另外的占“支配地位”的机构（比如集体农庄）：“对农村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城市”^⑥。

这种“长入”过程中的重要机构是苏维埃银行和信贷系统。对金融和信贷的依赖性正如许多“线”一样保障了国家部门的经济领导作用，它们把非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部门“编织”在一起并创造出合作社和“无产阶级国家信贷机关之间的一种‘利益社会’”^⑦。对国家银行信贷占“统治地位”的无限经济威力的信念使布哈林得出了他那最引起争议

的结论：“甚至富农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也将长入我们的制度。”他预见到这个想法会招来反对的意见，在1925年春，他尝试性地第一次把它提了出来。但几个星期之后，在总结他的合作社理论的时候，他更加肯定地写道：

我们农民合作社组织的基本网将由合作社的细胞构成，这些细胞不是富农式而是劳动者式的，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总的国家机关系统并因而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链条上的一些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巢穴将以完全一样的方式，通过银行等等长入同样的系统；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一种异体……将来这种富农式的合作社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它想繁荣起来，它就必须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经济机关联系起来，它……将把盈余的现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得到固定的利息。即便出现了他们自己的金融组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同无产阶级国家强有力的信贷机构结合起来，国家机构支配着全国基本的信贷资源。无论如何，富农和富农合作社将无路可走，因为我国发展的总的既定模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④。

四年后，这段话被用来作为布哈林离经叛道的最重要的证据。

“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成为某种‘阶级合作’的外壳，而这种合作表现了社会整体的团结”。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即阶级斗争的概念，还没有同布哈林的向苏维埃社会主义进化的道路的理论相结合。1917至1920年的事件已把这个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剥削性质的虚无空幻的概念改变成为内战一词的委婉说法。它把社会描画成一个相互搏斗和不可调和的各阶级的战场，一个分裂的、充满着斗争的舞台，这个舞台上只会出现一个胜利者。从苏联二十年代的情况来看，阶级斗争是个潜伏着爆炸性的固定的概念，是国内和平的对立面。当然，布尔什维克左派，特别是它反对富农的一翼，经常提到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激化。另一方面，布哈林却试图就对此概念的理解做出两个修正，以此削弱这个教条的作用。

首先，他认为苏维埃社会的出现有可能在敌对阶级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成为某种‘阶级合作’的外壳，而这种合作表现了社会整体的团结……”^④。这个主张是布哈林两个基本思想的总和。苏维埃社会（及其经济）是一个单一实体或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他认为左派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到了国民经济中的矛盾但没看到统一，他看到了斗争但没看到合作……”。社会的“统一”意味着相当程度上的阶级和谐或合作，这对布哈林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进行最大程度的经济合作，而新资产阶级也可以在这个合作中“有限”地发挥“对社会

有益的作用”^⑧。因而，阶级的经济合作将克服、或至少调和阶级斗争破坏性的方面。

布哈林在他的第二个修正中解释说，合作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已在苏俄结束。相反，它意味着阶级斗争过去的暴力形式（即机械地打掉牙齿）已不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合作社的）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间的“经济竞争”中表现出来。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极为独特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多种形式出现，如通过市场竞争取代私人贸易，向农民提供低于乡村高利贷者利息的贷款，以及在总的方面把农民的“灵魂”争取过来。在各方面，新的阶级斗争与老的阶级斗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不用金属武器的撞击声”来进行这种斗争。布哈林举例说，与私商开战，“不是粗暴地对待他并关闭他的店铺，而是……生产并销售更为价廉物美的商品”。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大宗低息信贷是“我们与农村中的剥削分子斗争中必须使用的武器”^⑨。

这两项修正都是针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发展预期着特别是农村中阶级冲突的深化的思想而提出的。布哈林承认阶级斗争在近期的将来可能有零星的激化，但他坚持，进步意味着“阶级斗争将开始平静”，开始“熄灭”。暴力对抗的事件不会扩散，而是“将越来越罕见，最后销声匿迹”^⑩。他首先痛斥了关于党必须“点燃起阶级斗争”而不去使它“软化”的论点，如同他在1925年一次党的会议上所宣布的：“能否说我们的总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在于有意识地强行

开展阶级斗争？我并不认为如此……”；或者，如同他在其他场合所说：“我根本就不赞成使农村的阶级战争尖锐化”^④。在他看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运动预期着阶级冲突的缓和。

通过竞争，国家和合作社的企业将挤掉它们的竞争者，即私人资本。最后，市场关系的发展将破坏它本身；迟早市场本身亦将消亡

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不同经济形式之间不涉及个人的竞争，这是布哈林的进化理论的最重要的观点并解决了看来是它内部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预见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而布哈林的纲领却提倡“在市场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增长”^⑤。为了调和这两种见解，他又一次比喻式地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里，通过市场竞争，“大生产最终挤掉了小生产，中等资本在大资本面前后退……竞争者的数量在减少”，而且“市场被市场本身征服，自由竞争变成了垄断……”。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可能要重复这一过程。当规模更大和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单位把私人资本家从他们的零售和批发的据点中清除出去的时候，“我们将超出市场的范围”并接近计划经济：“通过在市面上的斗争，……通过竞争，国家和合作社的企业将挤掉它们的竞争者，即私人资本。最后，市场关系的发展将破坏它本身……迟早市场本身亦将消亡……”。这番话是辩证的，“它最终表明我们正是通过市场关系到达社会主义……”^⑥。

不管怎样，布哈林的理论是乐观的。在一个实行新经济政

策的社会的令人沮丧的多元经济中，它找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有机的进化道路”。“轨道”已经铺设，不需要突变的动乱，不需要最后解决，也不需要“第三次革命”；甚至富农的命运也令人愉快地注定了。这种乐观主义是来自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普通”农民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细胞”。把销售合作社和社会主义部分等同起来，使布哈林能够举出每年国家和合作社贸易超过私人贸易的成比例的增长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发展，证据表明“虽然私人资本绝对增长……但是，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仍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强大”^⑧。同样的推理还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部分“不断增强其力量，并逐渐同化落后的经济单位……”，将会自发出现经济计划。总的来说，这些假定意味着“在我们的条件下纯粹生产力的增长……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⑨。

他的理论就布尔什维克的源流来看，也是新颖的，因为在信奉革命理想的同时，它抛弃了盛行的革命英雄传统而直截了当地选择了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布哈林说，用这些方法而不是以前的方法，“我们将逐步地克服现有的一切罪恶”。需要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与实践作出根本的改变。如他在1925年所说：“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从我们早些时候寻找的地方开始的。”^⑩不仅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和新的理论，而且还需要一个新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不再是“内战的党，而是国内和平的党”。国家不再主要是“镇压的工具”，相反，它为“合作”和“社会统一”创造必要的和平条件

在要求党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进化道路的同时，布哈林也号召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思想和实践进行广泛的变革。以社会和谐、阶级合作、自愿工作和改良主义措施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从定义上讲与1921年以前的“机械的镇压”和“流血”的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所宣布的布尔什维克不再是“内战的党，而是国内和平的党”^④，正是总结了人们所渴望的国内政策的变革。据布哈林自1924年至1926年所明确表达的政治纲领，国内和平是其基本要点和有连续性的行动口号。但是，他不是鼓吹对1921年已涌现的苏维埃政治制度进行根本的结构改革。不管怎样，他没有对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权提出疑问。甚至连一个亲苏维埃的第二党也是不允许存在的。他有一句著名的妙语说，两党的存在使人联想到“一个是执政党而另一个则是关在牢狱中的党”^⑤。要改变该政权所自诩的阶级性也是不可想象的，苏维埃政权是“受到旧俄农民支持的，但它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工农)结合——“社会上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权力上的合作”。简而言之，布哈林的政治前提是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道德和合法性：“首先，工农之间的必要的联盟……；其次，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第三，工人阶级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属于共产党。”^⑥

同其他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后来的现代派一样，布哈林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尽管他确实希望逐渐扩大选举权（如果未加证实的报告是可信的话），他赞成通过某种人权法案保护苏维埃公民不受国家滥用权力的危害，但他还是接受了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宪法中的有关预防性的条款。这些条款不仅规定把“资产阶级”分子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还倾向少数城市无产阶级，而对农民不利^④。民主对布哈林和对二十世纪的现代派一样，首先是个经济概念；“民主化”意味着“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从未公开反对过布尔什维克的教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广泛的民主”^⑤。

然而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布哈林提出对苏维埃的政治生活进行意义深远的变革。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再主要是“镇压的工具”。相反，它为“合作”和“社会统一”创造必要的和平条件，为许许多多不情愿的，但是和平的革命同路人和革命的“半心半意的朋友和敌人”寻找喘息的余地和宽容。只有旧制度中的顽固的领导人（布哈林似乎认为人数很少）才会受到国家铁拳的镇压。国家对其他人则致力于“和平的组织工作”。至于恐怖的“时代已经过去”^⑥。

国家这种新“作用”的规定部分来自布哈林对1924年以后苏联政治局势的评价。他的预测同布尔什维克左派有明显的不同，而且回顾起来，同斯大林时代的官方的宣称也有显著的差别，那时阶级斗争和阴谋被说成是在残暴地激化。当布哈林坚信党已经摆脱了1921年至1922年的危险的孤立并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后，他在1925年谨慎地宣布，“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人民并不反对我们”，他更积极的说法是“农民从未象现在这样友好”。然而，他的主要政治论点是革命的内部敌人已经消失或已被解除武装，“一切都是‘太平的’，国家内没有叛乱，没有反革命行为，没有阴谋”^⑧。而且，他还辩解说，偶然出现的反对苏维埃官员的暴行并不是因为内在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而是苏维埃官方的缺陷造成。比如，农民暴力的事件是由“低层的权力代理人”——“小谢得林英雄们”——挑起的，他们滥用权力的做法使人们想起沙皇的暴吏^⑨。

**顽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将让位于“坚定的
法制标准”；社会革命除了工业化以外
还包括教育、改造人**

在整个二十年代，布哈林从未动摇地坚信，苏维埃俄国主要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已经死亡。他实际上说，争取持久国内和平的客观条件已垂手可得，因此，党和国家应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作法。他把这种调整叫做使苏维埃政权“强制性的‘正常化’”^⑩，也就是说“革命的法制”再也不是“行政独裁”和官方的“无法无天”的委婉的代名词。这些顽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将让位于“坚定的法制标准”；地方党和共青团机构将停止颁布法令——只有苏维埃才有权制定法律；共产党员将失去他们实际上免受起诉的豁免权，他们将按照法律办事，而不是“逍遥法外”。革命的法制意味着“在原来动乱的地方建立起革命秩序”。有效力的是名词，而

不是形容词：“革命的法制应取代一切即使是革命的行政独裁的残余。”^⑧ 布哈林主要想到的是农村：“农民要得到的是苏维埃秩序，苏维埃权利，苏维埃法律，而不是由一个找不到的‘上访局’所制约的苏维埃独裁。”^⑨

在以命令、强制和当局的反复无常为特征的“军事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到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的“正常的”一党制之外，布哈林还要求“决定性地，全面地，无条件地过渡到说服方式”。党要放弃以暴力为工作方法的做法，今后，在同群众打交道时，一定要“坚持说服，并且只能说服”^{*}。没有更好的论点能反映布哈林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改良主义了。社会革命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包括教育、改造人，这一事业需要一种新的政治领导。对布哈林来说，这种领导是教育性的。他在谈到党特别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人数远远超过了农村的老同志，因而经常在农村代表党的时候解释说，“从最广泛的字义上讲，政治领导的任务……就是一个社会教育的任务。”^⑩ 如果说新经济学是进化性的话，新政治学就是教育性的——父兄似的，善良的，温柔的。

实际上，这表示了布哈林对整个苏维埃宪制的理解。他把全国的苏维埃式的金字塔视为一个基层的教学“试验室”；上层由党员统治，“从上面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下层（主要是农村苏维埃）却越来越多地由“非党群众”组成，因为地

* 对说服的强调成为他经常谈论的主题之一。参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80—81页；《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69页；他对党的战时共产主义的说明，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8页。

方苏维埃形成了“我们改造农民，战胜他们个人主义的心理，争取他们，教导他们同我们和谐地工作，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验室”^⑧。

地方苏维埃曾在1918年到1921年党的军事政权时期“消亡”（布哈林对此感到悲哀），但是为了使之生效，它要得以复兴，再次成为民众选举产生的工作机构——“小型工作‘议会’”，在这里，日益觉醒的农民可以得到政治上的满足和指导^⑨。因此，布哈林成为党的1924年至1926年运动的热情创导者，这个运动是想通过新的和更自由的选举“重振苏维埃”。越来越多的党员当选并没有使他不安。他把选举结果看作是“思想说服”的美德战胜了“行政压力”的证明。他是这样推理的，一个真正经过选举的布尔什维克会得到真正的支持，而十个“虚假当选的人……在人民中是没有威望的”^⑩。

布哈林对于政治和思想说服的信念是同他强调在经济领域内开展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都说明他坚信在新经济政策的多极社会中，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治，思想——目标最好是通过和平和“不流血斗争”的非行政方法得到实现。的确，他逐渐把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竞争原则看作一个可贵的“分子式”，它确保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成果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诡计和虚假的胜利。布哈林致力于竞争原则的深度和广度可从他在1924年至1925年党的文艺政策大辩论中所采取的立场来判断，这个问题好象与对付私人资本和在地方选举中获胜毫不相干。

**在文艺方面，“让尽可能多的派别和组织
同国际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全苏
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共存吧！”**

七年来党已经避免在文艺问题上发号施令。但是1921年后，随着一种不同的，大众化“非革命”纯文艺的繁荣，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文艺派开始呼吁“在文艺领域内实行党的专政”，以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个作家组织作为它的“工具”。他们为谋求官禄而操戈，反对自己的文艺同行。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他们的要求于1925年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否决。这个体现了布哈林观点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它承认了文艺百花齐放的原则，并且保证要保护和鼓励非党作家^④。布哈林的观点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长期始终不渝地赞成一种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他是政治局里这种思想的唯一的提倡者。虽然他在文化方面的广泛兴趣和宽容态度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却主张激进的立场，他把任何一本“无产阶级”的小说或剧作都当成“第一只新燕”而给予热烈欢迎*。

尽管布哈林在理论上同情无产阶级文化，他强烈反对可以通过“机械强制方式”和官方的提倡来实现新文艺的想法。“如果我们……坚持一种应该由国家管制的文艺……，那么……我们就会摧毁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作家要依靠同其它运动展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竞争的原则”，“为自己赢得文艺权威的地位”。虽然党提供指导，但它的作用并不

是削弱竞争，而是鼓励“最大限度的竞争”，扶植“多种多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越多越好”。布哈林宣称：“让一千个组织出现吧！让两千个组织出现吧！让尽可能多的派别和组织同国际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共存吧！”^⑥

虽然文艺辩论并没有涉及或与党内政治上的分裂相呼应，布哈林看到同样的原则处于危险境地。他说，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申请者们赞同“一元化的原则”，因此他们“在文艺政策中占居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正如经济中的“超垄断”原则造成了工农业的毁灭，一元化也是“摧毁无产阶级文艺的捷径”。尽管布哈林提倡“在思想和科学生活的一切领域，甚至在教学领域”党都应提出明确的方针，但他绝不赞成“用大炮解决问题”或者“压制”不同倾向。党绝不要“把大家攥在一个拳头里”，它处处要“进行可能的竞争”。对于那些顽固的农民，布尔什维克要讨好非无产阶级作家，让他们不要“打昏农民”或者“揪

* 见其《第一只燕子》，载于《真理报》，1923年1月12日，第1版；《中国的怒吼》在麦叶尔福利德剧院》，载于《真理报》，1925年2月2日，第3版；和他在《关于联共（布）的文学艺术政策问题》，第36页，和在《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3—265页中发表的意见。在内战期间，他比较性急。在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所进行的争论中，他疾呼：“旧时的剧院应被打碎。对这一点不理解，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理解。”《真理报》，1929年12月16日，第1版。然而，在二十年代，他援引这样的话：“早餐时不宜争论”。见他给伊里亚·爱伦堡的极其非无产阶级的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的奇遇》（第三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写的导言，第5页。我们将会看到，也是例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坦姆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失宠的作家与诗人的保护人。

住不放”^⑤。他对这个问题与对国内政策的其它问题一样，提倡通过百花齐放、说服、和平竞争而求进步，反对由政治压迫造成的虚假胜利。

他这时强调民间和平、法制、官方的克制和宽容以及以理服人（布哈林把所有的批评收集到“正常化”一栏内），这与他1920年赞颂的“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强制”相比较是一个急骤的大转弯。显而易见，他的新的政治思想受到他的经济纲领的强烈影响。依靠市场关系和把农民改造成为有效的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来求得经济增长的办法，与政府的朝令夕改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反复论证说，政府的这种做法“同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要求农民合理地耕种，再也不应把他们置于老办法之下：“那时，我们今天征这种税，明天征那种税；今天颁布这个法令，明天颁布那个法令”。“只有在行政和政治工作中根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商品交换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布哈林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一定要懂得，“武断地干涉经济生活的进程会对这种经济生活产生极为可悲的影响”^⑥。

专横或官方的朝令夕改是官僚机构的心理和工作方法

但是，在他的新政治思想背后还有更多的内容。这就是他所担心的布尔什维克一党制中潜在的独裁。从他对官方的“专横”提出的多方面的警告中，人们可以觉察到他的这种担心。“专横”作为沙皇官吏任意践踏俄国农民的形象一直是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潮讨论的主题。它使布哈林追溯往

事，展望未来^⑧。他把专横与“战时共产主义残余”相提并论；与那些似乎享有“某种绝对豁免权”的党的官员相提并论；与那种“我可以为所欲为”的心理相提并论；与“自称是世界精华”的布尔什维克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共产党人的傲慢”态度相提并论；与认为党的统治就意味着“粗暴地对待那些非党员或非团员”的态度相提并论^⑨。布哈林在他致力于党的专政的有限范围内，看到了政治垄断的内在危险，他担心形成一种新独裁主义——制度化了的专横。

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恐惧同他在道德方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是有关系的；而且同他区分邪恶的“官僚主义”与必要的组织上的官僚机构也是有关系的。对他来说，专横或官方的朝令夕改是官僚机构的心理和工作方法，如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谴责的那样，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在二十年代，有一种由“虚伪的法令”统治的他所谓的“新的官僚国家”的威胁。这是一个“新阶级”的幽灵。当左派谈到布尔什维克有可能蜕化时，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或者党内生活的团体化。布哈林对第二个问题也是担忧的。但对他来说，真正导致运动蜕化的是布尔什维克官吏的专横作风：

对我们全党全国来说，任何共产主义小组的专横作风的残余都代表着真正蜕化的一种主要可能性。当一些共产党人可能逍遥法外时，当一个共产党人可以……“安排事宜”时，当他犯了罪无人能逮捕他或起诉时，当他还能通过各种渠道逃避革命法律

制裁时——这就存在着我们可能蜕化的最大的基础之一^④。

布哈林知道，对滥用权力只限于提出警告是不够的。只要滥用权力的人还能获得保护，就要鼓励独立的“自愿组织”去填补党国和人民之间的“真空”。从合作组织、文艺社团到棋类俱乐部和禁酒团体，这些“附属组织”可以共同起到“直接联系群众”、培养“基层的群众积极性”的作用，可以起到打开“渠道”的作用，使群众的意见能够影响政府，如果有必要，通过这种路子，全体人民能够动员起来，团结在政府周围^⑤。显而易见，布哈林希望有上千个这样的“人民的团体”，它们除了防止新的官僚独裁之外，还将修补1917年至1921年“蜕化变质的社会结构”，把支离破碎的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扩大并且巩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群众基础”。

布哈林相信“自愿组织”是苏维埃民主的“一小部分”。他还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特别关心合作组织要真正是自愿的和实行选举的组织，而不是国家机构的简单重复^⑥。然而，他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新生的工农报道员和业余新闻工作者组织。这些组织为地方和中央的报纸撰写有关他们工作地点的报道，1925年达十八万九千多人。这个运动在《真理报》的赞助下开展活动，接受了布哈林的特殊兴趣和影响。五年以

* 或如他所说：“我有条件地称之为‘苏联舆论’的增长。”这句话可以译成苏维埃社会结构、社会团体或简称为苏维埃主义。见《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二卷，第256—259页；亦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7—8期，第22—24页。

来，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反对把工人报道员变成“官僚阶层”的做法。虽然他承认工人报道员不应仅仅是个“留声机或反映基层情况的反光镜”，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他们的官僚化会破坏他们的“基本工作”，即起到向政府转达群众的情绪和不满的“触角”作用，也会破坏他们批评官吏作风的基本自由^⑤。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后来指责说，这是布哈林向群众的“落后和不满”低头的“机会主义”哲学的典型表现。布哈林对这个问题和对当时正在发生的苏维埃社会官僚化的问题再次用这样的口号做出回答：“尽一切可能组织工人团体，用一切办法避免它们的官僚化。”^⑥

布哈林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现实。他相信一党制，希望布尔什维克在经济、文化和思想生活中占“主宰”地位；但是，他也容忍甚至称赞在新经济政策年代中这些领域内出现的多极化的特征。他敏感地注意到出现一个“新的庞然大物”的征兆并且吃惊地回顾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过火之处。他反对把专政的“基本组织”变成无处不有和万能的组织，反对把所有其它的社会机构都变成“铁拳机构”^⑦。他再也不是“国家化”的提倡者，而是最赞成非“极权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了。他相信坚持两厢情愿和教育的领导方法，而不相信专横的方法；相信用“同志式的说服”的领导方法，而不相信暴力的方法；他相信社会和谐——他这种信念所表述的是一个既厌倦国内争斗又充斥着文盲的社会。即使是较为同情他的反对派有时也隐晦地指出，布哈林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他提出用和风细雨的办法

去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严峻问题。1928年至1929年有人再次提出这一指责，当时布哈林成了右派反对派的领袖。

本文作者对布哈林经济思想的评论

1926年年中，布哈林提出了他的修正过的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他的理论涉及广泛的范围，堪称为一位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和政治纲领，并在理论上把这两方面同在新经济政策下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广泛的、总的、战略性的目的”联系起来^①。假如党愿意遵循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布哈林的理论成就就是相当可观的了。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是，他从理论上把1917年的两种革命调和了起来。他把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说成是“我们的革命”的一部分，把1917年的双重动荡说成是由于“工农联合”的胜利这个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这样他就从思想上埋葬了第三次革命——无论是农民革命，还是“无产阶级复仇者”革命的幽灵^②。姑且不论其它，他所论证的观点，即反对农民的思想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都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任务”格格不入的（“一出迥然不同的歌剧中的插曲”）^③这一观点，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办法，以把他们未曾预料到的作为现代化的推行者的作用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协调起来。

但是，旨在把他的新理论奉为党的正统理论的运动是注定要遇到抵制的，这种抵制甚至来自非反对派的人。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仍然存在，它的支持者比人数很少的左派更广泛。

许多农村官员受到战时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有些人对新农村政策持敌对态度，有些人对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没有“背离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说法持怀疑态度^④。此外，他的很多理论——从他的供销合作社的论述到机构演化的概念——使人回想起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异端，而他把工人和农民看作是同志式的“苦力”的结合的看法使某些人认为他堕入了邪恶的俄罗斯民粹主义。尽管布哈林对民粹主义思想一贯持批判态度，从不附和民粹主义对农村生活理想化的看法，但他试图使城市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俄国的农村。这样，不可避免地使人听起来象是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课题。他看到农民在二十世纪既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又是一种有可能起破坏作用的力量。但这不能消除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环绕着他的想法所产生的怀疑，也未能消除说他赞同一种“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指责^⑤。

然而，布哈林的理论最终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在意识形态上能否被接受，而是取决于它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他的纲领要求通过扩大和加强国营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实现工业化。农民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可保证粮食生产有剩余，促进工业的持续增长。这样，他关于“经济结合”的两个目的的设想都会招致严峻的诘问。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领导下，左派很快就抓住了他的工业纲领中的关键的弱点，谴责他在宣扬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复辟思想”^⑥。左派争辩说，在1921年至1926年的工业恢复时期，用鼓励消费需求来刺激工业生产的纲领，是满足了

当时的需要的；但在此后的阶段，当现存的工厂充分开工时，当扩大并从技术上更新固定资本（“重建”）成为中心问题时，这个纲领就不再适用了。当恢复时期相对低廉的费用殆不可得时，新的投资这一严峻的问题就再也无法回避了。批评布哈林的人指责说，他强调需求的作法是在追逐一种可怕的怪物。1914年至1921年间固定资本的消耗和折旧，加上革命使农民摆脱了沉重的财政义务从而使他们向苏维埃工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都意味着真正的弊病是工业结构不能满足消费方面的要求，而不是虚弱的国内市场。在工业得到重建之前，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达到的。相反，却会出现长期的工业“货品荒”^④。

左派的批评在重要问题上显然是有效的。布哈林是在短期工业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长期的纲领。在“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的1923年至1926年，工业年产量的增长有一年是百分之六十，次年又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这使他眼花缭乱地看到“获得了解放的工业的远大前景”。他的战略是使现存设备重新发挥作用，而不是制造新的设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政策的全部艺术是用强制的办法（动员）使那些作为生产因素的隐而不见的‘未被利用的资本’发挥作用”^⑤。虽然到1925年，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业上的“未被利用的资本”“发挥了作用”，但是到1926年3月，布哈林开始公开表示担心“追加资本”的问题了。他对1925年出现的轻微的货物短缺实际上是保持沉默的，直到1926年2月他才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阵痉挛”^⑥。其次，他不愿意

设想马上急骤地扩大工业，这一点也是明显的。比如，布尔什维克知道，他们的日益增长的城市失业的根源是农村人口过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解决办法是用建设新工业的办法来吸收流入城市的移民；布哈林的解决办法是在农村提供新的农业就业机会^④。

他的有关农业的想法也是有懈可击的。布哈林设想，刺激农民的消费胃口，使农民经济商业化就会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城市并支援工业化。他的想法模糊了俄国农业内在的落后性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俄国农业的原始性和分散性，由于1917年至1918年革命破坏了庞大的生产剩余粮食的庄园和富农农场而变得更加严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一种是允许私人兼并土地而形成具有高度生产率的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对布哈林来说或者对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来说，这种“富农式的解决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不能接受的^{**}。在他想利用富农这个鬼怪的同时，他对富农农业的宽容却没有达到宽恕土地兼并和出现一个农村资产阶级的地步。当他告诉农民“自己致富”的时候，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统

* 1915年12月，他注意到工业生产出的“货物数量短缺”，但他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见《全苏列宁主义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114页；《三次演讲》，第19页。

** 在大辩论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并没有忘记斯托里宾推行的沙皇农业改革措施，斯托里宾把这些改革说成是“押在清醒的和强壮的人强健的个体所有者——身上的赌注，而不是押在醉鬼和弱者身上的赌注”。见理查德·查克斯所著《帝俄的没落》（伦敦1965年版），第177—178页。因此，布哈林一再否认他的政策是“押在富农身上的赌注”。

一的、繁荣的、中农的农村。他提出的可能是个虚妄的建议。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从事生产的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但是在布哈林的影响最大的时期，一切形式的集体耕作都因官方的忽视而越来越差。这种情况与布哈林在1924年至1926年对集体农庄所持的消极态度是一致的*。

即使苏维埃农业重新达到革命前的生产率水平，仍然存在着农业产品的市场供应问题。农村遭到的破坏加强了农民经济的自给自足，取消农民的债务使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决定生产和销售的数量和种类**。布哈林希望有利的价格和丰富价廉的工业产品会使剩余农产品的供应稳定地增长，但货物匮乏的威胁经常危及这种希望。如果说他的工业纲领中的缺点危害了他的农业纲领，那么反过来说也是对的。1925年出现了第一个预兆，尽管那年是个丰收年，粮食收集量远远低于官方企望的数字，从而严重地危害了政府的进出口计划④。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布哈林1924年至1926年的经济思

* 这是卢因的《俄国农民》一书的主要题目。

** 见卢因在《苏联研究》（1965年10月）第163—164页上的论述；另见厄里奇《苏联的工业化》第34—36页。学者们对二十年代剩余粮食的市场销售益有争论。有些人倾向于支持斯大林引用的官方数字，把1926年至1927年在市场销售的农作物定为占总收成的13.3%，而1913年占26%；另一些人认为这些数字不准确，1913年和1926—1927年的差别远没有那么大。见杰西·F·卡斯《对粮食问题的思考》一文，《苏联研究》（1967年4月）第399—434页；另见R.W.戴维斯《评粮食的统计数字》一文，《苏联研究》（1970年1月）第314—329页。即使假定采用较有利的数字，这仍然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想对国家在工农业生产中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强调得不够^⑧。他敦促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而不是提倡计划性的资本投资；他全面依赖小农的“合作”，而不是提出最终要建立一个辅助性的集体的粮食生产部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降低了国家“支配地位”的干预能力，而去依赖市场的自发功能。1924年至1926年，他提出了实际上是与市场有关的目标要求，如取消个体商人，加快商品交换。这些目标往往得以实现，但国家的生产能力依然如故。

这一大方向造成了与布哈林的政策有关的其它方面的困难。他关于工业增长的速度和格局的思想反映了恢复时期的情况，那时产量剧增，轻工业要促进重工业。然而，当布哈林谈到用“蜗牛的速度”走向社会主义时，当他有一次争辩说“慢速度”不见得是“致命的危险”时^⑨，他象左派一样，强烈地想要获得一种“非常高的速度”，这种速度将不允许重工业“落在后面”。最后，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看来，他的政策好象是要剥夺党在工业化中的主动地位，而把它交给凶吉未卜的农民或外国市场手中。因此，由于感到政治上无能为力而引起的怨恨和出于经济原因的抵制使他的纲领遭到反对。

布哈林为什么迟迟不肯放弃他的非同小可的错误概念呢？他为什么对左派作出的分析持顽固的冷漠态度呢？肯定无疑，他对政府在经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误解。此外，他相信，反对派的政策就是政治灾难。而且由于他自己参加了激烈的党内斗争，他听不进正确的批评。他同他的

对手一样越来越相信他的政策——而且只有他的政策——是明智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从道德上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看来也与此有关。这种理解把他同大规模消费是苏维埃工业化的动力的论点联结在一起。这种观点有时对布哈林不无好处，比如，提醒他警惕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所固有的危险性。但这种理解也会使他步入歧途。他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用剥削农民来养活工业的“疯子般的乌托邦”火冒三丈。但是在需要进行冷静的说理时，他却沉溺于空喊道德口号。对左派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要求，他反驳说：“我们的工业向农村经济提供的产品一定要比资本家的还要便宜。”^⑧ 不管这在道德上是多么令人满意，但它却没有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问题。最糟糕的是，这种道德上的理解使布哈林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匮乏或可怕的负担的工业化——一条没有痛苦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原来的经济纲领在1926年工业恢复工作结束时就陷入了困境。几个月之后，他开始重新考虑并修订他的政策^⑨，尽管他的修正后的思想继续信守他于1924年至1926年提出的总的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论点。与往常一样，经济情况和政治将会影响他的提议，但愿这仅仅是由于布哈林和他的思想当时是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的缘故。

注 释

①参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案》第2卷第163—172页。

②《为列宁主义而斗争》（论文集）第285页。

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1954年版第2集第116—126页；E.H.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249—275页（纽约1958年英文版）。

④参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党反对派》（剑桥1960年英文版）第I章。

⑤参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2章。他的思想在亚·厄里奇所著《苏联的工业化》一书中得到最全面的分析，此书被本人广为引用。

⑥参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84、88—89、124页。

⑦同上，第85—88页；另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8章。

⑧参见《共产主义学院通报》1924年第7期第79页；《新经济》第110—111页。

⑨《新经济》第136—146页，第1、3章。

⑩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党和反对派集团》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52页。

⑪《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93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63页；《报告》第18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11—312页。

⑫《不断革命的理论》，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47—348页；《一九〇五年革命》，见《劳动通报》杂志1925年第12期第8页；《列宁的政治遗嘱》，第7—8页；《土地及农民问题的意义》，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3—4期第5、16页。

⑬见《三次演讲》第2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47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89—299、341—349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8—19页。

⑭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8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8页；《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3页、第267页。

⑮多伊彻：《手无寸铁的预言家》第234页。

⑮《马恩选集》第二卷第24—25页。如进行讨论，见罗伯特·C·塔克《哲学和卡尔·马克思的神话》（英国剑桥版，1961年），特别见第11—27页。

⑯《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158、168页；亦见《进攻》第69页。

⑰《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辩护人与被告的发言》（莫斯科，1922年）第139、144页；《进攻》第215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92页。

⑱《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2、297页；《苏共中央决议汇编》第二卷中援引的布哈林的话，第558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92页。

⑲《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51、352页；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的积累（理论探讨）》（第4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121、131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3—4期第6—8页、第16—17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05—306、528页。

⑳《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3—4期第17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51、353页；《建成社会主义》（伦敦，1926）第64—65页。

㉑《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87、351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3—4期第8页。

㉒《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3—14页；《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60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12页；《国际形势和共青团的任务》，《真理报》，1925年3月26日，第3版。

㉓《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45页；《国外通讯》第八卷（1928年）第1270—1271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6页。

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13—714、760页；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的积累》第106页；布哈林：《当务之急》，《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第2版；亦见其所著评论，《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2版。

㉕《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第2版；《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2、89页；《教师们和共青团》，《真理报》，1925年2月4日，第5版。

㉖《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版；亦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88—292页；及《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8—9页。

㉗《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版；《真理报》，1925年2月4日，第5版。

㉘《报告》第23页；《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与革命》杂志，1925年第3期第8页；亦见《三次演讲》第26页。

⑳ 《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47页；《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88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6页。

㉑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0—292、315—317页；亦见《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8—9页。

㉒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亦见《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6页。

㉓ 《劳动通报》杂志，1925年第12期第5—6页；《国外通讯》第7卷（1927年）第423、431页；《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

㉔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84、197页；《国外通讯》第7卷（1927年）第199页；他在《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3—13、45—85页中全面发展了这一论点。

㉕ 布哈林：《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莫斯科，1925年）第17页。

㉖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61—62页；亦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80页；及《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2版。

㉗ 《帝国主义和资本的积累》第66、78页和第3章中到处可见。组成该书的文章最初出现于1924年底和1925年初。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见保尔·M·斯威齐所著《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1942年）第158—172页。

㉘ 《共产国际》杂志，1928年第31—32期第35页；关于布哈林如何对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判性评论，见厄里奇的《苏联的工业化》第18—21页。

㉙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5—6、60页。另见《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3版和《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

㉚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1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5页。

㉛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52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3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03、371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3、41页。

㉜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6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05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7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3页。

㉝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51—54、76页。

㉞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3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1、41—42页；《列宁格勒组织》第99页。

④③ 《列宁格勒组织》第98页；《三次演讲》第16—18页，第20页。

④④ 见他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3—14页，第9—10期第3—15页。

④⑤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4、6、12、76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0—22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5、14页。

④⑥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4—5页。

④⑦ 布哈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文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第147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5页。他在1925年的其他两个场合也被迫收回这个口号。见《新反对派：关于1925年讨论材料的文集》（列宁格勒，1926年）第47页；及《布哈林同志的声明》，《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第3版。

④⑧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3、16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5页。

④⑨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4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3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9—10页。另见厄里奇的《苏联的工业化》第13—14页。

④⑩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54、66页。

④⑪ 同上，第63—71、77—85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9—305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4—45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7页。

④⑫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06—309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77页。

④⑬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7—58页；另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06—310页。

④⑭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07页；《国外通讯》第七卷（1927年）第199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91页；《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第3版。

④⑮ 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05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77—84页；《报告》第32—33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62—64页。

④⑯ 《全苏列宁主义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1926年3月11日—12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256页。

④⑰ 见多伊彻：《手无寸铁的预言家》一书中所引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话。

④⑱ 《列宁格勒组织》，第103页。

④⑲ 同上，第102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5页。

⑭ 《列宁格勒组织》第91页。

⑮ 见《国外通讯》第五卷（1925年）第987、1025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5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71页。

⑯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6页。

⑰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4、66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8—9、14页。

⑱ 见《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57页上布哈林的论述；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0章，和他的《社会主义》第1卷第10章。

⑲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2期第4—5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60—62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0页；《为列宁主义斗争》第337—338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72—374页。

⑳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2期第5页和1925年第8期第9页，N.布哈林和A.塔尔海默；《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莫斯科1924年）第24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3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74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47页；《真理报》1926年7月3日，第2—3版。

㉑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310页；《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3版。

㉒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4页、第17—18页；另见《真理报》1924年10月24日，第5页。

㉓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14页；《进攻》第205页。

㉔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3—4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2—13页。

㉕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20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87页；《三次演讲》第27页。

㉖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64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2、45页。

㉗ 见布哈林发表在《进攻》杂志第128页上的话；《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16页。

㉘ 布哈林所列举的例子，见《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9—40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9页；《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第113页。

㉙ 《列宁的政治遗嘱》第10页。

㉚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526页；另见他的《恩其门主义》，《进攻》杂志第128—170页。

㉛ 里昂·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45年）第29页。

②⑩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8页。

②⑪ 《报告》，第21页；《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2版。另见《世界革命的道路》第2卷第116页；《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47页。

②⑫ 见《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64页；《报告》第10—11、34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21页。

②⑬ 关于乌斯特里亚诺夫，见布哈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第148页。布哈林实际上想的是布尔什维克左翼。见《国外通讯》第7卷（1927年）第1603页。

②⑭ 见法布曼：《退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第304页。

②⑮ 《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第113—114页。

②⑯ 见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6年版第101、103页；另见布哈林：《列宁格勒组织》第110页。

②⑰ 《三次演讲》第34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2期第8页。

②⑱ 《我们战胜谁》，《联共（布）的二十五年，1893—1923年》，（莫斯科，1923年）第137页。

②⑲ 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谈言论，《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7年第8期第78页；和布哈林对他们的观点的评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136页。

②⑳ 见布哈林在《报告》第36页上的言论。

㉑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4—6页、第9—12页。

㉒ 如托洛茨基所做全面记叙的证明，见他的《俄国革命》第3卷第398—399页；《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57年）第37—39页。

㉓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9页。

㉔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136页。关于他在1925—1926年间所谈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主要言论，见《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4—6页、9—12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00—10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16—24页；《建设社会主义》第49—63页；和《世界革命的道路》第2卷第110—117页。

㉕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22页；《建设社会主义》第50—52、62页；《世界革命的道路》第2卷第111页。

㉖ 《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78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24页。

⑦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5—6页。

⑧ 《报告》第16—17、46页；《国外通讯》第7卷（1927年）第1423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5—6页；另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9、82、103—104页。

⑨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5页和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3章。

⑩ 关于如何估量农民阶层及其政策含意，瓦·M·卢因《谁是苏联的富农？》一文，《苏联研究》（1966年10月）第189—212页；卢因，《俄国农民》第2—3章；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3章第5节。关于老富农已经消失的观点，见B·鲍古舍夫斯基的《论农村的富农或论传统在术语中的作用》，《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63—64页。14%的比例数是加米涅夫提出的，见波波夫，《历史大纲》第2卷第244页。

⑪ 见马依兹林（弗·斯米尔诺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926年第18期第108—111页；《左翼反对派的纲领》（1927年）（伦敦1963年）第25—34页。

⑫ 见《共产主义火学校刊》第2卷第254—255页；《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61—62、66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48—50页。

⑬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53页。

⑭ 如布哈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指出的那样，见第22页。关于列宁在1918年的言论，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7—208页。

⑮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1页。

⑯ 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5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2—183页；《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第5版；《列宁格勒组织》第107页和《三次演讲》第3、23页。

⑰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3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4页；费希尔在《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一书中第543—544页中引用布哈林的话。关于他没有发挥的论述，见《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5—26页。

⑱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13—14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9—50页。

⑲ 《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11页；《三次演讲》第20—21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48—49页；《报告》第29—30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11页。

⑳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7页。

⑩同上，第43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4页。关于反对派的指责，见《列宁格勒组织》第111页和布哈林：《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47页。

⑪见《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61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7—48页；《三次演讲》第3页、第25—2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48—149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47—48页。

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43—45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12页；《报告》第18—23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42、60页；《真理报》1927年11月5—7日，第3版。

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99页；《真理报》1927年11月6—7日，第3版。

⑭《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0、99页。

⑮《进攻》杂志第279页；《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0、312页；《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3版。另见《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4页，第46—51页，也在那里论证道，该理论的轮廓是列宁勾画出来的。

⑯《进攻》杂志第14—15页。关于后来对两个阶级的理论的攻击，见N. 索尔茨：《论“两个阶级的社会的理论”和工农联盟》，《真理报》1929年11月28日，第3版。

⑰见《新反对派》第144—193页。

⑱见《三次演讲》第28—32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32—42页。

⑲《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第129页。

⑳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216—222页和布哈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1—189页上的言论。

㉑《真理报》1929年8月28日，第4版。

㉒《扩大的执委会》（1925年）第319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7页。

㉓《真理报》1925年3月6日，第3版。

㉔《马克思主义和农业合作社》（莫斯科，1928年）第222页。关于他的再次论述，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12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8页和《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9页。

㉕《马克思主义和农业合作社》第220—221页。同样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4页；和《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13页。

㉖《三次演讲》第33页。关于他对列宁的“合作计划”的评论，另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87、293、371页和《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9页。

⑳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6页；《真理报》1925年6月19日第5版。关于他对合作社的观点的全面论述，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6—9章。

㉑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12页；《三次演讲》第27页。另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1—33页。

㉒ 《国外通讯》第5卷（1925年）第1025页；《报告》第23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8页；《三次演讲》第27页。

㉓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7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8页。

㉔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4、299页；和N.维尔采尼切夫；《论布哈林同志的合作制计划》，《真理报》1929年10月12日，第2版。

㉕ 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5—296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8—13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2—187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0—35；《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4—38页。

㉖ 塞莱克特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引用，第265页。

㉗ 《真理报》，1926年7月1日，第三版；《国外通讯》第八期（1928年）第986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4—35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8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2—183页。

㉘ 《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3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7页；《报告》第22—23页；《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第124页。

㉙ 《国外通讯》第5期（1925年）第998页。亦见《真理报》，1925年3月6日，第3版。

㉚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9页。关于他的早期讲话，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7页；《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5页。

㉛ 《若干问题》第47页。

㉜ 《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3版；《若干问题》第46—51页。

㉝ 见《若干问题》第48—49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2期第5—6页，和1925年第8期第9、14页；《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6—268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6—188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中处处可见。

㉞ 《报告》第11—12页；《若干问题》第48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4页。

㉟ 《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6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7页；卡尔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援引了布哈林的话，第一卷第261页。

㊱ 利昂特也夫在《经济理论》第68页上援引了这句话。

⑭《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64—65、70页，《国外通讯》1925年第5期第1025页。

⑮《党和反对派集团》第49—51页；《国外通讯》1925年第五期第990页。

⑯《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9页；《为列宁主义而奋斗》第306—309页。

⑰《青年应该走什么道路？》，见《青年近卫军》杂志1926年第2期第83—84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64页。

⑱《报告》第8页。他对国内和平的论点，见《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第47—48页；亦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1—52页。

⑲《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

⑳《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四期第267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3、70—71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第371页。

㉑《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8页，威廉·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芝加哥，1952年）第77、96页。

㉒见其《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和《俄国革命和社会民主》，载于《国外通讯》第七卷（1927）第1528页。

㉓《若干问题》第48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68页；《国外通讯》第五卷（1925）第921页。

㉔《出版和革命》杂志1925年第三期第8页；《国外通讯》第五卷（1925）第923页；《苏联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7）第21页。他后一部分的观点看来是正确的。见默尔·芬索德：《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剑桥，1958年）第177页。

㉕《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3—54页；《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65—66页。

㉖《若干问题》第12页。

㉗《真理报》，1924年10月24日，第5版；亦见该报1925年2月4日，第5版；《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9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

㉘《若干问题》第12页。

㉙《真理报》，1925年2月4日，第5版。亦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0—821页。

㉚《党和反对派集团》第71—72页。

㉛《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8页；《若干问题》第13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第370页。

⑩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75页。至于“复兴”运动，见卡尔：《社会主义》第二卷第23章。

⑪ 见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14章；爱德华·J·布朗：《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俄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插曲》（纽约，1953年）第3章，至于决议，见该书第235—240页。布哈林的作用也在波隆斯基《文学运动片段》第8章中得到了讨论。决议中的语言与说理，和布哈林辩论中的语言与说理十分相似。见《关于联共（布）的文学艺术政策问题》（莫斯科，1924年）第35—39页和《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3—272页。

⑫ 《关于联共（布）的文学艺术政策问题》第36—38页；《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3—265页。

⑬ 《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63、269、272页；《关于联共（布）的文学艺术政策问题》第36—38页。

⑭ 《列宁格勒组织》第101—102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瓦连丁诺夫在其《学说》一书中援引的布哈林的话，第23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9页。

⑮ 布哈林不断对苏联官方的专横表示抗议。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第78—81页；《若干问题》第12—13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1页，见以上第158条注释。对于它在十九世纪俄国思想中的存在，见关于官方在亚力山大赫增的不法行为的讨论，《大洋彼岸，俄国人民及其社会主义》（纽约1956年）第181—183页；Г.А.江希耶夫：《宗教改革的时代》（彼得堡，1907年）第328页。

⑯ 《全苏列宁主义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256—257页；《新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第270页；亦见《真理报》，1925年2月4日，第5版。

⑰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

⑱ 见《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二卷第256—257页；《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8—9、12、16—25、34—40、68页、75—77页和《真理报》，1926年5月29日，第3版。

⑲ 《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第74—77页。亦见《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8页；《真理报》，1925年6月19日，第5版和《青年近卫军》杂志1926年第2期第89页。

⑳ 见其《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中特别见第8—9、18—25、34—40、51—57、61—63页；《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1926年5月29日，第3版。至于工人——农民通讯员，见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195—198页。

⑳至于指责，见《为了马列主义关于出版的学说》（莫斯科，1932年）第81—85、108—110页；《反对工农通讯员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见《真理报》，1929年12月11日，第4版。关于布哈林的回答，见《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5页，及他对官僚化的愤怒指责，见《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4页。

㉑《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第15—16、56页。

㉒《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7页。

㉓这是德米安·贝德尼的话，被卡尔在《社会主义》第2卷第79页引用。

㉔《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第294、296、317页。

㉕见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5页的话；另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

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303页。

㉗这是伊凡·斯迈尔格的话，见《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17期（1926年）第199页。

㉘对左派批评的这一报道是以厄利奇《苏联工业化》一书第30—59页为依据的。

㉙《报告》第3页；《三次演讲》第17页；《若干问题》第7页。关于工业数字，见波波夫，《历史大纲》第二卷第261页。

㉚厄利奇，《苏联工业化》第38页。关于布哈林，见《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年）第369—370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9—10期第4页。

㉛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290—297页。

㉜见卢因的讨论，《苏联研究》（1965年10月）第162—197页。

㉝《目前时局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1页。

㉞《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8页。

㉟见厄利奇，《苏联工业化》第4章。

（达洋译）

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一书简介

〔苏〕德·彼·马列茨基

在布哈林同志的这本书中，收进了作者关于最近争论期间党所面临的各种至关紧要的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尼·伊·布哈林的这本论文集，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这一“观点体系”的详尽的批判性分析，在形式上是卓绝的，在内容上是摧毁性的；它对我党广大党员群众来说，其意义较之它的标题所表明的要大得多。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的宝贵贡献，而且也是对“论列宁主义问题”的出类拔萃的评论性指南。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加紧地砥砺我们的总的路线”。既然“宣传列宁主义是时代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那么，“就要在批判各种背离列宁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很好地阐明我们自称是其信徒的这一学说的特点”。

“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是列宁主义的最本质的独特的特点。”（《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一书原文第100页。以下所注各页码均系该书原文页码。——译者注）因而很明显，如何

* 《论托洛茨基的问题》一书1925年由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共192页。本标题系译者所加。——译者注

阐明这一学说的基础，在理论上深入分析有关工农联盟的各项总的和局部性的问题，也就成为作者注意的中心。“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在逻辑关系上互相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三组问题，尼·伊·布哈林的思维正是按照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文集最突出的优点之一，也许是作者在集子里真正做到了把最近争论期间经常提到的那些有时看来全然互不相干的大量问题，都综合成为一个逻辑上完整的整体，成为一个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东西。布哈林同志本人在整个集子中反复强调的正是必须把大量的个别的问题统统综合在一起来看。“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分歧，现在已经汇合成为一些基本的‘理论要点’，一些完整的思想体系，一些多少可称之为严整的‘理论’。以前争论中许多分散的问题，例如，币制改革问题，党内几代人的问题，价格问题，机关工作人员问题，‘剪刀差’问题，党内民主问题，计划问题，‘商品侵入’问题等，所有这些现在都已归结为某些基本的路线，都仰赖于某些总的问题（例如不断革命的理论，对我国革命动力的估计，对我国革命前途的总的估计等问题）的解决。而所有这些最重大的问题围绕的核心，是工农联盟问题。”（第64页）

布哈林同志在书中，充分地做到了不是给读者简单地罗列党与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分歧，而是把它们作为一定的体系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并加以阐发，他把这些分歧排列成为一个统一的“序列”。

在《打倒派别性》一文（这是文集中收进的第一次争论

期间所写的唯一的一篇论文)和《不应当怎样写十月的历史》一文(这是我党中央机关报发表的第一篇反驳托洛茨基同志臭名昭著的《十月的教训》的文章)之后,尼·伊·布哈林立即转入讨论“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学论据的问题”,转入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著名论文中企图描绘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问题。布哈林同志以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一企图在理论上的欺骗性、狭隘的行会倾向和政治上的危险性。某些同志为一种特殊的“工联主义”倾向所迷惑,为了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过程,竟建议走阻力最少的路线。他们受一种想法所诱惑:不必采取相应的办法而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进行积累,用在社会经济上“剥削”农民的办法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吞食”小资产阶级经济,把它变为“社会主义宗主国”的经济“殖民地”。但是如果我们沿着这样一条诱人的道路走,那就势必要“毁灭”作为我党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成就的基础的“工农联盟”。这就是布哈林同志所要证明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王国”,而是共产主义,不是“吞食农民经济”,而是“改造”农民经济,不是对农民的阶级奴役,而是与农民的“联盟”,对农民的阶级领导,不要国营工业的“垄断寄生性”,而要“社会主义式的发展”,——这就是布哈林同志提出来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规律”的一些反原理,一系列致命的反题。

《关于不断革命理论》的论文,对读者来说,是饶有兴味的。“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这就是对我国革命进程的总的

估计问题，我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我国社会各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无怪乎，在不断革命的学说中，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个别的、局部的错误，似乎都汇集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在不断革命理论中，最易于鲜明地揭示出“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缺陷”，即从头到脚渗透在整个托洛茨基主义之中的对农民估计不足。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除了名称相同外，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于1905年，甚至于1917年对于“动力”问题的表述，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毫不沾边，而且也不可能沾边。这是因为，他的表述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阶级同盟军和助手——农民的怀疑。没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支援”，夺得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必然注定要陷于农民反革命的刀戈之中，——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理论就是这样恶毒地预言的。这种站不住脚的理论，已经被实践，被苏维埃俄国七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所粉碎。在我们这里，代替反无产阶级的农民反革命的，是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布哈林同志不仅阐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在苏联国内舞台上的破产，而且还论证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破产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尼·伊·布哈林这部著作的最奇特的批驳是：如果一贯地、坚定地站在“不断革命”的立场上，那么，甚至在具备有外国无产阶级的“国家支援”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可能要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等等，那么，即使在无产阶

级获得世界性胜利的情况下，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农民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无产阶级无法使这个大多数跟着自己走，那么，要么国际性的革命注定要失败，要么（按照库诺夫的说法）必须把革命推迟到形成无产阶级多数的時候再来进行”。布哈林同志在逻辑上有充分的权利讽刺道：“不能设想，难道我们还能炸毁‘天人界线’，而去等待纯粹无产阶级的天国力量的帮助，并且还是以‘国家形式’的帮助吗？！”（第120页）

在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副标题是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的《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教训》）中，布哈林同志带有批判性地总结了去年的经济学争论。在前言式的总的社会学的章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之后，作者随即展开了从总的到局部性的、从抽象的问题顺着逻辑的阶梯逐步下降到具体问题的批判。布哈林同志从经济结合问题，谈到了“工业专政”问题和计划问题，之后又分析了我们的“价格政策”和币制改革。最后还写了一个概括性的章节，从与私人资本斗争的角度上来谈“社会主义积累”问题。对去年经济学争论的这一批判性的经验总结，本身是极为重要的。在这里，它令人感到兴趣，还由于，布哈林同志在其中清算了划定争论期间互相斗争的“两种工业政策的界线”的某些不正确的“流行公式”。布哈林声明，那种认为似乎“反对派是主张高赢利、社会主义积累高速度，而中央是主张最小赢利、社会主义积累低速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庸俗的。“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最小赢利，而是主张单位

商品的最小利润。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要脱离农业的、最终是较快的、最快的积累速度。”（第182页）

“社会主义积累”的“最佳速度”（即恰到好处速度）符合于中央路线的要求，而不符合于反对派路线的要求。“反对派”经济学家们所主张的高额利润、高额垄断价格的方法，不但没有加速，反而在客观上延缓了积累过程。积累过程不可能置身于销售过程之外。销售是在流通领域里，在商品周转领域里实现的。高价会减缓商品周转过程，迟滞商品销售，因而，也必然减缓积累速度本身。“资本周转的时间……就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总和”（第182页）。反对派忘却了《资本论》第二卷的这一真理——这个真理现在由于当前极为现实的政治争论的火花又突然重新放射出自己的光彩——他们竟想实现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一面延缓社会主义工业资本流通的时间，另一面又要加速这一资本的周转。布哈林同志正是细微地考察了反对派是如何在这一矛盾的迷网中，愈陷愈深的。

最后，我们想请党员读者注意文集中的两点。这两点，对于理解列宁主义理论基础都是异常重要的。第一点，布哈林同志依据弗·伊·列宁关于“环节”的著名原理，对列宁辩证法的特点进行了解释。“可以说，列宁同志除了天才地勾划出伟大的历史前景外，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是列宁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种表现，这就是：第一，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首先寻找它的特殊性，在每一个历史阶段、

每一历史关头看到它的独特性、个别性、不可重复性的最伟大的本领；第二，察觉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过渡，一种情形向另一种情形，一种局势向另一种局势过渡的本领；最后第三，由前面两个基本的特点产生的又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用我们的政治行话来说，在“目前的时局”）中，善于区分出必须紧紧抓住的基本环节的最伟大的本领”（第100—101页）。列宁逻辑的这三根所谓“支柱”，布哈林通过布列斯特和约和计划的例子，作了十分浅显的阐述。

我们想提请注意的第二点，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一文的第一章“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布哈林同志在这一章中，对“诸阶级在社会中的合作”与它们“在国家中”、在“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合作，作了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方法论上的区分。我国社会上的某些误解和理论谬误，以及例如奥托·鲍威尔这样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的某些吹毛求疵，都是在混淆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诸阶级在社会中的合作（列宁同志曾写道，“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并不要求必需有他们在这个社会的“政治外壳”。即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与之相适应。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象某些为我们的“亲农主义”所吓倒的同志那样天真地认为我们主张的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而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制度又是由在领导阶

级——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互相合作的不同阶级所组成的。

对于列宁同志所说的这种“阶级合作”的条件，作者作了内容极为充实的分析，以便从理论上进行详尽的阐发。对于不同的阶级来说，合作的性质、类型是不同的。对于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战略路线”在于通过同它合作，利用它，“从一定的时机开始，主要通过经济排挤的途径战胜它”；对于农民，我们的路线则在于“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的合作和更小得多的程度上的斗争；是通过改造而不是通过排挤的办法来战胜之”（第143页）。

显然，要把这本文集的全部丰富内容在这里介绍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布哈林同志的文章，精彩的叙述方法与令人折服的批判性理论相互交辉，让人读起来实在爱不释手。对于这样的文章，每一个希望认真搞清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的党内同志，每一个愿意利用一部分闲暇时间来研究列宁主义“这个我们时代最灵活的认识工具”（第141页）的党内同志，都绝不应当轻易放过。

（徐博涵译自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二五年
第五一六期。）

评布哈林论文集《进攻》

〔苏〕卡皮托诺夫

世界革命运动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从手持武器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直接战斗转入小小的——被迫的和随时准备突破的——喘息。无产阶级利用两次流血战斗之间的短暂间隙，来调集力量，整顿队伍，对自己的先锋队进行战斗训练。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党表现为在局部危机中对健康的战斗力量的发展和挑选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在新战斗前夕的这种基于力量的集结。

对西方党的队伍的检验表明，不是战线的一切地段都同样巩固。特别是，广大党员的理论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者理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显然不够。在实际政策中多多少少变为公开的机会主义或“左”的盲目性的理论倾向，现在是所有西欧共产党注意的中心。

同样的过程，也在俄国以另一种形式显示出来。初看起来，我们的青年党员热衷于各种“最新的”、而实际上是庸俗—修正主义的理论（象恩其门主义、波格丹诺夫体系等）的浪潮，似乎退去了，似乎俄共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又开始加强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俄国共产党人必须在

其中工作的客观形势，那末就会发现，理论上的坚定性仍然不够，理论在我们这里没有占据足够重要的地位。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出现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大改组，由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新方针”的结果而显示出来的国际局势的极端复杂性，——所有这些，在一个合法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就造成这个党内，在它那不具备牢固而彻底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其思想未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火炬完全照亮的部分中，出现不可避免的动摇和偏差的条件。为了对付周围陌生的新奇事物提出的挑战，为了能够掌握它们而不偏离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路线，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觉悟。

布哈林同志的论文集《进攻》，收进了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刊登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刊物上的文章。这里收入的首先是专门分析经济理论的五篇。这里的进攻目标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最时髦的“明星”：柏姆-巴维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司徒卢威。反对柏姆-巴维克的论文，只是在布哈林同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对“奥地利人”的光辉进攻的开始。在这一进攻之后，这些边际效用理论家们的论断的科学价值就永远完结了。此后，批评“奥地利人”，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论据，几乎成为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论文只是进攻的开始，因此在《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之后，它作为标志布哈林同志对心理学派展开批判的道路的文件而引起兴趣。

《理论上的调和主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价值

论) (第14—24页)一文,由于简短,只是大体勾划出一条应当据以对杜冈进行批判的路子;但是,在这篇短短十页的文章以后,杜冈靠信口开河和无耻地冒充权威向无经验的读者施放的貌似有说服力的迷雾,已完全消散。

而另一篇关于同一个杜冈的文章——《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分配理论)》。包含着对理论上庸俗化的精彩分析,至今还有现实意义。理论上简单化的危险是今天理论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之一。一些同志常常以为,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员,不管恰当不恰当,只要念记阶级,以阶级斗争起誓,也就够了。这样的同志,如果能够看一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他将会十分惊奇,他将不得不承认,杜冈是自己观点上的同伴,——原来杜冈也讲阶级,讲阶级斗争,讲随你要的什么。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证明了这种观点的全部虚弱性。为了了解当前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简单指出它们是不够的,——应当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复杂结构,应当揭示阶级斗争和无政府状态社会、无政府状态调节的基本经济规律之间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价值、价格等等)——杜冈预先有意地把分配理论的制定跟这些范畴割裂开来,——应当加以研究,并且必须把这些范畴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联系起来。只有当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内在经济原因被揭示出来时,才能说得上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不然,就是简单化,庸俗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习气。

其余两篇反对奥本海默和司徒卢威的经济论文,指出了

资产阶级的博学教授，当他们在公开的科学讨论的场合企图以自己的观点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表现了他们的整个的幼稚无能。资产阶级学识渊博的“可怕的坦克”，在布哈林同志的批判之笔下，变成了可怜的哈巴狗；他们企图证明自己的学术优势，可是不论有什么样的学术词藻的装饰羽毛，实在仍是几条哈巴狗。

我们共产主义大学青年中，谁没有听说过恩其门，谁不曾向他“拜倒”过？另一方面，我们“中立的知识界”中，谁不知道巴甫洛夫教授和他反革命的世界观？《进攻》中有两篇思想锋利、理论上极其重要的文章，专门论述这些惹人注目的问题。其中第一篇论及恩其门的，特别令人感兴趣，有理论价值。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这一系列文章，是论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直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这里，从对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和这一专政的实质的一般理论分析，到对共产主义建设具体困难的分析和对策略口号的探讨，包括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问题。深刻的理论和今天的实际政策的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贯特征——在这里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是独立的一篇，由在共产主义学院会议上就这个题目的简短的讲话整理而成。在党内同志一些著作中流行的在区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的糊涂观念，被布哈林同志清除了。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的“实践”或马克思主义在生活中的“运用”；列宁主义，这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实际斗争的最深刻的理论和指示。如果马克思主义被它的追随者们在理论上歪曲，在实践上变成空洞的公式和图样，这并不证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枯燥抽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同革命活动、革命实践息息相关、以最深刻的理论为其灵魂的学说。列宁的功绩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继承人。

在一篇评论中详尽阐明布哈林同志这本书的意义是不可能的。每个多少能够进行思考的党员，都应当在理论修养方面经常最严格地要求自己。而布哈林同志的《进攻》当能在这方面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马文哲译自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0期)

布哈林传奇

——评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

〔英〕伊·恩·卡尔*

最近几年来，英美的苏联问题专家对布哈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原因很多，有的是很明显的。人们经常听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无穷无尽的谴责，已经感到腻味了。布哈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一个革命者。一个人如果对他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出于同情而发生兴趣，那至少可以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顽固的冷战老手了。

更重要的是，布哈林的经历对那些饱受西方传统熏陶的作家来说，是极易理解和富于吸引力的。布哈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莫斯科知识分子。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父母都是中学教师。除童年时期曾在比萨拉比亚渡过四

* 伊·恩·卡尔生于1892年，1916年进入英国外交界，长期在英国外交界工作。现为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高级研究员，曾出版过《两次大战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1917年前后》、《苏联对西方的影响》、《苏联的形成》、《新社会》等多部史学著作。十卷本《苏维埃俄国史》是他的代表作。——编者注

年外，他一直是在莫斯科长大的。他的经历使他与俄国外省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同农民和工人也没有任何接触。直到大约十七岁那年，他开始从事政治鼓动工作的时候为止。

1911年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从那时起，到六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他一直是在西欧和美国渡过的，他写了不少的书。这是他的政治、经济观点已经形成，并开始写作的时期。他的德语和法语都讲得很流利，英语的阅读能力也很强。可以这样说，布哈林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不同的地方是：他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远远超过俄罗斯文化对他的影响。

布哈林的性格随和而又招人喜爱，具有独特的人情味。这一点当时人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而且在后一代人的眼里他的形象同样具有极大的魅力。布哈林是唯一无懈可击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是一位处在充满了恐怖和残酷的革命和内战时期的领袖。托洛茨基则被认为是“戴着羔皮手套不能干革命”这个陈腐而冷酷的口号的提倡者。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任何地方也没有布哈林采取过什么行动的记载，他从来没有负责过行政职务。他是一个卓越的鼓动家，词藻丰富，才华横溢，但却不是一个实干家。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不同，他清白无瑕，一尘不染。只有他的头上才闪烁着圣洁的光环。

布哈林的结局终究没有逃脱悲惨和恐怖这唯一的下场。在列宁死后，他跟随着斯大林这颗新升起的晨星，大肆攻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直到1927年底把他们开

除出党并送去流放。但后来他感到这太过火了。他原来只想把托洛茨基逐出公共生活，并不想伤害他本人。他需要实现工业化，但不想搞得象斯大林那样快和猛烈。他不赞成对持有粮食的农民进行残暴的干预。他开始给政治局写报告，并以很谨慎的语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斯大林。

尽管如此，他仍然难逃一死。1929年夏天，他虽然没有被开除出党，但是却受到了谴责和降级。他顺从地忍受了这一耻辱，此后几年他仍然忠实执行分派给他的无足轻重的任务。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甚至季诺维也夫是恨之入骨的，对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布哈林没有任何反对斯大林的言行。斯大林把他留到最后，然后逮捕和审问了他，和其他人一样枪杀了。这是一桩恐怖事件，甚至比所有的清洗事件都要恐怖些。

斯蒂芬·科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学者非常崇拜布哈林，并为此确实作了许多事。他用英语写了第一部学术性的长篇布哈林传，也可能还要用其它的文字来写。这个工作他准备了好几年。科恩先生搜集了一切可以弄到手的布哈林著作或有关布哈林的文章，偶尔也利用曾经接触过布哈林的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材料。科恩先生在自己的序言中，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有那么一种诱惑力，迫使传记作者“夸大了主人公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本书对布哈林的描述比史册上所记载的更重要和更光荣，那么人们就不必过分地吹毛求疵了。许多传记之所以写得好，都是因为作者对他所描述的主人公有一种特

殊的同情和共鸣的缘故。

科恩先生并不是想把他的主人公描写成白璧无瑕的人。相反地，他笔下的布哈林不过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古典英雄之一，正如布雷德利的名言所说，他们“替促使自己死亡的灾祸出了一份力”。1923年底，当布哈林还是《真理报》的总编辑时，为了同托洛茨基进行长期斗争直至把他驱逐出党，布哈林写了一篇文章定下调子。在这篇文章中他不遗余力地列举了托洛茨基宗派罪行的历史，而这些罪行他是样样都参与了的。这篇文章中被科恩先生公正地称为“令人讨厌的、带煽动性的章节”，正是在以后四年中，不仅针对托洛茨基，而且也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以及其他敢于向党的正统观念挑战的俄国和国外共产党人的无数文章和讲话的先兆。

科恩先生在本书有一个地方写道：“布哈林的特点就在于，他认为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影响私人关系。”这是不太真实的。布哈林进行政治报复的最令人震惊的和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出卖自己的老朋友，他的著名的《共产主义入门》一书的合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的分析并不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而是一篇敏锐的经济分析论文，可是布哈林却以粗暴的政治煽动性的语言来回答他。

科恩先生在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中引用了1927年11月布哈林的老同事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痛斥布哈林是“迫害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狱吏”。这封信发表在孟什维克的一个国外期

刊上，结尾这样写道：“小心点，布哈林同志，你经常在党内进行争论，或许你一定还会这样办。但是总有一天你现在的同志们将要把你交给阿格拉诺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去审判。榜样是有感染力的。”

这样看来，布哈林的遭遇带有一出历史大悲剧的性质。这出悲剧的结尾是如此的悲惨和恐怖，因而人们对他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有意和无意而促成这出悲剧的罪过，就能加以谅解，并且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了。这最后一幕构成了悲剧的实质，使它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用这种方法去判断一本传记就象是去理解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很显然，这不是科恩的原意。他想从，甚至也希望我们从布哈林的波涛起伏的一生中得出政治结论。他的传记想为历史作出一番贡献，但却使历史学家们碰到一个麻烦问题。假定斯大林早死二十年，假定布哈林离开政治舞台，象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那样，在默默无闻的退休生活中渡过他的晚年，那么一个失败的伟大领袖布哈林的传奇还会写出来吗？

布哈林传的作者所用的资料有许多迷惑人的地方，就人们所知道的情况或可能知道的情况来说，布哈林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一样（列宁和托洛茨基除外），在私人文件和通讯方面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对他的私生活和思想我们也搜集不到什么有特殊意义的材料。布哈林发表的著作（包括书、小册子、文章和无数的演说）是很丰富的，只是不可能搜集齐全。但一本内容相当丰富的书目提要却出版了（虽然科恩先生引用的是英文版，而不是内容全面而系统性强的德

文版)。

面对这样一大堆原始资料，谨慎的传记作者必须进行选择。布哈林是一个有魄力的作家和演说家，他的文笔流畅、清楚，很有说服力。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对那么多有分歧的问题写文章、作报告，有时会陷入自相矛盾和互相抵触的境地，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即使象列宁这样坚强而又自信的人也难免如此，况且布哈林的见解又向来是以灵活多变著称的。在布哈林的主要理论著作中，科恩先生对他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作了公正的评价，此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写成，是对当时流行的奥地利“边际效用”学派的尖锐批判。同时，他还把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同他和列宁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评论，而把《过渡时期的经济》当作战时共产主义乌托邦观点的产物，但却没有明显地提到他后来同罗莎·卢森堡的争论，只把这篇文章列入他的“参考书目选录”中了。

科恩先生仅仅是对布哈林的一部理论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详细的分析，此书在1921年出版，曾有几年的时间被公认为是党内重要的权威性著作。科恩很精明地观察到，这本后来被指责为右倾的书，却几乎和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同时完成，而后者却表现了布哈林著作中的极左观点。科恩先生还指出，该书有一部分是直接针对波格丹诺夫的，而布哈林又曾经支持他去反对列宁。该书充满了启发性的观点，对于研究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理论中的各种奇谈怪论的人们来讲，从中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思想根源。但是，

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科恩先生的评论和布哈林这本书，人们反而无法确定布哈林究竟是属于哪一派的人物。他那敏锐而灵活的头脑，他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长期研究，使他成为党内权威人物，而党内其他领袖们在1917年以后则几乎没有时间来作一些抽象的理论研究。但是作为一个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布哈林是远远落后于罗莎·卢森堡和葛兰西的。

布哈林的声誉在于他对二十年代苏联政治和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意见分歧的重点。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们对文献和回忆录中各种论据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布哈林的品德是没有问题的。他的人情味比任何其他领袖都浓。他喜欢乱涂上几笔讽刺画；喜爱飞禽和小动物；不管他的理论如何，他对于暴烈行为有一种本能上的厌恶。

但是还有一面也是不能抹煞的。不可否认，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政治行动常常与他的政治倾向不符。当托洛茨基在1925年的党代会上斥责布哈林有迫害自己对手的嗜好时，他以不可思议的矛盾心理写信给托洛茨基：“对于这种嗜好，我全身都在发抖。”科恩先生说，托洛茨基所描写的布哈林倚在他的肩上哭泣一事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为什么不可信呢？1928年7月，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有过一次密谈，几小时之后加米涅夫描绘了当时布哈林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这使得托洛茨基的描写似乎完全是可信的（顺便说一下：科恩先生在引述加米涅夫对这次会谈所作的简略记录

时，删去了这一节)。这种过分人情味的弱点并没有使我们改变对布哈林的同情心，是万恶的命运将这位秉性如此善良的人抛进革命的动乱中了。过分人情味的弱点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于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布哈林的评价。

研究布哈林的政治生涯，必须从1912——1914年他在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同列宁初次建立关系时开始。在和侨居国外的列宁有着不同程度联系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中，布哈林是一位智力敏捷、受过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人；列宁也明显地为他特有的魅力所吸引，称他为“全党的宠儿”。1915年，布哈林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以皮达可夫为首的小组。皮达可夫和罗莎·卢森堡、拉狄克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和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毫无关系的国际性纲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布哈林和列宁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由于当时列宁已把民族自决看作是通向革命的重要阶段，并献身于它，因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布哈林发展了被列宁称之为“半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职能的观点，使冲突更加尖锐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正如科恩先生所说，列宁“众所周知的好争论的脾气”是要负责的。1916年，列宁第一次公开了他对布哈林的看法，说他“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极不坚定”。在前一个问题上（和马林诺夫斯基事件有关），完全可以说布哈林是正确的，而列宁错了*；在后一个问

* 马林诺夫斯基是沙皇政府莫斯科保安局的密探。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和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07年起，主动向警察局提供情报，1910年被录用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

题上，以后发生的一切表明，列宁是正确的，有洞察力。

上述的争论并没有使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持久地激化，虽然科恩先生在探索他的英雄对列宁战时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的影响方面显得有点过于热情，但这两篇文章确实反映了两人思想上趋于一致。然而，革命胜利后，布哈林却参加了党内的所谓“左翼反对派”，激烈地反对与德国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且为战时共产主义各项措施找到了理论根据。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一本经典的乌托邦式的教科书《共产主义入门》。

第二件激怒列宁的事是布哈林企图调和列宁和托洛茨基1920年底在工会前途问题上发生的激烈斗争。其原因可能是列宁认为布哈林受托洛茨基个人的影响太深；也可能是列宁仅仅因为一个年轻的轻量级拳击手居然想介入两个重量级拳击手的斗争而被激怒。这一次使列宁对布哈林作了尖锐的评论：“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使人非常喜欢而且不能不喜欢的特点。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做‘软蜡’。就是说，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

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14年根据内务部指令躲到国外，力图接近列宁。布哈林首先向列宁指出此人不可靠。由于列宁当时住在国外，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因此没有接受布哈林的意见，并认为他“轻信流言蜚语”。十月革命后终于弄清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面目，并于1918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关于这件事，列宁曾指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迅速更替，使我们必须把总指挥部即党的领袖们特别‘隐藏起来’，藏得特别秘密，这有时就会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这一事实。”（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7页）——译者注

‘恶意煽动者’都可以在这块‘软蜡’上任意雕刻。’*’

继之而来的事件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就在几个月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布哈林又从党内的极左立场转到右边。对列宁来说，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是“退却”，而对布哈林来说，却是“我们的幻想的破灭”，他“童年时代的幻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理由设想列宁会失去对布哈林个人的喜爱。但科恩先生反复提到的关于布哈林在列宁临终前几个月同他特别亲密的几件事，却是来自靠不住的二手材料，因而，最好是把它们归到不足凭信的布哈林轶事之例。当时的文献记载是十分清楚的，在列宁清醒的政治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转而向托洛茨基求助，共同去反对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在对外贸垄断上的攻击；反对格鲁吉亚事件中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立场。

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布哈林的评价往往混乱不清和前后矛盾。列宁除了称布哈林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外，又说“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他的理论观点里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理解辩证法。）”科恩先生把这一点同列宁对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采取“折衷主义”而不是“辩证法”态度的批评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如果辩证法正如列宁所坚决主张的那样，是理论和实践

*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2卷第34--35页。——译者注

的统一的关键，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布哈林在抽象的理论方面是杰出的，但却不知道如何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总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实干家。这个结论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

然而，如果要求把布哈林真正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和国务活动家，那就必须以他1924——1928年的农业政策为依据。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这就是在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仍然是相当原始的农民的国家里，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或者任何一种形式的工业革命。新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对处于暴动边缘的农民所做的必要让步，1923年的“剪刀差危机”给国内以同样深刻的教训，再也不能对农民进行压榨了。1924年季诺维也夫提出一个戏剧性的口号：“面向农村”。布哈林由此走到了极端，以一种极不老练的坦率，乞求富裕农民“发财吧！”不加限制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从1925——1927年间，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布哈林的政策得到了合理的推行。这就是使工业化的速度适应农民的能力，布哈林在另一场合还轻率地说过，这是“蜗牛式”的工业化。这种政策遭到托洛茨基及所谓党内“左派”的反对和谴责，而这却使它得到斯大林和党的机构的大力支持。布哈林热情地投入了战斗，托洛茨基被指责为不关心农民，挨了一闷棍，因而败下阵去。

当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在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后，对布哈林的清算也快来到了。在这些

年代，布哈林对农业政策的积极贡献，就是鼓吹生产者合作社。但这实际上不过是布哈林前几年滔滔不绝地吹嘘过的、和布尔什维克乌托邦一样抽象的民粹派乌托邦。他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中心。谁来付粮钱呢？发了财的农民要求“致富”，谁又为他们提供条件呢？而同时，谁又来养活工厂的工人和城镇居民呢？到1927年底，两次大丰收以后，仓库、草棚以及任何藏得住粮食的地方都堆满了粮食。货币贬值了，而且，可买的东西也少得可怜，富裕农民得出结论：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了。

这场危机给布哈林以致命的一击。“赌注压在农民上”终于失败了，不是败于托洛茨基之手，也不是败于斯大林之手，而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诱导农民出售粮食。饥饿威胁着城市。在1928年最初几个星期，从斯大林起所有主要的领袖们都下到俄罗斯各个地区的农村，组织收集粮食的战役：能说服的就说服，必要时就用武力解决。这是苏联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期和生命攸关的转折点。只有布哈林还留在莫斯科后方，去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外国代表们解释：当时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是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同他们打任何交道现在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而关于粮食危机的问题却没有人提及。

粮食收集战役在短期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农村有粮食，并且也收集来了。但是根据1928年苏联的情况，说服和高压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小的，这场收粮运动是反对农民的“内战”的开端，布哈林是极其担心的，而他的政策却无力

防止“内战”的爆发。

那种认为轻而易举就可以征集到粮食（这样的征集已绝不能再搞了，因为大量的储备已经耗尽，农民反抗的准备做得更好了）的欺人之谈冲昏了莫斯科“超工业化主义者”的脑袋，这些人相信，要使他们落后的国家高度和高速工业化，除了坚强的意志和无情的决心外别无他法。政府实行了彻底的高压政策，结果导致了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的大恐怖。

当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并答应将来要同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行动、“首先，是右倾”作斗争后，从1928年夏天到1929年11月，布哈林一直因蒙受羞辱而沉浸在极度的痛苦里，这在本书有关章节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科恩先生为他的英雄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稍微夸大了布哈林的不满和抗拒的姿态，这通常是在密室或者在只有内场人才懂得的暗语中表达出来的，但却略去了布哈林为求得妥协而进行的无效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尝试。托洛茨基把布哈林这一时期的语言说成是“行将溺死的人所冒的气泡”，这话是刺耳的，但却与事实相去不远。

读了科恩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意识到形成本书的一些特定的因素（也许完全是无意识的）。他在前言中曾两次不点名地提到依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人们有这样的印象，他已经或多或少地、很审慎地接受了这场挑战，并打算象多伊彻为托洛茨基辩护那样，也为布哈林作些辩护。但不

幸的是这场挑战本质上是针对科恩先生的。他自命为布哈林的传记家和辩护士，并凭这资格赢得了人们的高度称赞，但是他的主题从未超越布哈林的个人悲剧。多伊彻的杰作的唯一功绩，是他把托洛茨基的个人成就和本身的悲剧看作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巨大的历史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恩先生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一种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

此外这一番比较导致了一个更为不幸的论断，这一点在前言里还表露得比较含蓄，而在本书的简介中却非常清楚，这不可能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意。在这里作者据说是要表明，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严重威胁，从政治远见和领导才能来看，与其说是托洛茨基，还不如说是布哈林。

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古怪的论断了。托洛茨基的脾气不好，常作出有重大错误的判断。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来说，他的缺点同布哈林一样严重，虽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有一点上，即他的政治信誉却是无可挑剔和无可比拟的。从斯大林上台掌权的一刻开始，直到十五年后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为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和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只有一个主题，一个摆脱不了的思想，那就是：他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所维护的每一件事的死对头。

布哈林的历史却与此毫无共同之处，这是科恩先生的传记评论者们所难以回避的。因为在那最关键的三、四年，即当斯大林建立他对党和国家的牢固的控制权、击败他的反对派的时候，布哈林是他的积极的追随者。说得好听一点，他

的确是斯大林手中的“软蜡”。在1928年初的头几个月里，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以后，知道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不再需要布哈林的帮助了；而布哈林也为斯大林政策的激烈和严厉日益感到不安。谁最先制造决裂？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是斯大林在那里发号施令，操纵一切。根据公开的记录，布哈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或写过一句攻击斯大林的话，从公布的秘密会议或私人谈话中的只言片语来看，布哈林不具备一个斗士的品德。

斯大林也从来没有把布哈林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对手。他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后来的柳京集团不一样，他一直没有被开除出党，也没有被逐出莫斯科。当他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后，虽然解除了所有负责的职务，但不是低声下气地、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工作。1934—1936年，他作为《消息报》主编，当苏联加入国联后，他还忠实地为反对希特勒的斗争服务。他还是1936年著名的《斯大林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一点，知道的人是不多的。就布哈林来说他没有任何不忠于斯大林的行为，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几乎毫无目的的病态的报复性格，竟将布哈林推入最后一次大清洗审判的血泊中。

在科恩先生对布哈林的评价中还有一些次要的和比较一致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在美国自由派人士中特别强烈地存在着的一种希望：相信好人可以成为开明的政治领袖。愤世嫉俗者可能怀疑这一结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劳合·乔治和弗兰克林·罗斯福都是伟大的政治领袖，但可能算不得

很好的人。

乔治·麦克高文和埃德蒙·马斯基都是极好的人，他们具有人道主义的理想和无可怀疑的原则性。但是五十年后，为他们二人任何一位写传记的作家，要是把他们描绘成被令人厌恶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恶毒阴谋挫败的政治领袖的话，这位作家就是在严重的歪曲历史。而这恰恰是科恩先生在为布哈林写传记时发生的问题。

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一个评论者要是不能赞同作者对他的主人公的经历的看法时，那么最后还是应该称赞作者在处理材料及引用文件方面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似乎是公正而合理的。（至于出版者顽固地拒绝承认一本学术著作的资料注释最好应该放在书页下边，这就不是作者的错误了。）只是在少数几段中，值得一提的是涉及到列宁一生最后几个月和布哈林一生最后几个月的事，作者才是根据事隔多年而值得怀疑的传说写的。但是，即使目前流行的看法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地位已经改变了，而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于科恩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还是非常感谢的。

（倪玉生、洪历建译自英《泰晤士日报》文学副刊 1974年
9月24日3785号，陈为汉校）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官方评论布哈林和 “联共（布）党内右倾”资料选编*

本文编译者说明

一、本辑收集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首脑人物讲话、党政决议以及重要书刊中评论布哈林和“联共（布）党内右倾”的有关资料。《苏共党史》中有关布哈林的论述另有专辑，这里从略。

二、材料一律按发表的年月先后排列，以示论点的发展。为了阅读方便，将若干重要字句用黑体字标出。如要引用，务请核对原文。

联共（布）党内右倾——右倾的投降主义集团；党内的富农代理人，是在各个战线上展开社会主义攻势时期共产党内部的主要危险。随着1928年——1929年党内富农阶级进攻，

*对布哈林的重新评价及对其思想的研究，这一问题必然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苏共历史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已引起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正如198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各国学者所指出的，对布哈林的平反只能由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来解决。现在，苏联究竟对布哈林问题持什么态度和看法，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特请王墨等同志编译了这篇资料，供进行学术研究时参考。——译者注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其他右倾投降分子和资本主义复辟分子们便撕去了假面具，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以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共产党彻底揭发了右倾投降分子是列宁主义的敌人、党内富农的代理人和反革命集团。以后，右倾分子们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一个共同反对苏联人民的匪帮，成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1936年——1938年揭发了许多关于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机关服务的间谍、暗害分子、暗杀分子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帮的反革命活动的新材料。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彻底粉碎了这些人民公敌。

《苏联百科辞典》1955年版条目（1954年4月付印）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已被粉碎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由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孟什维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秘密反苏集团结合而成。这个联盟曾依照资本主义国家侦探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于1932年——1933年组成，其目的是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分裂苏联；它进行密和破坏活动，阴谋刺杀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员暗。1938年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一批托洛茨基—布哈林恶魔被枪决。苏联人民一致拥护粉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并且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苏联百科辞典》1955年版条目（1954年4月付印）

1923年4月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约·维·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所支持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者。

共产党在约·维·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粉碎了叛徒和投降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人民的其他敌人，他们企图使党和国家脱离列宁的道路，走上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提出了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和苏联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右倾投降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复辟派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党集团公开活动起来了。不击溃这些叛徒，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农村获得胜利。约·维·斯大林的演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对于党战胜布哈林、李可夫反动集团具有重大意义。约·维·斯大林在这些演说中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列宁主义的敌人，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1936年12月5日，在非常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批准的苏联宪法，把苏联人民获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固定下来了……共产党在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在这个时期中彻底消灭了外国侦探机关的走狗托洛茨基—布哈林两面派、间谍、破坏分子、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的反革命巢穴。

《苏联百科辞典》1955年版

《斯大林》条目（1954年4月付印）

有些同志，因为看到近来采取了一些增加人民消费品生产的措施，因而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就糊涂了。……他们企图……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的生产》（1955年1月25日）

联共（布）党内右倾——社会主义全线进攻时期构成共产党内部主要危险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右倾分子企图使党和国家离开列宁的道路，走上一条使无产阶级革命成果丧失，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道路。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一样，右倾首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同伙是孟什维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和继续，是外国侦探机关的间谍。

右派的魁首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早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就曾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弗·伊·列宁。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建立的最初之日起，他们就从事反对共产党、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斗争。1922年，弗·伊·列宁曾经痛斥布哈林是耐普曼、投机商和富农的思想家。

党内右倾的形成是和国内1928年——1929年间所发生的

阶级变动有联系的。当党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的时候，右倾资本主义复辟分子就特别起劲地、公开地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在共产党于1926年——1927年间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时期，右倾分子把自己力量作为后备军，并不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分子，以赢得时间。随着共产党转向富农发动决定性进攻，布哈林—季可夫集团撕下了假面具，开始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路线。右倾资本主义复辟分子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熄灭的“理论”，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上反对党的总路线。在1928年的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右倾投降主义者要求放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托洛茨基分子一样，布哈林—季可夫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维护国内资本主义分子的利益，实行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暂时还用“左”的词句来伪装这一条路线，那末，由于党和苏维埃政权过渡到向富农进攻而活跃起来的布哈林分子则公开保护国内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右倾资本主义复辟分子反映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对企图阻挠粮食收购从而使工人阶级、城市居民和红军的粮食供应受到威胁的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右倾资本主义复辟分子要求放慢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压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取消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调节作用。他们保护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自由发展。共产党坚决粉碎、摒弃

了右倾投降分子的计划。1929年联共（布）十一月中央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就不能留在党内；全会将布哈林作为右倾的思想家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这次全会上右倾分子领导人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他们声明放弃自己的反党观点，但事实上他们更加强了反党斗争。后来查明，右派准备了反革命的富农暴动；布哈林曾同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密谋杀害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右倾分子按照外国侦探机关的直接指示，在国内进行了破坏活动。1930年党揭发并粉碎了“右派和‘右倾’联盟”：一个站在右倾资本主义复辟分子立场上的司尔佐夫—洛米纳泽—沙茨金反革命集团。

在国内失去了所有社会支柱之后，右倾投降主义者于1932——1933年间参与了反苏的联合组织——“右派—托洛茨基联盟”。1937年的联共（布）二至三月中央全会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党。1938年对反苏的“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审讯彻底揭发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全部滔天罪行。这一间谍和杀人犯罪帮遭到了彻底的覆灭。

共产党也粉碎了右倾投降主义者使共产国际政策走上社会民主主义轨道、瓦解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企图。右倾也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联共（布）党内右倾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紧密联系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推行了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路线。布哈林反革命的假科学“理论”的宗旨在于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其他国

家挽救资本主义，揭穿这些理论，对于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尔什维克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粉碎了右倾资本主义复辟分子，捍卫了列宁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引导苏联人民走上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34卷条目（1955年6月付印）

我们党的团结是经过好几年、好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团结在同无数敌人的斗争中更加坚强了。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的人民的死敌，那些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曾经拚命地设法从内部破坏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可是他们都在这一团结的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总结报告（1956年2月14日）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作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场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党也进行了巨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反对自己队伍中那些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主张执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人们。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

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到，如果1928年——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把赌注放在“印花布工业化”和富农的身上，其结果将是怎样呢？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措施。

正是1935年—1937年—1938年这个时期内，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

分子……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知名的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在声明中写道：

“我的大部分的招供是由乌沙柯夫口述给我的，其余的是根据记忆抄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西部西伯利亚的材料，把内务人民委员会材料中所引证的事实都加在自己头上。当乌沙柯夫和我所臆造的这些神话有些牵强附会的时候，就迫使我另写一个。对卢希英维奇也是如此，起初把他列入“预备总部”而随后丝毫未对我说又把他除名了。对于似乎是布哈林在1935年所创立的“预备总部”的主席也是如此，开始我把自己写上，但后来又让我写上梅日拉乌克及许多其它的情节……”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1956年2月25日）

列宁逝世以后，敌对派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党内活跃起来了，他们采取了抛弃列宁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的立场，这样实际上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党对列宁主义的这些敌人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约·维·斯大林长期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同其他领导者们一道，为实现列宁的遗训而积极斗争。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他领导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

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的斗争。在这个政治和思想的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1956年6月30日)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遵照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提出农业集体化已成为党和苏联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党中央政治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在这一时期，布哈林、李可夫和托洛斯基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集团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在约·维·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右倾》（1928年）、《论联共（布）党内右倾危险》等报告中，揭露了代表富农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约·维·斯大林……在实现列宁的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中，在为建成社会主义，为苏维埃国家的独立和为巩固和平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方面的巨大功绩应归功于约·维·斯大林。约·维·斯大林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把它应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巨大意义。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0卷《斯大林》条目（1967年付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对各种与列宁主义敌对的派别和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一切企图使党脱离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斯大林同列宁的其他学生和战友一起勇敢地捍卫了无产阶级同阶级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的利益，坚定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

斯大林的《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和《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等著作打击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热情地捍卫了列宁主义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学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苏联人民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便使自己的国家从世代代的落后状态发展到经济繁荣的地步，使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各国人民友谊的堡垒和具有发达的工业、社会主义大农业和高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的业绩在全世界看来，真是无法解释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为贯彻列宁的规划而奋斗的斯大林，由于具有卓越的理论家和组织家的才能，由于同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党内和党外获得了很高的威信和

广泛的声誉。

苏联人民和所有进步的人类过去和今后都永远给予斯大林以应得的一切，尊敬他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功绩。

《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文章：《约·维·斯大林
(纪念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1959年12月)

在列宁的领导下，党制定了根本改造国家的计划，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

党在反对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分子，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偏向分子和其它敌对集团的尖锐斗争中维护了这个计划。党动员了全体苏联人民为实现列宁的指示而斗争。

当时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并在经济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共产党纲领》第一部分第二节(1961年)

批评个人迷信和根除它的有害的后果的同时，应该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而斗争。对于任何思想领域内出现的借口批评个人迷信而为托洛茨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民族倾向主义和其他早已为党粉碎和公正地抛弃了的反列宁主义思潮辩护的一切企图、对于抹杀或中伤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巨大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一切企图、对于中伤和辱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党和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切企图、对于中伤和破坏马克

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切企图，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

苏斯洛夫：《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社会科学教
研室的任务》（1962年2月）

这个条子上还写道：“学生们常问，布哈林等人是否是外国间谍？您给我们出个主意，该怎样讲授？”

我可以声明，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苏共二十二大的文件，就能够说，布哈林也好，李可夫也好，当然都不曾是间谍和恐怖分子。

巴·尼·波斯别洛夫在全苏改进历史科学科研和教
学干部的培养工作会议苏共党史组的总结发言
（1962年12月）

布哈林，尼克拉·伊万诺维奇（1888—1938）——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各区担任宣传员。1911年侨居国外。1915年为《共产主义者》杂志撰稿，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持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同皮达可夫和博什建立反党集团。十月革命前夕维护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俄国取胜的论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抛出反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提纲，否定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真理报》编辑，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多次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政策；1918年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1920年——

1921年党内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先采取“缓冲”立场，后参加托洛茨基集团；1928年起领导党内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7年因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27卷以及若干卷所附人名索引（各卷评介繁简不一，但调门相同。
1962年——1965年）

党保持着总方针的继承性。党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分子以及其它反列宁主义派别和集团的不调和斗争中捍卫了这个方针。

苏共中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提纲（1967年6月25日）

我国半个世纪来所走过的光辉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和暂时的挫折。除了由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落后所引起的各种困难以外，苏维埃国家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我们党在同托洛茨基分子、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民族偏向分子以及其它反列宁主义派别和集团的激烈斗争中，捍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外，党势必还会遇到另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担任新的、前人从未经历过的人类未来道路的开拓者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所引起的。

苏斯洛夫：《伟大的五十年》（1967年）

党在解决这些任务的时候，向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它反对派集团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的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压力。反对派否认首先在我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巩固性，他们企图使党离开列宁的道路。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了反对派，从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捍卫了列宁的总路线，加强了自己队伍的团结。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67年11月3—4日）

作为大理论家和组织者，约·维·斯大林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领导了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斯大林用自己的理论著作和实际工作对列宁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纪念约·维·斯大林诞辰九十周年》（1969年12月21日）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害怕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并不是偶然的。苏联人民的敌人总是疯狂地反对共产党，因为他们懂得，如果他们能够削弱它，那就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反革命甚至抛出了“要苏维埃，但不要共产党人”的口号。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其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力图破

坏共产党，在党内制造从事破坏和分裂活动的派别，企图使工会、共青团和其它群众组织脱离党。

列宁留下的思想遗产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手中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有效武器。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 在迫害共产党人的同时，正在千方百计地妄图从思想上瓦解工人阶级政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修正主义身上，力求离间各国共产党，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并使它们相互对立。

苏斯洛夫：《列宁主义和世界的革命改造》（1969年）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遵循列宁关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把实现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和苏联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阐明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1928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10月）、《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等报告中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推行的那条有害的路线进行了揭露。虽然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发生了过火行为，对这些错误，斯大林也负有责任，但是由于党在斯大林的参加下采取了一些坚决措施，这些错误得到了纠正。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3卷《斯大林》条目（1971年）

联共（布）党内右倾——1928年—1930年间由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集团领导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帝国主义者企图阻挠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国内的资本主义分子——耐普曼和富农——激烈反对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伴随着对巨大困难的克服。在这样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及阶级斗争尖锐化，加剧了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动摇，他们的情绪侵蚀了工人阶级，并通过工人阶级带进了党内。结果在党的队伍内部形成了右倾，这一右倾表现为“……企图降低大工业的建设速度并阻止它的发展，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抱着轻视或否定的态度，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富农的斗争估计不足并企图抹杀这种斗争……”

（苏共决议汇编第三分册第477—478页）右倾首领的机会主义立场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此以前，即早在十月革命以前时期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就有过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动摇，他们不止一次地反对过弗·伊·列宁关于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右倾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在苏联，只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落后形式，而且所用的时间将是漫长的，建设速度则是极其缓慢的。右倾分子歪曲弗·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硬说农民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供销合作社。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归结为调整那些据说是和平共处的不同阶级

和社会集团（其中也包括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阶级斗争熄灭以及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点。右倾分子的这些理论观点是他们政治立场的基础。他们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因此要求降低工业化的速度、缩减基本战线的投资。他们认为，消除农业落后的可能性既不在于技术改造，也不在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于全面发展并巩固个体农民经济，首先是富农的经济。他们轻视或简直无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任务，对实际解决这一任务的做法予以抵制；他们主张在粮食收购中停止对富农施加压力，免除对他们征收的特税，主张最大限度地提高粮价以及市场关系自由化。右倾的政治纲领客观上等于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下放弃社会主义阵地，使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归于失败。1928年初，右倾分子公开发动了反对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制定的党的路线的斗争。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1928年6月给联共（布）中央的信陈述了他们的政治观点。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提出加强反对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的斗争任务。右倾分子置中央全会决议于不顾，转而采取了派别斗争的方法。1928年7月，布哈林跟早已被击溃的“新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列·波·加米涅夫举行了谈判，打算联合起来反对中央和党的政策。1928年9月，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妄图诋毁党的政治路线。右倾首领企图使追随他们的尼·亚·乌格拉诺夫所领导的莫斯科党

委会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庭抗礼。1928年10月18日，联共（布）中央在《告联共（布）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中谴责了右倾分子的行为。十月，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表示坚决支持党的政治路线。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参加了联共（布）中央关于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提纲起草委员会，公然以自己的观点和中央路线相对抗，但遭到了反击。为了对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政策，为了表示抗议，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可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和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集体提出辞呈。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认为辞职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右倾首领收回了辞呈，但同时坚决要求党停止反右斗争，并给予他们以不受阻挠地散布其观点的机会。在1928年联共（布）十一月中央全会上，右倾分子继续将反列宁主义的方针强加于党。全会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并指出：右倾已经转变为党内的主要危险。1928年12月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右倾分子企图使工会与党对立，谋求工会八大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在工会中鼓吹工联主义，公然无视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但大会拒绝了右倾分子的要求，表示支持联共（布）的政治方针。在1929年1月30日与2月9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右倾首领提出了一个正式与立足于中央路线立场的纲领相对抗的新的声明。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举行联席会议，

确认右倾分子的观点是和党的总路线相对抗的，要求右倾首领停止派别斗争。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全苏代表会议批准了联席会议的决定。布哈林被撤销《真理报》主编职务，托姆斯基被撤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稍后，李可夫被撤销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在共产国际，右倾分子支持外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重新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列宁早在1916年就批驳了这一理论，斥之为站不住脚的和反对革命的。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右倾遭到了批判。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解除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并将其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但是，右派继续进行斗争。1929年联共（布）十一月中央全会宣布：右倾追随者的观点是同党籍不相容的。布哈林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严重警告。右派首领向中央递交了承认其错误的声明。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批准中央全会关于右倾的决议并警告其首领，他们只有为党的路线积极斗争，才能表明自己心悦诚服地承认了立场错误。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和共产国际，右派被定性为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约·维·斯大林（当时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安·安·安德列也夫、米·伊·加里宁、谢·米·基洛夫、斯·维·柯秀尔、瓦·弗·古比雪夫、阿·伊·米高扬、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巴·彼·波斯蒂舍夫、扬·厄·卢祖塔克等人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曾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右倾的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

从组织上和政治上粉碎右倾，对于顺利地实现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20卷条目（1975年付印）

……斯大林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同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苏联取得胜利的学说的斗争中，在加强党的团结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斯大林的著作……《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等在宣传列宁的思想遗产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实现了列宁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按其复杂性和全世界历史意义来说是巨大的革命改造。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同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斯大林也作出了个人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关键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它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能进行技术改造，保证苏维埃国家的国防能力。进行革命改造的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发生了过火行为。对于这些错误斯大林也负有责任。但是，由于在斯大林的参加下，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错误被纠正了。文化革命的实现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24卷《斯大林》条目（1976年付印）

这个党保卫了自己的路线，并始终不渝地把这条路线贯彻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的原则性斗争中，保障了党的队伍的列宁主义团结。

《苏共中央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
的决议》（1977年1月31日）

关于恢复布哈林的党籍和苏联科学院院士资格的要求不能满足，因为对布哈林进行判决的依据——关于其罪行的指控尚未撤销。

据西方报刊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出版物透露的苏共
中央官员克里莫夫对尤·拉林（布哈林之子）
的电话答复（1977年6月9日）

联共（布）党内右倾——1928年—1930年间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首领是尼·伊·布哈林、阿·伊·季可夫、米·巴·托姆斯基等人），否认我国有高速工业化、发展重工业、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宣扬阶级斗争熄灭和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右倾派别受到全党批判后不再存在。

《苏联百科辞典》1980年版条目（1978年付印）

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人民建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勋：击退了装武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历次进攻，确定了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开始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仅在二十年里我国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岁月里，苏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根据列宁的指示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同时，党增强了国家的防御能力。苏联的国际威望、它的榜样的力量、它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影响增大了。

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干部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人当中也有约·维·斯大林。他积极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事业。他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在这一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得到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

《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纪念约·维·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1979年12月21日）

即使在斯大林活动的年代里，我党在主要方面、在基本方面仍然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列宁主义方针……

以事后聪明为能事的反苏分子写道，在党的影响下，苏联人民高速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从而造成许多困难和匮乏。当然，当时是高度紧张的，我国居民经常对最需要的东西感到极为缺乏，而帝国主义的包围又大大促进这一点。但是，苏联人民自觉地为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作出牺牲。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国家战后的恢复和发展都证明了这种牺牲并非徒劳的。

有人指责我们，在国内强行实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他们完全故意不提，集体化进程是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时候就开始了，而农民向集体农庄的“伟大转折”，坚决的转变（今年是这样转变的五十周年）是由绝大多数再也不愿意在贫穷、无知和资本主义奴役的境况下过日子的农业劳动者的长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经验所准备的。这是群众自身的运动……

尽管在这方面也是有错误的……

……斯大林对许多曾经参加过或实际并未参加过各种反党集团和反党倾向的人采取了专横的作法。五十年代，那些受到诽谤或者未按罪量刑的人恢复了名誉，而那些犯有越权和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人则受到了惩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给与对那些已经达到搞破坏和鼓动推翻苏维埃制度的蓄意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政治赦免。我们党一贯警惕地保护党的思想上的团结和组织上的团结，也一贯不允许在党的队伍中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

《共产党人》1979年第18期编辑部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问题》（1979年12月）

布哈林是列宁一贯和最顽固的政治反对者之一……

1917年，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相适应，布哈林企图表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革命胜利后，他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分裂派别……

布哈林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路线，他不相信在俄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921年，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他与托洛茨基一起想以军事官僚领导群众的方法强加于党，从而破坏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团结，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加强了对列宁主义的攻击。从1925年起，他就开始机会主义地宣扬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国家经济领域中的和平共存。二十年代末，他以此为基础，制订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政治纲领。党粉碎了右倾的投降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图谋的失败，成为党在困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团结的重要因素。

苏联人忠于党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他们坚决谴责任何削弱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地位的企图。因此，苏联劳动人民不会忘记那些布哈林分子的复辟计划。对苏联劳动人民来说，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只不过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时期为阻止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企图而已。

约·伊凡诺夫：《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载于1980年6月苏联驻意大利使馆《新闻公报》

（王器 马吉霞摘编）